苏联科学院主編

世界通史

第十三卷上册

東方出版社

苏联科学院主編

世界通史

第十三卷下册

东方出版社



世界通史

第十三卷上册

C·A·齐赫文斯基(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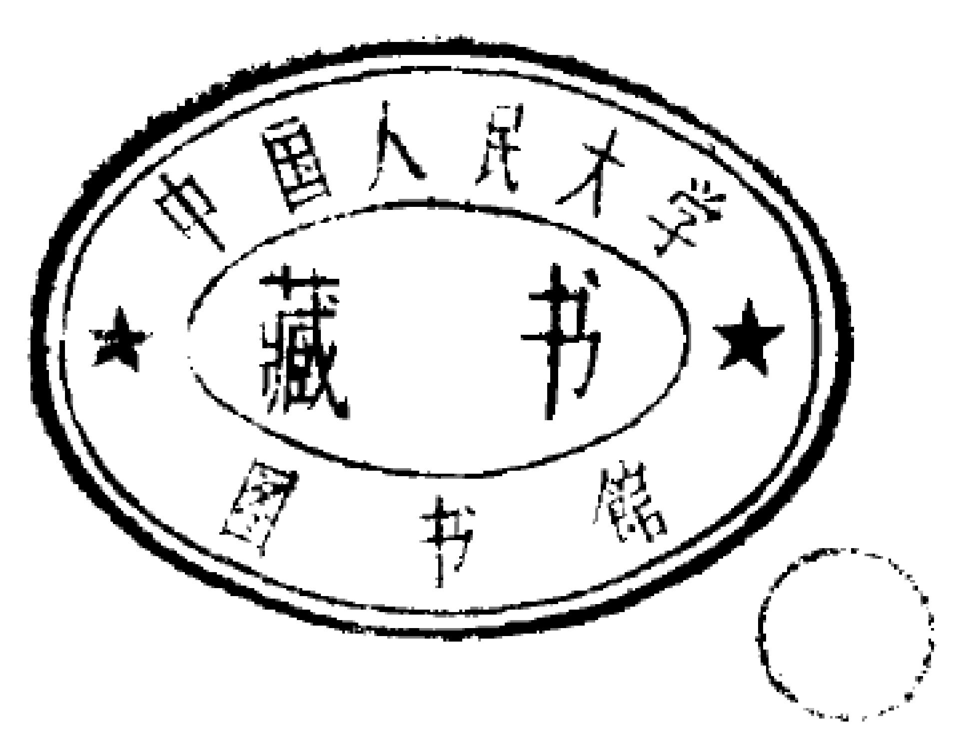
C·И·维斯科夫,P·Ф·伊万诺夫(副主编),

H·П·卡尔梅科夫,Г·Ф·基姆,M·П·基姆,

H·И·列别杰夫、A·Я·马努谢维奇,M·A·

波尔塔夫斯基,Б·C·波波夫,A·O·丘巴里扬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



東方出版社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ТОМ XIII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С.Л.ТИХВИНСКОГ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С.И.ВИНСКОВА, Р.Ф.ИВАНОВА

(зам.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редактора),

Н.П.КАЛМЫКОВА, Г.Ф.КИМА, М.П.КИМА,

Н.И.ЛЕБЕДЕВА, А.Я.МАНУСЕВИЧА,

М.А.ПОЛТАВСКОГО, Б.С.ПОПОВА, А.О.ЧУБАРЬЯ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 Москва 1983

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1983年版译出，略有删节

世界通史 第十三卷

SHIJIE TONGSHI

主编/〔苏〕С·Л·齐赫文斯基

译者/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850×1168毫米32　印张/32.375　字数/911,000

版次/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1— 825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89-X/K·19　定价(上下册) 18.5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世界通史

第十三卷下册

С·А·齐赫文斯基(主编)

С·И·维斯科夫,Р·Ф·伊万诺夫(副主编),

Н·П·卡尔梅科夫,Г·Ф·基姆,М·П·基姆,

Н·И·列别杰夫 А·Я·马努谢维奇,М·А·

波尔塔夫斯基,Б·С·波波夫,А·О·丘巴里扬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



東方出版社

苏 联 科 学 院

世 界 史 研 究 所
苏 联 史 研 究 所
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
东 方 学 研 究 所

序　言

这次出版的《世界通史》第十三卷叙述的是1961—1970年这 5
十年的事件。1969年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进行这一时期的历史总结时强调指出："人类发展的主要道路是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已无力夺回它所失去的历史主动权，也无法逆转当代世界的发展"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反动力量和进步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的整个变化过程涉及到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

在两个相对抗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中，科技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上述时期，科技革命具有真正的世界性，但是，它对不同国家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影响并非完全一样。这更加紧密地关系到科技革命的社会经济后果和社会政治后果。在上述时期科学已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这一情况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共同的。科技革命使生产过程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变化。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把科技革命成就用来为垄断资本获得利益及增加其利润，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使科技进步为社会进步服务，把科技革命成果作为经济建设中前进的新的重大步骤，以便越来越充分地满足劳动人民的需

①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1969年6月5—17日于莫斯科)。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69年版，第280页。

要。

六十年代在苏联社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苏联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开始。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向苏联人民展示了新的历史前景。1961年10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其中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下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培育新人。苏共纲领确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指出了完善苏联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以及进一步发展科学、文化的途径。

科技革命成果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效结合是苏联在这一时期取得成就的基础，这保证了经济，首先是工业高速度的稳定的发
6 展。在1959—1970年这十二年内，苏联的工业实力几乎增加了两倍。这使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大大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苏联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十，而1967年，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时，它的比重已占百分之二十。

1950—1969年期间，苏联的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二，而美国为百分之四点五，苏联农业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八，而美国为百分之一点八。

苏联在六十年代开展的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劳动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政治道德意义，它对解决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任务起了促进作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培育了新人、实现了苏共纲领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规范原则。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完成为进一步迅速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六十年代提供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关怀人们的福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任务，也是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表现。

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千百万新的劳动者自觉地、积极地投身于创造活动和参加管理国家。以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式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已成为全民国家，成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政治组织。

六十年代不仅是苏联历史上，而且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各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许多兄弟国家正是在这十年里开始走上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上述时期令人信服地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国际性质。同时，一些最重要的民族问题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当每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真正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各国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的时候，始终不渝地执行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策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性。顺利地解决某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任务以及顺利地解决加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整个大家庭的国际主义任务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辩证法的具体表现。

把经济合作的重心转移到生产方面是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相互关系的特点。同时，贸易作为加强每一个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互利联系的因素，它的作用也增大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各国发展水平的逐渐拉平和政治合作的加强为转到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阶段——，创造了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继续在华沙条约组织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新旧事物的顽强斗争中，是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战胜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反抗和粉碎那些随时准备同上述力量进行勾结的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阴谋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相互关系，六十年代在解决国内问题和加强国际地位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作为当代的革命领导力量和世界范围内反帝运动的支柱，登上了国际舞台。

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实力的加强是促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变化这一整个进程得到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六十年代里，经互会各成员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三，而在同一时期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虽然经互会各成员国的土地只占地球的百分之十八，人口只占世界的百分之十，但是1969年的工业产值却约占世界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至1970年，在工业产量方面上述国家比战前发展水平增加了十至十一倍，而资本主义国家在同一时期只增加了四倍。

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使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及其国防威力得到了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所一贯坚决捍卫的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也逐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集团所承认。

争取和平仍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项主要任务。这显示了苏联外交方针的继承性，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1982年)上发言时说道："保障持久和平，维护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权利，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始终不渝的目的"①。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为实现列宁提出的"废除武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②这一著名的纲领性原则做了可能做的一切。

可是，社会主义国家为解决裁军问题所作的努力遭到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顽强抵抗。因此，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形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开始缓和的趋势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尚未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资本主义国家的险象丛生，失业人数增多，通货膨胀加剧，导致劳动人民加强了阶级斗争，首先是加强了罢工运动。与此同时，

① 《苏共中央全会资料汇编(1982年11月22日)》，莫斯科1982年版，第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3页。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活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劳动人民的社会灯塔、重要的历史航标、积极开展阶级斗争的动力，这对群众运动的质变起了促进作用。在这一时期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斗争目的，不只是为满足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而且是为争取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越南、阿尔及利亚和近东的斗争。六十年代群众斗争的活跃表现于美国的千百万黑人和白人反种族主义者的运动、美国和法国的广泛的学生运动以及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大规模政治罢工。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是拥护和平、维护各国人民友谊、争取实际贯彻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1961—1970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的过程仍在继
续。这个过程的急剧发展导致在这十年内有二十八个新的主权国 8
家宣告成立。

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在两个最重要的方向展开：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已获得解放的国家进行深刻的内部改造，以便摆脱原宗主国的束缚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六十年代的经验表明，要建立使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这在阶级斗争日益加剧和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民族解放力量的阴谋活动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居住着千百万居民并蕴藏有极丰富原料资源的广大地区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分离出去，导致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急剧缩小，促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变化。因此，帝国主义大国使尽一切手段企图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内，它们多次为此目的对阿尔及利亚、刚果共和国、安哥拉、几内亚、越南、老挝、柬埔寨、近东和古巴等各国人民使用武力。为了把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帝国主义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思想上采取了各种老的和新的压迫手段，尤其是经常利用

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帝国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援助而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作出让步。

然而，无论国内反动派，还是帝国主义势力都不能阻挡已解放国家中进步趋势的发展。六十年代后半期，有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和社会政治改革，这些改革都具有明显的反帝倾向性。已选择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巩固了自已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大力援助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和已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年轻的独立国家。这种援助对巩固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起了促进作用。

帝国主义原殖民地区革命进程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加强统一行动，在促使五十年代末进入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一系列现象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本主义阵地的不断削弱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存在的内部因素，二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之间全球斗争有关的对外政策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的辩证联系增大了它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破坏作用。

六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科技革命，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矛盾和社会政治矛盾更加激化。经济各领域的超级垄断化过程发展很快。这不仅使经济权，而且使政权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首先是集中到军界工业界集团
9 的代表人物手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反垄断阵线创造了先决条件。

全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说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日益发展。1967 年，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庆祝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伟大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总结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战后发展情况，确定了世界革命进程新的历史前景。

1970 年，隆重地纪念了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奠基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对这些纪念日的庆祝成为显示世界革命力量的团结一致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成就的盛大活动。

• • •

本卷所述的这十年中事态的发展使世界政治地图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首先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引起的变化。一方面是世界主权国集团因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从属地位而在数量上得到了扩大，另一方面是殖民帝国的范围急剧缩小。这两方面进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开始的、而在这十年内尚未完全结束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的继续。但是，各殖民帝国在1961—1970 年期间遭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例如，英帝国主义失去了一系列领地：欧洲的马耳他；亚洲的新加坡、南也门、科威特、马尔代夫群岛；非洲的塞拉利昂、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冈比亚、贝专纳、巴苏陀兰、毛里求斯、斯瓦士兰；南美和中美的圭亚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巴巴多斯；大洋洲的斐济和汤加群岛。

法国帝国主义被迫从阿尔及利亚（非洲）撤走；西班牙不得不让赤道几内亚独立。

获得独立的还有联合国的许多托管地，坦噶尼喀（英托管）；鲁安达-乌隆迪（比托管）；西萨摩亚（新西兰托管）；瑙鲁岛（英、澳、新西兰共同托管）。

六十年代末的世界形势图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这十年内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变化。

同时，从世界地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到这十年结束时，民族解放运动中还有哪些任务尚未解决。殖民帝国还继续存在。其中占第一位的是葡萄牙。它在非洲占领了诸如莫桑比克、安哥拉、比绍几内亚等大片土地。英、法帝国主义还保持有大量领地、殖民地和保护国，其中包括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在加勒比海的

岛屿。南非共和国继续占领着纳米比亚。

联合国交给美国托管的(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澳大利亚联邦托管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沿海岛屿、俾士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北部)各地的命运都未得到解决。

* * *

10 本卷正文是由下列作者执笔的：

序言——Р·Ф·伊万诺夫；第一章：第1—3节——В·С·列利丘克、Л·Н·利西齐娜、Н·Я·布朗利，第4节——Р·Ф·伊万诺夫和Н·К·彼得罗娃；第二章：前言——Я·Б·什梅拉尔，第1节——А·Я·马努谢维奇，第2节——В·Д·库利巴金，第3节——А·И·涅多列佐夫，第4节——А·И·普什卡什，第5节——А·А·亚济科娃，第6节——Л·Б·瓦列夫，第7节——Л·Я·吉比安斯基，第8节——Н·Д·斯米尔诺娃；第三章：前言——М·А·波尔塔夫斯基，第1节——Г·С·亚斯尼娜，第2节——А·Г·布达诺夫，第3节——Ф·И·库利科娃，第4节——А·М·格里戈里耶夫和С·Л·齐赫文斯基；第四章——Е·А·拉林；第五章：前言——Р·Ф·伊万诺夫，第1节——С·И·维斯科夫，第2节——С·Ф·莫洛奇科夫，第3节——И·И·日加洛夫，第4节——Е·А·克拉夫琴科，第5节——И·С·克雷默尔，第6节——Н·П·科莫洛娃；第六章：前言和第1—4节——А·С·卡恩，第5节——В·弗拉基米罗夫和Ю·科米萨罗夫；第七章：前言——М·А·波尔塔夫斯基，第1节——А·С·纳马佐娃，第2—3节——В·Г·奥夫钦尼科夫，第4节——Е·Ю·波利亚科娃，第5节——В·К·库钦斯卡娅，第6节——Г·П·德拉古诺夫，第七节——С·П·波扎尔斯卡娅，第8节——Р·М·卡普拉诺夫，第9节——К·Я·米哈伊利季斯；第八章：前言——М·А·波尔塔夫斯基，第1节——П·П·托佩哈，第2—3节——Д·Г·切列明；第九章——М·А·波尔塔夫斯基；第十章：前言和第1节——Г·Г·科托夫斯基，第2节——Ю·В·甘科夫斯基，第3节——Э·Д·塔尔穆德，第4节——И·Б·列季

科；第十一章：前言——Г·И·列文松，第1节——А·Ю·德鲁戈夫，第2节——В·Ф·瓦西里耶夫，第3节——Ю·П·杰缅季耶夫，第4节——С·И·约安涅相，第5节——Э·О·别尔津，第6—7节——Ю·Ф·赫列诺夫，第8节——Г·И·列文松；第十二章：前言——М·А·波尔塔夫斯基，第1节——Р·Т·阿赫拉莫维奇，第2节——Е·А·奥尔洛夫，第3节——А·М·沙姆斯丁诺夫，第4节——Н·М·戈尔布诺娃，第5节——К·Я·米哈伊利季斯，第6节——Э·П·皮尔-布达戈娃，第7节——Е·А·列别杰夫，第8节——Л·Н·科特洛夫，第9节——Д·Р·沃布利科夫，第10节——Е·К·戈卢博夫斯卡娅，第11节——Л·В·瓦利科娃，第12节——В·Л·博江斯基，第13节——Г·С·尼基京娜，第14节——В·И·基谢廖夫；第十三章：前言和第1节——Б·Г·谢伊拉尼扬，第2节——Д·Р·沃布利科夫，第3节——Н·И·普罗申，第4—6节——Н·С·卢茨卡娅；第十四章——А·Б·达维德松；第十五章——Н·М·拉夫罗夫；第十六—十八章——С·И·维斯科夫；第十九章——Р·М·伊柳欣娜；第二十章——В·В·扎格拉金；第二十一章——О·С·哈尔哈尔金；结束语——Н·П·卡尔梅科夫。

插图是И·Г·鲍里索夫挑选的，В·К·沙齐洛参加了这项工作。大事年表由Е·М·米希娜编写，主要参考书目由Н·Б·科尼克编写，人名索引由Л·С·萨尔基相茨编制，地名索引由М·П·奥夫钦尼科娃和И·С·萨温娜编制。地图由Б·Г·加尔科维奇绘制；地图印制准备工作由苏联部长会议测绘总局"制图"生产联合公司担任。地图校订工作者有：И·Я·苏克尼克、Т·В·阿尔乔缅科、И·Ю·卡缅斯卡娅、Н·М·彼得罗维切娃、В·Н·波利亚科夫、В·И·尤尔琴科。

参加本卷评阅和校订工作的有：Н·И·叶戈罗娃、Н·П·科莫洛娃、Е·Н·马卡连科、В·Г·奥夫钦尼科夫、Е·Ю·波利亚科娃、А·А·斯比特涅娃、Д·Г·切列明。

参加本卷学术辅助性出版准备工作的有：Н·Б·科尼克、Е·Н·马卡连科、Е·М·米希娜、М·П·奥夫钦尼科娃、Е·Ю·波利亚科娃、Н·В·罗扎诺娃、И·С·萨温娜、Л·С·萨尔基相茨、А·А·斯比特涅娃、В·С·图鲁希娜、Д·Г·切列明、В·К·沙齐洛。

本卷学术组织工作由В·Г·奥夫钦尼科夫和Д·Г·切列明担任。

目　次

第二编 1961—1970年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三编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1961—1970 年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五编　1961—1970年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

图表目录

第 一 编

1961—1970年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第 一 章 1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1961—1970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

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国家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这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1959年)所作的结论。这一结论向苏联人民展示了新的前景，向他们提出了新的宏伟任务。在制定和实现这些任务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起着领导作用。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新纲领 1961年1月10—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在同年10月召开党的例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6月19日，中央全会通过了苏联共产党新纲领和新章程的草案。7月30日和8月5日分别发表了这两个文件的文本。大约有七千三百万劳动者参加了这两个文件的讨论。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关于全民讨论党的新纲领和新章程草案的总结报告，并批准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纲领和章程。

全国是在政治热情大大高涨的形势下迎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

表大会召开的。早在1961年1月19日就公布了莫斯科劳动者为庆祝代表大会召开而提出的社会主义义务倡议书。这一倡议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和支持。新的社会主义竞赛的首倡者也就是苏联五十年代末出现的并成为竞赛最高形式的共产主义劳动运动的参加者。竞赛的特点是：竞赛的参加者不只限于承担劳动义务，他们在争取顺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同时，还提出要系统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文化水平、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成为日常生活中优良品德的模范。

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队员和集体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群众创造积极性普遍高涨的先决因素。这种高涨的局面随着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日益临近而明显增强。苏联人民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成就——在地面和空间所取得的胜利，在工业中、集体农庄的田地里或运动场上所创造的记录，以及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

在讨论党的纲领草案过程中，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别高昂。在短时期内，各个共和国和州，所有的企业和机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及部队都举行了公开的党员大会、党的代表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与会者就讨论的文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希望。此外，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的组织以及报刊编辑部还收到了党员、共青团员和非党劳动者寄来的大量信件。苏共纲领草案的讨论过程和结果再次充分证明，党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苏联人对当代的一些根本问题、对在苏联进一步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的看法是一致的。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61年10月17—31日举行。大会代表共四千七百九十九人，他们代表九百七十多万名党员。有八十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的代表以来宾身分出席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批准了苏共新的纲领。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纲领，它规定了解决以下三位一体任务的具体途径：建立共产

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造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纲领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创造性地总结了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全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

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纲领规定的党和苏联人民的主要经济任务，它包含以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现国家全盘电气化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工艺和社会生产组织；实现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更加全面的自动化；在国民经济中广泛运用化学；大力发展新的、经济效益高的生产部门以及新的能源和新型材料；全面而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把科学同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和大大加快科技进步；使劳动者具有高度文化技术水平；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大大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是共产主义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除了建立强大的工业，建立繁荣的、全面发展而又高产的农业也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纲领阐明了世界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新现象，并指出，"人类正进入科学技术变革的时期。这场变革是由于掌握了核能，开发了宇宙，化学工业和生产自动化得到了发展以及其他科学和技术重大成就的取得而产生的。"同时，纲领还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科技革命起着极大的限制作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种革命，并将其成果用来造福于社会。"①

纲领首先确认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接着指出，必须经常注意解决那些与苏联社会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结构、苏联民族关系的完善以及与人民精神生活有关的任务。纲领评述了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政治组织，科学地论证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全民国家的原理，并且明确指出，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内部发展的任务来看，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苏维埃国家以往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出现的，但在新的现阶段它已变成为全

① 《苏联共产党纲领》，莫斯科 1976 年版，第 27—28 页。

民国家，变成为体现全民利益和意志的机关。"①有鉴于此，在党的
15 新纲领和新章程中载明，共产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党已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党。

党非常重视劳动者的共产主义教育，认为在苏共纲领和章程中必须包括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准则，这种准则应表现为下述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如：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福利而勤恳地劳动；人人都关心创造和爱护社会财富，深刻地了解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人们之间应充满集体主义和同志式互助的精神，应持人道主义的态度和相互尊重；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应保持道德上的纯洁和简单朴素；在家庭里应相互尊重，关心子女的教育；对民族和种族歧视现象决不容忍，对共产主义的敌人毫不妥协；同各国劳动者保持兄弟般的团结，等等。

新党章的通过使党内民主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把集体制原则作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固定了下来。

劳动者社会组织为实现苏共二十二大决议而斗争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所有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实际依据就是苏共新纲领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中所提出的结论和原则。在这些机关和组织的活动中占据中心位置的问题是：如何使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出现新的高潮；如何提高苏联人民的创造能力和主动精神。

1961年12月召开的全苏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会议对学习新党纲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研究了苏联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1961—1962年，召开了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苏联科学院为研究"共产主义建设与社会科学"问题的全体大会以及全苏历史学家会议。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见文艺工作者引起了巨大反响。

---

① 《苏联共产党纲领》，莫斯科1976年版，第27—28页。

1963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专门研究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分析了全国各地区（其中包括明斯克和古比雪夫州党委会、塔什干市党组织）积累的经验，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执行这些决议的目的在于改进思想教育工作的质量，使思想教育工作同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全会还确定了符合苏联共产主义建设需要和国际舞台阶级斗争需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向。

根据党的指示，共青团、工会和各社会组织都安排了本系统的思想工作，其要求是首先以热爱和尊重对社会有益的劳动的精神来教育苏联人。

1962年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多数是先进生产者，他们是从大型厂矿、油田、建筑工地、先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到莫斯科的。会议期间，共青团承担了支援建设一百五十个最重要的企业的任务，这些企业都被宣布为全苏的突击工程。为争取更有效地参加发展国民经济的活动和参加劳动集体的社会生活，共青团于1962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共青团探照灯队（监督组织）”小组、岗哨、分队和指挥部，它们通过电台广播和电视、中央和地方报刊、企业简报、墙报、照片陈列窗批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缺点，交流先进经验。在列宁格勒，它们对K-700新型拖拉机的研制工作进行不间断的监督；在哈尔科夫，它们对制造功率为五十万千瓦的大型涡轮发电机试制样品的工作 16
进行不间断的监督。莫斯科小型汽车制造厂的共青团员们在本厂的小范围内对公用事业企业（食堂、商店等）的活动进行监督。到六十年代中期，“共青团探照灯队”共有男女青年队员三百多万人。

在此期间，工会这个最有群众性的劳动者社会组织的工作也明显地加强了。1963年召开的苏联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是苏联工会运动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大会：与会代表有四千零一人，他们代表着六千八百万名职工。

在确定工会在经济建设、改进劳动组织和工资支付办法、改善居住条件等方面的任务时，代表大会非常详细地研究了教育工作问题和工厂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为保证劳动者积极参加生产管理而行使自己职权的问题。五十年代末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开始建立的常设生产会议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

工会对组织社会主义竞赛，首先是对开展共产主义劳动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1963 年春，举行了第二次全苏共产主义劳动运动先进分子代表会议。至此，这种新形式的竞赛虽只有五年历史，但是它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参加竞赛的人数已超过两千六百万人。这支劳动能手大军的力量不仅在于他们是生产先锋，是其他人的榜样，而且还在于他们竭力把自己的使命同履行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准则的日常行动结合起来，同积极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结合起来。社会设计局、义务性技术监督部、企业革新者委员会、房管所和学校附设的各种社会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得到了普遍的推广。也就在那时，开始普遍建立人民纠察队，每天协助民警维持公共秩序。社会工作已成为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员应尽的道德义务。

第六届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运动显示了人民极高的政治积极性。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的已登记选民参加了 1962 年 3 月 18 日的选举。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七的选民投票赞成联盟院的候选人，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的选民投票赞成民族院的候选人。

地方苏维埃的活动大大加强了。在这方面，各地重新采用的代表小组（起源于三十年代）这样的工作形式起了很大的作用。每个小组把本地区所选出的全部代表（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到村苏维埃代表）都联合了起来。这就有可能使代表们广泛地依靠地方社会人士，协调自己的行动，共同解决与本选区有关的问题。在重建代表小组的同时，各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建立了代表站。每个站由若干名代表和地方积极分子组成。

义务活动的广泛发展对执行机关的工作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1963年，仅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机构的编外工作人员就达到二十六万二千多人。不过义务活动发展的良好趋势有时也走向极端，经常性的工会活动往往毫无理由地被远非都具有必要知识和管理工作经验的社会活动人士的工作所代替。这只能增加国家机关工作的困难和降低社会人士本身的活动效率。 17

苏共中央十月全会（1964年） 从1962年起，由于个别领导人主观主义地行事，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某些不合理的改组，致使这些机构的活动变得日益困难。1962年春，各州、各边疆区和各共和国都成立了地区性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此后，于1962年底—1963年初又撤销了农村区党委，而把地区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按照所谓的生产原则进行的这种改组遍及全国。根据改组发起人的设想，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应能变得更加高明些，更富有针对性，但实际上却使工农业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从而使加强城乡联系的工作遇到了困难。不久，新管理结构就暴露出复杂、臃肿的缺点，而且在新结构建立的过程中还产生了领导干部频繁更换、工作人员大量调动等弊病。

共产主义建设的利益坚决要求根除在领导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主观主义毛病。苏共中央十月全会（1964年）讨论了已造成的形势，揭露了犯错误的原因，并且果断地提出了尽快纠正错误的途径。全会表明了党严格遵守和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与领导原则的坚强意志，坚决批判了唯意志主义的种种表现，如通过了一系列考虑不周、没有充分根据的决定，使城乡生产力的发展遇到困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利用。全会强调指出，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制定防止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个别人手中的补充保证措施。全会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关于免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认为，一个人同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两项职务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全会

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阿·尼·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同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取消了把党的组织人为地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苏维埃机关、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因为它们同样经历过这种错误做法的阶段。1965年初，进行了统一的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同时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都确认，必须批判地认识由于不合理的经济改组而引起的消极现象。代表们严厉地批评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体制的缺点以及领导农业和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方面的错误。

改正错误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这是因为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总路线还是正确的。任务在于，要更加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进一步振兴经济，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个领域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条件。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1966年3月29日—4月8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决议对进一步制定本时期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起了巨大的作用。

18 自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发展了二百七十五万五千名新党员，因此出席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近五千名代表就代表并表达了全国一千二百四十七万一千名共产党员的意志。有八十六个国家的共产党、民族民主政党和左翼社会党的代表作为来宾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大会代表讨论了列·伊·勃列日涅夫所作的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并审议了1966—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代表大会在分析党为执行苏共纲领所开展的多方面的活动时，特别强调了苏共中央十月和十一月(1964年)全会决议的重要性。总结报告的决议指出，"在领导共产主义建设和执行苏维埃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中的科学态度、集中制原则和求实精神已被确认为中央委员会应有的工作作风，因此中央委员会今后的全部活动

也应以此为依据。”①

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分析了国家生活中的变化、研究了国际形势以及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方针以后，表示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和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结论。

为了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和改进党的整个工作作风，代表大会对党章作了一些修改：决定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改为政治局，并恢复1922年列宁在世时设立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位。大会决定，至少有五年党龄(以前是三年党龄)的党员才有权做入党介绍人。

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领导机关。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阶段 完善党的组织原则的工作成果，不仅对党自身的活动，而且对全国一切社会组织的活动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持续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助于加强苏维埃在城乡居民生活中的作用，有助于巩固整个苏维埃社会政治制度。六十年代，苏维埃的代表性大大提高。1958 年，有一千三百七十八人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2 年为一千四百四十三人，而 1966 年则为一千五百一十七人。

第七届(1966 年)最高苏维埃有工人和集体农民代表六百九 19
十八人，知识分子代表约五百人。第八届(1970 年)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总数仍为一千五百一十七名，但工人和集体农民代表却已增加到七百六十三人。1959—1969 年期间，地方苏维埃的代表人数增加了二十七万人；仅村镇苏维埃的代表几乎就有一百五十万人。

在本时期内，前些年所存在的缺点，即不按宪法规定的时间召开苏维埃会议的现象终于得到克服。苏维埃执行机关向代表，而代表则直接向选民定期汇报的制度建立起来了。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的扩大地方苏维埃权限的过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9 卷，莫斯科 1972 年版，第 30 页。

程，到六十年代，主要是六十年代后半期，进展很快（该过程在1962—1964年期间进展有所放慢，这是将苏维埃分为工业苏维埃和农业苏维埃的错误做法所引起的）。地方苏维埃在解决许多财政问题、组织住宅建设、安排商业和公用服务行业、领导国民教育等方面的权限有了增加。

加强苏维埃中数量最大的环节——村镇苏维埃的工作最受关注。1967年通过了关于改进村镇苏维埃工作和关于加强村镇苏维埃物质财政基础的措施等决议。这些决议都有助于扩大地方苏维埃组织工作的权限。

为了使苏联最高苏维埃能够有效地解决有关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福利、完善法制等主要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必须扩大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加强最高苏维埃对应向自己汇报工作的机关，其中包括苏联部长会议的活动的监督，增加常设委员会的数目。原来两院共有九个常设委员会和一个总的经济委员会，到1966年两院分别成立了十个部门委员会，其中包括计划预算、工业、运输和邮电、农业、保健和社会保障等常设委员会。1969年，两院分别成立青年事务常设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也增加了常设委员会的数目和参加其工作的代表名额。这对拟定各种法律草案，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以及发掘预算中补充收入的建议都起了重大作用。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这十年中，苏联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法令比前二十年多两倍。其中的重大法令有：关于全面实行职工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日制的法令以及关于领导工业的现代体制、完善计划工作、加强经济刺激和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等法令。六十年代末，批准了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婚姻与家庭立法原则、卫生保健立法原则以及土地立法原则。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劳动立法原则的通过具有重大意义。此前所使用的1922年通过的《劳动法典》已经过时，需要进行认真的修改。1970年夏批准了由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同起草、经过最高苏维埃两院各常设委员会认真审定的法律草案。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所有最重要的法令，事前都经过全民讨论。

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社会政治团体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与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有关的主要任务。1970年，有七 20
千一百多万人参加了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竞赛，而且其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和集体的运动。

竞赛的成就，如同群众创造积极性的普遍高涨一样，跟工会的日常活动有着紧密联系。工会一向是苏联劳动者最富有群众性的组织：1970年，工会的会员数超过了九千三百万人（1959年大约为五千三百万人）。会员人数如此大幅度地增长不仅取决于职工(即会员)人数的普遍增加，而且还由于许多农业工作者加入了工会。1964年以前，集体农民没有加入工会组织，工会的职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集体农庄行使的。但是自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以后，大量原先为工会会员的农机人员进入了集体农庄，因而很自然地产生了他们今后的会员身分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同社会保险制度相联系而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集体农庄本身的农业专家的数量也有了增加。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的农业劳动组合和渔业组合于1960年都成立了工会组织。

1968年2月底到3月初举行的苏联第十四次工会代表大会明确规定了工会在新条件下的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必须肃清轻视工会会议的现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研究劳动者的意见和建议并努力付诸实现。大会再次强调了作为劳动者政治教育学校的工会会议的意义。

共青团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和从前一样起着重要作用。为贯彻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966年5月举行了共青团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六十年代，布拉茨克、伏尔加斯基、克里沃罗格、诺里尔斯克、日丹诺夫和鲁德内等城市的共青团组织因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荣获了劳动红旗勋章。至1970年5月召开共青团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共青团员的总数已达到二千七百万人

（1962 年大约为一千九百万人）。

共青团同青年的生活有着紧密联系，这表现在许多开创的事业上，其中包括组织大学生建设队的创举。象“第三劳动学期”这样的概念就是在六十年代出现的，它反映了青年大学生新运动的群众性。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个运动的规模最为广泛。1969 年暑期，参加建设队的大学生已达到二十七万人。他们不仅参加住宅、农场、工业企业的建设，而且还积极帮助农村学校对少年进行辅导，建立宣传队，以及从事其他活动。

其他社会组织如全苏知识协会、全苏发明家与合理化建议者协会、各种科技协会等组织也都加强了自己的活动。

伟大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和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在本时期内，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特点是热情高涨，这是共产主义建设普遍获得成就的反映。庆祝伟大十月革命五十周年（1967 年）和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1970 年）的活动把这种高昂的热情推向了顶峰。党为此专门作出了决定，指引苏联各界人士为迎接这两个重大事件进行全面准备。

苏共中央于 1967 年 1 月 4 日颁发了《关于准备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决议，号召苏联人民把这个光辉的周年
21 纪念日当作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节日，当作十月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日来迎接和欢庆。全体劳动者都响应党的这一号召，全国掀起了庆祝伟大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竞赛。1967 年 6 月 21 日，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了党中央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提纲，该提纲总结了列宁的党五十年来活动的主要成果和伟大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1967 年 11 月 3 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联合举行的庆祝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五十年》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五十年来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并第一次提出了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

的结论。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建成，被认为是伟大十月革命后五十年来党和人民英雄行动的主要成果。

11 月 5 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为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发布了《告苏联人民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体劳动者书》，其中指出，苏维埃国家五十年的发展道路充分证明，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并且表示相信，苏联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建设的已有成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定能取得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

在庆祝伟大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日子来到之时，全国都对庆
祝节日的竞赛进行了总结。数千个先进集体成了竞赛的优胜者，
它们受到了特别的嘉奖。约十三万名十月革命的老战士和国内战 22
争参加者荣获了勋章和奖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设立了十月
革命勋章，当时就有许多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以及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领袖荣获这一奖赏。

苏共中央于 1969 年 12 月专门通过了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宣传提纲。提纲进一步地阐述了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的功绩。全国都掀起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潮，以此来迎接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1970 年 4 月 11 日，举国上下都参加了列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数以百万的苏联人因积极参加劳动和社会生活而荣获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而设立的“英勇劳动”奖章。

1970年 4 月21—22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隆重举行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和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有力地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全世界劳动者和苏联人民一起表示了对列宁的无比敬重和爱戴，为伟大十月革命的故乡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2. 苏联经济的发展

党的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及苏共中央历

次全会都对苏维埃国家1959—1970年经济政策的战略方针进行
过认真研究。发达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特点是，
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和前提。这就反映出共产主义社
23 会经济结构的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着辩证联系
和统一。

要想解决意义重大、规模宏伟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及时而充分地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不断完善国民经济的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经济，持续不断地提高各种产品产量的绝对增长额，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完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办法。

党所制定的经济政策考虑到了发达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下述特点：国家拥有了庞大的生产设备，其数量比社会主义基本建成时的前一阶段要多许多倍；在质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已经研制出并积累了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劳动工具，工业方法已毫无例外地推广到所有的生产部门和各种类型的物质生产，发展国民经济的粗放方法正在向集约方法过渡；某些先进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加快，这类部门是，电力工业、原子能工业、石油工业、天然气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机器制造业中的仪表制造业和无线电电子工业，而这后两种工业部门乃是促使整个经济更快地转到最新的技术基础和工艺基础上去的特殊催化剂；除了强大的工业，还应建立高度发达的集约化的农业生产部门；已有可能综合解决极其复杂的生产问题和社会问题，应使经济实行深刻的转变，以解决与提高人民福利有关的各种任务；要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和组织水平，建立生产和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广泛发展科研机关和工业企业一体化的各种形式，建立农工和地区生产综合体（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崭新现象）等。

把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数量参数和质量参数加在一起，就为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规律发挥作用，为全面利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潜力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苏维埃国家在六十年代的经济政策具体表现在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的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控制数字上和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1966—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中。

1959—1965年期间工业的发展 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规定，除了大力扩展生产规模（七年内要生产出与前四十年同样多的产品）之外，还要使全国经济在质量上产生重要的变化。计划指出：对工业的部门结构要进行重大的进步性的变革；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要逐渐取齐；大大提高化学工业的比重；从根本上改进燃料平衡的结构；全力加快科学技术进步和扩大最先进的机器、各种仪表、自动化设备和电子设备的生产；通过建设大型热电站和水电站、敷设新的输电线、建立统一的动力系统等方法加速实现国家的电气化；大大增加并改进食品工业和轻工业产品的品种；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24

解决这些任务，需要大量的资金。按计划，1959—1965年期间对国民经济的投资额为一千九百四十亿到一千九百七十亿卢布，这几乎等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国家对发展经济投资的总额。

七年计划的出发点是，必须进一步完善全国生产力的布局，必须将国家全部自然资源迅速纳入经济周转的渠道。国家为发展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和中亚的经济而拨出的资金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生产中广泛采用科技成果，是苏联经济蓬勃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苏共中央在六月（1959年）和七月（1960年）全会上认真讨论了技术进步的问题，积极参加这两次全会工作的还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和先进生产者。大力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为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良好条件的工作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从1960年秋季起，开始实行对研制和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者给予奖励的制度。设立了功勋发明家和功勋合理化建议者的光荣称号。国家银行及其地方分行对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发放短期贷款的权限比

以前更宽了。这种政策反映了把科学转化为社会直接生产力的普遍过程。各社会设计局、各大工业企业党委所设的技术进步促进委员会、青年新技术参谋部和其他自愿性的联合公司以及苏联工业劳动者，都在利用革新者的建议，力争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到七年计划通过的前夕，全国正式登记在案的发明家和合理化建议者共有一百三十一万三千人。三年后，其人数增加到一百九十万零三千人。仅在七年计划的头三年半的时间里，生产革新者的活动就为国家节约了五十多亿卢布。劳动者技术创造的热情反映了群众积极性的普遍高涨。

为和平目的利用原子能和完善原子能技术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一系列发电能力很强的核电站正施工建设。

科学家们为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提供了量子发生器，人造金刚石、焊接结构材料、新型合成材料、通用计算机等设备以及其他经过改进的重要技术。

生产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已成为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七年计划的头几年里，仪表、自动化工具和计算技术设备的产量就已大幅度增加。数以千计的生产工段实现了全盘机械化。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用模压法制造铸型的自动化生产线。这种自动化生产线除了使产量提高五倍外，还能消除铸型车间的噪音和繁重的手工劳动。荣获共产主义劳动企业称号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列宁铅锌联合企业1961年就完成了自己的七年计划，而且各项指标都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最好的企业。这个联合企业主要生产过程实现机械化的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各车间所使用的自动控制仪器达两千五百多台。许多工厂都采用了无废料切割扁钢的自动化系统，这是科技思想的重大成果。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克里沃罗格冶金工厂以及其他许多大型冶金工厂的车间里已经开始对高炉的热过程实行有效的自动控制。

生产大功率的机器和设备，是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特点。在

电力工业方面，正在建造装机容量为一百万到二百四十万千瓦的大型热电站和水电站。装机容量为十五万、二十万和三十万千瓦的高节能蒸汽涡轮机组在苏联的热电站首次投入使用，而装机容量为五十多万千瓦的涡轮机组已在水电站投入使用。此外，还研制出供热电站使用的单机容量为五十万和八十万千瓦的超功率动力机组以及非通用的电力变压器和容量为五十万千瓦以下的涡轮发电机和水力发电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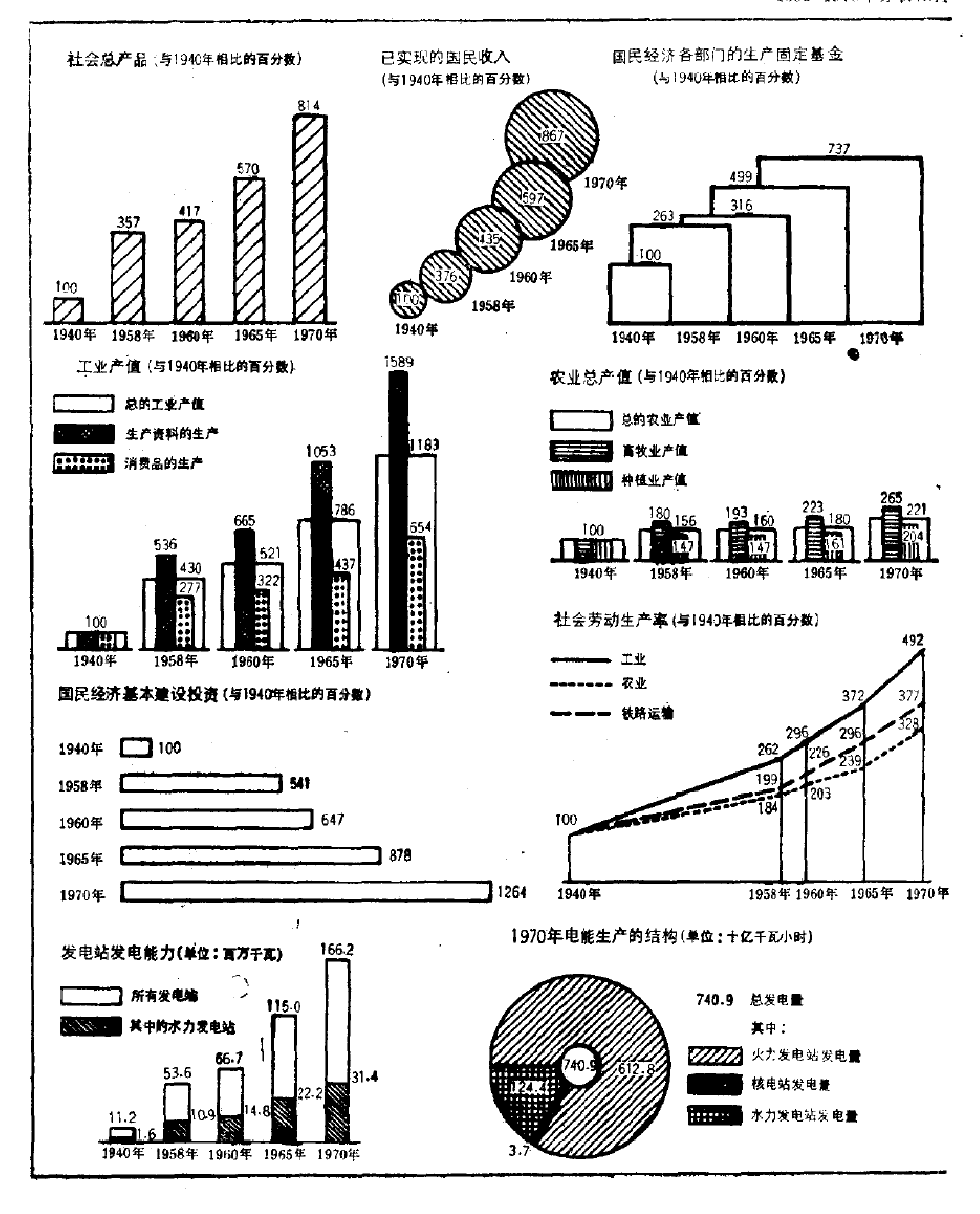
黑色冶金业的技术进步表现为建设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容量达九百吨的平炉与容量为一百吨和一百三十吨的氧气转炉。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连续浇铸钢锭装置的车间在新利佩茨克冶金工厂开始投入使用。年轧钢量为三百万吨到四百万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连续轧钢机业已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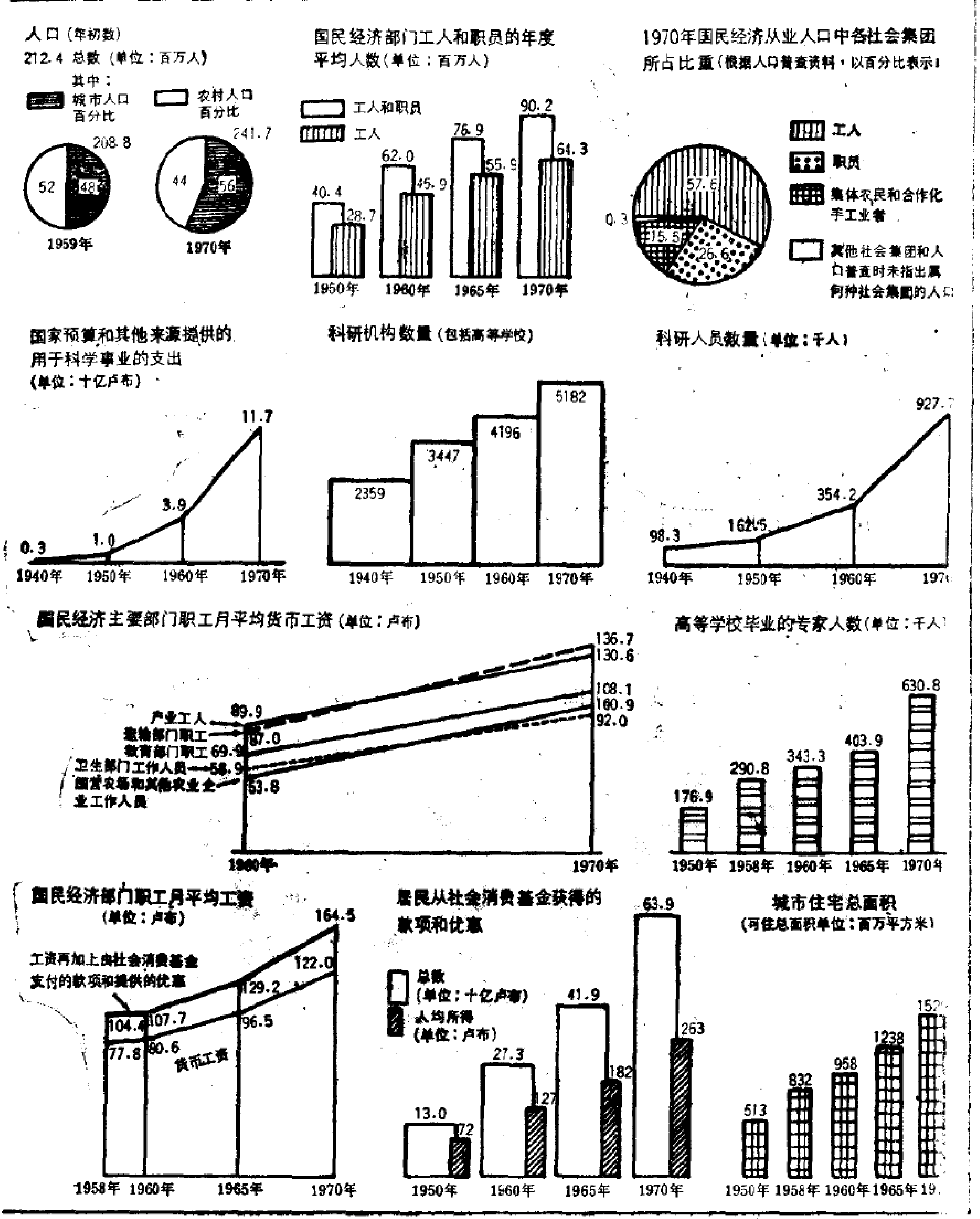
苏联工业已经掌握了以前需要进口的大口径钢管的生产，并且能大规模地生产电焊钢管、无缝冷变形钢管和优质钢管。

化学工厂已经拥有生产能力为二万四千吨的生产聚乙烯的装置这样一些大型成套设备。

为加快技术进步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产生了越来越丰硕的成果。现代化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增加了。所有工业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技术更新的过程。大多数企业都是在不停产的情况下进行改造的。

加快技术进步速度方面的成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七年计划的头三年里，大约有三千个大型企业投入了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是动力工业。建筑业由于采用了最新机械和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使施工实现了工业化，从而大大缩短了发电站工程的期限。例如，克列缅楚格水电站的十二套机组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就安装完毕。投入使用的还有装机容量为二百五十万千瓦的伏尔加河水电站、第聂伯河梯级水电站的又一个梯级以及其他大型发电站。工业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控制数字规定为百分之二十七），而总产值比计划任务增加了一百九


社会总产品（与1940年相比的百分数）
100
357
417
570
814
194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已实现的国民收入
（与1940年相比的百分数）
100
376
435
597
867
194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固定基金
（与1940年相比的百分数）
100
263
316
499
737
194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工业产值（与1940年相比的百分数）
总的工业产值
生产资料的生产
消费品的生产
100
536 430 277
665 521 322
1053 786 437
1589 1183 654
194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农业总产值（与1940年相比的百分数）
总的农业产值
畜牧业产值
种植业产值
100
180 156 147
193 160 147
223 180 161
265 221 204
194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社会劳动生产率（与1940年相比的百分数）
工业
农业
铁路运输
100
262 199 184
296 226 203
372 296 239
492 377 328
194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与1940年相比的百分数）
1940年 100
1958年 541
1960年 647
1965年 878
1970年 1264
发电站发电能力（单位：百万千瓦）
所有发电站
其中的水力发电站
11.2 1.6
53.6 10.9
66.7 14.8
115.0 22.2
166.2 31.4
194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0年电能生产的结构（单位：十亿千瓦小时）
740.9 总发电量
其中：
火力发电站发电量
核电站发电量
水力发电站发电量
740.9
612.8
124.4
3.7



人口（年初数）
212.4 总数（单位：百万人）
其中：
城市人口百分比
农村人口百分比
208.8
241.7
52
48
44
56
1959年
1970年
国民经济部门工人和职员的年度平均人数（单位：百万人）
工人和职员
工人
40.4
28.7
62.0
45.9
76.9
55.9
90.2
64.3
1950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0年国民经济从业人口中各社会集团所占比重（根据人口普查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工人
职员
集体农民和合作化手工业者
其他社会集团和人口普查时未指出属何种社会集团的人口
57.6
26.6
15.5
0.3
国家预算和其他来源提供的用于科学事业的支出（单位：十亿卢布）
0.3
1.0
3.9
11.7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科研机构数量（包括高等学校）
2359
3447
4196
5182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科研人员数量（单位：千人）
98.3
162.5
354.2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国民经济主要部门职工月平均货币工资（单位：卢布）
产业工人
运输部门职工
教育部门职工 69.9
卫生部门工作人员 58.9
国营农场和其他农业企业工作人员
89.9
87.0
53.8
136.7
130.6
108.1
100.9
92.0
1960年
1970年
高等学校毕业的专家人数（单位：千人）
176.9
290.8
343.3
403.9
630.8
195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国民经济部门职工月平均工资（单位：卢布）
工资再加上由社会消费基金支付的款项和提供的优惠
104.4
107.7
129.2
164.5
77.8
80.6
96.5
122.0
货币工资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居民从社会消费基金获得的款项和优惠
总数（单位：十亿卢布）
人均所得（单位：卢布）
13.0
72
27.3
127
41.9
182
63.9
263
1950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城市住宅总面积
（可住总面积单位：百万平方米）
513
832
958
1238
1950年
1958年
1960年
1965年

（按原图译……

十亿卢布。在七年计划的头三年里，工业产品的产量年均实际增长百分之十点一(计划数为百分之八点三)。

鉴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巩固工业发展已经达到的速度。对七年计划后几年（1962—1965年）的控制数字作了修改：增加了电力、金属的生产和石油开采以及其他某些产品的生产任务。

苏联人积极参加完成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苏社会主义竞赛为动员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职工投入突击性劳动提供了可能。建筑业职工、动力工程人员、化工人员、铁路员工以及其他行业的职工都参加了竞赛，为提前完成七年计划任务和为实现劳动
28 生产率的高指标而努力。到1964年中，已有二千多万人，也就是说近半数职工参加了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运动。有五十万个班组和三千五百个企业荣获了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的光荣称号。扎波罗热炼钢厂的炼钢工人П·基科和M·基涅巴斯、鞑靼的石油工人H·德鲁茨基的小组以及莫斯科近郊的细纱工Ю·韦切罗娃闻名全国，他们的劳动成果大大超过了世界记录。

在工业发展的数量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在质的方面也



“友谊”输油管苏联段的一个先进的安装建筑工程队。1961年

发生了变化。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布哈拉的企业在国内率先停止使用煤和重油作为燃料，全部改用天然气。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完全自动化的油田投入了生产。西伯利亚勒拿河畔的大型喷油井开始出油，时过不久，开采秋明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工作也全面展开。在开发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区的矿藏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1962 年夏，年产矿石二百五十万吨的米哈伊洛夫铁矿联合企业第一期工程竣工投产。1963 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的高炉开始使用天然气：因为长达二千公里的加兹利—乌拉尔天然气管道投入使用。"友谊"输油管开始按经互会成员国的协议投入工业使用。世界上最大的布拉茨克水电站的最后一套机组也安装完毕。

化学工业比其他工业部门发展得更快。但是业已增长的化学工业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苏共中央十二月(1963 年)全会提出的任务是，既要靠新建工厂也要靠改造现有工厂来保证更快地发展化学工业。

为了完成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向工业部门提出的各项任务，就必须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1962 年底，在莫斯科和斯维尔 29
德洛夫斯克举行了经济会议。中央报刊为讨论国民经济发展问题辟了专栏。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参加了这场讨论。完善计划体制、完善管理的组织形式、制定价格、加强国民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杠杆等问题成了注意的中心。

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1957 年取消部门管理原则的结果，降低了部门领导的水平。因而，1961 年以后，虽然产量的绝对增长额仍逐年有所上升，但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却出现了放慢的势头。为了改变现状，曾试图在地区管理体制的范围内进行某些新的组织变动，如采用合并的办法扩大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各工业部门的国家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但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经济改革的方针 共产党对国民经济管理实践中出现的主观

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在中央三月和九月(1965年)全会上制定出了一系列改进计划方法和经济管理方法的措施，从而为在全国进行经济改革打下了基础。

经济改革的宗旨是：把管理的组织形式同影响生产的经济方法，把集中的计划工作同扩大企业的经营积极性最合理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每个企业的利益能完全符合整个社会的需求创造条件。

全会决定对工业和建筑业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并集中精力完善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工作；建立了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工业部和建筑部；撤销了(1966 年 1 月)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在恢复生产管理的部门原则的同时，党采取了把部门原则同地区原则最合理地结合起来的方针。每个部门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根据集中的、一般的部门原则确定的，而发展的具体形式则根据地区特点(自然、民族等特点)加以选定。

改革把企业——苏维埃社会经济机构的基本单位作为计划工作、经济管理和刺激的中心。而象压缩上级向企业下达的计划指标数量、根据产品销售情况评定企业的活动、企业建立用以刺激职工劳动的奖励基金等这样一整套措施，使企业有可能切实实现自己的经营自主性。

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仍然是集中统一进行的。但是其具体形式和方法都有了很大变化。苏共中央九月(1965 年)全会的决议强调指出，国家应集中注意力，对那些能促使企业以最低限度的费用及时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优质产品的经济杠杆(如价格、利润、贷款和奖金等)进行规划。

1965 年，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方法试验成功，收到了良好效果。改革的实际准备工作终于开始。

30 在评价 1965 年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意义时，应当特别强调它们的全局性。苏共中央三月和九月(1965 年)全会在实行与发达

社会主义阶段相适应的领导经济新方法的同时，提出了提高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效率的任务，而不是象前几年那样只涉及其中的某些方面。

工业部门执行七年计划的结果 党执行的各项措施得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苏共中央三月和九月(1965年)全会的决议开创了经济振兴的新前景。七年计划就是按照全会决议的精神执行到底的。尽管原来的管理体制和计划体制一直沿用到1966年初，但是党的决议和业已实施的各项措施在1965年就已产生了明显效果。国家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标已大有改进。1965年工业产量的增长额达到了百分之八点七(计划数为百分之八点一)。

列宁格勒电力联合公司的职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炼钢工人和阿利麦季耶夫斯克的石油工人首先完成了七年计划。1965年8月，莫斯科劳动者完成了工业产量七年计划。继他们之后，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职工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

基辅水电站和普利亚温斯基水电站，世界上最大的日丹诺夫工厂的高炉，科尔舒诺沃采矿选矿联合企业的第一期工程，纳沃伊、戈梅利、古比雪夫和多罗哥布日的大型化学企业，布拉茨克的木材工业综合体都投入了使用。全长七百公里的阿巴坎—泰谢特铁路线已经通车。仅在1965年就有四百七十个大型工业企业(不包括改造的企业)投入生产。

总的说来，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由于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而不得不增拨经费来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但是全国在工业发展方面却前进了一大步。动力、化学、机器制造等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七年里几乎增加了一倍半。

七年计划期间，科学家和机器制造工厂的工作人员研制和试制了三万多种新型机器和设备，将大约二千五百个高效率的生产工艺流程运用于生产，使将近五千条自动化流水线和三万二千多条机械化流水线投入使用。合理化建议者和发明家的创新思想使

国家节约了一百一十亿卢布。仅1965年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就有四百一十万条(1958年为二百九十万条)。

在全国的燃料平衡方面,更经济的燃料——石油和天然气居于优先地位。百分之八十四点五的铁路运输任务是由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完成的(1958年仅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五)。硬路面的汽车路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各种运输的客运量大大提高。建立全国统一的动力系统的巨大工作正在进行。1965年已经拥有九个联合系统,苏联欧洲部分的统一动力系统已基本建成,其总发电能力超过五千万千瓦。

在七年计划期间,固定生产基金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工业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计划规定为百分之八十)。大约有五千五百个新的大型工业企业投入生产。工业部门劳动的动力装备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

但是,并不是七年计划所规定的全部任务都得到了顺利实现。化学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以及机器和燃料的某些产品的生产
31 就没有达到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工业总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额由1956—1960年的百分之六点五下降到1961—1965年的百分之四点六。

七年计划期间的农业 到五十年代末,农业生产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总产量比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根据已达到的水平,七年计划规定农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七十(年平均总增长额为百分之八)。战后立即展开的农业的技术改造的工作在继续进行。按照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58年)决议实行的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和将农业技术设备出售给集体农庄的工作到六十年代初就已完成。集体农庄从国家手里购进了六十万台拖拉机、约三十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技术设备,总金额为十八亿卢布。

但是,对于许多集体农庄来说,有效地利用技术设备并不容易,原因是缺少修理基地,三分之一的集体农庄没有修配厂。

鉴于这种状况，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物质技术基础的措施。1961年降低了农业技术设备备件的价格。集体农庄购买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设备和房屋，可以根据集体农庄的财政状况延期五至十年付款。同年成立了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出售农业技术设备、备件、矿肥和组织农业机器的修理及使用的联合公司——"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对现有的修理基地开始进行改造。1964年，"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系统内已有大约二千五百个专业化组织(如机械队、机器出租站、饲畜业机器站等)开展了工作，它们根据互利的合同原则同集体农庄建立联系。

从1961年起，供应农业的各种技术设备有所增加，而且随着数量的增加，质量也有所改进：拖拉机进行了更新，研制出了新型机器，更广泛地采用了带有一套悬挂式农具的自行式车架。到七年计划结束时，机械发动机(主要是拖拉机和汽车)占农业动力设备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在七年计划期间，从事社会性农业生产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劳动动力装备率由四点四马力上升到七点七马力。

为实现农业电气化正在进行大量工作。到七年计划结束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集体农庄(1958年只有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国营农场实现了电气化。但是用到生产上的电力只有一半多一点。

矿肥产量由1958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万吨增加到1965年的三千一百三十万吨，这不仅能保证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对矿肥的需要，而且还能拨出越来越多的矿肥给谷类作物。

1959—1965年期间，用技术熟练的干部充实农业的工作在继续进行。例如，在这期间，农机人员的人数增加了七十五万六千人，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附属企业中具有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程度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十三万人，共计达到四十九万六千人(占全体农业专业人员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大田农艺师、农机人员和畜牧业

工作者忘我的创造性劳动解决了许多问题。继城市之后，在农村也开展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和突击手的运动。到七年计划结束
32 时，全国各地还有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全体加入了这一运动。1960年，莫斯科州谢尔普霍夫区的先进农业生产者发起了“今天革新者的水平就是明天集体的水平！”的运动。运动的参加者把在生产中推广和广泛采用先进的劳动方法作为自己的目的。各地都以农机手A·B·吉塔洛夫和H·Φ·马努科夫斯基为榜样，开始组建耕种地段和技术设备都加以固定的机械队。这一做法有助于更好地使用技术设备和提高耕作水平。由先进生产者、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人、农业专家们主持的先进经验讲习班对革新者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著名农业能手B·A·斯韦特利奇内、B·Я·佩尔维茨基、Д·库奇耶夫、T·阿胡诺娃等人的事迹已众所周知。

尽管农业劳动者都尽力而为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但是在七年计划期间农业仍未达到使苏联经济协调发展和完成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所必需的水平。到六十年代中期，部分地由于客观原因，而有时却是由于错误和缺点，农业方面积压了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

制定价格政策上的缺点，关心物质利益原则的遭到破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领导中的行政命令和主观主义方法，管理机构不合理的改组——凡此种种都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无根据地改变播种面积结构，破坏轮作制和农业技术规程等现象在1963年天气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影响尤为严重。这一年全国所收粮食比上一年减少三千二百七十万吨。饲料不足影响到畜牧业。1963年，猪的头数几乎减少了一半，羊减少了六百万头，牛奶产量也下降了。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64年）分析了1963年农业方面出现上述严重状况的原因，强调了机械化、水利化和化学化这样一些农业生产基础的意义。

33 1964年3月2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在

制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计划的实践中严重违反和歪曲政策的事实"的决议。决议列举了背离党所制定的和苏共中央九月（1953年）全会各次决定以及1954—1956年期间发布的许多党内文件中所规定的农业政策原则的种种严重现象。决议指出，"近来，在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里又出现了早已被党谴责过的自上而下规定生产计划的老一套做法。这些地区蛮横无理地强迫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接受播种面积和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牲畜头数和牲畜产品率的计划，用命令的方法强制规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部工作，从而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人及专家们束手无策，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工人的主动性受到压制。"

1964年春，各地调整了播种面积结构。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扩大了三百多万公顷，玉米的播种面积减少了近七百万公顷。1964年的农业总产量有所上升。

但是，违反经济规律和经济合理性原则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在1964年的收割和收购运动期间，就曾发生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收购计划和向国家交售粮食的计划被多次加码的现象。

畜牧业状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尽管牲畜头数总的增长速度和总产值比前七年稍有增加，但是畜牧业的产品率仍在继续下降，只是到七年计划结束时才稍有提高。

为了改变农业状况，需要采取治本的措施。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1965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 34
业的紧急措施"的决议，其中包含有解决农业政策所有主要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全会揭露了国民经济极其主要的这个部门发展受到阻碍的原因，并提出农业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建立并完善能够加速生产发展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刺激体制，大大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实现农业机械化、化学化和土壤改良的长期综合纲要，发展农业科学，完善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系统，改进劳动和农业生产管理组织等。党对农业中的生产技术、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任务采取了综合解决的坚定方针。

根据三月全会的路线，制定并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措施。早在1965年4月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便通过了“关于1966—1970年农业发展投资”和“关于向集体农庄提供财政援助”两个决议。旨在改进农业计划工作和扩大集体农庄及国营农场经营自主权的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实行了新的农产品收购制，集体农庄就有可能执行数年固定不变的收购计划。

为了保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各生产部门的赢利率，制定出了新的、有充分经济根据的收购价格。根据地区的不同特点，小麦和黑麦的收购价格提高了百分之十二到六十二，牛的收购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五，猪的收购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七十，羊的收购价格提高了百分之十到七十，牛奶的收购价格提高了百分之十到四十。同时，面包、谷米和肉的零售价格仍然不变。对集体农庄超计划向国家出售产品实行奖励的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降低农业技术设备的价格和电费率有助于巩固农业的经济基础。注销集体农庄的欠款数额达二十多亿卢布。向集体农庄征收所得税的办法也作了如下的改变，即由按总收入课税改为按净收入课税。结果，全国所有集体农庄所得税的总税额减少了二分之一左右。

关于农作物的地区布局问题经过了重新研究。1965年，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减少了玉米和饲用甜菜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小麦、荞麦、水稻和向日葵的播种面积。在水分充足的地区恢复了草田轮作制，而在干旱地区则扩大了休耕地。根据党在1964—1965年的决定所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为农业集约化创造了条件。

总的说来，在七年计划期间，苏联粮食的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以上，籽棉的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糖用甜菜的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蔬菜的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每公顷达到十点三公担，而过去七年里只达到八

点三公担（同时应当看到 1959、1963 和 1965 年都是歉收年）。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有提高，籽棉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七年计划期间由每公顷二十点二公担提高到二十三点二公担，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农业计划的控制数字却未完成。农业总产量的增长还不到百分之十五，而计划数为百分之七十。

1966—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1966—1970 年发展
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特别强调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科
学技术进步，根据党所制定的经济改革方针改进对经济的领导。计
划对资金作出了有利于消费品生产的再分配，但这绝不意味着降 35
低重工业的作用。计划结算的根据是，提高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
效率和加快作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最重要原料基地的农业的发展
速度。

五年内，工业产值预计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对国民经济的投资预计为三千一百亿卢布。同时，拨款的分配要做到使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相互接近，使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相互接近。计划规定要进一步优先发展电力工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

计划要求在技术进步、完善劳动组织、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和对劳动者的物质鼓励的基础上，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在提高生产赢利率的同时降低产品的成本；工业利润应当提高一倍以上；在文化生活用品的生产方面要达到更高的水平。

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在经济改革业已开始的条件下进行的。而经济改革则是根据每个经济部门的特点和各个企业完成准备的程度逐步展开的。首先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经济刺激方法的是那些经济活动指标很高的最有经验的集体，其中有伏尔加格勒“红十月”冶金厂、诺里尔斯克采矿—冶金联合企业、涅瓦机器制造厂等。

经济改革是在工业品国家固定批发价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

早在1955年规定的批发价格，因不能充分反映出工业品生产所需社会必要耗费而过时，因而被新的批发价格所代替。工业中已不存在亏损部门，而且大多数部门（其中包括开采业）的赢利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1967年，大约有七千家企业（约占所有工业企业的百分之十五）已经按新的制度办事。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也在逐步转用新的工作条件。到1968年初，实行新制度的已有半数以上的铁路（承担全国货运量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大部分的汽车运输企业、海运与河运轮船公司以及民航、邮电、物质技术供应、商业、公共饮食和生活服务等企业。

1968年，不满一百名工人的小企业（约占所有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一）也开始采用改革原则。经验证明，将上述小企业纳入经济活动新体制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将小企业同大企业合并和建立生产联合公司。除生产联合公司外，还建立了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科研所。这种联合公司有助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和加强生产的专业化与协作。

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有四分之三的工业企业进行了改革，这些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利润占工业利
36 润的百分之九十五。建筑业也开始了经济改革。

1966—1970年工业发展的成就 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特点是，速度快而且稳定。发展特别快的是那些对技术进步起决定作用的部门，如电力工业、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和无线电电子工业。在工业生产总额中，这些部门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二十八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这便使生产结构起了重大的质变。

改革原则的效能首先表现在生产的集约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上。到第八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的国民收入同超过1940年水平五倍的1965年水平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五年中，工业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

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获得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上升了：从

1961—1965年的百分之六十二上升到1966—1970年的百分之七十三(1970年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四)。五年中企业的利润增加了一倍以上,生产的赢利率也大有提高。

为庆祝伟大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和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而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对1966—1970年期间工业产量的迅速提高和工业发展质量指标的改进起了巨大的作用。

苏联人每天都为国家创造出新的劳动成绩。1967年9月,装机容量为四百一十万千瓦的布拉茨克水电站交付工业使用。同年11月3日,发电能力相当于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第一台水力发电机组开始工业送电。10月初,世界上最大的中亚至中部地区输气管道第一期工程竣工。

克里沃罗格列宁冶金工厂兴建的世界上最大的高炉开炉。位 37
于莫斯科的装有世界上最高发射天线(五百三十三米)的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工程竣工。利用"闪电号"人造卫星进行转播的"轨道号"超远程电视发射系统投入使用,从而使我国最边远地区的居民有可能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合理化建议者和发明家对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技术创造的主要方向是解决一些重大的生产问题。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采纳了十万个发明和一千七百万条合理化建议,国民经济部门得以节约一百二十六亿卢布。

1968年9月通过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提高科研组织工作效率和将科技成就加速用于国民经济的措施"的决议有助于提高科研效率和加速将科研成果运用于生产。现代化仪器、自动化流水线以及能使劳动实现全盘机械化的电子计算机的生产明显扩大。能大大提高零件加工的精度和使小批量生产自动化的程序控制机床开始投产。运用计算装置来控制工艺规程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第一乌拉尔斯克新铸管厂在钢管机上使用计算装置之后,大大提高了制管精度,而且每年能节约两千吨高合

金钢，为国家节约五十万卢布。

新技术设备的采用大大减轻了矿工的劳动。功率强大的窄幅联合采煤机的运用使采煤量增加一点四倍；装有液压传动支柱的采煤工作面的采煤量增长了三点五倍

冶金业扩大了采用先进工艺的范围。第八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在高炉生产方面，基本上完成了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炉料供给自动化和其他重体力操作自动化的工作。这是苏联科学家、设计师和生产者们的巨大成绩。1970 年，绝大部分的高炉(其生铁产量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六)都用上了天然气。五年中，改用吹氧法炼钢的平炉的比重由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二点九。连续浇铸钢锭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使用这种方法不仅有可能缩短生产周期，实现钢锭浇铸过程机械化和自动化，而且还有可能大大减轻工人的劳动。就使用这种方法而言，苏联在世界上稳居领先地位。

大力发展电气化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装的重要条件。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发电量达到七千四百亿千瓦小时，而每年增长额达到五百亿千瓦小时(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全国的年发电量仅为四百八十亿千瓦小时)。这一时期电力工业发展的特点是发电机组的发电能力不断提高(提高到三十万、五十万乃至八十万千瓦)。五年计划结束时，有三十多个国营地区发电站的发电能力都超过了一百万千瓦。在提高发电机组质量和发电量的同时，发电机组的发电能力也得到增强，从而大大降低了电力成本和节约了燃料。核电站的建设在继续进行。苏联欧洲部分和乌拉尔的动力系统合并成了统一的动力系统，其中包括六百个发电站，总发电能力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千瓦。

38 动力工业发展的成就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生了良好影响。国民经济部门总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 1966—1970 年期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七(1961—1965 年只提高百分之二十九)，其中工业部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三十二，建筑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

提高百分之二十二。

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了基本建设的宏大计划。在此期间全国固定生产基金增长了近百分之五十。世界上最大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竣工。1970年3月25日，该发电站的第十台机组开始与西伯利亚动力系统并网发电，使该发电站的发电能力达到五百万千瓦。同年，萨拉托夫水电站九台机组中的最后一台机组竣工投产，该电站开始全力发电。

全长三万五千四百公里的输油和输气管道投入使用。

1969年，国家委员会同意西西伯利亚冶金厂启用1300型初轧机，这是苏联第三部同类型的轧钢机。车里雅宾斯克和下塔吉尔的新高炉以及车里雅宾斯克的转炉车间也都投入使用。以伟大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命名的南方制管冶金厂的世界上最大的连续轧管车间的机组开始试轧。

摩尔曼斯克州(阿帕季特市)年产精矿一百八十万吨的"阿帕季特"磷灰石和霞石选矿联合工厂第二期新厂房的建筑工程提前竣工。乌克兰共和国康斯坦丁诺夫卡化工厂全国最大的颗粒过磷酸钙车间(年产化肥六十五万多吨)已经投入使用。克拉斯诺乌拉尔斯克炼铜联合企业建成并于短期内掌握了生产硫酸的成套设备。

在中乌拉尔，一个大型石棉工业企业投入生产，该企业每昼夜能生产优质石棉近九百吨。

在古比雪夫州，预计年产汽车六十六万辆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的建筑工程已经开始，并于1970年8月就生产出第一批轿车。

五年计划期间开航的索尔莫夫式柴油电动火车海上渡轮象一座巨大浮桥把南高加索和中亚的铁路连接了起来。

苏联人顺利地完成了五年计划。列宁格勒工业部门数万名劳动者1968年末就已执行1970年——第八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工作任务。莫斯科三百多家企业提前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劳动生产率指标。

在1970年4月11日为纪念列宁诞辰而开展的全苏共产主义

星期六义务劳动期间，工业劳动者利用节约的原料、材料和电力进行义务劳动，并达到了最高生产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成果是劳动者献给列宁生日的最好礼品。

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1965年）制定的党的农业政策的主要方针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央五月全会（1966年）上得到了发展，并且成了苏联人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的行动基础。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按计划将为实现农业生产集约化采取一系列经济、物质技术和组织上的措施。

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的要求，农业投资在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61—1965年的百分之二十上升到1966—1970年的百分之二十三。

39 为了保证加快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利用经济杠杆和加强物质技术基础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和集体农庄对生产建设的投资和购置技术设备的费用比前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此期间，由于机器生产的速度加快，农业机器的总数大大增加。1970年，全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共拥有拖拉机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台，谷物联合收割机六十二万三千台，载重汽车一百二十万零六千辆。

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生产工具的无形损耗加快，为农业研制新技术设备的速度也相应提高。1966年，投入批量生产的新型农业机器为四十五种，1967年为六十五种，而1968年达到七十四种。1970年，工业为农业提供了七百二十四种品名不同的农业机器，而1965年只有四百九十种。

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用电量急剧上升。1966年8月2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之前保证所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电力的需要，而到1970年末必须基本实现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职工住

宅的电气化。由于实现了1966—1970年农业电气化国家纲要，农业的动力设备1970年比1960年增加了一点二倍，而每个工作人员劳动的动力装备率增加了一点一倍。

大田作物栽培业和畜牧业生产过程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水平大大提高了。

农业技术设备供应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设备的复杂化，把高效率地使用、维修和保管这些设备的问题提到了首位。建成了几万个技术保养站、机器房、汽车库和加油站。"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所属的为农业机器进行大修的专业化企业网在逐年扩大。

生产设备能否得到正确使用，首先取决于干部的技术水平。直接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附属企业中工作的具有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程度的专业人员数量五年内几乎增加了三十万人，总数达到八十多万人。此外，在农业中工作的农机人员大约有三百五十万。从前在农村工作的主要是农艺师和饲养人员，而今在农村工作的专业人员中，工程师、技术员、经济师、农业化学家、水利土壤改良专家这样一些人员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队伍得到了加强。五十年代初，由专家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的仅占农庄主席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而二十年后却有百分之八十的农庄主席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国营农场场长具有高等或中等专业教育程度。

第八个五年计划的特点，是采取综合方法解决农业问题。在发展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的同时，土地的本身及其肥沃程度越来越成为注意的对象。苏联农用土地总面积中大约有三分之二分布在天然水分不足的地区，在这种条件下，土壤改良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制定土壤改良纲要，苏共中央专门召开了五月（1966年）全会。根据全会决议，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进行土壤改良建设和提高土壤肥力。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有三千多万公顷的牧场用上了
水，有三百多万公顷的沼泽地和过分潮湿的土地被疏干。五年内， 40
供应农业的矿肥量增加了一千八百五十万吨，同战前水平相比，增加了十七倍左右，而且肥料的质量也大有改进。按工业规模生产

营养物质含量高达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浓缩肥的技术已经掌握。

为了加速农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完善生产组织的形式，改进管理方法，加强劳动社会化和劳动分工的过程。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集体农庄庄际生产协作和农工一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一过程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有助于农业部门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完善，有助于国家所有制形式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形式相互接近，有助于更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由于在专业化的农庄和农场中推行了全盘机械化，手工劳动的范围日益缩小，生产水平得到了提高，而这些单位工作人员的劳动也日益成为一种工业劳动。

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跨集体农庄的建筑组织、跨集体农庄的和国营企业集体农庄的农工综合体与联合企业、某些农产品的生产联合公司得到了发展。1970年，即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国大多数集体农庄都加入了跨集体农庄和国营企业集体农庄的联合公司、企业和组织。这些公司、企业和组织已有四千多个。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推行内部经济核算制的工作开展得比以前更加广泛。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工作队和班组的建立，有利于克服土地和技术设备使用方面无人负责的现象，有助于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采用先进的劳动报酬形式。在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条件下，生产总耗费的经济效益成了衡量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

完善计划工作，加强经济刺激，采用并巩固内部经济核算制，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所有这些做法都为集体农庄转为向银行直接信贷提供必要的条件。在苏联部长会议于1965年12月17日通过“关于改进集体农庄贷款办法”的决议之前，集体农庄就已通过收购机构获得贷款。但预支的数额不超过日常的生产费用，而象劳动报酬这样一些重要的开支项目一般是不让贷款的。1966年，集体农庄开始逐渐向银行直接贷款，而到1970年，这种办法几乎为全国所有的集体农庄所采用。这有助于解决一个重要

的社会问题——使集体农民得到有保证的劳动报酬。

实行广泛的、多方面的农业发展计划，是把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运动、提高生产水平和勤俭节约的运动连同高速度地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斗争推向前进的重要动力。

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显示了农业工作者的杰出成就。1968年，有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八名参加展览的农村工作者获得了金质、银质和铜质奖章。

1969年召开的全苏第三次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是本时期农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共产主义建设时期集体农庄生活基本法。进一步发扬集体农庄的民主，是新章程的显著特点。新章程反映了民主化的主要方面——加强集体农庄的经营自主性，让集体农庄庄员 41
更多地参加公益事业的管理。代表大会认为，各地区、州、边疆区和共和国都必须建立经选举产生的集体农庄机关的系统，而在中央则必须建立全苏集体农庄理事会，负责协调各级集体农庄机关的工作。

由于党所制定的各项措施得到实现，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进行了忘我的劳动和国家对农村的需求更加重视，农业发展的指标有了明显改进。1961—1965年期间，农业年产量平均增长百分之二点三，而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则增长百分之三点九。农业年平均总产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一，而在前五年中只提高百分之十二。粮食生产方面发生的变化最大。粮食年平均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达到一亿六千七百五十万吨，而1961—1965年期间则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万吨。粮食产量的增长首先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产量平均大约为十四公担）而取得的。这几年的单位面积产量是苏联农业史上最高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牛的头数明显增加——由1959年1月1日的七千零八十万头增加到1971年1月1日的九千九百二十万头。第八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主要畜产品的计划任务全部完成：肉类生产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

点四，奶类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二，蛋类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三，羊毛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五。

农业向集约化道路的过渡和对农业进行的技术改装，为提高农业工作者的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能。1966—1970 年期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百分之六点五（而工业为百分之五点七）。

在苏共中央三月全会（1965 年）以后的时间里，集体农庄的经济得到了巩固，富裕和极其富裕的农庄数有了增加。1965 年，一百公顷耕地的总收入超过两万卢布的集体农庄占农庄总数百分之三十六点九，而 1970 年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五点五，而且，有百分之十九点三的集体农庄一百公顷耕地的收入超过了四万卢布。

1959—1970 年苏联经济发展的总结 工业产值的绝对增长额大幅度提高，发展速度高而稳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便是六十年代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1970 年，社会总产值达到六千四百四十亿卢布（1960 年为三千零四十亿卢布），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四千零九十亿卢布（1960 年为一千八百九十亿卢布）。十年间，生产总基金增加了一点三倍，其中工业的生产总基金增加了一点四倍。1959—1970 年期间有七千三百七十家新企业投入生产。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经济潜力在数量上的增长。苏联经济发展在质量上的巨大变化才是发达社会主义时期的持点。实质上新建立了许多生产部门，它们的产品对进一步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加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工业部门发生了许多进步的变化：生产设备增加了，首先是动力、冶金、石油、化工这样一些部门的生产设备增加了；扩大了工业原料基地（发现了许多新的油田、天然气田和其他矿藏）；提高了合成材料的利用率；广泛采用了大功率机组（动力机组、石油加工装

置、转炉等)；开始对机器制造业进行技术改装(建立自动化流水线，使用电子计算机和程序控制机床等)。1951—1960年期间苏联制造了大约一千三百种新型机器、设备、机组和仪表，而1961—1970年期间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42

苏联科技发展的高水平在开发宇宙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许多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抱有飞向地球以外、进入辽阔无垠的宇宙空间的大胆幻想。这一幻想终于实现了。伟大十月革命的故乡成了实现人类大胆设想的出发地。1961年4月12日，全世界都得知苏联公民Ю·А·加加林驾驶第一艘"东方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Ю·А·加加林在宇宙空间飞行了一小时零二十九分钟。他的神话般的飞行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1961年8月6日，苏联公民Г·С·季托夫驾驶"东方2号"宇宙飞船进入轨道。飞船绕地球飞行十七圈，一昼夜飞行七十万公里。一年后，苏联的宇航技术再次使世界大为震惊：А·Г·尼古拉耶夫和П·Р·波波维奇首次进行双人多天数(三昼夜)的宇宙飞行，从而开创了宇宙空间研究的新阶段。1963年6月，В·Ф·贝科夫斯基和В·В·捷列什科娃完成了多天数的宇宙飞行。妇女第一次参加了宇宙空间的航行。1964年10月，В·М·科马罗夫、К·П·费奥克蒂斯托夫、Б·Б·叶戈罗夫进行了"上升号"多座飞船的首批试验。1965年3月，П·И·别利亚耶夫和А·А·列昂诺夫驾驶"上升2号"飞船进入了轨道；他们首次进行了人进入宇宙空间的试验。

"联盟号"多座卫星式宇宙飞船自1967年起先后进入轨道。10月30日，两颗苏联人造卫星在地球轨道上实现了自动对接和脱离。在1968年10月到1970年6月这段时间里，"联盟3号"到"联盟9号"各个飞船进行了飞行。参加飞行的有十二名宇航员(Г·Т·别列戈沃伊、В·А·沙塔洛夫、Б·В·沃雷诺夫、А·С·叶利谢耶夫、Е·В·赫鲁诺夫、Г·С·绍宁、В·Н·库巴索夫、А·В·菲利普琴科、В·Н·沃尔科夫、В·В·戈尔巴特科、А·Г·尼古拉耶夫、В·И·谢瓦斯季亚诺夫)。

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前夕，传遍世界的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消息：1967 年 10 月 18 日，“金星 4 号”自动站在宇航史上首次对金星上的大气进行了直接研究。1970年，“金星7号”也是首次在金星上实现了软着陆，并从金星地面发出了信息。

飞往月球，是苏联科学的巨大成就。1966 年，“月球 9 号”航天器第一次向地球发送了月球地形图象。“月球 17 号”空间站于1970 年 11 月把苏联设计师研制的“登月车 1 号”八轮自动车送上了月球。这种自动车靠太阳电池供电，由地面进行操纵。1971 年 10 月以前，它一直从月球上向地面发送了科学信息。

苏联在研究宇宙空间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卓越的成就，是因为
43 苏联的科学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苏联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培养出了许多技术熟练的干部。这些成就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忘我劳动的结果，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结果。

科学技术革命把建筑工业和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提到了更高的水平。建筑业中，主要机器（挖掘机、推土机、移动式起重机等）的总数十二年里（1959—1970 年）增加了二十四万三千一百台，而在过去十八年里只增加十万零四千八百台。

铁路运输这样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绩。1970 年，苏联实现了电气化的铁路全长达到了三万三千九百公里，而 1960 年只有一万三千八百公里。

由于实行自动化、全盘机械化以及其他改进措施，十二年里劳动的技术装备率提高了一点二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九十。

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人数的相对减少和非生产部门职工人数的增加，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结果。例如，1960 年非生产部门职工人数占国民经济部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到 1970 年已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农业生产发展的成就有助于改进对国民经济来说十分重要的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961—1965 年期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率(用百分比表示)比农业产值增长率高二点七倍以上，而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已缩小到二点三倍。

国民经济及其技术装备程度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为使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逐渐接近创造了条件。按计划规定，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第一、第二生产部类的发展速度几乎相同。1967年，这两个部类生产的实际发展速度几乎相等，而到1968、1969和1970年，第二部类的发展甚至略有加快。

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广泛建立作为工业生产有效组织形式的地区工业综合体，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和动力资源高度集中的地区。这便使工业得以接近原料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减少了因调运物资和调动劳动力而造成的耗费。布拉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一切烈姆霍沃以及其他一些综合体就是在五、六十年代于安加拉河、叶尼塞河以及西伯利亚其他河上建成的大型水电站提供动力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的基础上出现了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季夫诺戈尔斯克，以维柳伊斯克水电站为基础建成了二百个工业企业。这一过程在中亚地区也有发展。

上述表明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特点的所有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就成了加速历史进程的强大动力。

十年内(1961—197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为达到同样的结果，美国却用了二十年，英国用了三十多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用了将近十五年。为使工业产值增加一倍，美国用了十八年，英国用了二十二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用了十一年多。而苏联只用了八年半的时间。

3. 提高居民的物质福利。发展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44

完善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制度 “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这一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

个阶段，其中包括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仍然保持其现实的作用。所以，六十年代，工资仍然是对社会有效劳动进行物质刺激的主要形式，是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六十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始对在特别艰苦条件下工作的职工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对边远地区的正在开发原料新产地或参加主要工业项目建设的职工，采用较高的、所谓附加工资的地区系数。实行这一办法以后，极北地区工作人员的工资超过全国月平均工资指标百分之五十到七十，而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和远东工作人员的工资超过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乌拉尔、哈萨克和中亚边远地区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十到二十。

随着大多数企业因为改革而向新的经营条件过渡，企业用于工作人员的物质刺激基金增加了。这样就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因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所得的奖金。企业领导人也有可能规定不超过月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的奖金额。

物质刺激制度的普遍改进也与工资形式的完善有联系。在经济改革的条件下，每个企业都有权自行决定采用计件工资形式或计时工资形式的问题。无论采用哪种工资形式，都要考虑到生产过程的特点，工作人员的专业构成和业务水平以及生产的技术装备程度等情况。

由于实行了一系列完善物质刺激制度的措施，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由 1960 年的八十点六卢布增加到1970年的一百二十二卢布。六十年代末，月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比六十年代初增加了一倍。

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办法有了很大改变。早在六十年代前半期，许多集体农庄就已实行对部分劳动给予有保证的劳动报酬制度，其办法是不按计划任务完成的结果发放预支款。1966 年 5 月 16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集体农庄庄员从物质利益上对社会生产发展关心的程度”的决议。决议建议，从 1966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按照国营农场同类人员的工资标准按月支付有保证的劳动报酬（现金或实物）的制度。

1970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集体农庄已经实行按月支付有保证的劳动报酬制度。而且，现金支付部分超过了实物支付部分，几乎占农庄庄员报酬的四分之三。

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提高职工工资和集体农庄庄员从公有经济中所得收入的各项决议，有助于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任务，如促使各类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促使城乡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相互接近。同时，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提高物质刺激，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不断完善。 45

增加社会消费基金，完善优抚赡养制度 六十年代，社会消费基金对于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十年内，社会消费基金增加了一倍以上（由二百七十三亿卢布增加到六百三十九亿卢布）。近百分之九十的基金来自国家预算，其余百分之十来自企业、社会组织和集体农庄。

1960年，居民从社会消费基金中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按人口平均计算全年为一百二十七卢布，比战前增加了四倍多，而1970年为二百六十三卢布，比战前增加了九倍多。对于任何一个苏联家庭来说，从社会消费基金中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都是家庭预算中的一项重要收入。

六十年代，托儿所和幼儿园花在一个儿童身上的费用一年为三百到四百卢布左右，但其父母平均只付出其中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国家每年用于一名普通学校学生的费用为一百卢布，用于一名中等专科学校学生的费用大约为五百卢布，而用于一名高等学校学生的费用几乎达到九百卢布。仅1970年，国家拨给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大约为二百亿卢布。

国家为劳动者拨出的医疗费和休养费逐年增加。例如，六十年代前半期，工会组织发给的疗养证和休养证，其中就有百分之二十是免费的，而其余的大部分也只须交付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三十。在组织儿童休假活动方面劳动者也享有许多优惠。

社会消费基金还担负着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会职能，即促使居民的实际收入拉平。那些因小孩多、或病人多、或老人多而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可以从社会消费基金中得到更多的支付和优惠。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起，集体农庄的社会基金开始明显增加。同时，集体农庄能随生产力发展的加快而拨出越来越多的经费充作社会基金，用于实行集体农庄庄员的社会保险，改进庄员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以及开展文化生活服务。

随着工资和社会消费基金的逐步增长，优抚赡养制度也有了改进。从新的"国家优抚金法"（1956年）通过时起到六十年代中期，养老金的平均数额增长了一倍以上，残废优抚金的平均数额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失去赡养者的家庭除原有的补助金外还能领到大约百分之六十的附加补助金；军属补助金增加了一倍以上。

1964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的"集体农庄庄员优抚金和补助金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根据这个法律，每个庄员退休后都有权领取养老金，其计算依据为退休前最后十五年内任意五年劳动期的月平均工资，而且这五年可以由庄员自己从报酬最高的年份中选定。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年龄规定比工人和职员的退休年龄高五年。

集体农庄庄员的优抚金按两种工资形式计算，即既可按货币工资计算，也可按实物工资计算。集体农庄的年老庄员如果因健康状况不得已停止劳动，即使还没有达到必需的劳动工龄也可享受许多优惠。甚至在他们停止为公有经济干活之后，他们在集体农庄内生活的全部时间也计入他们的工龄。

46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7年9月26日的命令规定，从1968年1月1日起，集体农庄庄员有权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与工人和职员的退休年龄相同：男子六十岁，女子五十五岁。同时，提高了因工伤或职业病而致残的一级和二级残废庄员的残废优抚金的最低额，并增设了三级残废优抚金。

从1964年7月到1970年，领养老金的集体农庄庄员总人数

由二百六十万人增加到近一千二百万人。1961—1970年间，全国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由二千一百万人增加到四千万人，即增加了近一倍。应当指出，领养老金者人数之所以大大增加，不仅是由于领养老金人员的类别有所增加，而且还因为苏联人的寿命比以往延长了。

领养老金者人数的增加和国民经济需要的日益增长，这两个方面都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从物质上鼓励领养老金者继续参加社会有效劳动的问题。国家需要工作经验丰富的熟练干部。此外，已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并不都甘愿放弃积极的劳动活动。1964年2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提高领养老金者从物质利益上对生产工作关心的程度"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对继续参加劳动的领养老金者的劳动给予物质刺激的制度。在劳动力奇缺的边远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参加劳动的领养老金者除工资外，还可领取百分之七十五的养老金，但养老金和工资的总和每月不得超过二百卢布。在矿场和矿井工作的领养老金者不管工资多少均可领取全额养老金。建筑业、运输业和邮电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住宅维修业、国民教育系统和保健系统的工作人员既可领取养老金，同时也可领取工资。

1969年12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提高有劳动能力的领养老金者从物质利益上对领取养老金后继续工作的关心程度"的决议，规定除工资外还可以领取全额、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五十的养老金等三个类别，从而扩大了继续工作的领养老金者的范围。养老金和工资的总和也放宽到三百卢布。

总之，在上述十年里，党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完善优抚赡养制度的措施。同时，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名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又投入了积极的劳动，并在保留应得的养老金(或部分保留)的同时领取工资。

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 第七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综合标志，是各类各阶层居民的实际收入不断

提高。居民实际收入的提高首先是由于国民收入得到了提高，而国民收入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标志。1961--1965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每年平均为一千六百八十亿卢布，而1966—1970年已达到二千三百三十亿卢布。国民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三左右用于劳动者的消费，如：支付职工工资；增加集体农庄庄员从公有经济中获得的收入；用于教育、保健和满足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用于优抚赡养；支付学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建设住宅、医院、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

47 虽然六十年代提高居民实际收入的主要杠杆是调整工资，但是在本时期内降低课税额对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也起着巨大作用。例如，1960—1961年取消了月工资不到六十卢布的所得税，同时将月工资不到七十卢布的所得税降低了百分之四十，而到1968年初，这种降低工资所得税的办法已扩大到每月不超过八十卢布的工资。

总的说来，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收入1970年比1965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比1960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二，而比战前的1940年几乎增加了三倍。与此同时，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在六十年代几乎增加了五倍。

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在收入的水平和结构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首先是由于他们的劳动各有特点所致。例如，1970年，在工人家庭收支计划结构中，工资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余部分实际上是来自社会消费基金，在集体农庄庄员的家庭收支计划里，出现了如下的明显的趋势：靠个人副业所得的收入减少，靠公有经济所得的收入增加。

各类各阶层居民实际收入增加的具体表现是食品和工业品消费量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改进。从六十年代中期起，由于工资的提高，特别是低收入工作人员工资的提高，居民中不同经济集团在营养结构上的差别开始明显缩小。其主要原因是相对来说不够富裕的集团对高热量食品的消费量提高了。优抚金和补助金的增加

对营养结构的改进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生活条件大致相同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农业工人家庭的消费状况，就水平和结构而言实际上已属同一类型。此外，对产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家庭收支计划所做的分析表明，这两类劳动者由于在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处地位不同而造成的消费上的差别，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正日趋缩小，因为整个社会的特点，就是要使生活水平趋向一致。粮食的消费量开始减少（人均消费量从 1965 年的一百五十六公斤减少到 1970 年的一百四十九公斤），而某些食品的消费量则相应上升，如：肉类和动物油（由四十一公斤增加到四十八公斤），牛奶和奶制品（由二百五十一公斤增加到三百零七公斤），糖（由三十四点二公斤增加到三十八点八公斤），鱼制品（由十二点六公斤增加到十五点四公斤），蛋（由一百二十四个增加到一百五十八个）。

工业品消费量大幅度的提高及其消费结构的改进，是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结果。同时，随着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也增多了，而且起了质的变化。所以，不久前还被认为是奢侈物的许多商品很快便进入了每个苏联人的日常生活。

社会主义生活的改善表现为居民文化生活用品（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供应量的提高，还表现为各种耐用工业品（钢琴、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消费量的日趋增加。

文化生活用品需求的扩大及其产量的增长要求对为居民服务的商业系统进行重大改革。六十年代初，在中断了近三十年之后，苏联又恢复了赊帐交易，这种买卖很快就受到居民的欢迎。居民赊购最多的是诸如电视机、电冰箱这样一些商品。

改善居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1961—1970 年期间，党和政府为改善居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开展的活动达到了新的规模。48
1967年 3 月 7 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为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通过了关于企业、机关、组织的职工改行每周两个休息日、工作总时数保持不变的五日工作

周的决议。

在本时期内，各个企业广泛开展了保健和卫生防疫工作，从而使工伤事故大大减少；总的说来，十年里工伤事故减少了三分之二，而在某些部门甚至减少了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

大规模地进行住宅建设（包括国家的、合作性的和个体的），使得城市居民的住房面积明显增加。到1970年，苏联几乎有一半城市居民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条件。

六十年代，在城市房屋建筑和改造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巴库、萨拉托夫、塔什干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许多新区，这些新区和莫斯科的一个新住宅区相类似，被称之为“小野樱花”。这些新的多层建筑物前都设有科技进步时代所特有的全套服务行业。

农村住宅建设的规模扩大了。在一些经济发达的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建房一般可以获得为期十年和十年以上的建房贷款。

高速度的住宅建设对日常生活公用事业工程的组织和速度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国家为此目的拨出了巨额经费。例如，仅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为住宅建设和公用事业几乎用去了七百亿卢布，约占这五年国民收入积累基金总额的四分之一。

居民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保护苏联人民健康的最重要的预防措施之一。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把关心苏联人民的健康当作一项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所以，时刻注意完善医疗服务系统，并拨出大笔经费用以发展医疗预防机关和推行保健措施。

1961—1970年期间，各科医生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中级医务人员的人数以及医院、门诊所、卫生防疫站的数量（特别是在工业企业）都大大增加。以下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970年苏联人口是当时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七，而拥有的医生几乎占当时全世界医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由于居民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和医疗预防工作不断完善，许多

传染病如伤寒、鼠疫、白喉等实际上已经消灭。

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种种组织措施的落实增强了千百万群众参加日常体育运动的愿望。六十年代，运动员大军由二千八百七十万人增加到四千五百万人。

社会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 在进一步从经济上发展成熟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条件下，作为苏联社会主要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作用在继续提高。工人阶级对国家蓬勃发展的影响之所以得到加强，首先是由于其人数的增加。在国家机关、合作性机关、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职工中，工人的年均人数1960年为四千五百九十万，1970年为六千四百三十万(占就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六)。同时，工人阶级的质量构成也起了变化：工业部门工作人员所占比重增大了，而在这类人员中，物质资料直接生产者(一般地说，他们的生产技能最高)的比重也提高了。产业工人人数的优先增长是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完善的规律之一。

居民中最先进部分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必然会使这类居民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影响得到相应的加强。工人阶级所固有的诸如革命性、纪律性、组织性、集体主义精神、不断提高一般文化素养等特点加强了它作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主导地位。以下数字可以说明六十年代苏联工人阶级文化素养提高情况：1959年每千名工人中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有三百八十六人，1971年为五百五十多人。鉴于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提高，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不断扩大共产党员中的工人成分和工人阶级在各级苏维埃以及社会团体中的代表名额。

在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农民队伍也有了重大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的逐步转化，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生活的改善——凡此种种都使农民的社会面貌和心理状态起了变化。农民身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与工人相同的共同特点。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农村劳动者中受过中等和高等

教育的只占百分之六，而到1970年底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知识分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也是六十年代的特点。

六十年代，在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三支队伍的发展过程相互交织的基础上，消灭各阶级之间和各居民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的全面过程在加快地进行。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进步的客观规律。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同社会阶级关系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因为民族关系也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具体变革所决定的。

苏联各民族兄弟般合作的发展，各苏维埃共和国劳动者创造积极性的提高使社会主义各民族和部族更加接近，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牢固。为了贯彻列宁的民族政策，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力求把全联盟的利益和各共和国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力求使各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相互接近。但是，党实行的拉平各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方针，绝不意味着消灭它们在经济上的特点。该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根据各共和国的地区特点、民族特点以及其他特点完善各共和国社会分工的体系。同时，每个苏维埃共和国在自己的发展方面都要以全国的科学技术潜力为后盾，广泛利用其他共和国的生产经验。每个苏维埃共和国都在自己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同时也在苏联各民族继续逐步接近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1971年4月9日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中央总结报告的决议指出，“过去时期的特点，是我国各民族、各部族的全面进步和进一步的相互接近。苏联各族人民的卓越成就，是他们共同劳动和坚定不移地执行苏共民族政策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苏联人民。”①

4. 苏联的对外政策

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方面的成就和苏联日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0卷，莫斯科1972年版，第355页。

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国防实力为顺利实现苏联的外交方针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苏联外交方针的目的在于巩固世界社会主义的阵地，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加强普遍和平和在国际关系中确立互利合作。

苏联社会团体在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对外政策问题中的作用

苏联社会团体在解决六十年代苏联面临的一系列复杂的对外政策问题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六十年代的情况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符合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还是在广大劳动群众最积极的参与下付诸实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同任何的、甚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原则区别也在于此。

苏联社会团体在解决对外政策任务方面的作用日益提高，这是历史的规律，这个规律的发展既取决于外交因素，也取决于内政因素。苏联社会在六十年代的社会进步是与社会民主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种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解决对外政策问题。社会进步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普通教育水平和政治水平，这是他们积极参加国际生活的必要条件。

苏联社会团体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之所以能不断提高，还取决于世界革命进程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在建设新生活方面的成就，使苏联社会团体得以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建立起崭新的联系。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劳动人民的联系是在各兄弟国家共同遵循马列主义思想和从事马列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 从总体来看，这种联系是在六十年代获得全面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为扩大苏联社会团体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例如苏联共产党同资本主义国家马列主义政党之间的以及苏联工会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工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本时期内，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革命过程的发展导致了许

多古老的殖民主义帝国的崩溃。已经摆脱殖民地从属地位的各国人民都在寻求自己的、适合于他们的民族条件的社会进步的途径。利用其他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历史的规律。在过
51 去沙皇俄国边境地带的殖民地，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成社会主义，这是苏联独有的经验。这种经验对已经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各国人民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同时，苏联人民在六十年代仍继续无私地帮助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建设新生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基础，寻求社会进步的途径。所以，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的情况下，出现了苏联社会团体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亿万劳动者的联系全面发展的条件。

苏联社会团体参与国际生活和参与实现苏联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方针，实际上意味着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亿万劳动者各方面联系的发展。

苏联社会团体为维护和巩固和平，为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以实现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方针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一事实证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日益提高。

六十年代，苏联社会团体在国际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非偶然。只有社会进步才能为个性的真正而充分的发展，为每个人实际参与解决国家的内部生活和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苏联社会在本时期内的发展再次令人信服地证明，在社会进步不断发展的同时，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也在不断提高。

在本时期内，苏联社会团体对国际生活的影响极其广泛、多样，它们的国际联系反映了苏联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

苏联共产党是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利益的党。苏联社会团体通过苏联共产党同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与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人士取得联系。苏联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所以苏联社会团体通过苏联共产党同兄弟党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

国际联系是国际关系的最高形式。

工会是苏联劳动者的最富有群众性的组织，而且苏联工会迅速发展中的国际联系，是苏联社会团体国际联系的组成部分，是它们参与实现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重要形式。

在本时期内，苏联工会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已获解放并已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劳动者传授丰富的建设新社会的经验，而且还越来越积极地、创造性地利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弟兄的工会工作的好经验。

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苏联工会的国际联系得到了广泛发展：仅在 1970 年内，苏联就有三百六十六个工会代表团访问了六十四个国家，同时，有一百零二个国家的五百五十四个工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苏联工会的国际联系还不应单从工会的角度来看待。因为这种联系在社会政治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这种联系的参加者——苏联劳动者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不仅是工会的利益，而且还有争取和平，争取各国人民加强友谊和相互理解的事业。

积极参与这一斗争的还有苏联青年和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70 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已同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青年组织和大学生组织保持有经常联系。发展苏联青年国际联系的重要手段是旅游事业。

1961 年 7—8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世界青年论坛会议，讨论了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问题。参加讨论会工作的有一百零六个国家的八百多名青年代表。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为和平而斗争的问题、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而斗争的问题、为反帝和民族解放运动而斗争的问题以及青年组织进行国际合作的问题。

苏联青年在声援印度支那和远东各国人民的运动中，在声援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苏联社会团体还通过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联亚非团结委

员会、苏联妇女委员会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团体同外国社会人士发展联系，以这样的办法参加国际生活。在这些组织中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该联合会成立于1958年，到六十年代便成了同外国社会文化团体的广大人士保持联系的群众性组织。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参加了友好月的活动，参加了以研究兄弟国家同类组织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协会积极分子的旅游活动，参加了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举办的大量会议和会见。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 1965 年接待了九十五个外国代表团，同时向国外派出了一百一十四个苏联代表团，而到1970年接待和派出的代表团均达到二百五十个以上。

苏联社会团体积极参加国际生活和执行苏联对外政策所面临的各项任务，是苏联为实现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奋斗的重要因素。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与合作 在苏联六十年代的对外政策中，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关的新型国际关系，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推动本身进一步完善的新的重要动力。在加强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联系的同时，苏联始终不渝地遵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相互支持，以及党和国家平等独立的原则。

苏联共产党的外交活动及其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政党联系的广泛发展，对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卓有成效的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存在这种联系，才有可能从整个大家庭的利益出发来总结和利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发展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等方面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才有可能交流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

苏联共产党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联系，是通过双边接触、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参加兄弟党的国际讨论会的途径实现的。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苏共第二十二、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及 1969 年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

党国际会议对发展上述联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华沙条约组织是协调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外交活动的机构。苏联极为主动积极地参加了该组织的工作。

六十年代，苏联继续大力支援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完成社会主 53
义建设中紧迫的经济任务。以下事实可以表明苏联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的规模：据1971年统计，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援助占其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三以上。而且，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技术援助额还在不断增长。例如，1960—1965年期间，技术援助额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四，而1966—1970年期间却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九。在本时期内，苏联提供技术援助为社会主义国家新建、改造和扩建了一千六百九十五个不同的企业、某些车间以及其他项目。截至1971年1月1日，其中一千一百七十二个项目已经投入生产。

苏联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1966—1970年期间，苏联同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额超过了五百一十亿卢布，1970年比1965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根据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发展起来的。

六十年代，苏联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解决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59年1月1日这一时期内，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派出的专家约两万人，而在1959—1971年这一时期里则派出了六万多人。苏联专家帮助兄弟国家建设工业项目，调试和使用设备，培训熟练工人骨干。此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派出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生产技术。1950—1970年期间，就有二百万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在苏联的企业里实习。兄弟国家的同类企业和部门工会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互派革新者、合理化建议者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并交换有关劳动组织问题的资料。

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利用苏联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方面的极其丰富的经验，这有助于加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

之间的国际主义联系，有助于在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即苏联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生产和经济相互关系的领域，确立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

苏联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同样认真地研究和运用兄弟国家劳动者因发挥创新精神而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和交流先进生产经验方面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新事物。

友好、合作和互助双边条约，是苏联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合作的发展在条约法律上的体现。1961年7月6日，苏联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了条约，1964年6月12日，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条约。还同以下国家续订了在本时期内已经超过有效期的条约：波兰（1965年4月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1966年1月15日）、保加利亚（1967年5月12日）、匈牙利（1967年9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5月6日）、罗马尼亚（1970年7月7日）。这些条约是真正的友谊宪章，它们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型国际关系发展时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正面经验。

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受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支持和怂恿的国内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主义行动。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于1968年8月21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反革命的政变计划。这次行动是应捷克斯洛伐
54 克共产党人和劳动者的请求，并根据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工人党1968年8月3日的联合声明而采取的。联合声明强调指出，"保持、巩固和维护每一国人民以英勇奋斗和忘我劳动的代价所取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联对印度支那事态所采取的立场，是苏联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的鲜明体现。1964年，美国公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武装侵略。苏联政府不仅提出了停止侵略的要求，而且还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抗击侵略的行动给予了全面援助。

苏联还大力支援了为反对美国武装干涉者而战斗的越南南方的进步力量。

苏联对待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态度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表现得很明确。代表大会指出，“在侵略者使反对越南人民的可耻战争逐步升级的同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朋友和兄弟却对越南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支持。”在苏联的倡议下，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曾多次研究越南问题，并使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为大力支援英雄的越南人民所采取的政策协调一致。

苏联在联合国、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在各国领导人会晤时，都对越南民主力量抵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给予有效的外交支持。苏联社会团体发起了卓有成效的运动以声援越南人民。苏联各社会团体支援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各项措施均由1967年8月建立的苏联支持越南委员会进行协调。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战斗中的越南所提供的积极全面的援助，对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起着重大作用。

苏联同古巴的合作得到了顺利发展。

苏联不仅发展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全面合作，而且还促使社会主义大家庭不断得到巩固，从而为所有进步力量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苏联忠于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国际 55
主义原则，大力援助和支持正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与已经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年轻国家。

六十年代，苏联从外交、经济和军事上援助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开始得到积极的发展。

苏联对西伊里安归还印度尼西亚起了重要的良好作用。

苏联有效地支持了已经获得独立但仍要同阻碍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国家的进步力量。

苏联在制止以色列 1967 年 6 月在近东发动的侵略战争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许多国家的支持，它的坚定立场促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停火决议。此后，苏联又给予遭受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以巨大援助，帮助它们挽回所受的经济损失和加强其国防力量。

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一直坚定不移地主张公正、和平地解决近东的冲突。

殖民主义给已解放国家留下了沉重的包袱，特别是许多悬而未决的、反复引起国际性冲突的领土问题。其中最大的一次冲突是 1965 年发生的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战争。为解决印巴之间的冲突，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双方接受了苏联的调停。1966 年初，苏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在塔什干举行了会晤，为印巴关系正常化打下了现实的基础。

苏联大力援助已摆脱殖民地从属地位的各国人民解决其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截至 1971 年，苏联同四十个已解放国家签订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六十年代，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大大扩大。1955 年，苏联与之保持经常性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十八个，而到 1971 年就达到了六十多个。

苏联积极帮助已解放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它们的经济独立发展的基础。到 1971 年，在这些国家内由苏联援建的七百多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中，已有三百五十多个企业和项目投入使用。

苏联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机器和设备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 1955 年的近百分之三点六上升到 1970 年的百分之三十三，而成套设备的比重几乎达到百分之六十。

多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贷款，用以发展经济，所以苏联以优惠条件提供的贷款对这些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
56 治意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到 1970 年底止，苏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的总额为五十多亿卢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贷款用于发展这些国家的生产部门。

六十年代，苏联派出成千上万名高级专家到发展中国家工作，直接帮助它们实现经济发展计划。苏联的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不仅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工业项目和安排生产，而且还为这些国家培训它们感到奇缺的熟练的骨干工人。在 1961—1969 年期间，苏联专家为这些国家培训了三十多万熟练工人和中级技术人员。

苏联同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为经济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得到苏联的物质援助，而且还能利用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

六十年代的历史再次有力地证明，苏联奉行的对外政策具有国际主义性质。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的有效的全面援助，促使帝国主义过去的殖民地附属国更加积极地投入世界革命过程。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的加强为进一步有效地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一原则的彻底实行却遭到了(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激烈反对。

在本时期中，完成有关欧洲战后和平调整的一系列问题在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增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军事潜力，企图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核力量的办法使西德帝国主义者得到核武器，在西柏林进行挑衅活动——凡此种种都是西方外交方针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迫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上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1961年 6 月 3—4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美国总统在维也纳举行了会晤。会晤期间，苏联方面就解决德国问题以及停止核试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但是，会晤结果表明，反对国际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的美国军界工业界集团的阻碍作用非常之大。由于西柏林反动集团的挑衅活动越来越频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得不在征得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在同大柏林西区接壤的地带加强警卫和监视。这一正当措

施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特别是西德复仇主义者大发雷霆。为配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挑衅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还大肆进行军事准备。西方国家的行动导致国际局势急剧尖锐化。

面对帝国主义的挑衅，苏联政府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并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必要的支持。1961 年秋，苏联通过了关于增加
57 军事预算的决定，暂时停止裁减武装力量，延长了军人的服役期。

苏联政府所采取的果断措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挑衅行为开始逐渐减少。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不得不再次交换意见，但是从 1961 年秋直到 1964 年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谈判并无结果。

六十年代，苏联为了在解决全面彻底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而继续努力。苏联的主动行动为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该委员会于 1962 年 3 月 1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由于苏联外交人士的积极活动，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工作的开始阶段取得一致意见的不仅有总的原则，而且还有裁军条约的序言和某些条款。但是后来谈判陷入僵局，到 1964 年实际上中断了谈判。

六十年代前半期，苏联的对外政策在解决停止核试验这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苏联同美、英进行长期而又复杂的谈判过程中，西方大国阻碍达成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的立场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于 1963 年夏季建议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协定。在莫斯科谈判期间，许多争端得到解决，并于 1963 年 8 月 5 日签订了相应的条约。从“冷战”开始以来，第一次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切身利益的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以下事实可以证明上述问题的解决，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切合时宜：在很短时间里参加莫斯科条约的就有一百多个国家。

苏联解决欧洲政治问题也同解决其他国际问题一样，是在与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密切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

1965年1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欧洲安全的重要倡议，其中就有关于欧洲各国召开欧洲安全问题会议的建议。

1966年7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宣言，宣言号召世界各国政府和进步力量“共同努力，把最重要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欧洲变成各平等国家之间全面有效合作的大陆和世界保持和平互助的强有力因素”。

1968年7月1日，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同时签署了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多边国际条约，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又一胜利。1970年初该条约正式生效，此时参加国已达一百个。

苏联为和平解决争端，为加强国际安全和发展合作，为坚决回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做出了建设性的努力，从而使六十年代后
半期的国际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苏联同许多资本主义国 58
家在国际政治方面建立了事务合作关系，彼此之间开始定期进行政治磋商，并加强了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象1966年6月30日的苏法宣言、1970年8月12日的苏联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条约这样一些文件都可证明国际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这些文件中都表示拥护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政策。

六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后半期，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经济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苏维埃民主以及苏联各民族的兄弟友谊都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治力量和国防力量大大加强。

第二章

59 中欧和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

六十年代对中欧和东南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更高阶段的时期。六十年代初，上述国家已顺利解决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党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相继召开的代表大会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各该国的建成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各重要领域的胜利。而且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发展，是在反社会主义势力十分猖獗，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企图干涉该国内政的复杂形势下进行的。

六十年代，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由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相似，而且其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又大致一样，因而它们几乎同时向完成新的任务过渡。

把提高劳动人民福利放在首位，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总的说来，上述国家职工的工资十年内有了显著的提高，合作化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更大，结果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大大缩小。经互会多数成员国的最低工资得到了提高，退休基金也大幅度增加，职工开始向每周工作五日过渡，而捷克斯洛伐克已完成了这一过渡。只有波兰由于种种原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开始放慢。

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也在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肯定了社会主义取得的主要成果，宣布进一步加强政

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民主原则。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法作了重大修改，在经过检验的社会主义联邦制原则的基础上改组了国家结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社会团体的作用提高了，劳动者参加政权机关活动和生产管理的范围也扩大了。

中欧和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六十年代发展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逐渐成熟，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它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及其政策的科学论证性也应当随之提高。 60

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完善社会关系，促使该地区多数国家劳动人民在劳动性质、收入、工作和日常生活条件、文化技术素养等方面的社会阶级差别明显地拉平和缩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人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逐步确立，为使居民今后达到社会单一性所需的前提日益形成。尽管取得了上述可喜的进展，然而还存在因所有制形式不同和生活特点各异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以及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者之间的本质差别。

绝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及其与苏联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和华沙条约军事政治组织内部的全面合作不断发展，这一切是说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种合作关系为经互会成员国最合理地提高经济潜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互相配合，是经互会成员国扩大合作的核心。兄弟党领导人之间基本上定期举行的多边和双边会谈，是各党之间相互联系的最重要形式。通过这些会谈，互相交流了经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取得了统一意见，解决了经济合作的原则问题，制订了对外政策的统一方针。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1969年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各部委、企业、科学机构、友好城市和友好州之间的直接联系大大加强了。

经互会成员国1961—1970年的相互贸易额从一百四十二亿卢布上升到三百二十亿卢布，即增加了一倍多，这一事实可以说明经互会成员国——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期间经济联系的发展规模。根据1961年12月经互会第十五次会议拟订的并经1962年6月经互会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同意的“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基本原则”，经互会某些成员国开始实行生产专业化。计划工作的合作，特别是由于各期国民经济计划的协调而得到广泛的发展。1961—1964年间，苏、捷、匈、波和民主德国共同铺设全长约五千公里的“友谊”输油管干线这项工程，是经互会成员国活动中的一件大事。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从1964年起参加了经互会各个机关的工作。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例外，它于1961年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拒不参加经互会工作，实际上减少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从而对它的经济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

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潜力，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制度，加强其团结一致，是使整个国际形势健康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此期间曾多次企图扭转局势，变不利为有利，但遭到了失败。

61 ## 1. 波兰人民共和国

在波兰，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导力量的工人阶级，在六十年代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这个作用反映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指导性活动之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人数十年内增加了一倍多，即从一百一十万增加到二百三十万（包括预备党员）。在国民经济公营经济部门工作的人数从1960年的七百万增加到1970年的九百六十万，其中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人数从二百九十万上升到四百万。

在此期间，人民知识分子的队伍也明显扩大。国民经济公营

经济部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人数从二十四万增加到五十万零一千人。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者的比重从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九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

然而，波兰不同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许多任务实际上并未完成。例如，在农业方面私有成分还占优势。诚然，个体农户的数量从四百九十万户缩减到四百四十万户，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与其说是表现在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上，不如说是表现在许多个体农户资本主义专业化的不断发展上，以及农业设备的集中在他们手里。特别是个体农户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从1960年的一万三千台增长到1970年的五万五千台，仅略少于国营农场所拥有的拖拉机数量（1970年为六万六千台）。

除农业外，私人经济成分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略有扩大：在私人经济成分中工作的人数从1960年的三十三万六千人增加到1970年的四十四万二千人。

由于国家经济的多种成分——工业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统治地位，农业中小商品经济成分占优势，城乡存在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小企业，因此，社会关系仍然十分复杂，存在相当尖锐的对抗性社会矛盾。

除了结构因素以外，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长期存在、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波兰天主教统治集团部分人员的猖狂活动，均使对抗性矛盾得以继续存在。

某些社会生活问题，首先是住房问题的激化（一方面住房建筑面积缩减，建设速度放慢，另一方面因人口增加和城市化而使住房的需要增大，这两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1961年2月16日通过了国家发展五年计划（1961—1965年）法令。根据波兰前几年工业发展取得的成就，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个大胆而艰巨的任务：在投资总额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五十三的情况下提高国民收入大约百

分之四十，工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基本建设投资首先用于发展冶金工业，扩大燃料能源基地，发展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开发前几年发现的硫矿和铜矿。计划规定用于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拨款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三十六。

62 与以往一样，不断扩大与苏联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合作，对解决上述任务起了重大作用。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兴建的、于1964年12月投产的朴洛次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对加强波兰的工业潜力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联合企业开始加工由苏联经“友谊”输油管道波兰段（还在1963年12月就已竣工）输入的石油。随着朴洛次克联合企业的投产，波兰化学工业获得了国内第一个用石油加工生产主要化学产品的大型企业。石油加工从1960年的九十万吨增加到1965年的三百五十万吨。

波兰加紧开发国内蕴藏量丰富的燃料动力资源和原料资源。这样，煤的开采量超过了五年计划的指标。扩大开采图罗朔夫煤田（弗罗茨瓦夫省）和科宁煤田（波兹南省）的褐煤矿，使褐煤产量从1960年的九百三十万吨增加到1965年的二千三百万吨。结果几乎百分之三十的电力是由比煤更便宜的燃料生产的。这种情况加上一些新电站的投入使用和1959—1962年间经互会欧洲各成员国均被纳入其内的“和平”联合动力系统的建成，使波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电力生产达到了大致可以满足当时国家需要的水平。

普遍开发五十年代中期发现的塔尔诺布热格矿区的硫矿，使硫磺产量从1960年的两万吨增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四十三万吨。就化学工业这种贵重原料的出口额而言，波兰占世界第二、第三位。波兰化学工业的普遍发展，尤其是在利用苏联天然气进行生产的普瓦维地区的氮肥联合企业开工之后（1966年生产
63 达到设计能力后，国内半数以上的氮肥由该企业生产），人工肥料的生产以最快速度发展。合成纤维的生产也有发展。机器制造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产百分之九十六。在进一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工业结构现代化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到六十年代中期，就工业生产总值而言，波兰已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与此同时，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不相协调，发展极不平衡，耗资又超过了计划规定。而且因上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兴建的重工业项目和需要长期建设、开发和出产品的燃料原料工程未能竣工，大部分基本建设投资被耗尽。

许多工业部门没有完成发展计划。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也未能完成，部分原因是1962—1964年的气候恶劣。降低产品成本的任务没有完成。粗放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仍占优势；工业部门工作的人数大大超过计划规定的增长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必需保证人人就业所造成的。按计划规定，应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使总产值增加百分之八十四，但由于受粗放因素的影响，总产值只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国民收入未能达到计划规定的水平；五年内只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而计划规定提高百分之四十。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规定，通过运用科技革命成就和提高投资效率的方法进一步促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是：胜利地完成了许多计划任务的数量指标；工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计划规定为百分之四十四）。国内出现了许多大型新企业：奥尔兹丁省的汽车轮胎厂；以五十年代末发现的欧洲最大的柳宾-格沃古夫矿区（热洛纳古腊省和列希诺省）为基地兴建的炼铜厂；生产化学纤维、合成橡胶和药品的企业，冶金和机器制造联合企业，等等。位于诺瓦-胡塔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年产生铁九十二万五千吨的高炉于1966年投产，这座高炉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高炉之一。最先进的工业部门的产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波兰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联系扩大
了。经互会成员国奉行的方针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科技合作、国 64
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互相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波兰成为专门生产铁路机车车辆、船舶、发动机、纺织、水泥、制糖、电机等企业设备

以及铝锌和炼铜工业制品的国家，它的专业化越来越明确了。

但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不少严重困难。一部分困难是由于波兰进口物品和传统出口物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发生了对波兰不利的变化，而相当大的一部分困难则是由于超出五年计划的规定过分地优先考虑重工业发展需要的国家投资政策所造成的。其后果是，工业某些部门之间以及日用品生产和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失调更为严重。结果，正如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71年12月)所指出的那样，整个工业生产领域取得的成就没有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得到应有的反映。此外，波兰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以往比其他更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快，而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却落后了。1966—1970年期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减慢了。

这一切导致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额低于计划规定数，而随后由于生活费用提高了约有百分之八，某些劳动阶层的实际工资甚至有所降低。1970年的实际工资指数是1960年的一百一十九，而生活费用指数却超过了一百二十。谷物、肉类、牛奶和其他食品的人均消费量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物价上涨，低工资阶层的消费者对上述食品的购买力日益降低。

当时农业情况不佳也是使困难增多的原因之一。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十年内每公顷平均增加三点七公担，但是，大大低于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友邻社会主义国家的产量：在波兰，谷物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为十八点四公担，而在民主德国，每公顷为二十七点三公担，在捷克斯洛伐克，每公顷为二十五点三公担。

鉴于个体农户的商品生产率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在六十年代仍然采取1957年实行的发展农业生产组的方针。农业生产组不改变农民对土地和农产品的所有权，只不过有助于解决轮作、施肥、使用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无力使用的农业技术手段、工程修建等等问题。

农业生产组是一种有组织的经营管理形式，很快受到劳动农

民的好评。到 1970 年底,全国有三万五千个农业生产组,参加生产组的农民计二百六十万零五千人，约百分之八十八的农村建立了农业生产组。这时,农业生产组拥有九万二千台拖拉机,比1960年增加了八倍。农业生产组大多依靠国家于 1959 年建立农业发展基金来购置农业设备。农业生产组的成员基本上是中农。

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中,多数人占有不少于两公顷的土地。占地较少的小农户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非农业收入。“农民工人”，即拥有少量份地而基本上从事雇佣劳动的人数不断增加:1959 年为
一百八十五万人，到 1970 年增至三百万人。较大一部分“农民工 65
人”被列入社会主义经济范围,但其中许多人在富裕农户当雇工。

不少郊区农户,土地仅有二、三公顷,但成为赢利多的蔬菜、家禽、花卉专业户，这些专业户往往无需雇工也可以得到很高的收入，有时甚至是暴利。

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六十年代有所提高,然而居民粮食、畜牧业饲料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增长得更快,以致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国家不得不增加谷物和饲料的进口。由于农村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农村中小商品经济成分仍占优势，因此更合理使用土地、加强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消除耕地交错现象、国家收买因子女不再务农而无劳动力的农户的土地、禁止瓜分占地等措施奏效不大,也未能为解决国家面临的国民经济重大任务创造条件。1969 年和 1970 年的歉收,使国内市场食品短缺。与食品供应紧张状况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实际工资没有增加,住房建设规模缩小，保健投资减少。

六十年代，波兰统一工人党继续加强与盟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联系。民主党于 1961 年 2 月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审议了关于手工业者、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某些其他社会阶层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

1961、1965 和 1969 年三次议会选举中，选民们对参加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人民统一阵线的三个政党的活动表示赞同。

当选为议会成员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有二百五十五或二百五十六人，波兰统一农民党党员有一百一十七人，民主党人有三十九人，无党派人士有四十八或四十九人，包括代表上层天主教徒社会政治联盟的天主教活动家：其中当选为第三届议会议员的有十一人，第四届议会议员的有十二人，第五届议会议员的有十四人，在主要的问题上，他们的活动与人民统一阵线的原则是不矛盾的。1964年8月亚·萨瓦斯基逝世后，爱德华·奥哈布当选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1968年4月，主席职务由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接替。1947年起，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主持政府工作。

为庆祝本国历史、波兰革命运动史和国际革命运动史上许多纪念日而进行的活动都是六十年代波兰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此时期，全国的庆祝活动有：波兰立国一千周年；1912年6月列宁来到波兰五十周年；1942年1月成立波兰工人党地下组织二十周年；1863年11月开始民族解放起义一百周年；雅吉隆大学成立六百周年；波兰印刷出版业成立五百周年；波兰开始复兴并建立人民政权二十周年。全民隆重庆祝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和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在筹备庆祝周年活动的同时，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领导的青年组织以及盟党、工会和创作联合会进
66 行了广泛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目的在于正确阐明庆祝周年活动的意义，发扬进步传统，以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

然而，思想教育工作未能贯彻始终，原则性不强，使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往往背离国际主义原则。对往事的科学分析常常被理想化所取代。这助长了那些企图散布各种民族主义偏见和种种成见的反社会主义集团的猖狂活动。

所有反社会主义势力——资产阶级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改良主义分子，利用了国内经济状况困难和波兰社会结构特殊这个条件来进行反人民活动。1968年3月，部分学生受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唆使，制造了混乱局面。

巩固波兰社会主义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迫切问题以及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任务，是1968年11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议题。民主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9年2月)和农民统一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69年3月)都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作出了贡献。

然而，客观上存在的困难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在经济、社会和思想政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使全面解决正确规定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主观主义、违反列宁关于党和国家领导的原则，是犯错误的根源。正如晚些时候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71年12月)所指出的那样，上级党组织审议某些问题时越来越取决于政治局极少数几个委员的兴趣和意见。党内民主受到极大限制。党和国家的领导面临危机。与此同时，大部分党员、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和其他劳动者对领导方法以及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错误大为不满。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提高国民经济投资额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这一事实证明经济发展方面的严重失误。为寻求摆脱经济困难的途径，政府于1970年12月12日不作任何解释就大幅度提高许多日用品价格，以致引起了一系列大规模行动。从工人方面来说，首先在波罗的海沿岸一些城市发起的这些行动根本不带有反社会主义倾向，只不过是对极少数领导人确定的路线表示谴责而已；而这些少数领导人却毫无 67
理由地将工人们的抗议说成是反革命行动，非用武力镇压不可。犯罪分子趁工人发动之机，开始捣毁商店。为了恢复社会秩序，政府在许多场合出动了军队。然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制止了上述会引起大量伤亡的行动。12月20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了一系列政治变动。全会选举爱德华·盖莱克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撤销提高物价的措施；就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新方针拟定了措施。波兰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通情达理地响应了向他们提出的关于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号召；党所采取的措施，使国内局势正常起来，并为寻求克服困难的

途径提供了条件。

六十年代期间，人民波兰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不渝地奉行巩固和平，逐步实现与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人民波兰反对“冷战”政策，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波兰政府与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于 1967 年 6 月同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

波兰认为，发展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各国的关系，对波兰外交政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波兰人民共和国是 1962 年 6 月召开经互会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起国，并对会议作出了重大贡献。会议赞同了“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基本原则”。人民波兰积极参加这方面的下一步工作，1969 年通过的关于制定社会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的决定，是这项工作的重大成果。

由于 1945 年条约的有效期满，苏波两国于 1965 年 4 月 8 日在华沙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新条约。新条约规定根据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发展苏波双边以及经互会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关系。新
68 条约反映了 1945 年条约签署以后世界上发生的变化。

波兰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如既往地顺利发展。1967 年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1968 年同匈牙利，1970 年同罗马尼亚，分别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波兰人民共和国竭力反对新殖民政策，同已解放的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给予他们各方面的援助。

波兰人民共和国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的事务接触。1967 年 9 月戴高乐总统访波，证明波兰同法国的关系显著扩大，此外，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关系也大有发展。

波兰人民共和国仍然争取在中欧建立无核区（“腊帕茨基计划”），停止军备竞赛，禁止将核武器转让给无核武器国。波兰在1964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提议就安全合作问题召开有美国参加的全欧会议。波兰是参加签署 1968 年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首批国家之一。

苏联西德条约于 1970 年 8 月在莫斯科签署，表明世界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种变化促使联邦德国政府开始同波兰保持正常关系。两国代表于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签订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承认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发展的结局所形成的欧洲领土和政治现状，其中包括这些现状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如奥得河和尼斯河边界问题，双方同意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样的条约得以签订，全靠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所取得的成就。

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到六十年代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便已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取得了胜利，从而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得到解决。向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必需的前提已经具备。同时，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整个体系中的作用提高了。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小国竟能成为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而且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名列第二(仅次于苏联)。

民主德国所取得的成就，使德意志工农国家的敌人胆战心惊。六十年代初期起，受西方国家统治集团唆使的联邦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从对民主德国的经济侵略和某些挑衅活动转而准备直接采取军事侵略。西德帝国主义分子力图消灭民主德国的工农政权，吞并其领土。1961 年 8 月初，他们在民主德国首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破坏活动。北约军队在紧靠民主德国西部边境的地方开始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当时的形势要求民主德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8 月 13 日，民
主德国政府在征得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同意后，决定在同西柏林 69
交界处实行有效管制。得到民主德国人民群众拥护的这项措施和

社会主义盟国对进犯民主德国的侵略者将进行反击的决心，使欧洲中部的这场严重危机得以幸免。

1961年9月，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了国防法，1962年1月，又通过了义务兵役法。此外，还采取措施提高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战斗力。

帝国主义分子对民主德国的侵略计划的破产又一次证明，民主德国是一个坚固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有捍卫自己国境所必需的一切。与此同时，两个德国组成联邦的问题因西方国家和联邦德国政府拒绝民主德国政府一切建设性的和平建议而被从议事日程上删去了。显然，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主权国家和平共处这个原则之上。

六十年代初期的特征是，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继续加快。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顺利地克服了种种困难，逐步消除了在对西柏林实行边境开放时期造成的经济亏损。经济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使各个经济部门保持平衡，消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消灭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落后状况。在解决上述任务的过程中，民主德国不断寻求新的补充措施来扩大投资，实现科技进步和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1963年1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民主德国发展新阶段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新党纲，这是民主德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纲领的各项原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它指导党进一步发扬、巩固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并强调指出国家在领导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必须加强国家的组织、管理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能。大会文件指出，只有在民主德国人民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人民保持兄弟般合作的基础上，上述任务才有可能实现。

民主德国劳动人民以非常满意的心情欢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友好的民主党派——基

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民主农民党和德国国家民主党表示支持大会决定，赞成积极参加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民主德国公民在1963年10月人民议院、专区委员会和柏林市议会的选举运动中表现出完全同意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他们的绝大多数投了全国阵线候选人的票。

为实现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1963年7月制定了实行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新体制的措施。新体制规定，要显著地扩大企业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的权利。1964年1月起，国营企业联合公司实行经济核算。中央的国家计划工作越来越集中 70
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1964年10月，民主德国隆重庆祝了国庆十五周年。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分别召开大会庆祝民主德国国庆，而且还举办了显示德意志工农国家建设成就的展览会。在莫斯科举办的展览会是规模最大的一个。1964年9月21日奥托·格罗提沃逝世后被任命为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的维利·斯多夫出席了展览会开幕式。

到六十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劳动人民在实现国民经济各项计划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竞赛的蓬勃开展是全国劳动人民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重要决定的响应，社会主义竞赛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1962—1966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六。工业产值在这一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产值的增长几乎全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1962年相比，国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农业有了新的发展。1963—1966年，谷物单位面积年平均产量每公顷为二十六点八公担，土豆为一百七十六点七公担，甜菜为二百七十三点九公担。

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从1963至1966年，职工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合作化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国家拨给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费用在此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民主德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66—1970 年)是在仔细权衡各种可能和进行切合实际的预测的基础上制定的。根据计划，工业生产应比 1963 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比 1949 年增加五倍。

1966 年 11 月 23 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了一项扩大劳动人民领导经济的权利的法令。法令规定了劳动者参加计划和管理的具体形式。企业内现行的常设生产会议和经营管理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71 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生活的决定性领域——物质生产部门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完善。

贯彻大会决定的结果是，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更好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1966年，民主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科学和社会主义生产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改组1962年建立的科学研究委员会，并明确规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使之与国家发展的新阶段相适应。

六十年代下半期，民主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即只有采用综合治理的方法解决国家面临的任务，才能最有效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社会，更充分地利用其优势。1967年 4 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上述问题十分重视。大会拟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保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进一步完善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合理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农业方面，要求更加重视进一步运用工业化方法来发展农业。

代表大会制订了旨在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一系列措施。在实现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第一年，民主德国劳动人民就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国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工业产值上升了百分之六点八，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七点二。国家收购的农产品增加了百分之十，畜产品增加了百分之四点六。

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

面的一切变化，促使民主德国有必要制定新宪法。宪法委员会草拟的新的根本法草案于 1968 年 1 月经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基本同意后交由全民讨论。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和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积极地参加了宪法讨论。在历时二个多月的讨论中，劳动人民对草案的所有原则性条文表示同意，同时又提出了许多建议，以便改进草案某些条文的提法。新宪法草案的最后文本交由全民表决。全国百分之九十四点四的选民表示赞同。这样，绝大多数人对德国 72
统一社会党第六、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决定和党所宣布的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表示完全同意。

1968年宪法确定了民主德国国家制度、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政治方面宪法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城乡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宪法还把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民主德国的经济基础固定了下来，规定所有制有以下几种形式：属整个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劳动集体的合作社所有制和公民社会团体所有制。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领导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地方政权机关的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也是经济基本原则之一。

民主德国的 1968年 宪法发展并丰富了 1949 年宪法中所有进步的和民主的原则，肯定了民主德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并明文规定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和途径。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新宪法，体现了德国人民真正的革命传统和人道主义传统，确认德国人民忠于这些传统，新宪法还指明了进一步发扬上述传统的途径。

根据 1968年宪法规定，劳动人民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使自主权，是民主德国国家制度的基础。宪法载明民主德国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和教育权以及参加解决一切问题的权利。宪法还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不仅宣布了公民的权利，而且还保证公民行使上述权利。

宪法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中起领

导作用，工人阶级必须同合作化的农民阶级和其他阶层人民结成紧密的联盟。宪法还强调指出，关心人，关心人们的需要，是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基础。

宪法中关于民主德国是国际社会主义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这一条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宪法宣布，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争取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斗争，是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之一。

1969年10月，民主德国欢庆建国二十周年。为迎接这一节日而掀起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对顺利完成1966—1970年五年计划起着重要作用。五年计划中有关经济、科技和社会方面的所有主要任务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农业发展顺利。到五年计划末，国家收购的肉类(屠宰重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禽类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牛奶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蛋品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因1969—1970年冬季严寒所造成的某些困难，以致国民经济所需的原料、燃料和电力供应不足。五年计划后两年任务的许多指标未能完成。

总的说来，五年计划期间，民主德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四分之一强，1970年达到一千零八十亿马克。工业产量五年内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发展速度最快的是电机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科学仪器制造业。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保证的，这一事实具有很大意义。



柏林市列宁广场新住宅建设

零售贸易额1970年与1965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工业品销售给居民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

德国统一社会党以同合作化农民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结成紧密联盟的工人阶级为依靠，它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1970年，民主德国大约有六百四十万职工，其中在国营企业工作的约五百万人，在生产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工作的超过四十四万，在公私合营企业工作的约四十五万三千人，在私营企业的约四十三万七千人。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工会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方面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的素质在社会主义竞赛过程中有了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系有所加强。加入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青年一代积极参加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青年男女开展大规模的节约材料运动，五年计划期间向国家上交利润十五亿马克。

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国民实际收入五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多。国民经济社会主义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十九。职工每周工作五天，带最低工资的休假期由十二天增加到十五天，这一切为劳动人民的休息，从事体育运动和提高文化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居住条件逐年得到改善。由于建了新房，改造了老房，五年内有三十六万五千套住宅交付使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所以能顺利地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问题，首先是因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政府在工作中遵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在国家工业高度发展的特殊条件下正确运用马列主义原则，创造性地发展这些原则。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批制定并巧妙运用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新体制、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之一。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1970年，进步人士广泛地庆祝了列宁诞辰一百周年。1969年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号召学习列宁的理论遗产，这个号召得到民主德国劳动人民的热烈响应。学习列宁著作成了大规模运动。为庆祝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而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具有了群众性。

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

74 家的合作，决定了民主德国外交活动的内容和总方针。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已经阐明。其中最主要的是：为在民主德国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加强同苏联的联系；增进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同获得解放的国家发展全面合作；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全力支持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对联邦德国反动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政策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民主德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遵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所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全面合作，是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民主德国一贯履行其参加华沙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以此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民主德国作为经互会成员，在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合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民主德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签订国务条约，对民主德国顺利解决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民主德国1964年6月同苏联签订的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在所有这些条约中占有特殊地位。

换货额的增加证明民主德国同苏联的经济关系发展顺利。1966—1970年的五年间，两国换货额增加了近百分之三十二。1961—1965年间，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总贸易额为四百九十九亿零一百万外汇马克，而1966—1970年间，总贸易额为六百五十六亿六千七百万马克。

民主德国恪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忠实履行华沙条约所规定的义务，1968年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一起援助兄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反革命作斗争。

民主德国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积极支持那些为抗击美国侵略者及其西贡傀儡政权的联合力量，争取自由和国家独立而忘我斗争的英雄的越南人民。

民主德国广泛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全面合作。民主德国一贯

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

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使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同民主德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进行合作。1968—1969年，民主德国同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签署了贸易协定，同英国和意大利签订了第一批长期贸易协定，又同澳大利亚和芬兰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

由于西德统治集团的过错，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仍然复杂而困难。在整个六十年代期间，民主德国一直致力于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以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欧洲和平。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和政府多次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设性建议，但联邦德国统治集团却予以拒绝，对工农德国继续采取敌对态度。

直至1969年底，两国关系才有所好转。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 75
社会主义的变化、民主德国国际威望的提高以及联邦德国本身的利益，都促使联邦德国政府同意两国在和平共处、平等、独立的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关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调整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所作的不懈努力、它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对西欧和北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有助于六十年代末为民主德国以后在国际法律地位上广泛得到承认创造前提。

3.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六十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在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过程中，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及其以马列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1965年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八点一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以外，又出现了合作化农民阶级，形成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

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使

捷克斯洛伐克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值方面居于世界先进行列。

1961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60年7月经捷共全国代表会议赞同的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五十六。计划特别重视下列问题：加速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更加合理地进行国内生产力的布局；特别是保证把斯洛伐克的经济提高到捷克的水平。还规定农业也要高速度发展，其任务是，到五年计划结束农业总产值应提高百分之二十二点八。

全国劳动者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劳动作业队运动广泛展开，全国作业队首次会议于1961年1月召开。社会主义劳动作业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技术进步、实现生产过程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提高工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主要核心——产业工人的技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农村开展了合并扩大合作社、建立赢利更多的大型经济综合体的活动。国家开始制订发展农业各部门的多年远景规划。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良好结果。然而，总的说来，农业生产在五年内只提高了百分之七点四。除了其他原因外，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如1962—1963年冬季严寒以及1965年多瑙河和摩拉瓦河流域的水灾，都影响农业未能完成计划规定的指标。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特点总的说来是速度减慢，
76 1961—1965年的工业产量增长额为百分之二十九。在生产过程中以不断补充劳动力为主的粗放发展趋势一直延续下去，这产生了不良影响。1958—1959年制订的关于改进国民经济领导，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及其技术装备程度，根据科技革命要求改革工业结构等措施均未能彻底实现。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条件也没有充分加以利用。此外，正如1962年12月召开的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破坏，这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集中领导受到了削弱，重要建设项目未能按期投入

使用。大会分析了经济发展中的缺点，确定了为期七年（到1970年止）的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制订了以下措施：完善国民经济的计划和管理工作，消除工农业发展水平的比例失调现象，更有成果地利用原料来源和挖掘生产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实行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

为执行代表大会决议，捷共于1965年还制订并实施了经济管理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新原则。但是，在领导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主观主义表现和唯意志主义表现，阻碍了所有上述措施的彻底实现。这些表现是：错误地认为社会已达到思想政治成熟和团结一致的程度；忽视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加强思想侵蚀的条件下对原来剥削阶级的影响及其死灰复燃的能力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考虑到：经济基础的变革不可能使思想和政治这个上层建筑自行发生变化；社会发展的新任务要求对人民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生活的一切过程有更高的领导水平。结果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观点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某些倾向放松了斗争；对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的意义估计不足。而且，资产阶级世界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中的困难进行的思想破坏活动越来越激烈。国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也越来越频繁而公开地进行攻击。这表现在：大肆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特点；鼓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假民主，特别是多党制原则；主张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庭抗礼，过高评价知识分子某些阶层的作用。文艺作品中出现一种倾向，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说成是无阶级社会，并且作出结论，说什么国内阶级斗争已一去不复返，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因而失去其意义。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思想纲领就这样逐步地形成了。

捷共领导对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所作的整个斗争缺乏深刻的阶级分析和科学分析，常常只是采用行政方法，以致这场斗争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党在

思想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误，特别是思想工作缺乏进攻精神，党对理论界的活动估计不足，存在形式主义等等；事隔四年之后，在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在全党讨论过程中又提到上述缺点。1966年6月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指示党去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77 然而，党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不仅如此，而且对于敌对的观点和思潮表现出无原则性，在干部问题上也是如此。持有反社会主义立场的人窃居了文化、社会科学、群众性宣传、党政机关的领导岗位和要职。

1967年年中，有迹象表明，党内和社会上将出现严重危机。捷共中央委员会十月和十二月召开的会议上表现出领导机关的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的这几次全会都对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安·诺沃提尼的党的领导作用提出了严厉批评。1968年一月全会通过决议，选举亚·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然而，全会未能指明党的工作方向是加强政治思想斗争，反对猖狂活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思潮。1970年12月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的《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和社会上危机发展的教训》这个文件指出："1968年捷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就明显暴露出一月全会后领导的软弱无力和不团结以及力量对比发生对右派有利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随后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所取得的胜利而使其利益受到损害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趁党的领导削弱之机企图为自己1948年2月的失败雪耻。非党积极分子俱乐部和"二三一"俱乐部（由一些因从事反国家活动而被按刑法典第231条判刑的人组成的俱乐部）这类反革命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原资产阶级党派的政客们也蠢蠢欲动。国际反动派决定亲自出马，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并迫使捷克斯洛伐克退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党的机关内，包括在捷共中央任职的机会主义分子背离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伙同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使马列主义者在党内无法采取行动，这就帮助了反革命势力和国际反动派的阴谋活动。同时，修正主义

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鉴于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便提出“改进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化”等口号来掩盖自己的破坏活动。他们以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为依据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这个理论，为了体现“价值普遍规律”，必须将部分公有制生产资料交给某些集团——“集体”，使这些生产资料不属于国家的统一领导、管理和计划之内，从而使之完全依从于市场关系。这种政策导致资本主义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复辟。根据“市场经济”这种观点，奥·切尔尼克领导的捷克政府放弃了196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撤销了全国性的专业部。

右派势力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力图使捷克斯洛伐克断绝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并在外交和经济联系方面采取亲资本主义国家的方针。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居民中大肆散布资产阶级宣传机关捏造的种种谣言和诽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反苏情绪。

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耐心地消除同捷共关系中所产生的龃龉，同时多次指出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势力阴谋活动的危害性，建议捷共领导制止这种阴谋活动。1968年兄弟党 78
代表在索非亚、德累斯顿、莫斯科、蒂萨河畔切尔内和布拉迪斯拉发等地举行的几次会谈都曾提到过上述问题。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发展的这种危险倾向表示严重关切，要求捷共领导注意这种倾向不仅危及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还威胁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

然而，杜布切克提出的关于愿意扭转国内局势，扑灭日益嚣张的反革命势力的大量保证只是空口白话而已。捷共领导层中与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分子相勾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拒绝参加1968年7月在华沙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这显然是一条捷共同兄弟党和同盟者断绝关系的方针。不错，捷共

领导在1968年8月3日布拉迪斯拉发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声明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以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声明还肯定，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然而，捷共领导层中的右派势力违反了布拉迪斯拉发共同声明的原则。这一点有事实为证：8月初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发起了一场解散民警的挑衅性运动，而民警在1948年2月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曾经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报刊还公开地诋毁那些奋起反对反革命势力阴谋活动的工人们，这一切说明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日益受到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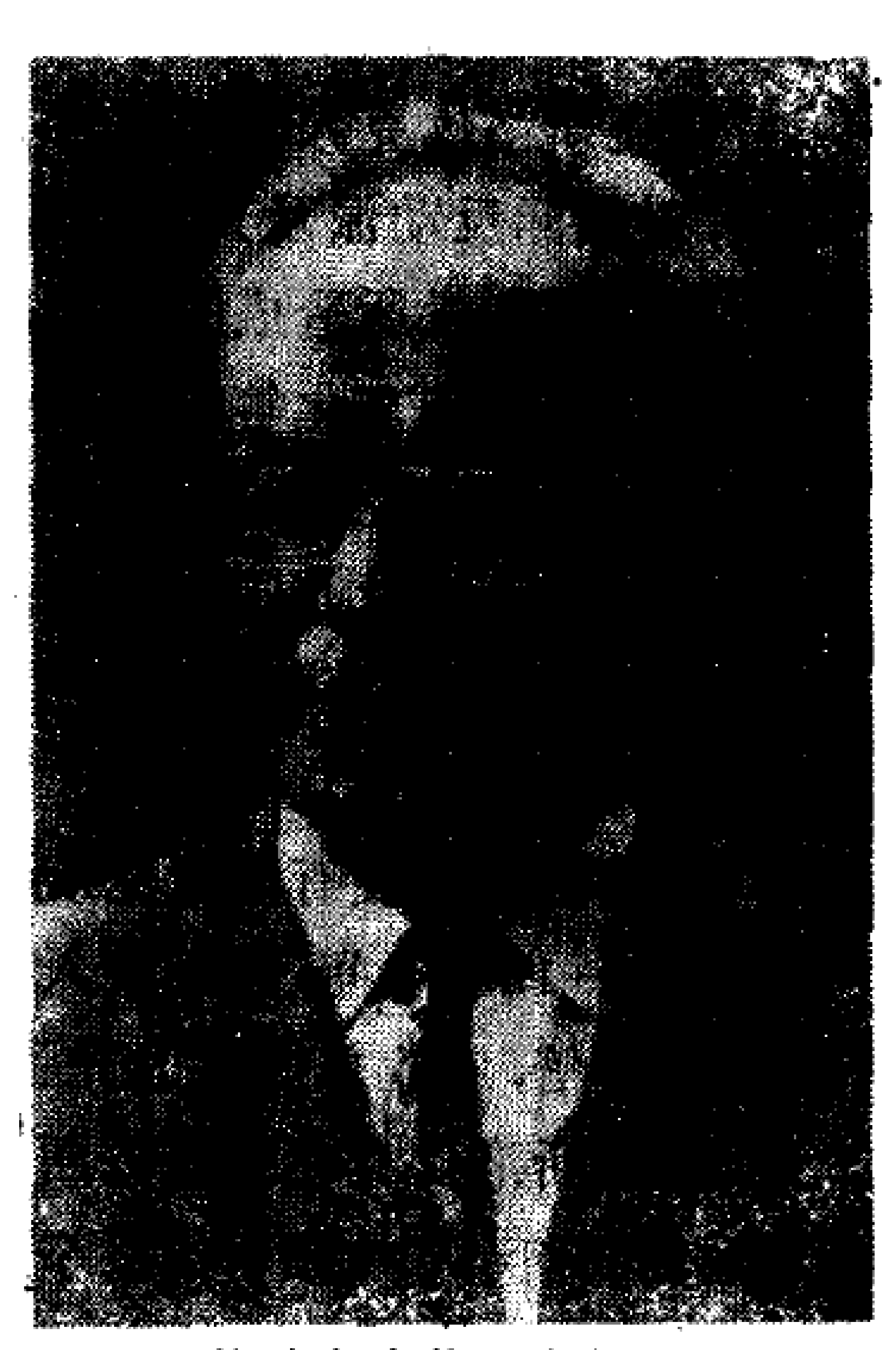
正如捷共中央《危机发展的教训》这一文件所指出的那样，被机会主义分子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未能用自己的力量击退国内反革命和国外社会主义敌人的进攻。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许多企业工人、捷共中央委员、政府成员和捷克国民议会代表在此严重考验时刻请求兄弟党和华沙条约各成员国政府帮助捷克人民捍卫社会主义成果。

1970年捷共中央十二月全会在评述捷克1968年8月国内局势时指出："国家陷于内战边缘。'谁战胜谁？'这个尖锐问题迫在眉睫。或者是受到国际反动派支持的反革命势力的阴谋得逞，或者是社会主义力量击退反革命，捍卫住社会主义。"

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五个社会主义盟国（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作出决定，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反革命、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给予国际主义的援助。五国联合部队于1968年8月21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动阻止了国际和国内反动派实现其罪恶勾当。这个国际主义团结的行动，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积聚并扩大了国内抗击修正主义分子的力量。修正主义一伙准备在1968年8月底召开从事派别活动的

所谓“最高代表大会”，企图在捷共党内搞政变，完全夺取党的领导权，以便随后断绝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毁灭社会主义成果。

1968年8月底至1969年4月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捷共内部马列主义力量反对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十分激烈。首先将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捷共领导，并依靠一贯坚持斗争的党员来加强捷 79
共领导，乃是马列主义力量在党内获得胜利的保证。1968年8月31日捷共中央全会便已补选了古·胡萨克和卢·斯沃博达为中央委员，并将他们选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捷共中央十一月全会通过了决议，其中揭露了反社会主义势力在8月底前这段时间内所扮演的角色，并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各级党组织对这一决议的讨论有助于捷共健康力量进行巩固各级党组织的斗争。捷共中央四月(1969年)全会免去了杜布切克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并选举古·胡萨克担任这一职务。捷共新领导以后的行动都是旨在进一步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消除党内和社会上旷日持久的危机。



捷共中央第一书记
古斯塔夫·胡萨克

捷共中央五月(1969年)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党的团结、党对社会(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领导作用以及提高国家机关的作用等重要决定。宣布恢复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友好关系，是捷共的主要目标之一。捷共新领导的这些措施受到广大劳动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上述措施有利于迅速改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这

一点特别由以下事实可以证明：反社会主义势力在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兵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一周年之际组织挑衅性示威游行的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

捷共中央九月（1969年）全会废除了1968年一月全会以后捷共领导作出的与社会主义利益和国际主义传统背道而驰的一切决议，否定了直接违反党章的所谓“最高代表大会”。

捷共就清党问题进行了认真工作。1970年更换党证一事具有重大意义。稳定经济形势，遏止通货膨胀势头，保证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等重大措施一一付诸实施。

1969年1月起，根据宪法规定的国家联邦制度，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两个平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联邦。每个共和国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国民议会）和执行机关（政府）。由两个议院——人民院和民族院组成的联邦会议和联邦政府是捷克斯洛伐克最高国家机关。

80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在捷共领导下，对国际反动派及其国内代理人的种种策划给予了坚决打击，消除了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在解决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任务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依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援助而获得的对国际反动派及其国内代理人的胜利，显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的牢不可破、捷共的战斗力、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强大力量以及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团结。

严峻的考验没有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停止增长。总的说来，1961—1970年间，国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工业总产值提高了近一倍，农业总产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

捷克斯洛伐克在外交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捷苏两国政府代表1968年12月在布拉格举行了会谈。会谈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互利合作问题，特别是根据捷方请求，对下一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期间总额为一百五十亿克朗，即比现五

年计划(1970年前)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订货分配问题作了规定：由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并向苏联提供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化学、石油加工和食品工业设备、船舶和机器制造业其他产品。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额 1969 年与 1960 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其中机器设备的换货额增加了一点三倍。

捷苏友好合作互助新条约于 1970 年 5 月 6 日签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新条约有助于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加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地位。

4.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到六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基础已在匈牙利建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占了统治地位。

向建设发达社会主义过渡，就必须解决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复杂的新任务。在此期间，匈牙利的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所改善，特别重视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提高国家的经济，采取了改进国民经济结构、合理使用生产力和周密考虑生产力布局的方针，同时特别注意使传统农业地区——奥尔弗尔德(匈牙利大平原)和杜南图尔(外多瑙河边区)实现工业化。

匈牙利劳动人民在完成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和1966—1970 年)的任务时，在奥尔弗尔德和杜南图尔建立了新的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中心。在包尔绍德、蒂萨河畔、佩塔等地兴建了大型化学联合企业和许多发电站；在贝克什开始建设由苏联援助的核电站。出现了列宁城和科姆洛等新的社会主义城市。

1970年匈牙利工业(不包括建筑业)产值占国民收入总额百分 81
之四十三点二(1960 年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由于工业发展顺利(1970年工业生产总值比 1960 年水平增加百分之一百九十四)，

国家出口总额中工业产品的比重增加了。1961至1970的十年内，工业产品的比重有几年从百分之八十六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与此同时，十分明显，粗放型经营管理的潜力到六十年代中期基本上已挖掘殆尽。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出现下降趋势：前五年工业产品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七点五，而后五年降至百分之六点二。这首先是成品，包括重工业产品的销售出现困难所致。

党和匈牙利政府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实现生产资料现代化、更新老设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途径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特别重视完善工业结构。电子、电机、真空和仪器制造等金属消耗量少的工业部门优先得到发展，这一点对原料基本上靠进口的国家来说相当重要。根据匈牙利的条件，这些部门被认为是有发展前途的。化学工业继续高速度发展，二十年内(1951—1970年)其产品增加了十九倍。

考虑到匈牙利是一个矿藏不多、能源不足的国家，党和政府采取了提高天然气和石油开采量并在国民经济中更有效地予以使用的措施。在杜南图尔和奥尔弗尔德地区勘测到新油田和天然气产地，随即投入开采。结果在十年内天然气产量增加了九倍，即从三亿四千二百万立方米增加到三十四亿六千九百万立方米，石油产量增加了近一倍，即从一百二十一万七千吨增加到大约二百万吨。六十年代尚未达到设计能力的萨兹豪隆包陶石油精炼新厂到1970年已每年加工由苏联经“友谊”输油管第一支线运来的二百万吨石油。

1961—1970年间，匈牙利所需三分之一以上的电力和燃料基本上是由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匈牙利的电力从1963年起就与乌克兰动力系统和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动力系统接通了。

匈牙利电力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建立热电站网；到1970年，其总功率达三千兆瓦。国内电力生产十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即为一百四十五亿千瓦小时。

在此期间，匈牙利新建和改造了一些高炉和轧钢机。在欧兹德

又新建了年生产能力为一百万吨的铸钢车间。位于多瑙伊瓦罗什 82
的大型冶金联合企业的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向国家提供了生铁（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一）、钢材（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和冷热轧材。匈牙利1970年生铁产量达一百八十三万五千吨，钢——三百一十一万吨，轧材——二百零三万八千吨。黑色金属冶炼业所需矿石百分之八十来自苏联，所需焦炭百分之七十五是进口的。

同时，匈牙利虽然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铝矿，但国内炼铝的能力却有限。苏匈协定从 1962 年开始生效。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帮助匈牙利发展制铝工业。1970年，苏联企业加工的匈牙利铝矾土一年达十二万吨；炼成的铝全部运回匈牙利。同苏联的合作，使匈牙利大大提高铝矿开采量、铝矾土的生产和铝的产量。1970年，铝矿开采量约二百万吨，铝矾土生产量为四十四万吨，铝的产量为六万五千吨。

机器制造业是匈牙利工业的主导部门。1960—1970年，其产量增加了一点三倍。化工产品在此期间增加了二点九倍。轻工业生产规模基本上保持原有水平。

然而，匈牙利六十年代的工业发展水平在世界最发达国家中占第十七位，就工业生产人员在自立人口总数中的比重来说，匈牙利占第七位。这表明匈牙利国民收入中工业所占的比重虽然超过了丹麦、挪威、芬兰和爱尔兰等国，但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却不高。

私营小型工业职工在此期间约有五万人，他们主要是裁缝，木器制作、制革和制鞋部门的手工业者，以及铁匠、钳工，烤面包工人，电工和无线电安装工。

匈牙利从 196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计划和经营管理新体制。 83

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匈牙利广泛实行了农业劳动机械化。结果，农业生产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在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进行了合并扩大，得到了必要的技术装备，逐步实行了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1968年起，又实施了加强国营农场和合作社经营自主权的方针。

农业生产开始具有工业性质，其增长速度加快了，这使务农人

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到六十年代末，农业人口的比重约占全国自立人口的四分之一。国营农场职工有二十多万人，合作社工作人员约八十万人。

农业的技术装备率不断提高：1960年机器占总牵引力的百分之八十，1970年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七。1970年农村使用的拖拉机有六万八千多台（1960年为四万一千台），其他机器约八十万台，而且拖拉机的功率在此期间从一百三十万匹马力增加到三百二十万匹马力。耕地、播种、田间管理和收割几乎全部机械化。

农业中矿肥、治虫和除草化学药剂的使用有了明显的增加。1970年每公顷农业用地使用的矿肥比1960年增加了四倍。

畜牧业，首先是养牛业，是匈牙利农业生产的重要部门。1960—1970的整个期间，饲养头数几乎保持同一水平，即大约二百万头。家禽总数1960年（年底的情况）为四千万只（其中良种家禽为二千七百万只），1970年增加到六千四百万只（其中良种家禽为三千五百万只）。就每个居民对家禽肉食的消费量来说，匈牙利占欧洲首位。

农业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的改造，使社会主义大型农场在农业结构中占了优势。1960年匈牙利有国营农场三百三十个，到1970年合并为一百八十个。合作社也进行了合并扩大。1961年匈牙利有四千二百零五个生产合作社，到1970年底已合并为二千八百零五个。百分之九十七点二的农业用地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其中国营农场占百分之十二点九，生产合作社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其余百分之十七点二是企业职工的副业用地和合作社社员的宅旁园地。

1967年国家通过了旨在调整生产合作社活动的新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法。这个法律使土地合作社所有制这个新的形式合法化。合作社有权把自己所使用的但在法律上属于私人、合作社社员或国家所有的土地作为合作社所有的财产。六十年代合作社社员宅旁园地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同一水平，即约占农产品总数

百分之二十三。同时，合作社社员从公有经济中获得的收入也有增加，1960年占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1967年占百分之五十点九。

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计算，1970年比1960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职工实际工资在此时期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从社会消费基金项下的付款和从中获得的优惠，六十年代约占居民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1970年国家预算拨作社会消费基金的金额计二百二十亿福林，比1965年增加了九十亿。

在匈牙利，实际上人人都享受社会保障。1966年实行的子女 84
抚育补助金在这方面有重要意义。根据规定，因生孩子而停止工作的每个在职妇女三年内可享受占其平均工资约百分之四十的补助金。1970年底，享受这类补助金的母亲有十六万七千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子女补助金额有所提高——每个孩子每月补助五十福林。结果国家支付的子女津贴总额从1965年的十六亿福林增加到1970年的二十八亿福林。

生产合作社社员同国家企业职工一样享受退休金的这个制度于1967年1月开始生效。

原来规定的部分职工的退休金额从1970年3月起提高了，这使只靠退休金生活的退休职工（约占退休总人数的一半）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一千五百五十三福林提高到1970年的二千一百五十二福林。农业完成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收入比职工的收入提高得更快。这使1968—1969年农业人口平均工资与职工工资相等。

1966—1970年间，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政府多次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

文化革命的顺利进行使广大群众掌握了知识，对老知识分子进行了再教育，造就了新型的工农社会主义知识分子。1963至1968年，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计有一百一十万人。科技

工作者的人数（已超过六万人）以及受过高等教育在文化和保健部门工作的人数增加得特别快。

六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基础在匈牙利建成之后，这时已形成的社会阶级结构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62年职工人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五，农民人数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八。由于职工人数继续增加，到六十年代末，已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二；合作化农民人数（占农民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有所减少，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六十年代，匈牙利继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5年召开的匈牙
85 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如：制订关于苏维埃地位的新法律；将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变化写入国家宪法；提高社会团体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国民议会通过了新选举法。根据新选举法，一个代表席位可推选两个以上候选人。选民有权在任何时候召回自己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和国民议会代表。新的劳动法典规定实行劳动者和企业领导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工会在维护劳动者利益方面的权利得到了扩大。

1967年3月，按新选举法规定，国民议会和地方苏维埃进行首次选举。多数专区各提出一个国会代表候选人，有九个专区各提出两个国会代表候选人。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六百八十六个专区各提出二、三个候选人。所有候选人就爱国人民阵线提出的统一的政治纲领发表演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是这个纲领的基础。通过选举共选出三百四十九名国会代表和八万四千五百零八名地方苏维埃代表，选举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匈牙利人民同意并支持这个方针。

在此时期，爱国人民阵线成为国内最大的群众组织。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它团结了各个阶级和各阶层居民。1963年和1967年，匈牙利工会先后召开了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工会胜利地完成了自己肩负的任

务。到1970年底，工会拥有三百四十三万名会员（占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三）。匈牙利工会同九十二个国家的工会保持着联系，并参加了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七次大会于1969年在匈牙利首都召开。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匈牙利共青团发展成为群众性组织，团员有八十多万（三分之一以上是工农青年，百分之九十三是大学生）。匈牙利共青团承担了支援二十六个最重要建筑工程和项目的任务。青年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劳动作业队运动和群众性文化工作。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67年4月召开。会上成立了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理事会，此后，国家机关便同它一起商讨农业方面的经济政策，在制订有关生产合作社的法律条文时征求它的意见。

匈牙利妇女联合会、匈苏友好协会、少数民族联合会、科普协会和许多其他社会团体继续顺利地开展工作。

人民匈牙利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家所有物质和精神生活领域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是分不开的。从1956年起，亚诺什·卡达尔就长期担任党的领导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党的第八次（1962年11月）和第九次（1965年11—12月）代表大会决议成为六十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的基础。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始终不渝地维护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统一；捍卫集体领导原则；保证党的活动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发扬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实现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是同进一步完善党的组织结构和发扬党内民主密切有关。为此，党的第九和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党章特地作了某些修改。党章赋予党 86
组织监督企业、机关的生产活动以及选拔和配备干部的更大权力。十年内党在人数上和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1970年年中，党员共

有六十六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此时期显著地扩大了国际联系。它同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并发展了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关系。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它的政策把国际主义利益和民族利益、真正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融为一体。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代的对外政策是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历次代表大会所制订的各项原则为基础的，旨在加强匈牙利的国际地位和提高它的国际威望，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确认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原则，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

根据这些原则，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发展和扩大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关系，是匈牙利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匈牙利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密切合作不只局限于华沙条约的范围之内。它还是经互会成员国，积极参加经互会所有机构的活动。匈牙利主张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合作。为了使苏联能向匈牙利提供石油，1967年6月苏联、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签署了关于最有效地使用“友谊”输油管道的条约。同年，波匈合营股份公司的第五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企业“赫尔杰克斯”在波兰的扎布热城投入生产。该企业用匈牙利的工艺加工从波兰煤矿开采的煤炭。

匈牙利由于参加经互会范围内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和协作，1967年同民主德国就某几种计算机的生产问题签订了生产计划的分配协定以及关于机床制造业中一个部门的专业化协定。1968年初，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签署了关于电子测量设备生产专业化协定。匈波两国组织了运货卡车和公共汽车的联合生产。匈牙利奉行社会主义国家加紧各方面合作的方针，参加了

经互会范围内的国民经济计划协调工作，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匈苏关系的发展特别富有成果。1967年9月7日签署了为期二十年的苏匈友好合作互助新条约。匈牙利同民主德国（1967年），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同保加利亚（1969年）先后签订了同样的条约。

六十年代，匈牙利同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许多关于商业、运输、通信、保健、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协定。社会主义国家在匈牙利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1970年为百分之六十五点三，其中苏联占百分之三十五。

匈牙利政府一贯支持抵抗美国侵略的越南人民，支持印支人民反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匈牙利继续同几十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匈牙利同它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利和友好互助的基础之上的。 87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六十年代，匈牙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已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正常化。从联合国大会撤销所谓“匈牙利问题”这一议程之后，匈牙利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提高了外交关系的等级（外交代表机构改为大使馆），其中包括1963年底同法国和英国，1964年同意大利以及1966年11月同美国都在外交关系上提高了等级。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发展迅速。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强。在此时期，匈牙利同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的关系也有了改善，同奥地利建立了良好关系。匈牙利同美国的经济联系有了某些起色，然而，美国统治集团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所奉行的政策阻碍了匈美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到1970年底，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参加了六百一十个国际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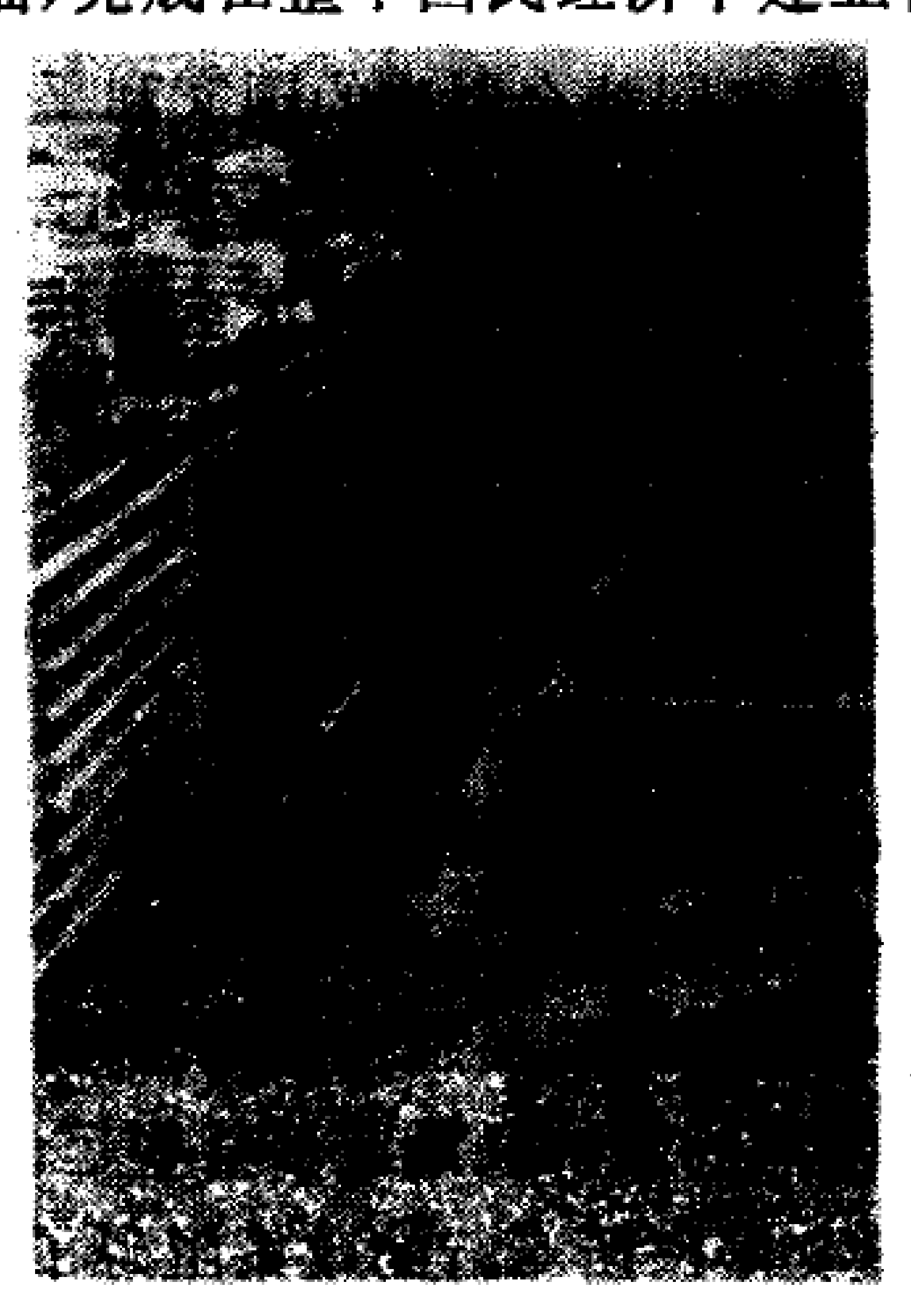
织，其中四十个是政府级的。匈牙利对大约三百个国际科学组织和一百个国际文化机构的工作作出了贡献。1970年底，匈牙利同九十个国家(1965年只有四十九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巩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牢固可靠的组成部分。

5.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六十年代是罗马尼亚历史中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建设、向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个过渡是由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规律以及一系列特点所决定的。

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60年6月)规定了该党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建设阶段的主要任务。代表大会批准了1960—
88 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完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实现计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就必然能够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活动的所有部门取得全胜，彻底消灭剥削阶级，确立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原则。



布加勒斯特共和国广场；
左面为共和国宫

根据上述总的战略方针，计划规定了发展主要经济成分的具体任务。根据计划，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应从上一个五年计划的百分之十点八增加到百之十三，农业总产值应增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1960—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

的顺利完成，对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工作在完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的过程中取得进展起了促进作用。1965年工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加了一点二倍，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四点五。罗马尼亚十分重视扩大动力基地，保证发展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实现运输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现代化。化学、动力、机器制造和冶金等工业部门在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比重从战前的百分之二十点七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九。

除了进一步寻找最佳利用国内资源的途径，运用现代化技术，继续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1951—1965年期间罗马尼亚“甲类”工业的增长速度与“乙类”工业相比，超先系数为一点四）以外，罗马尼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利合作关系与以往一样对罗马尼亚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主义国家在罗马尼亚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1969年约为百分之五十五，其中苏联占百分之二十九。

六年计划期间（1960—1965年），罗马尼亚在苏联的技术帮助下有一百多个工业项目投入施工。苏联和罗马尼亚相互提供必需的原料、机器和设备。总的说来，六十年代上半期，罗马尼亚出口的大约百分之九十的机器和设备，大约百分之八十的石油化工产品是运往社会主义国家的。

按社会主义原则完成农业改造，吸引尚存的个体农户参加生产合作社，是罗共提出的1960—1965年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到1962年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62年4月，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拥有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四。至此，参 89
加生产合作社的约有三百二十万个农户。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比原定时期提前三年完成。

农业合作化导致全国居民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根据1966年人口普查材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合作化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1956年占百分之七点二），知识分子和职员占百分之十二点三，合作社手工业者占百分之一点三，个

体农民约占百分之六，非合作化手工业者占百分之零点四。这样，由于农业完成了集体化，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统一的基础得到了巩固，农村中形成了新的阶级——合作化农民，在为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他们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可靠同盟者。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于1965年3月19日逝世，他在近二十年内一直担任党的首脑，随后又担任国家元首。罗共中央委员会这时选举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担任罗共中央第一书记（1965年7月起改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托伊卡·基伏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任部长会议主席。

罗共第九次（根据当时决定的新编号①）代表大会是在1965年7月19—24日召开的。代表大会确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在城乡取得了全面胜利。大会通过了关于罗马尼亚工人党改名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决定。

由于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使罗马尼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发生的根本变化已被载入1965年8月通过的新宪法。宪法宣
90 布罗马尼亚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立法形式肯定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领导作用。

罗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家经济和政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针，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66—1970年）以及发展动力工业十年计划的指令。代表大会文件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今后仍将是党的经济政策的基础。

与以往一样，罗共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根据罗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区、州和共和国分别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社，1966年3月又成立了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总社。

① 这是罗马尼亚工人党改称罗马尼亚共产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保持连续性，仍称第九次代表大会。——译者

为了完成罗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综合发展农业的任务，计划规定进一步增加农业投资，首先是用于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化学化，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合理使用土地总面积。

六十年代下半期，罗马尼亚实现了一系列旨在改进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领导的措施。同时十分重视以下问题：扩大工业和农业企业的财经自主权；确定物质鼓励和产品质量之间更加密切的依从关系；把科技成就运用于生产；加紧利用经济杠杆；坚持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物质利益。1967 年 12 月召开的罗共全国代表会议对根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善经济机制的经验而制订的这些综合措施表示赞同。

根据 1968 年 2 月罗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颁布了新的行政区域设置法。废除了州和区，而代之以战前罗马尼亚实行过的县和农村公社的区域划分；设立了三十九个县，其中包括一百八十八个市和二千七百零六个乡。罗共全国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由一人兼任为宜的决定。根据代表会议的提议，罗共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兼任了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而罗共各县委第一书记兼任了县苏维埃执委会主席。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政治结构，1968年 10 月成立了罗共和二十九个不同的社会团体、工会组织联合组成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团结阵线。

根据罗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方针，罗马尼亚于1968年进行国民教育改革：从普及八年制义务教育过渡到普及十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儿童六岁入学；为中学毕业生成立学制为两年的高级专门学校，高级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有权升入高等院校。此外，还采取了一些专门措施，用以改进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培训工农业熟练干部以及综合大学和学院造就高级专家的工作。1966年至 1970 年，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了十多万名工程师、医师、教师和 91
其他专家。

罗共在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的活动十分复杂，涉及面广，不可能没有困难。1968年4月召开的罗共中央全会指出了党在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中存在的许多缺点。揭示出前几年出现了违反社会主义法纪、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民主的现象。

1966—1970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完成，使国家经济发展进一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七十年代初，罗马尼亚已成为工农业国家：工业比重占社会产品总和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一，农业比重占百分之十七点三。重工业各部门在工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大增加。



罗马尼亚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

由于工业生产高速度发展，工业原来落后的罗马尼亚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值已接近经互会经济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的水平。

农业也出现了明显的增产趋势。1966—1970年时期与1960—1965年时期相比，农业年均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1961—1970年与前十年相比，农业投资增加了三倍多，即增加了八百五十六亿列伊（五十年代为二百零四亿列伊）。然而，总的说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不上工业生产的增

长速度。

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了，1967年职工优抚赡养制度扩大应用于农民——合作社社员。仅1966—1970年期间，居民实际收入平均 92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

1969年8月6—12日召开的罗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罗马尼亚建立人民政权以来走过的道路，并向全党提出了不断扩大和完善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及建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六十年代是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积极发展国际交往的时期，无论同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都有显著的扩大。1960—1965年期间，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九点九，而1965—1970年间则为百分之十一点八。

罗马尼亚领导人对国际政治问题所持的种种观点在罗共中央四月(1964年)全会的决议中已作了说明，以后又在罗马尼亚政府拟定的外交路线中反映了出来。

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发展经济和政治联系，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核心。

罗马尼亚在经互会的范围内参加制订集体决议，其目的在于扩大与经互会成员国的生产和科技联系，更充分地利用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这个优势以及参加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合作。1964年，罗马尼亚参加了“和平”联合动力系统，1970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合作组织——“国际冶金合作组织”和“国际化学组织”的成员。

罗马尼亚谴责美国侵略越南，支持许多殖民地国家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由于以色列侵略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罗马尼亚政府主张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67年11月22日决议制止近东冲突。然而，罗马尼亚仍然保持了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1967年1月，罗马

尼亚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正常化。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期，罗马尼亚领导人所持的立场不同于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捍卫社会主义成果的立场。

罗马尼亚在六十年代大力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马耳他等国）商定建立外交关系，或者互相将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有所发展。

正如罗共和罗马尼亚政府一些文件多次指出的那样，苏联在罗马尼亚的国际交往中占有特殊地位。1970年7月7日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新条约，是罗苏关系史上一件大事，罗共中央全会把这个条约看成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关系以造福罗苏两国人民、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件”。条约强调指出，根据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以及互助和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原则，苏联和罗马尼亚两国今后将继续加强和发展互利合作，扩大生产和科技协作以及促进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多边关系的发展。

93 ## 6.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至五十年代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保加利亚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了保加利亚社会统一的社会阶级结构，加强了全社会在思想政治上的一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已成为保加利亚人民整个精神生活不可动摇的基础。在保加利亚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了新型的相互关系。这样，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就具备了向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最重要的前提。

1961—1970年期间保加利亚的特点是，不仅社会生产蓬勃发展，而且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技术改造，人口和社会过程发生了迅速变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62年11月)继续执行保共中央四月全会(1956年)的路线，对过去存在的破坏党和国家领导的列宁主义准则的现象进行了原则性批判。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分子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撤销其重要职务。代表大会对党章作了一系列修改和补充，以保证进一步加强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1962年11月19日，国民议会选举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

1966年11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进一步加快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纲领的主要内容是继续高速度发展国家工业化，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加速技术进步，使所有经济部门集约化和现代化。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执行过程中，在完善国民经济领导机构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1966年6月，根据积累的经验制定的、并经全民讨论的保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国民经济新领导体制基本原则》的提纲得到批准。该文件指出，现行体制已不适应经济发展增长的规模和要求，其特有的过分集中和对经济杠杆作用的轻视已成了提高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和加快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道路上的障碍，无助于最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生产的优越性。新体制的目的是在保持中央计划机关的作用和意义的情况下，免除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过多规定。以保加利亚所存在的特殊问题为出发点的这个新体制，就其实质而言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进行的经济改革有许多共同之处。

1970年末，保加利亚的工业管理进行了改组。为了使生产积聚和专业化，共和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合并为一些大型的经济单位——国营经济联合公司。每一个联合公司包含整整一个部门或几个相互有关的部门。联合公司为加速发展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条件。

农业也开始向生产社会化的新阶段过渡。根据保共中央四月

94 全会(1970年)的各项决议，生产高度集中的大型农工综合体成为农业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农工综合体能为加强工业基础上的部门专业化创造条件。至1970年末，成立了约一百六十个农工综合体。加入综合体的既有劳动合作农业经济体，也有国营农业经济体，以及一部分加工农产品的工业企业，一些建筑单位和服务行业。组建农工综合体的原则如下：自愿参加；在结构、规模和生产专业化方面要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劳动合作农业经济体和国营农业经济体在地区和组织上要求得统一。这样做对于完善生产关系、加快农业生产的集中和专业化的过程、在农业中尽快采用工业方法、使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国家的和合作社的)互相接近都起了促进作用。

六十年代，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展开，而且速度日益加快。十年内国民经济投资额增加了一点六倍多，而且大部分资金是用于新企业的建设。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与某些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有关，这些项目是：克列米科夫斯克冶金联合企业、“东马里查”煤炭动力综合体、旧扎果腊附近的氮肥厂、保加利亚化学工业的最大企业——布加斯地区的石油化学联合企业、“麦德特”选矿联合企业、普罗夫迪夫附近的有色金属联合企业以及许多发电站和水力枢纽、机器制造业企业、轻工业企业和食品工业企业等等。由于工业产值增加了近两倍和农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在这十年内全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

保加利亚社会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引起了人口变动和劳动力部门分配的变化。城市化过程发展加快。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比例起了变化，1960年分别为百分之三十八和百分之六十二，而1970年则为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在这十年之初，从
95 事农业的人口比重为国民经济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七，至六十年代末，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二。在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口的比重相应地从百分之三十六点一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点七。仅工业中的就业工人人数就由1960

年的六十二万七千人增加到1970年的九十一万八千人。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要生产力以及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其作用大大提高了。

扩大再生产方面的集约化因素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平均每年为百分之七点一，而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为百分之八点三。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潜力在工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工业终于被确认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自1961年至1970年，制造生产资料（甲类）的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增长到百分之五十四点七。就人均工业产值而言，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已经大大接近于经济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

在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保加利亚农村的固定生产基金和劳动生产率都增加了一倍多。按人口平均计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农产品产量增长的速度方面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而在葡萄、番茄和其他一些作物的产量方面它也稳居全世界产量最高的国家之列。肉类、牛奶和其他畜产品产量大大增加。保加利亚农村本身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日益牢固地树立起来。保加利亚的合作社农民无论在劳动条件方面，还是在文化水平和社会觉悟方面都大大接近于工人阶级。

经济的发展为更充分地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创造了前提。在 96
1960—1970年期间，社会消费基金增长了二倍多。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合作社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同时，在收入数额和整个生活水平方面农村居民正迅速地接近于其他各类劳动者。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收入指数（以1952年为100）在1960年为一百九十二，1970年为三百零三，即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七，而农民实际收入指数分别为一百七十和二百八十三，即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六。自1968年起，工人和职员开始实行五日工作周，并提高了某些类别工作人员的优抚金。广泛的民用建筑计划（包括住宅建筑）正顺利地付诸实施。国民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具有高等

和中等专业教育程度的专家人数1960年为二十五万七千人，1970年增加到五十二万一千人，约占国民经济部门全部就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

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在改进社会的政治组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加强了，为更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必要的主观和客观前提。社会主义民主已成为国家社会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和主要特点。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国民议会和人民苏维埃的作用大大提高，它们获得了在计划、协调和监督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工作方面进行积极有效活动的必要条件。这些机构的代表性得到了提高。苏维埃在自己的活动中开始广泛依靠劳动人民及其社会团体。所有这一切在1968年修改的人民苏维埃法中都得到了反映。

97 在管理方面，国家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且社会团体的作用不断加强。企业成立了经济委员会，这是劳动集体的机构，它正在企业内顺利地发挥作用。劳动者通过这种机构参加生产管理。

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家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不断发展使祖国阵线和劳动人民的其他群众团体的活动更加活跃。祖国阵线委员会和人民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之间的接触大为加强。它们的共同活动有了很大发展。1970年，祖国阵线共有成员三百八十万人，占十八岁以上公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

保加利亚共产党同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之间的合作更加积极。约有一百名大国民议会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是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成员。该联盟在国际舞台上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例如，它大大加强了与国外某些进步的农民党和农民运动的联系。该联盟在社会主义制度新条件下进行的活动以及它与保加利亚共产党有效的合作，对于加强工人阶级和合作化农民联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起到了促

进作用。

至1970年末共拥有二百七十万名职工会员的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执行了重要的任务。工会在生产管理系统中的作用提高了。工会在国际上的活动也更为活跃。

季米特洛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积极作用。

保苏友好全民委员会为加强保加利亚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开展了广泛活动。

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最密切的兄弟般友谊和合作,积极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六十年代,保加利亚签订了一系列新的长期协定,发展了直接的生产技术关系,积极参加了经互会的工作,这一切都表明保加利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正在不断扩大和加深。保加利亚1967年与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1968年与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与匈牙利,1970年与罗马尼亚签订了新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使保加利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保加利亚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依靠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首先是苏联的兄弟般的支援。保加利亚的工业利用了苏联的科技成就和经济援助,因而得以在短期内建立起黑色和有色金属的生产,制造出各种机器和设备,掌握了复杂的化学工艺流程。苏联向人民的保加利亚提供了大量的期长贷款。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保加利亚建成了一系列主导工业部门的企业。至七十年代初,这些企业已能提供全国黑色金属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有色金属的百分之八十五,石油加工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产品的百分之八十。1970年8月,苏联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关于协调1971—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协定,该协定涉及到一切经济部门。

98 具有发达的经济潜力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以兄弟般互助方式给予保加利亚以援助。保加利亚也对兄弟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为保加利亚提供了它所短缺的原料、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稳定的供应基地，还为保加利亚的输出提供了有保证的市场。六十年代保加利亚的输出结构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1961—1970年期间，工业品在保加利亚出口额中的比重从百分之八十四点四增长到百分之九十二点一，而未加工的农产品比重则从百分之十六点六① 减少到百分之七点九。1960年保加利亚本国机器制造业产品在出口额中占百分之十二点六，而 1970 年则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三。1961—1970年期间保加利亚的外贸总额增长了二倍多。总额的约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易额，而其中苏联又占百分之六十。

托多尔·日夫科夫在 1968 年 7 月保共中央全会上发言时说，保加利亚近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雄辩地证明，保加利亚经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经济实行一体化的方针是正确的。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是最早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之一。1969年 3 月，它和苏联及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共同向所有欧洲国家提出了关于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全欧会议的建议。

保加利亚对加强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建立平静的气氛和保持巴尔干地区的和平采取了许多重大步骤，并为把巴尔干变为无核区而奋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联系有了发展，1965—1967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对此起了促进作用。1964年夏，保加利亚与希腊的关系得到了解决。保土关系也有了建设性的进展。

---

① 原文有误。似应为百分之十五点六。——译者

保加利亚人民为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对正在战斗的越南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不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在所述十年内，它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从四千一百万列弗增加到二亿五千三百万列弗，在保加利亚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则由1960年的百分之二点九，增加到1970年的百分之五点五。保加利亚还给予年轻的独立国家以财政和科技支援。

保加利亚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始终不渝地执行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爱好和平和建设性的政策，在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它们发展贸易和经济联系。1960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共为四亿八千五百万列弗，而1970年则增加到七亿四千三百万列弗。1970年，保加利亚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六点六。这十年内，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建立贸易联系的国家从七十一个增加到一百零四个。

保加利亚的国际威望在六十年代大大提高。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保加利亚代表一贯执行的方针是加强和发展国际合作，扩大各国人民间的接触和相互理解。

1961—1970年保加利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充分证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政策、在保加利亚的条件下对列宁主 99
义建设社会主义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以及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兄弟合作，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方针都是正确的。

7.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六十年代的前半期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而言乃是近二十年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任务之一——国家工业化的完成阶段。1961—1965年的五年计划的目标就是完成工业化。这期间，工

业发展的速度平均每年为百分之十二以上，到五年计划末，工业产值几乎超过战前水平六点五倍。至1965年，工业成了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工业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一半，如加上建筑业则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南斯拉夫已变成一个发达的工农业国家。

对达到这一目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重工业。至1965年，工业生产中甲类部门的比重几乎达到三分之二（1939年仅略高于百分之四十）。机器制造业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就，是由于进一步贯彻了195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通过的方针：加速发展加工工业并把对甲类的投资适当进行有利于机器制造业及金属加工部门的再分配。

燃料动力部门和原料部门，特别是电力的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对能源和原料不断增长的需求，首先是工业对它们的需求尚不能充分满足。例如，钢铁就感到不足，虽然与1939年相比，1966年的钢铁产量几乎增加了八倍，但还是不得不依靠进口。1961—1965年钢铁的进口量就达到了南斯拉夫本国钢铁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一状况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是由于这一时期燃料动力部门、原料部门和冶炼业的发展速度一般偏慢，这一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前面所提到的投资再分配有利于加工部门有关。这一现象对黑色金属冶炼业的影响尤其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2年在斯科普里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南斯拉夫最大的冶金联合企业，并对一些大型冶金企业进行了改造。

虽然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优势，但在六十年代的前半期内轻工业在增长速度上第一次超过了重工业。由于大量投资，化学工业成了主导部门之一。

1961—1965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业产量的总增长额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至六十年代中期，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与战前相比增加了三点五倍以上，而农业人口比重则大大下降，只占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弱（而战前为四分之三）。

六十年代仍继续执行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采取的增加农业投

资的方针，只不过作了某些修改而已。对农业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投资的大量增加和这些部门的迅速发展导致农业生产的技术装备程度大大提高和人造肥料的使用大大增加。加快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并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方针继续得到执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是，扩大社会主义农业组织的面积和改造社会所有制农业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一方面保留其供销职能，另 100
一方面由于在其内部组织和发展了社会所有制农场而具有生产合作社的特点。这种农场建立在合作社从国有土地总面积中得到的土地，以及向个体农民购买或租赁的土地上。向个体户购买和租赁土地也是农场和在大农场基础上建立的联合企业扩大其土地总面积的手段。为刺激农民将土地出售和出租给社会所有制农场，曾采取了许多专门措施，如：制定土地务必使用的法令，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有权优先购买个体农民出售的土地，对长期出租土地给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农民实行减免税优待办法等等。从事农业的人数大大减少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因为从农村迁往城市去的人，首先是小土地所有者，竭力想出售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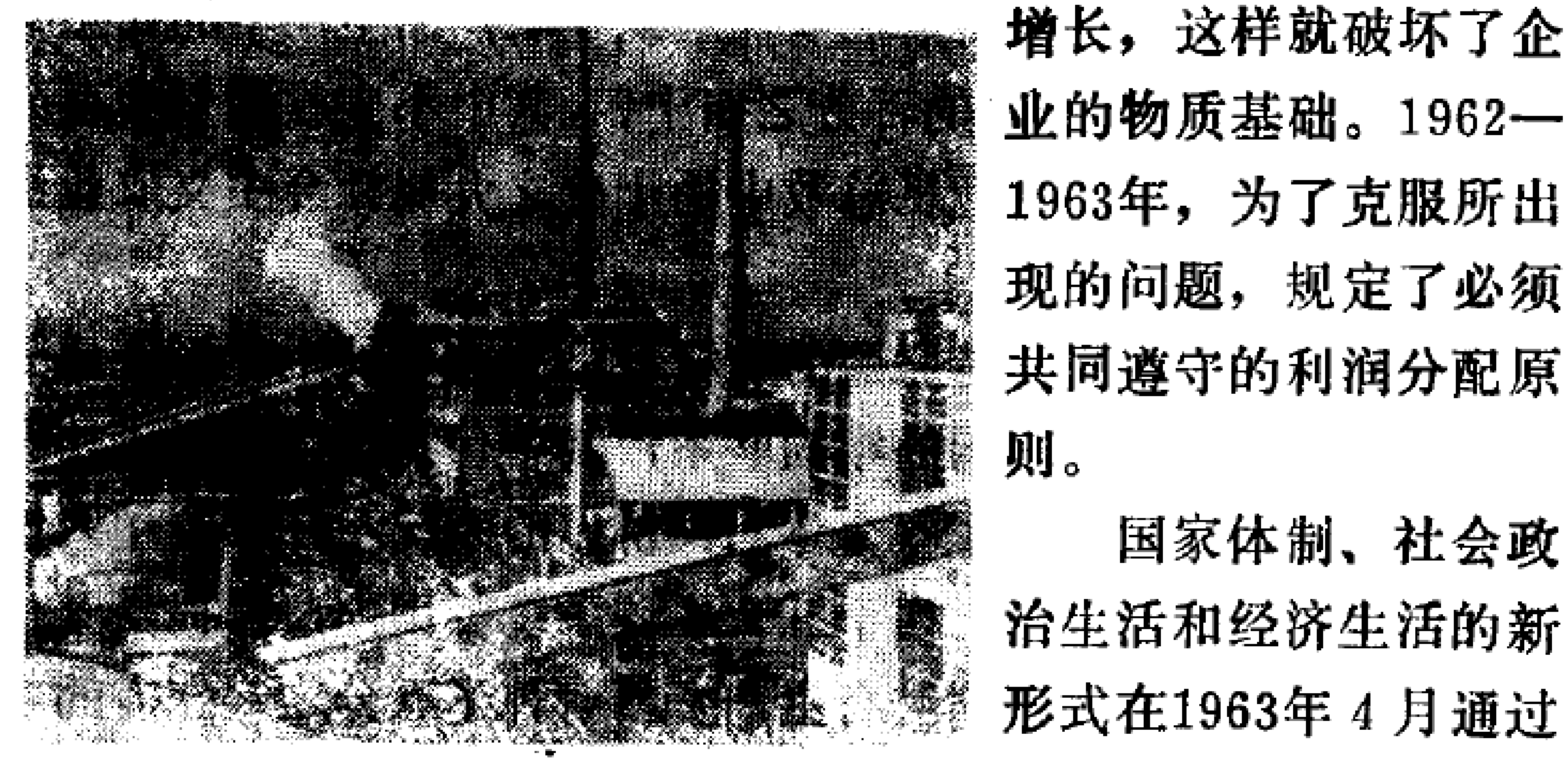
至六十年代中期，属于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成分的约有可耕地的百分之十四、农业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以上和牲畜总头数的百分之九。但社会所有制农业组织在农产品生产中的比重却非常大：占全部商品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四，其中小麦收购量为百分之七十五。1965年，拖拉机总数中的十分之九属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成分。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农村政策旨在发展个体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牢固联系，其中包括生产联系。社会所有制农业合作社建立了与个体农民协作的系统，1965年纳入该系统的个体户已达百分之四十五。在该系统范围内，除提供其他某些项目的服务外，还用公有生产资料耕种了五分之一左右的农民私有土地。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通过农业合作社向个体农民预购（签订合同）和收购农产品的做法得到了发展：1961—1965年，共

收购个体经济商品产量百分之九十。但是个体经济成分在农村还是占优势。虽然农业生产在增长，但直到1965年南斯拉夫粮食需求的五分之一仍不得不靠进口来解决。个体小农经济不能充分保证全国对粮食和原料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工业化年代里，不太发达的共和国和区(这是旧南斯拉夫遗留下的经济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些地区的发展速度比全国高一些，但还大大落后于经济较发达的一些共和国。纠正这种状况已作为南共联盟政策在民族问题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101 六十年代前半期，在国民经济管理上，在国家建设方面以及在社会政治体制中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变动是为体现南共联盟提出的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原则而做出来的。1961年3月通过了一项法令，根据该法令，企业(通过工人委员会)在国家提成百分之五十五之后有权自行酌情分配收入，包括确定工资总额和企业经营基金之间的比例。法令的目的是为促使企业获得最大生产成果、发挥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创造条件。在贯彻此项法令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许多企业在分配收入时用压缩积累基金的办法加大消费基金，个人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样就破坏了企业的物质基础。1962—1963年，为了克服所出现的问题，规定了必须共同遵守的利润分配原则。


贝尔格莱德郊区的
纸浆造纸联合企业

国家体制、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形式在1963年4月通过的南斯拉夫新宪法和各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了肯

定和进一步发展。国家开始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也改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自治省。1963年宪法确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自愿联合、权利平等的各民族的联邦国家和政权属于劳动人民并进行自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宪法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有组织的领导力量”。新宪法宣布，“以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实现自由联合劳动”和“在生产和社会产品分配上实行劳动者的自治”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宪法规定有劳动权、工资照发的休假权、接受教育和享受社会保障权、获得最低个人收入(最低生活费)权。

根据新宪法规定，改变了以往总统和联邦执行委员会（政府）主席由一人担任的做法，将两者的职能分开，并设立了副总统职位。最高立法机关——联邦议会的结构更加复杂化了。过去只有由国民经济部门职工选举产生的生产者议会，现在则分不同的劳动活动(包括非生产活动)选举成立了四个院。保留了由全体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和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选出的部分联邦议会代表组 102
成的非常设院，该院只是在审议修改宪法问题或涉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利益的问题时才进行活动。1963年宪法扩大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利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限。对选举制度也作了某些修改：只有部分代表机关(主要是地方代表机关）可以沿用直接选举的原则，而其他机关均按由下级代表机关向上一级代表机关选派代表的原则产生。

1963年6月，根据新宪法选举产生的联邦议会再次选举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南斯拉夫总统。

长期以来，虽然采取了某些措施，但采掘业仍一直落后于加工业，而农业则落后于工业生产。至六十年代中期这种落后状况所引起的比例失调开始严重地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输入的不断增长导致对外贸易逆差和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外债增加。采掘业落后于加工业还使经济落后的共和国和自治省(恰

好是采掘部门的主要集中地，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等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与比较发达的共和国及自治省（加工工业的集中地，首先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之间在经济发展上更加不平衡。

1964年12月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详细研究了南斯拉夫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制定了称之为社会经济改革的长期纲要。1965年7月，采取了一整套相应的立法措施开始实施纲要。1966—1970年的五年计划又具体规定了改革的任务。

改革的经济措施涉及到生产、分配、财政、外贸的一切领域。在外汇和对外贸易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改变第纳尔兑换率和允许更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其目的在于使南斯拉夫的经济适应国外市场的情况。企业的权利大大地扩大了。由于国家提成部分减少，大部分净收入（达三分之二）可由企业自行支配。同时，取消国家给企业的补贴，而集中投资基金的资金则转交给也属自治单位的专业银行办理。银行的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规定以贷款形式并按经济核算原则向企业拨款。为了加速发展农业，农产品的收购价平均提高近三分之一。为了刺激生产，提高了采掘业产品的价格，同时还给予该部门以补充投资。

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更加广泛地参与解决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联邦议会的结构也作了相应的变动。1968年，人数增加了一倍的人民院成了与其他院平等的常设院，而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如批准联邦计划和预算时，则享有优先权。

1966年，通过了关于改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领导机关的决议。1969年3月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盟章也对改组一事作了规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被撤销，其部分职能交由定期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会议承
103 担。代表会议由例行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组成，负责研究和确定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南共联盟的现行政策。党的活动由南共联盟主席

团和主席直接领导。主席的职务是1966年取消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设立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产主义者联盟按代表人数均等的原则(每个共和国三名,每个自治省一名)选举产生南共联盟执委会。参加执委会的还有南共联盟主席。1966年,铁托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后来在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

在社会经济改革过程中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全国经济起了良好的作用。黑色金属冶炼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了:1961—1965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四,而1966—1970年期间提高到百分之七点六。1966—1970年,农产品的增产总的来说超过了前一个五年计划,自1967年起,出口农产品的价值超过了进口。

与此同时,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却减慢了。采掘部门和加工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现象没能克服。经济不太发达的共和国的工业发展大多未能达到计划的水平。工业部门工作岗位数量的增长落后于后备劳动力(包括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增长。南斯拉夫公民出国(主要是到西欧国家)从事临时工作的人数增加了。1971年,出国人数几乎达一百万人。长期存在的外贸逆差、国际收支赤字和通货膨胀现象使上述种种困难日趋严重。

在农村,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商品生产中的比重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和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减少使得地价上涨,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可购买和租赁的土地——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主要来源——也随之减少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耕地面积几乎没有增加。允许个体农民购买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使个体经济成分中的拖拉机总数有了增加(1971年已达拖拉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1966—1970年期间,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合作的个体农户数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

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与政治上的困难交织在一起。至六十年代末,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更加活跃。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本身队伍中,包括该联盟某些领导机关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他们的活动目的是反对党的领导作用,反

对该党建立在阶级基础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上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统一。个别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民族主义分子也大肆活动。他们的行动，包括分立主义活动在内，其目的都是反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统一，使民族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部分经济领导人和地方负责干部采用一切方法试图削弱国家、劳动集体和工人委员会在计划、监督、调节等方面的职能，这种行为也具有反社会主义性质。

已出现的这种局势要求采取措施反对这些消极现象，克服出现的困难。1970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会议强调指出，必须在民族平等和加强各共和国责任的基础上巩固联邦。
104 在这次会议上，南共联盟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占有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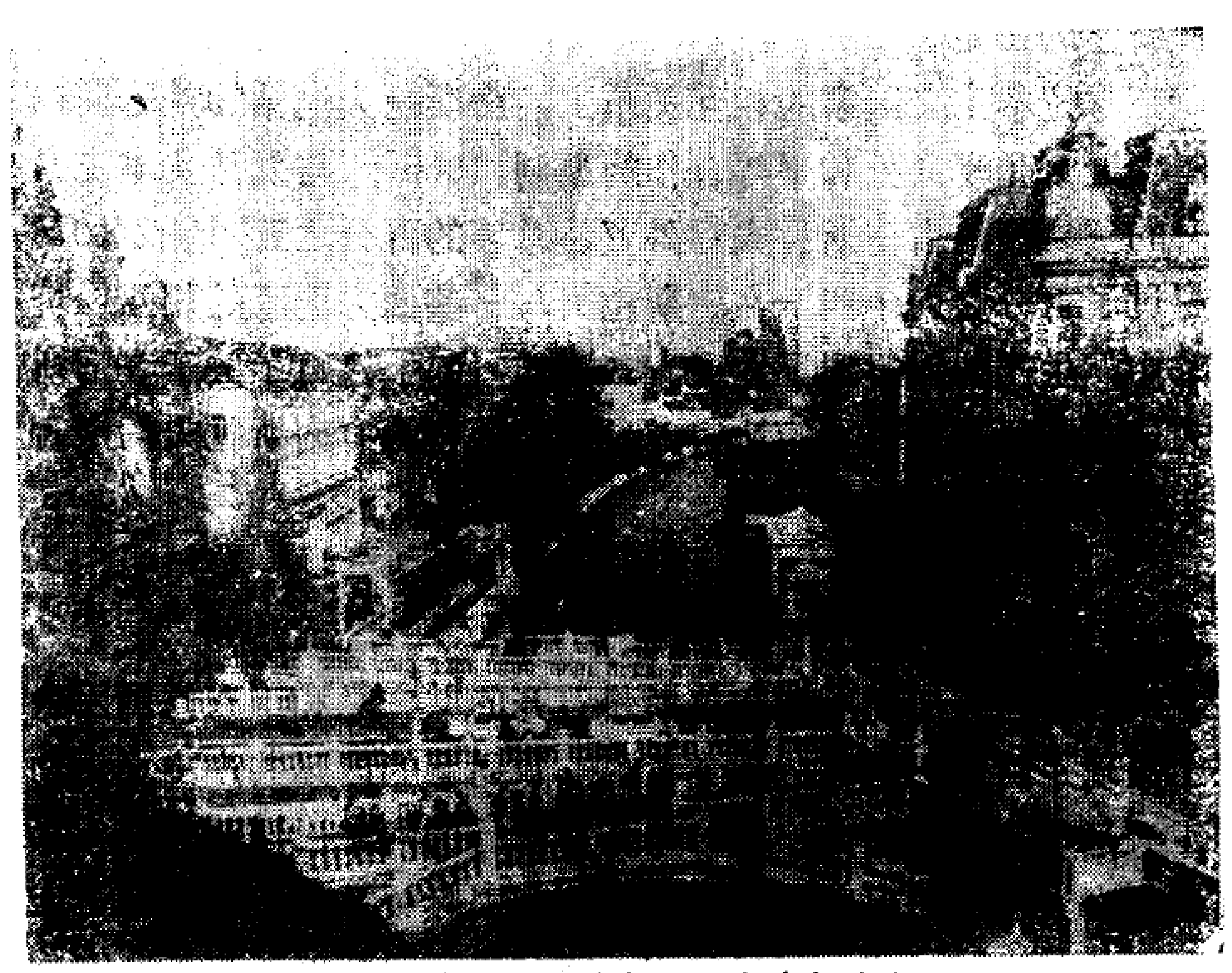
在整个六十年代内，南斯拉夫继续贯彻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并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南斯拉夫为保障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为缓和紧张局势和制止军备竞赛所作的努力在其对外政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南斯拉夫是参加“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1963年)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的第一批国家之一。1969年，它成为日内瓦裁军委员会成员之一。

为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而斗争，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获得政治经济独立的要求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六十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不结盟政策是南斯拉夫外交方针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196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南斯拉夫是1962年7月在开罗召开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它还积极地参加了1964年10月在开罗和1970年9月在卢萨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工作。

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中起着重大作用。这种关系是在它们具有建设社



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共同目的而利害一致的基 105
础上不断发展的。在一系列有关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南斯拉夫的主张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致。在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经济和科技联系占有重要地位。1964年9月，签订了关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参加经互会机构工作的协定，它开始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多边合作。

自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互访开始，苏南关系得到了重大发展。定期举行最高级会晤是两国加强合作的表现。

虽然苏南两国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产生了分歧，但两国关系仍继续发展。两国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1961—1965年期间，双方换货量又增加了两倍，1966—1970年又增加了一倍半。1965年成立的苏南政府间经济合作委员会起着重大作用。苏联积极参加南斯拉夫企业的建设和更新。1969年签订了关于合作

生产轿车的协定。

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南斯拉夫遵循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等合作的原则。1965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约占南斯拉夫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而1970年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四。在南斯拉夫与一些西方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中，生产协作得到了发展。1969年10月签订了关于在南斯拉夫成立国际投资公司的协定，参加该公司的有南斯拉夫的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银行。

8.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出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背离一致同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路线的动向。1961年2月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毫无保留地在对内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一切问题上支持北京的“特殊路线”。1961年末，阿尔巴尼亚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阿尔巴尼亚不再参加经互会工作，拒绝在华沙条约组织内进行合作，并于1968年正式声明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以自力更生为主”这一论点是阿尔巴尼亚奉行自我孤立、拒绝经互会合作路线的理论根据（“新方针”）。这意味着它必须采取依靠自己的物质技术力量同时接受中国援助的方针。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针，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并停止了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合作，这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起了不良影响。加之1959—1961年极为不利的天气条件也造成了不少客观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1年2月许诺的贷款推迟了两年才开始提供。结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的计划任务在一系列最重要的指标方面没有完成。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百分之十六点九，下降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百分之六点八。诸如石油
106 开采工业、煤炭工业这样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发展指标大大下降。

过去阿尔巴尼亚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六个铬矿石输出国之一，但现在这一重要原料的开采量却下降得特别明显：整个五年计划时期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点四，而计划规定为百分之十八。由于贷款无着落，二十五个项目的建设只好下马，而开采铬铁矿和镍矿的联合企业的建筑工程推迟到七十年代才开始。工业总产量之所以还有所增长，主要是由于以往由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援建的企业的设备发挥作用的缘故。

农业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年代里，农产品总产量的计划任务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六点五。第三个五年计划内曾试图通过大幅度增加投资额、吸收城市居民和军队参加农业生产的办法使农产品和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百分之七十二）。但是，1966年11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确认，农业生产仅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

对外贸易额也减少了。政府不得不实行许多食品的定量配给制并增加从国外购买谷物的数量。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中国援助的效能，因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不是简单地改变资助的来源和更换一些外国专家。问题在于能为发展阿尔巴尼亚经济制造最良好条件的稳固的对外经济关系体系遭到了破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年代里利用中国“大跃进”的实践经验和大炼钢铁这种创新做法失败之后，又回过来采用经过考验的工业化方法。同时，由于阿尔巴尼亚拒绝在经互会范围内进行合作，拒绝能使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接近和拉平、而且对阿尔巴尼亚特别有利的国际社会主义总分工，当然会使其国家发展发生困难。中国的贷款不能弥补由于阿尔巴尼亚断绝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互通有无的联系而造成的损失。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为了证明与经互会成员国断交在经济上是有道理的，便借口说，似乎阿尔巴尼亚甲类工业部门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为了建立多部门的经济，提出了加速发展重工业的口号。

但是新的政治经济方针并没有使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反而下降了，因为缺少必要的动力和物质技术基础，预定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终于不再热中于用政治方法来解决纯经济问题，而又回过头来采用 1960 年前制定的原则。六十年代末的情况有所稳定就是执行这些原则的结果。

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执行情况，据1971年 11 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声称，是比较顺利的。但是计划机关并没有彻底改变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分配不平衡的做法。工业的成绩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削弱农业而取得的，尽管与战前相比农业产量的绝对数有所增长，但总的来说农业发展很慢，而且还保留着粗放性。农业长期落后的现象在第四个五年计
107 划期间也未能克服掉。农产品的增产计划只完成了一半多一点。自1949年起年年都把粮食自给自足的任务纳入计划，但这任务始终未能完成。

1970年，即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被宣布为“在各方面发动革命进攻的一年”。在“搞好农业人人有责”的口号下“以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是主要希望之所在。但是尽管采取了加班加点的做法，并组织工人职员工作队，把它们派往工业建筑工地和农村劳动达一年之久，却未能取得预想的结果。

“新方针”对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起了极其有害的影响。阿尔巴尼亚借口与“有害”思潮作斗争，停止了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大多数国家在文化艺术领域内的接触，而保留下来的某些联系也被限制在严格的范围之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称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认为它只有在中国的条件下才可以被接受。然而在制定阿尔巴尼亚的“思想、文化、科技革命”标准时，却表现出了毛主义观点的个别因素。阿尔巴尼亚领导所采用的理论把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归结为向人民灌输一定数量的知识以保证完成某种生产职能。从这一观点出发开始重新考虑文化、艺术、教育、科学的发展问题，而这绝不能促使它们进步。在六十年代末开

展了种种运动，反对"腐朽的唯智论"，反对向大中小学学生讲授"无用的知识"，反对美学教育与"注重博学多识的倾向"，因为这些东西都被当成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残余。1969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学校革命化"的决议，要求按照从学龄前起直到高等学校毕业进行军事化教育的原则改革教育制度。

至六十年代末，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开始出现分歧。这些分歧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因为阿尔巴尼亚领导对中国指明其贷款的用途（主要用于农业）、减少工业设备的供应以及把预定的企业交付使用期限拖延一至六年的做法表示不满。

在对外政策方面，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虽然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有重大分歧（如：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接近美国和联邦德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是步中国外交的后尘。

1961—1970年期间不断发展的在民族主义和反苏基础上的自我孤立，导致阿尔巴尼亚缩小其外交活动的范围。苏联保卫和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动遭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攻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和平和制止帝国主义分子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地区进行侵略的主动行动也遭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反对。这种方针早在1960年9月就开始表现出来，当时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不支持保加利亚提出的关于在巴尔干实行地区性全面裁军的建议。与此同时，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上，阿尔巴尼亚还反对由波兰提出的、并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赞同的关于撤除在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的决议草案。

阿尔巴尼亚与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除外）的联系只限于双边经济协定。阿尔巴尼亚武断地拒绝与它们就某些国际政治问题采取统一行动或进行合作，同时却又不排除"与帝国主义国家一部分资产阶级进行某种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在经济贸易方面 108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有所增加，而在文化科学方面则已与法国

和意大利有了来往。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间形成的不正常关系不符合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使反帝斗争的统一阵线以及阿尔巴尼亚本身遭受损失。苏联遵循列宁主义对外政策的国际主义原则不止一次地采取措施以求改善相互关系。

第三章

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

六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入 109
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能够在历年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完成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任务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医治了由于美国在1950—1953年发动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创伤，从而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越南民主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局势。由于美国的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建设被迫中断。为了抗击美国的侵略，越南人民不得不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代价。到六十年代末，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各方面都已取得了各自不同的巨大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方面以及在执行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要方面均取得了进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解决了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越南民主共和国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并坚持走自己所选择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势却十分特殊。它遇到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系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政策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所引起。

1. 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取得胜利之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就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要任务了。

1961年7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方面最主要的环节，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从而保证农业的集约化。"代表大会赞同蒙古人民共和国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

为了保证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在进一步从组织上和经营管理上巩固农牧业社和国营农场方面，在用现代的高效率技术设备装备农牧业社和国营农场，以及派遣干部加强农牧业社和农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家在农业政策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在保证农业的稳步发展上。1963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次全会制订了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措施。全国开始实行关于发展畜牧业和农业，以及提高农牧业社生产利润率措施的内容广泛的纲要。

110 1963年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采取发展农牧业社社际生产措施的决议。这项决议提出农牧业社可以发展联合生产(农业设施工程、饲料收购、某些畜产品的初步加工和建筑材料生产等)的方针。组织社际生产为挖掘潜力提供了广泛的条件。因为只局限于各个合作社范围之内，由于劳力不足、效益不高及其他种种原因，要挖掘潜力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使农牧业社更加关心发展农业，国家规定以较低价格将良种出售给农牧业社，而以高于国营农场的价格收购它们向国家交售的谷物。农牧业社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大量贷款用来购买技术设备、种畜和扩大农村的基本建设。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保证农牧业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措施。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1963年6月的决议，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建立了农牧业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担负以下几项任务：研究适应国内气候自然条件开展农牧业经营的方法，探索解决提高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等问题的途径。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条件下向前发展。这对提高农业产量十分有利。在此期间，畜牧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十三，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七。扩大牲畜头数的五年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牲畜总头数则达到了二千三百八十万头，超过1960年水平的百分之十五点四。

在实行合作社制度的条件下，农牧业社成了畜产品生产和向国家供应畜产品的主要单位。1965年在农牧业社中集中了全国牲畜总头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农村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农牧业社的中心庄园，变成了蓬勃兴起的文化、生产中心，设有学校、诊疗所或医疗站、发电厂、俱乐部和电影放映站等。

到六十年代中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顺利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各项主要任务。在此期间，基本建设的投资政策保证了蒙古工业主要部门的迅速发展：1961年至1965年的工业投资额比1956至1960年增长了一点四倍，其中电力工业增长了三倍，燃料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五十，食品工业增长了一点二倍。

通过国家在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目的明确的努力，以及工人、牧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劳动，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年代获得了显著的标志，那就是农业生产、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点五。在五年计划期间，国内新建了几十个新的工业企业和车间。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建的达尔汗工业综合体，成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新建工程。

共和国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新建了六十所中学，普通教育学校的学生数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新建了两所学院，国立大学开设了一些新专业，还成立了许多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1965年，大学生的数量比1960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四点五，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数量增长了百分之八。

医疗防疫机构网大大扩大和巩固了，医护人员的数量也有了

增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和国的医生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1960年为八百七十三名，而1965年则为一千五百一十一名），从而切实改善了居民的医疗条件。

工会对于取得上述各项成就起了重要作用。根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1963年8月通过的决议，工会按照生产系统进行了改组，共成立了五个工会：工业职工工会、建筑业职工工会、农业工作者工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工会，以及文化工作者工会。这次改组促进了工会在组织生产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工会同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工作联系。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对共和国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的。196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了经互会成员国，从而大大增加了它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体系的机会。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为加速蒙古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创造了条件。

1966年6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乌兰巴托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大会通过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新纲领，规定了党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作目的、任务和主要方针。

大会通过的党纲总结了蒙古劳动人民为保证国家超越资本主义阶段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而斗争的经验，同时也反映了由马列主义科学所揭示并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新生活建设实践所证
112 实的这种发展的规律性。党纲强调指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紧密联合与团结一致的条件下，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才能得到顺利解决。文件还指出，同苏联的友好与合作，以及苏联在各个方面所提供的援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蒙古人民在争取自由和独立、改变国家世代落后面貌和建设新生活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新党纲明确提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路线，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要任务，是在现代科技进步成就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高速增长和社会主

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加强对劳动者的共产主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使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党纲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完善，应该同国家生产力的有计划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党提出的任务是：大力巩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提高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觉悟。

新党纲在确定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外政策的路线时指出，党的"宗旨是保证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团结、友谊和合作，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 113
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促进当代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以及维护和巩固普遍和平与各族人民的安全。"

用新党纲武装起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全体蒙古人民，在实现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1966—1970年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指示所提出的任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国民经济和文化各部门的投资额比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了十五亿图格里克。国民经济固定基金增长了二分之一。所有经济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都有了提高，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提高劳动者福利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几年里，蒙古社会的政治体制继续得到完善。党同各种社会组织，如工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和妇女组织的联系加强了。

第四个五年计划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解决党所提出的把国家变成一个农业工业国的纲领性任务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1966年12月，由苏联协助建成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在乌兰巴托投产。1967年，也是在苏联的协助下，完成了达尔汗——乌兰巴托的高压输电线路工程。该线路与原有的达尔汗——苏赫巴托线路一起构成了包括乌兰巴托、达尔汗和苏赫巴托的热电站在内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动力系统。1969年，乔巴山的火力发电站交付使用。在第

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交付使用的还有达尔汗的水泥和硅酸砖工厂；乌兰巴托的泡沫混凝土工厂以及巴彦洪戈尔、科布多、扎布汗的钢筋混凝土制品车间和十三个省的制砖厂。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是通过改善对现有设备的利用和新企业的投产提高了产量。

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和比重有了显著增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四，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在发展农业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建立新的和扩建、改造老的国营农场取得巨大成就。大力开垦荒地使谷物产量得到提高。

第四个五年计划，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实力进一步巩固及其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实现的。1966年1月12日至17日，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在蒙苏友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访问期间，于1月15日，签订了苏蒙友好、互助、合作新条约。这个条约成了苏蒙两国人民牢不可破友谊的政治和法律基础。苏蒙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四个五年计划任务的顺利完成。1967年11月13日，苏蒙两国缔结了1968—1970年对蒙古提供补充经济援助的协定。为了进一步贯彻这项协定，苏蒙两国政府于1968年10月24日签订了关于实行补充措施以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迫切需要的合作议定书，以及关于在蒙古境内建设“轨道”号电视宇宙通讯站的协定。

114 蒙古人民共和国还顺利地发展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65年至197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蒙古同这些国家，以及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古巴，签订并开始实行关于文化交流的双边协定和专门条约。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经济合作，蒙古同苏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两国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积极参加了进一步加深和完善经互会成员国的合作

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的制订工作。

六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1961年10月，蒙古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平方针在国际舞台上的具体实施。在此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奉行着全力巩固蒙古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友好和合作的路线。

2．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 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以高涨的劳动热情投入了为实现国家1961—196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斗争。这五年，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取得成就，其主要条件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进一步吸引人民群众参加管理社会和国家的活动，完善了建立在以工人阶级和越 115
南劳动党起主导作用的工农联盟基础上的先进社会制度。从1960年开始，由黎笋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在劳动党的领导下，越南城乡开展了争取获得社会主义劳动工作队和工作集体称号的运动。

1961年2月举行的越南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大会的决议指出："必须集中力量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将越南北方变成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基地这项中心任务。"在大会通过的工会新章程中提出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任务。越南劳动总同盟改名为越南总工会。

1961年3月举行了越南妇女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劳动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两个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方针，是吸收自己的成员参加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和动员他们参加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

在1961年4月召开的越南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这个全民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解决全民族任务，以及在加强爱好和平力量的国际团结和保障世界和平等方面的任务。

1961年4月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提出了把解决国民经济问题同加强对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措施结合起来的任务。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不断发展问题始终是党关注的中心。1961年7月，越南劳动党中央研究了农业发展问题；1962年6月研究了工业发展问题；1963年4月研究了制订国家计划的问题。在1964年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十二月全会上，制订了关于扩大商品生产、改善商品分配和完善价格构成方面的措施。

关于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受到极大重视。从1962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国家企业职工新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定对因疾病、年老或因残废、职业病和丧失赡养者的人员发放优抚金和补助费。扩大了包括现代化医疗中心和农村医疗站在内的劳动者保健网。在居民中间开展防疫、接种和社会卫生措施的规模也日
116 益扩大。结果，在共和国境内疟疾已经被战胜，原先广泛流行的肺结核和沙眼的发病率也已大大降低，脊髓灰白质炎几乎绝迹。

随着城乡社会改造的深入进行，居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接受了政治教育和职业训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成千上万个昨天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属于各个社会阶层及不同民族的人员，投入了社会政治活动和生产活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单一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正在逐步形成，截至1965年，计有五十六万人，而且其中熟练工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根据越南劳动党所确定的路线对农村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条件下，农村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变化。这条路线的内容是：坚决依靠贫农和某些中农阶层，同中农结成紧密联盟，限制和消灭富农的经济剥削并对其加以改造，制止地主阶级势力的复辟，同时为他

们创造条件，使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改造成新人。这一路线的贯彻，保证了农村中最后一种剥削势力——富农阶级的消灭，以及根除资本主义分子剥削农民的条件。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在巩固和扩大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合作农民正在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国家曾经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即在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几乎有一半农户参加了低级合作社。虽然合作社内相当一部分生产工具由集体使用，但并不属于集体所有。合作农民阶级还未成为一个单一的阶级，社员在物质状况或思想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问题之所以复杂，还在于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暂时还很薄弱，合作社的经济能力有限，国营农场也还未得到充分巩固。此外，困 117
难还在于不断发生自然灾害，而国家的分裂使问题更趋复杂，原来按自然特点可以相互补充的一些地区则被割裂了开来。

1963年4月越南劳动党中央通过的一项决议，即关于开展旨在完善合作社管理、改善技术设备使用，以便全面、稳步地发展农业的群众运动的决议，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大意义。农业合作社中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常年固定的生产队，无论土地、耕畜或农具均归其固定使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即扩大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并从物质和精神上刺激劳动积极性，对发展合作社的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商品生产进行改造。原先建立的合营企业开始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在这些企业中实行社会主义管理方法，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1965年，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在工业中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六，其中唯一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仍然是向旧业主支付在企业合营之前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资本的利息。

通过逐步吸收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或使他们转入国营企业的方式，国家继续对小规模经营活动进行改

造。截至1965年为止，约有百分之九十的手工业者已加入了合作社。

118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国家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十三以上。1954年共计仅有二十个工业企业，到1964年已达到一千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就有二百个。在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总值增长了六倍多。发电站增加到了三十五个，电力生产几乎超过1955年水平的八倍。采煤量和水泥生产也大幅度增长。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一半以上。

1965年，农业达到了二十年来的最高指标，其中稻子产量超过了五百万吨。城市和工业中心居民的粮食供应得到改善。

1964年4月26日举行的第三届国民议会代表选举，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约有八百八十万公民，即共和国百分之九十八的选民，参加了代表选举。共选出代表三百六十六名。此外，有八十九名越南南方代表参加了大会：根据国家暂时被分割成两部分这一情况，延长了他们的代表资格。

1964年6月27日至7月3日举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第一次会议，重新选举胡志明为共和国主席，孙德胜为副主席。还选举了由长征任主席的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国民议会批准范文同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1961—1964年的越南南方 六十年代初，越南南方的两个主要社会政治矛盾，即越南南方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同地主、买办及国内其他反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吴庭艳当局千方百计企图在越南南方境内消除1954年8月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企图阻止依靠社会主义越南北方支持的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

由二十多个政党和组织参加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遵循越南劳动党的战略路线，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推翻南越的亲美反

动政权和统一全国而进行斗争。

1961年2月建立了正规的越南南方解放军，它同地方和地区的爱国者队伍一起组成了人民解放武装力量。

1962年2月16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解放阵线的详尽的政治纲领，并选举了由阮友寿任主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越南南方所实行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当代世界革命进程中团结群众的卓越范例。

随着在人民中间缺乏社会政治基础的西贡政权危机的日益加深，美国不断扩大对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国家内政的干涉，以维持它在当地的傀儡政权。1961年，美国中央战略机构制订了在越南实行“特种”战争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西贡政权部队应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对越南南方爱国者采取军事行动。据估计，该计划应该保证在一年半时间内使越南“平静”下来。到1962年末，越南 119
南方的美国官兵数量已增加到了一万一千人，而被征入西贡军队的人数则达到了二十万。

但是，人民反抗的火焰并未被扑灭。1963年5月，“佛教危机”爆发。南越独裁者吴庭艳是天主教徒，他禁止为纪念佛诞辰举行传统节日游行，随之又对提出民主要求的佛教徒采取镇压手段。示威游行遍及越南南方各城市。一场宗教运动迅即染上了政治色彩。

1963年5月9日，西贡政权发布通告宣布：根据同华盛顿缔结的协定，开始建立“战略村”，即用以监禁千百万越南南方人民的一种特种集中营。然而，由越南劳动党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各政治组织及其武装力量所领导的人民抵抗斗争，阻挠了“绥靖”计划的实现。美国被迫把自己的傀儡吴庭艳赶下了台。1963年11月1日，越南南方发生了军事政变。以杨文明为首的军官集团掌握了政权。吴庭艳被政变参加者打死。不过美国所玩弄的这一花招，并未使傀儡政权稳定下来。在吴庭艳垮台以后的半年内，西贡共发生政变和反政变十四起。

由于傀儡政权面临彻底垮台的危险，美帝不得不作出更大的努力以防止其覆灭。1964年3月至6月，五角大楼制订了在印度支那实行“局部战争”的战略，规定向南越派遣美国正规部队、改编
120 西贡部队，以及采取旨在保证体现军阀、买办利益的西贡政权维持稳定局面的一整套社会、政治措施。另外还计划在美国建立一个由五角大楼直接领导的新机构，负责指导越南作战，组建美国西贡联合指挥部和加强心理战措施。

这个战略计划中最恶毒的一点，就是指出必须加强和扩大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暗中破坏和施加军事压力的政策。美国在越南实行“新”战略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制造“北部湾事件”和接着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不宣而战的挑衅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抗击美国侵略的斗争 美国以散布“北越发动侵略”的谣言为手段，于1964年8月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并从1965年2月起转入长期连续的轰炸行动。由越南劳动党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采取了加强国防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动员人民群众抵抗侵略的同时，于1965年4月提出了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提纲，规定必须遵守的几个条件是：承认越南人民享有和平、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美国必须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人民的侵略；从越南南方撤出所有美国军队及其盟军；同意越南人民独立自主地解决包括国家统一问题在内的内政问题。

121 美国则提出了旨在使越南继续分裂和维持有利于美帝的西贡新殖民主义政权的十四项“调整提纲”。1965年6月，美国竟然宣布南越是“侵略的受害者”，请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关于“北越侵略”的问题。

1965年12月中旬，华盛顿为了给自己入侵印度支那的行动辩解而展开了“外交攻势”。1966年1月，美国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指控越南民主共和国，企图用“谋求和平”为旗帜来掩盖自己的侵略行

径。

美国的狂轰滥炸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许多发电站、工业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设施均被摧毁或遭到破坏，铁路、公路和桥梁等运输系统也遭到严重损害。轰炸防洪坝所造成的危害更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城市河内和海防均遭到敌人的袭击。

但是，五角大楼企图制造北越经济混乱和对越南北方人民采取恐吓手段的打算，却被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击得粉碎。越南劳动党确切地提出了在战时条件下人民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并率领群众投身于劳动和对敌斗争。越南劳动党制定了一条把政治、军事和外交三个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的路线。1965年12月召开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指出："全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同美国交战状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火箭兵、防空战士、年轻空军的驾驶员以及水兵、工兵和运输兵都建立了非凡功绩。集体英雄主义已成为战争年代的特点。从1964年8月初至1968年11月1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上空有三千二百四十三架美国作战飞机被击毁，入侵者的几十艘军舰被击毁或击沉。

在战争年代，越南祖国阵线及其所属各组织，如越南总工会、劳动青年团、越南妇女联盟等，在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对敌斗争以及开展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均发挥了巨大作用。1967年，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即几乎占全体职工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参加了越南总工会，使其成为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越南工人阶级队伍。劳动青年团成为三准备(随时准备保卫祖国、扩大生产、服务祖国)运动的创始者。在短时间内就有成千上万青年投入这项运动。为了深入开展和扩大"三准备"运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了建立一个战斗青年突击队组织——"卫国旅"的任务。这项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越南妇女联盟当时计有会员三百五十万人，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在党和政府机关，在国民经济部门以及卫生保健和教育系统

中，妇女们积极工作。1966年，在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中妇女占了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从事工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妇女人数也有了极大增长。

妇女自愿接受军训和在乡村民警机关执勤，有时则在地区部队任职。到1966年末，在许多乡村民警机关中妇女的人数平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而在某些乡村民警机关则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不少妇女担任自卫队分队的指挥员。四十岁以上的妇女则参加军人母亲协会，她们照料伤、残军人和军人家庭。

尽管战争条件十分艰苦，中央和地方代表机关仍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并未取消，与1946年至1954年不同的仅是战时在地方不设特别政权机关。

122 1966年4月召开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议会第三次会议，批准了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制订的在特殊条件下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二年（1966—1967年）计划。而从1968年开始，对于国家的国民经济工作以及国防和文化工作，则只制订年度计划。

大批公民参加了军队和准军事化部队。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力的紧张状况，尤其对农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就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如何通过改善农业技术设备和耕作方法，改善灌溉系统和扩大道路建设等途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虽然敌机连续轰炸，水稻产量仍明显增长；1966年，一千多个合作社的产量达到了每公顷五吨，许多地方的产量甚至达到了每公顷六至七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兴工业顺利地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许多企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从而使地方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在正规部队和自卫队配合作战的情况下，全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保护车间、工厂、机关、学校和科研单位的活动。与此同时，还恢复和改建了受到敌机袭击的企业。如果以1967年的生产水平为百分之一百计算，那么到1969年，国家的发电量为百分之一百五十二，机器制造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总产量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二，纺

织工业和缝纫工业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五，食品工业则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三点七。货运量（包括从国外运货的港口的货运量）猛增，运输工具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除了传统的运输工具外，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公路上还出现了成千上万辆大型汽车。

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的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流动商业供应组开始保证对工厂、工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从而促使价格趋于稳定。由于供应方面存在着困难，只能采取定量配售制和按工作单位分配的办法来保证居民的最低粮食需要。

在战争年代，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获得了空前发展。1966年7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培养科技和经济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新的环境下不仅不能忽视干部培养问题，相反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到1970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有三十五所高等院校和分校在开课。大批越南大学生和实习生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培训。

由于美国的侵略，在共和国内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城市和省会，或者被夷为平地，或者因受敌机空袭而遭严重破坏。美国飞机投向共和国境内的炸弹达七百八十多万吨，超过了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所投掷炸弹的总数。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越南劳动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仍然扩大了生产，进行了必要的恢复工作。

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经济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自1961年至1970年十年期间，共和国的农业对电力的总需求量从四百二十万千瓦/小时增至六千万千瓦/小时。农业总产值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三。到1970年末，越南民主共和国计有合作社约二万个，每个合作社平均拥有农户一百五十六个。虽然从整个农村来说仍以手工劳动为主，但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已有了明显的增长。

1969年9月3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活动家、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 123

世。在追悼会上，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致悼词，并宣读了胡志明的遗嘱和全国人民表示对胡志明遗训忠诚不渝的誓言。1969年 9 月 23 日，国民议会选举孙德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阮良朋为副主席。

1970年3月6日公布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开展提高党员思想政治水平和为纪念胡志明而吸收越南劳动党党员的决议。

1970年，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决议开展了四个重大的纪念活动：弗·伊·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胡志明诞辰八十周年，越南劳动党成立四十周年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变成了进一步动员越南人民贡献一切力量去解决革命任务的巨大思想运动。

1970年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十二月全会，成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会讨论了越南北方反侵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全会决议确切地指明了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大规模社会主义农业的任务。决议对发展专业化和机械化给予了极大重视。根据全会决议，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探索新的生产联系的组织形式，即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合作社与国家之间联系的组织形式，以便共同实施水利和土壤改良工程；把土地联成一片使耕作机械化；以及建立合作社社际的或国家与合作社合营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124 **美国的战争升级政策在越南南方的失败** 1964年 9 月，五角大楼制订了紧急措施计划，希冀借以制止西贡政权的“稳定局面”继续“遭到破坏”。越南南方许多地区人民群众 1964 年秋所展开的活动表明，西贡的新殖民主义“结构”正面临着彻底垮台的危险。仅在这一年时间内，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就进行了四万次战斗，消灭敌人官兵近十五万人，击落或击伤飞机和直升飞机五百四十二架，并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1965年 3 月，美国采取措施调动美国正规部队镇压越南南方

的爱国运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团在岘港登陆。至1965年末，在越南南方计已有美国官兵二十万人，到1966年，则几乎达到了四十万人，美国百分之三十二的战术飞机和百分之五十的战略飞机，以及几乎三分之一的航空母舰和实际是整个第七舰队，均投入了反对越南南方解放力量的历次作战。

美国把自己的一些盟国（南朝鲜、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拖入侵略战争，还使用了各种野蛮武器，如毒气、凝固汽油弹、球形炸弹和箱形炸弹、爆破枪弹等。

1965年8月，越南南方爱国者在边和地区首次进行了直接打击美国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证明了他们必定无疑能够战胜侵略者。五角大楼企图调动一百个营及其他增援部队于1965年11月在五个方向同时发起总反攻，借以反败为胜。这次战役遭到失败，遂使西贡政权的政治状况更趋恶化，到1966年3月事态发展得尤为严重。在西贡、岘港、顺化和其他一些城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群众提出了要求傀儡政府辞职和美军撤出越南的口号。在顺化和岘港运动发展成武装起义。

1967年在越南南方计有美国官兵近五十万人。美国每月用于战争的费用逾二十五亿美元。为了扩大西贡"嫡系"军队耗费了巨额资金。在对爱国者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建立了"越南共和国"伪民主的机构。1967年3月颁布南越"宪法"，成立了两院制的国民议会。阮文绍将军任总统，阮高其次帅任首相。

1967年8月中旬举行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民族解放阵线新的政治纲领，它将能促使人民群众在捍卫正义事业的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和越南南方人民群众于1968年1月底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反映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的增长。爱国力量攻打了包括西贡、岘港、顺化、广溪在内的一百五十多个城镇，以及敌人的军事基地和设防地区。一百六十九个西贡部队设防点的守军转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边。爱国者

控制的地区的面积已扩大到了越南南方领土的四分之三，居住人口在一千万以上。整个越南南方纷纷建立地方人民政权机关。在爱国者进攻最激烈的时刻，成立了南越民族、民主与和平力量联盟。西贡律师陈庭绍被选为联盟主席。联盟全力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路线，并与它一起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和西贡政权。

1969年2月末，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展开了新的进攻。在它的打击下，美国远征军团和傀儡军队的损失急剧增长。与此同时，爱国者在城市中也扩大了反对傀儡政权的政治斗争。

125 越南战场事态的发展，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对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支持，迫使美国同意就政治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通过两国代表在巴黎的一系列会晤，于1968年11月1日发布了如下的协议：完全停止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在巴黎举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和西贡行政当局四方代表的谈判。

谈判于1969年1月25日正式开始。然而，西贡政权的代表一直到经过近三个月的争吵、起哄之后才参加谈判。谈判拖延了很长时间。

1969年6月6日至8日，在距离西贡不远的解放区召开了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在政府中成立咨询委员会的决议。黄晋发被选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临时革命政府颁布了十二条行动纲领。纲领表达了千百万越南南方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确定了革命政权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的方针。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成立了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专设的代表机关。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世界进步人士都热烈祝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认为它才是越南南方人民在抗击西贡傀儡政权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时期的

真正代表。

1969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关于改行“新”亚洲政策（即《关岛主义》）的声明，这实际上就是承认美国远征军团的失败和整个“局部战争”计划的破产。“新”亚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正规军分阶段从越南撤出和实行所谓的战争“越南化”。

“越南化”在政治上的含义，则是试图加强西贡傀儡政权的机制和镇压反对派运动。三十家批评西贡政权的报纸被封闭。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不仅如此，阮文绍为了控制政治反对派，早在1969年4月就着手成立“民族社会民主阵线”，在它刚成立时有六个党派，以后仅有二个被正式允许存在的政党参加。其余的政治组织均遭取缔。

西贡自身共拥有武装力量一百多万人，其中：六十万正规军，三十万地方部队，二十五万警察、保安队员及其他人员。在实行战争“越南化”方针那一年，西贡政权从美国获得飞机一千六百架，直升飞机五百多架，以及大量军用船只、武器和装备。

自1969年至1970年，美国从南越撤走陆军约十五万人。而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却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大量空军集中袭击越南南方解放区。西贡部队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反对爱国力量的战役。已经失去越南南方人民群众支持的西贡政权，对反对派大肆镇压。然而，随着“越南化”过程所引起的危机的逐步加深，反对派人数却在不断增长。仅1970年在西贡，就曾进行过六千多次警察行动。

但是，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对越南南方解放运动实行何种镇压措施，一切均无济于事。与此同时，爱国力量却由于遵循越南劳动党在抗击美国新殖民主义及其傀儡的斗争过程中所制订的革命战略战术而不断取得胜利。 126

发展对越南的国际声援运动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55年至1965年执行年度计划、三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1961—1965年）计划期间，苏联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协助越南民

主共和国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总额超过三亿二千万卢布的援助，即相当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提供物资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在 1961 年至 1965 年期间，苏联向越南提供了六百多套技术资料，大批精通业务的苏联专家直接参加了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

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激起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抗议。早在 1964 年 8 月 6 日，苏联就曾专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在北部湾发动的侵略，并要求停止这一行动。1965年签订了一系列关于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协定。苏共二十三大还通过了支持印度支那爱国者的专门文件。

一条真正的生命之路从苏联人民这儿越过海洋通向战斗着的越南爱国志士。这条道路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首先应归功于苏联海员的非凡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在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全部生活顺利地转上了战争轨道，国防力量得到巩固，并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包括高射火箭部队和喷气飞机在内的现代防空系统。

世界进步舆论支持越南人民，要求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动。

1966年 7 月 4 日至 6 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根据越南战争的新形势对战斗中的越南人民提供援助的补充措施。

1967 年 4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卡罗维发利（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支持越南人民的宣言。

1968年 3 月在索非亚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严厉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的野蛮行径，并再次表达了对英雄越南人民的兄弟般团结友谊。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因美国扩大对越侵略而造成对和平威胁的宣言中声明，美国对越南人民的侵略使世界和平经受着严重考验。

参加 1969 年 6 月 5 日至 17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

党国际会议的各国，在一致通过的"给越南以独立、自由和和平！"口号中表达了对兄弟越南人民抗美侵略斗争的大力支持和友谊。6月12日，世界共产党人的这次国际性集会致电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热烈祝贺它的成立，认为这标志着越南人民的英勇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在1969年至1970年于莫斯科举行的苏越两国领导人会谈过程中，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确定了两个兄弟国家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各项任务，并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新协定。

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2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六十年代是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大力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时期。

1961年9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了1957年至1961年五年计划完成的情况，确定了1961年至1967年七年计划的任务和进一步争取朝鲜和平统一的措施。七年计划所提出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国家变成具有现代工业和发达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以及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大会号召全党和共和国的劳动者加强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在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由于苏联正在顺利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从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是朝鲜人民的解放者和最亲密的朋友，每当朝鲜人民遇到困难和考验的时候，苏联总是向它伸出援助之手。

共和国全国为争取完成七年计划而努力奋斗。各劳动阶层都投入了社会主义竞赛，并通过早在五十年代就已兴起的"千里马"运动具体表现出来。

党所制订的措施要求：加强对群众的政治工作，使党和经济机关的各个环节都直接接触生产。根据1962年首先在泰安电机厂

实行的新体制，经理一长制被废除，而以党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朝鲜劳动党的文件指出，实行这种制度，使党的领导作用得到了加强。

如果说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的高度劳动积极性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蓬勃发展和解决七年计划任务的主要内部条件，那么，同兄弟国家的合作以及它们的无私援助则仍然是人民朝鲜社会发展和保证其获得和平环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1961年7月签订的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具有特殊意义。这项条约为苏朝合作提供了新的条件，保证了朝鲜人民维护革命的成果，其宗旨就在于保障朝鲜半岛以及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为了具体贯彻这项条约，两国还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规定在许多重要工业项目的建设方面由苏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

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党和政府全面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迅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方针，在七年计划最初的几年即1961年至1964年，对扩大消费品生产就给予极大重视。在此时期，消费品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六，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

美国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反动派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旨在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加紧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军事挑衅。面对这样的形势，共和国的领导特别重视加强国防力量。由于拨出大量资金用于国防，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定的困难。1966年10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为了实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作出了关于将完成七年计划的期限延长三年的决定。

128 六十年代后半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一批新的企业建成投产，同时改造了许多老企业。每年约有百分之六十的投资用于工业，主要又用于重工业。与此同时，轻工业的基础也得到了巩固。为了扩大消费品的生产，除了发展中央所属的大型工业企业外，还

设法创造条件使地方工业便于得到发展，同时建立一批中小型企业。

在本书所论述的时期中，如同以往一样，在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协助下，一大批对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大型企业建立起来了。1967年成立了苏朝两国政府之间的经济、科技问题协商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其他所有经互会成员国以及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同样性质的委员会。

六十年代，共和国的工业生产与过去十年相比增长了二点三倍。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八。

1961年至1970年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时期。工业的发展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水利工程计划得到顺利的实施，水稻田灌溉任务也完成了。1970年受灌溉土地的总面积达到了七十万公顷，即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极大提高，农业机器站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在1961年至1969年期间，拖拉机总数增长了二点三倍，载重汽车总数增长了五点四倍。农村技术改造的其他任务也得到顺利实施。电气化过程基本完成。由于化学工业的发展，在1961年至1970年期间农村的矿肥供应增长了二点二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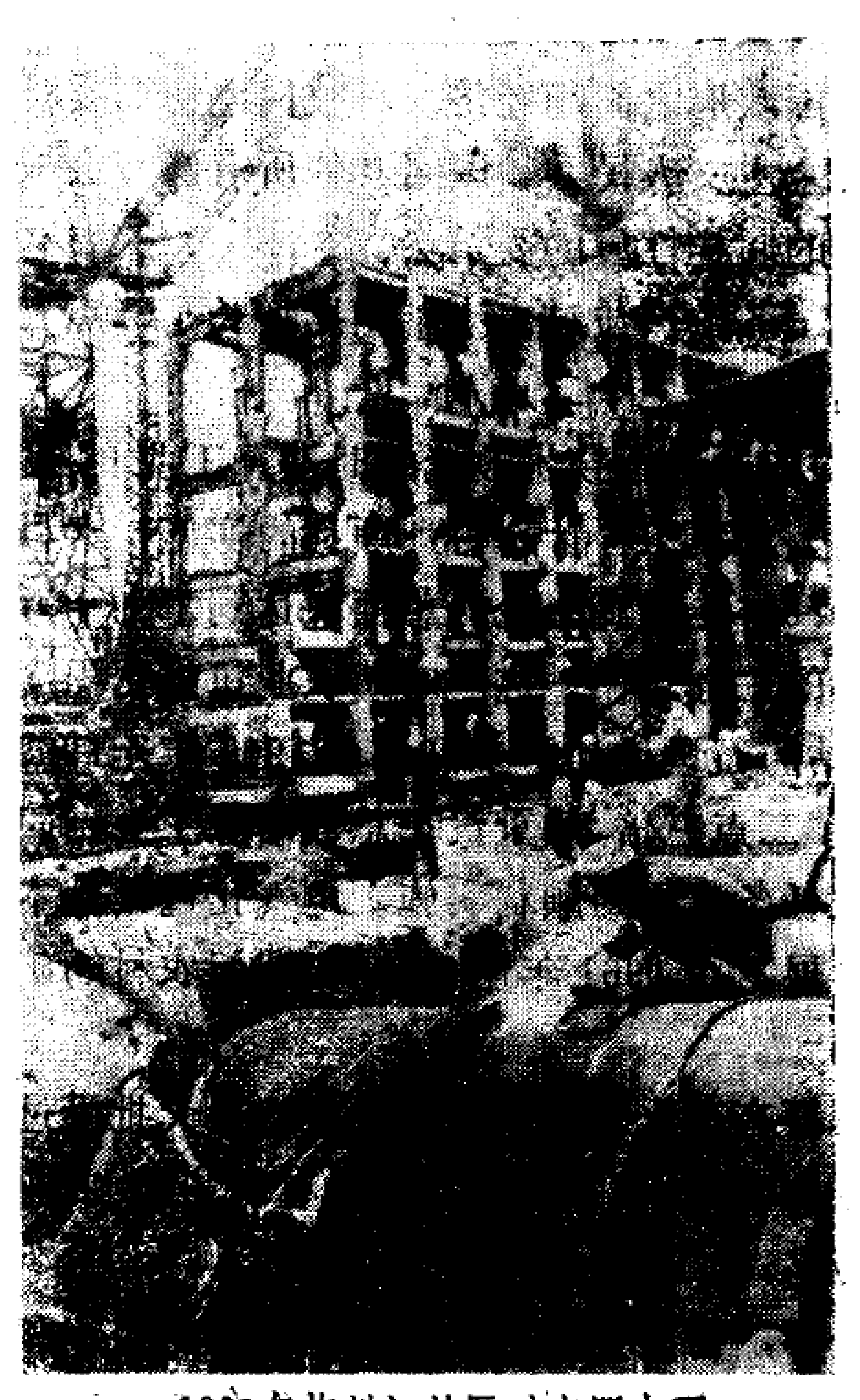
由于农业技术改造需要有高水平的干部，城市就把大批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专家派往农村。1970年，农村计有农艺师、农业技术员和农机人员十五万名，比1960年增长了八倍。

农业的发展同工业一样，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国家从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合作社。1964年3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农村中一切生产和文
化生活设施的基本建设都由国家统一拨款。1966年4月，朝鲜民 129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了关于废除农业实物税的决定，同时还宣布合作社对国家的货币和实物欠款一律作废。

六十年代，人民福利有了增长。国民收入提高了一倍多。1970

年8月增加了职工工资，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五。社会消费基金也有所增长。

共和国的教育事业获得巨大成就。1970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约有工程师、技术员和其他专家五十万名。在1961年至1970年期间，高等学校的数量从七十八所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九所。共和国全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在各类学校受到免费教育。



1963年抱川江地区功率四十万千瓦的热电站建设工地

在科学方面也取得巨大进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69年，朝苏两国科学院签订了为期五年的科技合作协定。

在发展工业、实行农业技术改造和进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工农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和朝鲜劳动党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得到了加强；这乃是人民民主制度得以巩固的基础。

1970年11月举行了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前一次代表大会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执行情况。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党在第四次和第五次

代表大会之间所取得的十分重要的成果，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统一朝鲜的方针。1962年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30
最高人民会议向朝鲜人民发布了告民众书，提出了旨在消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几条建设性意见：安排南北朝鲜代表会晤讨论统一问题；在美国军队全部撤出南朝鲜之后削减南北两方的军队数量；签订关于互不使用军队攻击对方的协定。在以后几年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曾多次提过类似的建议，其中倡议组织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并再次提出在保存南北方现有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建立联邦的思想，以便在经过适当准备之后进行全国性的自由民主选举和建立（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统一的朝鲜中央政府。但是，汉城政权却顽固地一再拒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这些建议。

六十年代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共和国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忘我创造性劳动，以及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全面帮助与支持，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在本卷所论述的时期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朝鲜半岛有一个和平环境和存在社会主义影响日益增长的新的国际形势。

南朝鲜局势 对南朝鲜来说，六十年代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在此时期，美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剥削不断加重，日本垄断组织也在积极渗入。

1960年10月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执政的民主党许诺建设"全民幸福国家"。这一切并未能使国内状况有多少改变。在领导集团中仍然残留着一部分寄希望于美帝和依赖美帝的势力。与此同时，南朝鲜人民群众在1960年斗争过程中所取得的某些民主权利（建立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召开大会及举行游行等权利），却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并促

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生活。各种政党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1960年末成立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派，如社会主义党、社会大众党等等提出了符合南方广大居民阶层愿望的和平统一祖国的要求。劳动群众越来越相信，执政的民主党和第二共和国的首领们并不打算采取措施来解决这项任务，他们所许下的改善生活条件、消灭失业和根除营私舞弊的诺言是不可能兑现的。人民的不满情绪因此不断增长。同时，执政党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1960年10月至11月，汉城的大学生奋起深刻揭露执政党的反人民政策，并把矛头指向美国帝国主义。1961年2月，南朝鲜三千多名承建美国军事设施的工人在汉城美国大使馆前面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抗议美国侮辱朝鲜民族尊严的黩武行动。

在南朝鲜各居民阶层的发动中，要求和平统一祖国和同北方建立联系的呼声越来越坚决。1961年4月19日在汉城召开的群众大会有十万人参加。大会通过的宣言强调指出，政府根本无力解决民族问题，也无力保障居民的刻不容缓的切身利益。工人阶级是这场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不过领导恢复国家统一斗争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别。

131 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情况极其严重。赋税也越来越重。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和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的要求。罢工运动日益高涨。虽然在许多情况下罢工者的要求得到了全部或部分的满足，但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第二共和国的领导人实际上仍在继续执行李承晚的对外方针，他们拒绝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是，面对争取和平统一国家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他们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以缓和紧张局面。执政当局答应削减军费和裁减军队。然而，南朝鲜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对此深感不满，蓬勃发展的人民运动和劳动人民的高涨情绪使他们惊恐万状。

1961年5月15日夜间，南朝鲜爆发军事政变。政变是由南方

的反动势力和它们的美国后台策划的。以少将朴正熙——一个曾先后在日本和美国军队中受过训的极右军阀集团的代表——为首的军人夺取了政权。第二共和国的领导人对密谋者未予抵抗。更有甚者，尹谱善总统竟然也参与了政变。政变发生四天后，美国当局即宣布承认南朝鲜新政权。

军阀政权借口反共产主义，取消了原来就极其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宣布实行戒严，解散国民议会，取缔一切党派和政治团体并禁止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大约有二万名主张国家统一的人被投入监狱。

军阀政权除了采取恐怖手段外，还广泛进行蛊惑性的社会宣传。1963年10月进行总统"选举"。朴正熙当选为总统。11月"选举"国民议会，12月即宣布第三共和国成立。文官内阁开始行使职权。虽然政体改变了，但是掌握政权的仍然是依赖外国资本的大资产阶级。

新制度既不可能解决南朝鲜社会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也不可能解决政治矛盾。1964年，参加劳资冲突的工人达二十多万，在汉城和其他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反政府的发动。1964年6月3日，游行者提出了迫使朴正熙辞职的要求。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缓和国内矛盾，南朝鲜统治集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965年5月至6月，签署了一系列促使南朝鲜同日本接近的文件。根据"基本关系"条约，东京承认汉城政权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向南朝鲜提供了大量资助和贷款。

在日本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参与下，美国竭尽全力促成南朝鲜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以及推动其经济机制的现代化。外国资本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南朝鲜。

南朝鲜工业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8年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提高到了1969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工业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然而机器制造和冶金工业处于落后状态，加工工业部门

的基础仍然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过程迅速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金融公司，并有发展成为垄断组织的趋势。

132 南朝鲜依靠借贷发展经济：1969年，外债达到了约二十亿美元。

南朝鲜的农业仍继续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大多数农民的处境却仍然一如既往。1967年，耕地面积不足一公顷的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五。耕地面积为一至二公顷的中农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农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农村的生产力仍然十分低下。

虽然南朝鲜的政权获得局部稳定，帝国主义碍于朝鲜半岛两种制度的竞争而不得不对南朝鲜经济给予支持，以及汉城当局推行把恐怖手段同蛊惑性民族主义宣传和社会宣传结合起来的政策（这对人民斗争的规模起了一定的扼制作用），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未能使城乡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第四章

古巴共和国

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人民革命胜利后古巴实行了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革和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以及由于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政府一贯奉行不妥协的内外政策，致使华盛顿指望通过古巴内部反动势力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在岛上复辟半殖民主义旧制度的企图落了空。美国垄断组织、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开始广泛开展反对革命古巴的运动，它们除了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施加压力之外，还十分注意利用集结在美国境内的古巴反革命侨民的力量来策划军事破坏活动。在这些反革命渣滓中，许多人在过去曾经与独裁制度的镇压机关有过种种瓜葛，即当过巴蒂斯塔军队的官兵、警察等。1960年3月1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中央情报局着手从这些侨民中训练一支武装侵犯古巴的雇佣军。1960年12月，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始建立"反卡斯特罗阵线"。

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从外交上孤立自由之岛的措施。它试图怂恿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对古巴实行制裁。为此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初出访拉丁美洲。8月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举行了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会议。美国代表团采取了一贯使用的高压手段，使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圣何塞宣言"），宣布古巴为"受非大陆影响"的国家，这就是说它对西半球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构成了威胁。

这种干涉古巴内政的行动，在古巴人民国民大会1960年9月

2 日通过的哈瓦那宣言中受到了严厉谴责。

到 1960 年末，美国对古巴实行的经济和政治侵略，大规模策动的以诬蔑古巴革命及其领导人为中心的心理战，以及美国情报部门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已达到了极大的规模。1961年1月初，华盛顿正式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

古巴革命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消除日益增长的危险。为了维持国内社会秩序以及同消极怠工和形形色色的破坏活动展开斗争，成立了民警机关。在反革命匪徒潜伏的山区，有专门的山区民警行使职权。几乎全体古巴成年居民都被编入进行作战和爱国宣传
155 活动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各群众组织同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一起成了可靠的革命支柱。

1961 年 4 月 16 日，卡斯特罗在对哈瓦那劳动者发表演说时宣布：古巴革命属于社会主义性质。革命进入新的阶段的表现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阶层结成联盟对资本主义实行的专政。

古巴革命的过渡时期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此期间由“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运动（革命指导委员会）”三个革命组织对群众进行政治领导，它们联合在一起起着统一的革命政党的作用。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组织之间的团结不断加强，到 1961 年 7 月终于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合革命组织。

因此，在不断受到国内外反动派威胁的情况下，古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以“武装人民的民主”这一特殊形式建立了起来；除了人民对革命的信任以及革命领袖的政治威信和坚定的革命团结精神之外，这乃是促使对敌斗争顺利进行的一个主要内部条件。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声援和支持这一外部条件，在保卫古巴革命和促使革命蓬勃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苏联一贯忠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站在革命古巴一边。针对美国政府的经济制裁，苏联购买了古巴的糖，并向古巴提供所必需数量的石油。1960 年 2 月 13 日，签订了第

一个苏古1960—1964年贸易和支付协定。当时卡斯特罗称：该协定是古巴过去所签订的协定中最为有利的一项协定。协定不仅涉及贸易问题，还规定在发展工业方面给予古巴以技术协助和向古巴提供一亿卢布的贷款。

1961年初，美国帝国主义所酝酿的推翻古巴革命政权的计划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起先曾计划在古巴境内组织所谓的“游击战争”。该计划的基本设想是：指望通过国内反革命势力在城市所进行的暗中破坏活动和在农村进行的土匪活动，以及由于封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将会引起群众普遍的不满和惊慌，会促使工人中间反对派人数的增加和革命军队的瓦解。然而，中央情报局却不得不放弃这个方案，因为，恰如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常务局长的柯克帕特里克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卡斯特罗政府在工农兵中享有特殊声誉，而真正反对革命的人只存在于有产阶级之中，况且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大多数都已离开古巴。”

因为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游击战争”的前景难以乐观，故而决定仍改用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3月17日提出的计划，转而采取公开进行武装干涉的办法。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制订了所谓“冥王星战役”，其实质在于派遣雇佣军在吉隆滩地区的猪湾沿岸登陆，侵占古巴的一部分领土和建立傀儡政府，美国拟立即予以承认并从各方面协助其推翻古巴革命政权。在中央情报局教官的率领下，大约有六千名古巴反革命侨民在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营 156
地“受训”。从2月24日至27日，五角大楼的特别使团对中央情报局的雇佣军旅进行了检阅。直接负责“冥王星战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和副局长比塞尔肯定地对肯尼迪总统说，在美国军队不参与的情况下“冥王星战役”也将取得胜利。尽管如此，在1961年4月17日发动的武装干涉中仍有二十名美国飞行员参与其事。

一千五百名雇佣军在古巴境内登陆一事引起了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愤懑和抗议。

1961年4月18日，苏联政府坚决谴责这次干涉行动，声明：

"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样决不会置古巴人民的灾难于不顾，在古巴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中苏联将给予一切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古巴全国都奋起保卫革命。白宫耗资四千五百万美元所筹划的"冥王星战役"就此归于彻底失败。不到七十二个小时，雇佣军即全军覆灭。

但是，此时华盛顿已经在制订扼杀革命古巴的新计划了。

1962年1月末，在埃斯特角召开第八次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协商会议。美国在会上强行通过了一项关于把古巴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和拉丁美洲国家断绝同古巴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的决议。2月3日，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贸易禁运。美国政府粗暴地践踏国际法准则，要求依附于美国资本的国家停止向
157 古巴输入包括粮食和药品在内的任何商品。凡是驶往自由之岛的外国船只均不准进入美国港口。一些不听从华盛顿要求的国家受到了政治压力和各种经济制裁。

针对这个新的敌对行动，古巴人民于1962年2月4日发表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宣言严厉谴责反动势力对古巴革命成果的蓄意侵犯，揭露了美国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且重申了古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的决心。

美国政府并未停止对古巴的侵略行动。它更加频繁地从空中、从海上向自由之岛沿岸的居民点侵犯。由中央情报局组织和拨款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在埃斯卡姆布拉山积极活动。一次新的武装干涉正在准备之中。

面对当时的形势，为了加强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古巴政府根据同苏联政府所签订的协定在古巴设置了苏联的中程火箭。针对这个情况，美国从1962年10月22日起对古巴实行了海军封锁。在自由之岛周围集中了一百八十三艘美国军舰，弗罗里达州的十万名美军官兵和西欧的全体美军都进入了完全战斗准备状态。五角大楼补充征募了十五万名预备兵员入伍，并加强了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守备部队。

1962 年 10 月 23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些“前所未闻的侵略行动”，并警告说：“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苏联将给予最有力的回击。”

美国反动集团的疯狂政策使国际局势面临严重危机。人类濒临新的世界大战的边缘。苏联竭尽全力防止军事冲突。在 1962 年 10 月末至 11 月初举行的苏美会谈中，苏联在使美国作出不进攻古巴的保证之后同意从古巴领土上撤出自己的导弹和“伊尔一28”式轰炸机。根据这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美国于同年 11 月 21 日解除了对古巴的海军封锁，并停止了一切军事准备。然而，经济封锁仍未撤除。

古巴是在艰难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从 1959 年至 1965 年，古巴境内有一百七十九个反革命匪帮在活动。中央情报局加紧炮制从肉体上消灭卡斯特罗和古巴共和国其他政治活动家的计划。仅在 1960 年至 1965 年期间，中央情报局就曾参与策划了八次暗杀卡斯特罗的阴谋活动。古巴境内美国海军基地关塔那摩的守备部队对古巴进行挑衅的次数迅速增加(从 1962 年至1967 年超过了五千次)。古巴人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展开斗争，调动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击退外来侵略，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镇压国内的阶级敌人。在许多年内，古巴不得不一直保持三十多万人的武装部队保卫祖国。尽管保卫革命的任务面临种种困难，然而在六十年代，古巴还是按社会主义原则顺利地建立了新的经济基础，并改变了上层建筑的形式。

从 1961 年初开始，古巴开展了在西半球范围内规模和效果空前的扫盲运动。截至 1961 年 1 月 1 日，古巴共计有人口六百九十三万三千二百五十三人，其中九十七万九千二百零七人目不识丁。1961 年被自由之岛宣布为“教育年”。全国变成了一所大学校。成 158
千上万的人响应革命政府号召，自愿参加了“人民教师”队伍。这场规模巨大的运动在“每个古巴人都是教师，每座房子都是学校”以及“学习、工作和步枪”这些口号的指导下进行。在这场运动过程

中基本上解决了文化革命的一项主要任务，即消灭文盲的任务（到1961年末国内的文盲仅剩下百分之三点九）。

经济封锁给古巴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由于国家经济在革命刚胜利的头几年还未完全转向新的国外市场，因而国家所遭受的困难就更加严重。原料、备用部件和外汇均十分缺乏。许多有一技之长的资产阶级专家离开了古巴。在组织工作上也存在着某些缺点，有时则在管理经济的方法上出现了错误。卡斯特罗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些困难时强调指出："无庸讳言，我们在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着唯心主义的错误，而有时甚至不知道存在着我们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然而，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过程中的主要困难，还是殖民地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整个落后的古巴经济，以及美国垄断资本长期控制古巴经济所造成的后果。

1962年，联合革命组织改组为古巴统一社会主义革命党，1965年10月3日又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共产党确定以民主集中制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作为活动的基础。菲德尔·卡斯特罗当选为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1975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随着共产党的建立，古巴革命获得了必需的政治武器，它将保证革命的历史过程不断向前发展和工人阶级及全体劳动人民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的实现。"

古巴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过程具有一系列特点。多少年以来，农业一直是自由之岛的经济基础，因而在1963年制订的近十到十五年内古巴经济发展纲要中，对某些主要农业部门如蔗糖生产和畜牧业给予最大关注。工业在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方面则起着杠杆作用。因此，在古巴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时，决定首先建立高度发达的农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建立大规模的机器制造业。之所以确定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是由以下一系列国内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古巴是世界蔗糖市场的主要供应者；全国拥有大量劳动力和主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农村；具有甘蔗和其他

农作物生长的最佳自然条件；此外，还由于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为古巴提供了必需的商品。

保证所制订的古巴经济发展纲要得到实现的主要条件，是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不断巩固。六十年代初，在第一次土改中未予剥夺土地的一万名富农已变成了国内革命的主要阶级敌人。在军事冒险行动彻底失败后，美国帝国主义和隐藏在美国的古巴反革命组织正是企图通过这些人来实现自己以后反对革命古巴的计划的。这些富农的庄园成了在古巴东部各省活动的匪帮们的避难所和反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心。

1963 年 10 月，古巴革命政府颁布第二次土地改革法令。由于土地法的实施，富农经济被消灭，占全部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十的土 159
地转归国家所有。法令规定：每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五卡瓦耶里亚（即六十七点一公顷）。虽然在古巴农村的社会结构中仍保存着私有成分，但其本质已经彻底改变：现在，私人成分的代表是那些过去最贫穷的农户。革命政府使贫农获得了向往已久的土地，因而拥有了可靠的革命保卫者。早在 1961 年，古巴就成立了全国小农协会。通过这个群众组织，共产党和革命政府推行自己的农村政策，帮助农业劳动者购买农业设备、种子和肥料，并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而全国小农协会也促进了党和政府的土地政策的实现。

人民庄园和合作社成了国家成分的主要经济单位。人民庄园是在过去的畜牧场和水稻种植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农业企业。合作化主要是在从事甘蔗生产的农民中间展开的。

除了农业中的私人成分外，一度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也存在过少量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百分之五）。1968 年，这一部分企业被收归国有。

由于在革命初期全部工业实际上已归国家控制，因而从 1962 年开始就有可能着手实行集中计划经济了。

尽管在加强国防、克服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杂过程方面耗费了大量资金，古巴的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从 1966 年到 1970 年，国民总产值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九，而 1961 年至 1965 年期间仅为百分之一点九。

社会主义古巴领导人为加强工农业的干部队伍所采取的措施，足以说明他们对改造国家经济所持的态度。早在 1959 年 11 月卡斯特罗最亲密的战友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就被任命为国民银行行长。1961 年 2 月，他又被任命为重新建立的基础工业部部长。切·格瓦拉在制订古巴革命的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64 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对制糖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其内容包括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和同时建设一批新企业，对收割甘蔗的各项作业实行机械化，并解决运输工具问题。革命政府为发展和完善国家主要出口产品生产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取得了成效：1970 年，蔗糖产量达到了古巴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即达到了八百五十万吨。全部农产品的总产量提高了。1969—1970 年的总产量比 1961—1962 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

到了六十年代末，古巴劳动者在发展电力、采矿、石油加工和化学工业方面，在修建生活住房和基本建设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受到了极大关注。1968 年，在古巴国民经济部门中工作的工程师数量就已超过了 1958 年的水平。

在革命后的十年内，古巴共产党和革命政府为提高人民福利
160 做了很多工作：彻底消灭了失业现象，实行了普及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扩大了保险和社会保障系统，降低了房租。下面的事实即是有力的佐证：1958 年，古巴仅有一所拥有十张床位的乡村医院，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已建造了四十七所共拥有一千三百张床位的乡村医院，除此之外，还建造了五十个在革命前不曾有过的农村门诊部。

同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在平等、互利和无私援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为古巴销售产品和购买必需的原料、粮食和工业品开辟了长期、稳定的市场，并保证使它能够获得贷款和科学技术援助。苏联是古巴最大的贸易伙伴：在1968年古巴的出口商品中苏联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三，在进口商品中占百分之六十点九。苏联给予古巴以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倘若没有国际上的声援，没有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尤其是伟大的苏联人民对我国劳动者的坚决斗争所给予的支持，那么，面对实际主宰着我们西半球各族人民命运的强大而又残忍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古巴革命者就只能注定象巴黎公社社员那样英勇牺牲，而不可能取得胜利。"

反动力量并未能使古巴屈膝投降，也未能把古巴历史拉向倒退。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就证明，美国所推行的孤立和歧视自由之岛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卡斯特罗在1980年12月召开的古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甚至当我们处在美国帝国主义虎口之下的时候，也并未被它的强大力量所吓倒，也未被它的财富所迷惑。我们没有接受它的思想，它的行动也未能使我们动摇。"

第二编

1961—1970年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五章

美洲和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63

六十年代，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在国际舞台上，两种对立体系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激烈斗争。这种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决定着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它使资本主义总危机愈演愈烈，使力量对比变得更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在同社会主义进行的历史性较量中，资本主义在各方面都遭到失败。这反映出某些崭新的因素，表明社会主义体系正以不可抗拒之势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这就为加速全世界的革命进程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动力。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国际地位的加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深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这种危机在五十年代末就已进入第三阶段。

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是上述进程的又一有力例证。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的过程十分迅速。六十年代，在原先

的帝国主义外围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不结盟国家运动取得了显著成就。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使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日益缩小，使资本主义采取社会手段解决世界历史发展向其提出的复杂问题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帝国主义在本章所述时期内奉行的外交政策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证据，证明帝国主义反动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美国继续扮演帝国主义反动派主力的角色。美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干涉别国人民和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迫使它们奉行符合美国心意的政治方针。印度支那便是美帝国主义实现其侵略图谋的主要地区之一。在那里，美国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发动了公开的武装侵略。

资本主义竭尽全力想稳住自己的阵地，阻挡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领导下实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视为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手段。

同五十年代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一体化是通过建立军事集体体系来实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其中的主要军事集团。经济一体化则是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类型的排他性国家垄断组织来实现的。在本章所述时期内，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向心倾向和离心倾向同时并存，都有所发展。实行一
164 体化是为了联合资本主义力量以对付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所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原则上都是支持一体化趋向的。但这一趋势在其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却经常遇到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致使帝国主义列强建立共同阵线的一切努力徒劳无益。法国于 1966 年 3 月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组织就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军事政治领域的鲜明表现。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也缺乏一致的态度，这特别表现在，没有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参加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向越南派遣自己的武装部队。这是美国结盟政策的严重失败。

“共同市场”的活动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体化过程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这种排他性集团丝毫无助于克服其成员国之间的深刻矛盾。它的活动恰恰证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力图加强其在世界市场上同美国竞争中的地位。

科学技术进步是同核研究和宇宙研究的蓬勃发展，同电子学和化学的飞速进步，同生产自动化程序设计的广泛采用，以及同科技进步领域其他重大成果相联系的，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进程和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科技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突飞猛进，这大大改变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这在经济、政治、外交上都有所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以及出口和黄金储备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减少了。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形成了三个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个三角关系内部发生的种种变化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美国在同其竞争对手的残酷斗争中依然保持了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至关重要的地位，继续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动，而且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工业，而且涉及农业和服务行业。生产和资本的聚集和集中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在实力强大的部门垄断组织不断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大型公司——由生产过程各异、产品各不相同的一大批企业联合起来的混合联合公司。通过美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垄断过程，尤其是工业生产垄断过程加快的趋势。1950—1954 年在美国实行联合的企业一千四百二十四家，1960—1964 年为四千三百六十六家，1965—1969 年增至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三家。在法国，1967 年私有企业合并的数字比 1956 年增加了一倍。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这种超级垄断的现象。至七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二十五家最大银行的资产总

165 额超过二千六百亿美元。在美国，拥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的银行所掌握的资产约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二。

超级垄断化产生的结果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控制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极大的政治权力。垄断组织与国家相结合的过程迅速发展，其表现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国家投资平均达到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国家垄断性质的加强助长了经济的军事化。在本章所述的十年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开支急剧上升。1960—1968 年期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仅直接军事开支一项就超过八千亿美元。军事化已成为资本主义大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在美国，是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战实际上已经停止。此种干预无所不在，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趋势。

同过去相比，六十年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空前扩大。国家补贴和国家订货，尤其是军事部门的订货，科研拨款，对经济发展的国家垄断调节和规划——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基本形式。

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它又使生产关系领域中极为尖锐的冲突再次爆发。在科技进步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生产社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私人占有这种生产成果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人民实质表现在，科技进步的一切成果都被垄断资本用于获取最高利润和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在本章所述时期内，虽然资本主义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但是各公司的利润却不断增长。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新现象的发展向人们提供了无可辩

驳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发生的过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无论是科技革命的成就，还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包括种种"反危机"措施，——任何办法都不能使资本主义摆脱不治之症。

危机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不稳定)的加剧，因实行生产自动化而更形严重的经常性失业现象，通货膨胀——这一切都推动着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反垄断斗争的发展。统治阶级比五十年代更加起劲地力图利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炮制的"人民资本主义"、"普遍福利国家"、阶级斗争"熄灭"等理论来对付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美化资本主义的图谋 166
是毫无根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急剧发展，罢工运动方兴未艾。五十年代中期，每年参加罢工的人数为一千三百至一千五百万，六十年代已超过四千万。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斗争发生了重要的质变。反战运动已成为群众性运动。在资本主义的堡垒——美国的整个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反对政府侵略性外交行动的广泛发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从未停息；黑人骚动席卷了美国几十个大城市。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罢工参加者越来越多地提出政治要求。甚至纯经济斗争也越来越多地具有政治内容，采取的行动方式是把矛头指向整个垄断资本，指向代表垄断寡头利益的资产阶级国家。

在进步力量和国际反动势力进行尖锐斗争的复杂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共产党发展壮大了，它们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加强了。

这些过程和现象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深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更加动荡。这些现象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国家最为突出。

1. 美　国

六十年代的美国依然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它拥有强大的

经济和军事潜力，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的主要基地，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起作用，西欧许多国家和日本日益加紧迫使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和资本输出领域后退。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 1960 年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九，1970 年降为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由百分之十八点三降为百分之十五点四。在六十年代，美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又是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严重动荡的根源，国际关系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十年中，美国的行动曾多次在世界各地造成威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危险冲突。

1961—1970 年的美国经济 美国六十年代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在发展速度上存在不平衡和不稳定。1960—1961 年间出现了某种衰退，之后开始周期性的高速增长，这一增长持续到 1967 年，随后又出现了新衰退的初期征兆，这次衰退最后发展为 1969—1971 年的危机。1961—1966 年期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百分之七点九，而 1966—1971 年间仅为百分之一点六五。

这个时期美国经济的特点是军事化倾向日益严重。军事开支从 1960 年的四百七十四亿美元增加到 1970 年的七百七十八亿美元。军事订货对许多工业部门（飞机制造、火箭生产、通讯器材和仪表生产业以及纺织工业等）的发展起了刺激作用。到这个十年
167 (1968—1969 年)结束时，每十个工人中和每五个工程技术人员中就有一人在军事生产部门工作。军事生产和研究部门集中了全国五分之一以上的科学工作者。

同时，美国的失业现象虽然在某个时期相对地有所减少，但整个来说仍然保持增加的趋势。1970 年，失业人数为四百一十万，而 1960 年为三百八十五万二千。通货膨胀有所发展，1960 年同 1948 年相比，生活费指数上升到一百二十三，1970 年为一百七十。几乎整个十年中，联邦预算都有赤字。国债越积越多：1960 年为二千九百零二亿美元，1971 年上升为四千一百五十亿美元。美国

的贸易顺差从六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在减少，1970 年出现了八十多年来第一次贸易逆差，数额达二十亿美元。在整个十年中，除了 1968 年以外，收支一直出现逆差(1960 年为三十九亿美元，1970年为四十八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从 1960 年的一百七十八亿零四百万美元下降到 1970 年的一百一十亿七千万美元。

科学技术革命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工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过程自动化和劳动的动力装备率提高了。加工工业电力需要量按就业者平均计算，1960 年为二万二千四百一十三千瓦小时，1970 年为三万零三百五十七千瓦小时。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大量增加 (1955 年不到十台，1968年几达六万八千五百台)。微型电子计算机的年产量从1960年的一千台增加到 1971 年的一万三千台。工业固定基金大量更新：投资主要用于新建部门和现有部门的更新。机器设备费超过生产设施建筑费三倍，而在前项费用总额中，用于生产自动化的资金比重大大增加：从 1960 年的百分之十四增加到 1971 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在发展新兴部门方面有了重大进展。这些新兴部门都是同原子能生产、宇航研究、现有设备更新和新式设备制造有关的部门。总之，在加工工业中，新产品所占的比重 1960 年为百分之十，1970 年为百分之十九。

耗能量大的生产部门迅速增长。美国主要从中东、近东和拉丁美洲国家进口的廉价石油是保证这种增长的基础。到七十年代初，美国在租让的基础上控制了阿拉伯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和采油量的约百分之七十。美国加紧侵占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产地。美国在亚非国家的直接投资 1960 年为二十六亿美元，1970年为六十八亿美元。美国公司利用廉价进口石油，节约了大量投资。此外，对发展中国家石油资源的大肆掠夺使美国得以保持本国的石油储备用于战略目的。在石油进口量日益增长的基础上，美国的石油化学工业和塑料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十年中石油化工产品(标准纯产品)增长了一倍。同时，黑色和有色冶金业、运输机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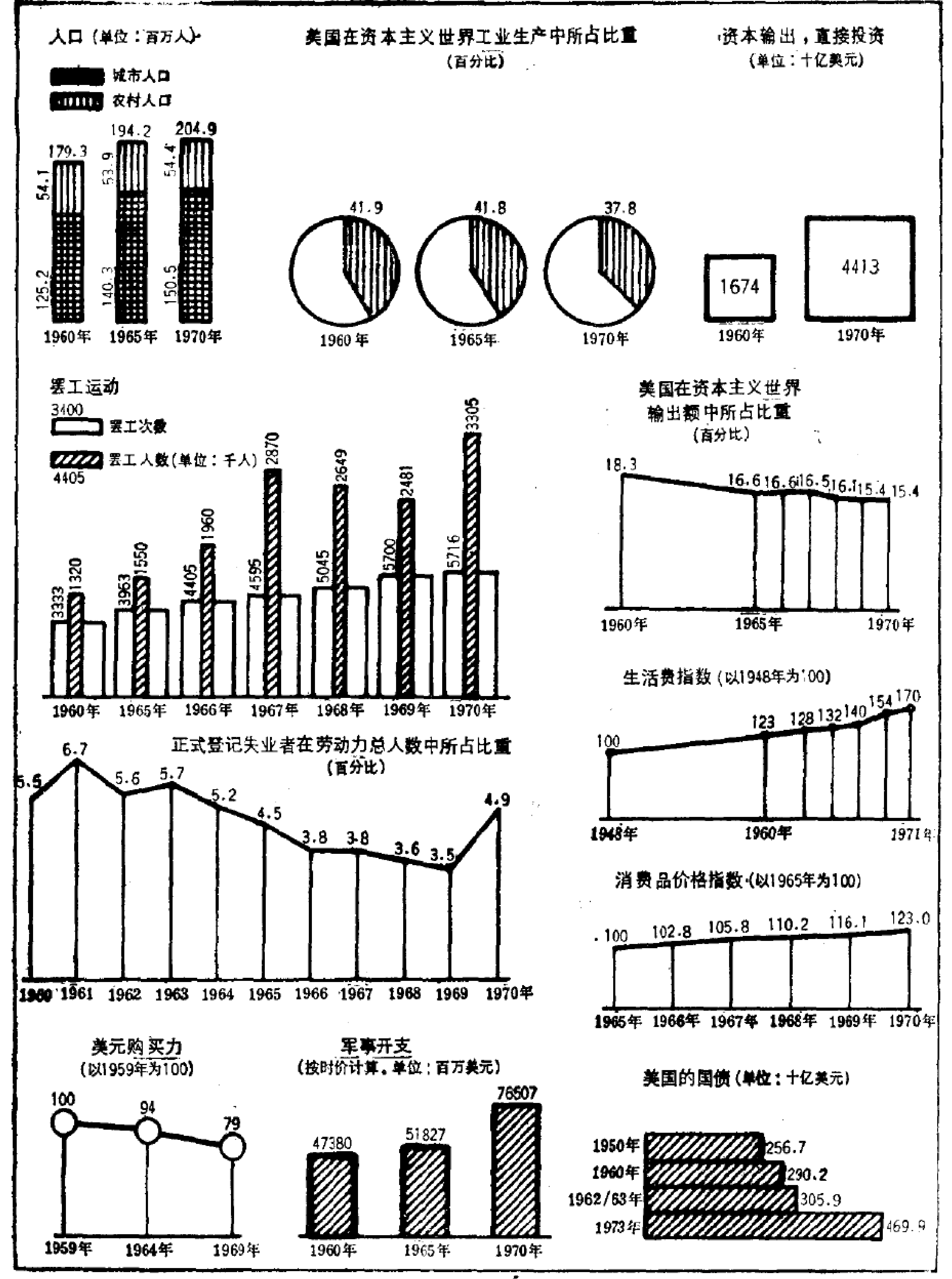
制造业和其他一些部门的比重有所下降。这证明，美国经济各组成部分之间缺乏有机的相互联系。非生产部门的迅速发展是本时期的特点。美国是第一个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非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过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

168 总的来说，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周期性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需求所决定的。实质上，这是一种军事通货膨胀式的繁荣，伴随这种繁荣而出现的现象是，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就已存在的困难更为严重了。

在本卷所述时期内，科学研究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对科学的投资总水平接近对加工工业固定资本投资的水平。这些拨款的主要部分用于核研究和宇宙研究，用于研制新武器。

在六十年代，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进一步扩大，证明垄断组织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继续增长。二百家大公司在加工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58年为百分之三十八，1962年为百分之四十，1970年为百分之四十四。一系列工业部门垄断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合并”和“吞并”过程也涉及到一些大公司。1970年，在美国十一家最大的煤炭公司中有九家(其产煤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被石油和钢铁大王所吞并。在此基础上，一种名为混合联合公司的组织迅速增加。而这种公司是在各公司资本向与本部门无直接生产联系或职能联系的新部门和领域进行渗透的基础上出现的。这样一来，单一的工业公司变成了多部门的混合公司，参加混合公司的各组成部分可继续保持各自在生产和销售条件上的差别，主要通过财政监督维持联合。跨国公司的作用不断增长，这种大垄断组织超越国家界线，控制它国的许多经济部门。跨国垄断组织是美国奉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支柱。它们打入别国经济，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支持当地反动集团反对进步力量和进步运动。在资本输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是跨国垄断组织国外业务的主要形式。1969年，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百个最大的公司中，就有六十六个是美国公司。它们在这一百个公司的营业额中所占的比

1961－1970年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根据原图译制〕

重达百分之七十三。

在美国，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国家的经济作用增长了。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通过经济和财政方面的立法调节措施，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例如，整个加工工业设备使用折旧(标准)期限从 1942 年规定的十九年减少到 1971 年规定的十至十一年。在某些部门减少的幅度更大，如航空火箭部门从十九年减少到六至七年。缩短折旧期限的目的是加速生产基金的注销，加速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无论设备折旧的优惠条件，还是"矿产消耗折扣"(在采矿工业部门）都是国家对私人企业的一种津贴补助形式。为了垄断组织的利益，对进口商品(日本的纺织品、西欧国家某些铸钢工业的产品等)规定征收高额关税，因为进口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导致了美国同类商品价格下跌。资本主义国家与垄断组织合作的形式之一是由国家出面收购商品和劳务，这就保障美国垄断组织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在这方面，绝大部分是军需品的收购。

170 实际上是继续把昂贵的国家财产无偿地（廉价）交给垄断组织。例如，在肯尼迪执政时期，通讯卫星的使用权就交给了私人企业，而这些卫星是由国家组织并拨款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的。1965 年原子能委员会把国家生产钚的大部分工厂卖给了垄断组织，并把原子反应堆交由垄断组织使用。在发生"铜荒"的 1965 年和 1966 年期间，国家把自己的铜储备削价卖给了大垄断组织。

在本卷所述时期内，垄断资本进一步加强了在国内的政治统治地位。大金融集团的代表人物成为总统的内阁成员，领导关键的联邦组织和主管部门。实际上，工业、商业、信贷、劳务领域、运输业大部为二十至二十五个金融集团所控制。领导这些集团的是美国金融寡头的核心——美国社会体系中同国家关系最密切、最有影响的阶层。这种国家垄断组织的头面人物不超过五千人。

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政策 1961 年 1 月就职的美国第三

十五任总统肯尼迪宣称其施政纲领乃是罗斯福总路线之继续。这个纲领得到美国自由派人士、劳联一产联工会系统和黑人的支持。

肯尼迪宣布的轰动一时的"新边疆"方针实质上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用最有效的手段来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国内政策方面，肯尼迪的出发点是，承认有必要进行某些迫切的经济和社会性质的改革。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提出对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理论和军事理论作一定的修改，使之符合世界力量分布的实际情况。但是，这个纲领在付诸实施时立即遇到了种种严重障碍。这在颇大程度上说明肯尼迪在民主党内的地位尚不牢固。肯尼迪之所以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是由于对南部民主党人作了让步，并许诺一旦在大选中获胜，将让他们的代表约翰逊当副总统。性格坚毅而又贪图功名的约翰逊力图扩大副总统的权力，这是符合南部各州支持他的强大垄断集团的利益的。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约翰逊往往和总统意见分歧。他主张在拉丁美洲国家采取比肯尼迪提出的纲领更加强硬的方针，主张扩大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他是主张武装入侵古巴一派当中的一员。而且，在国会中形成了一个由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参加的反动集团。这个集团坚决反对肯尼迪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各项提案，说这些提案是过于激进的，几乎是"社会主义的"。鉴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中力量的对比状况，总统没有同这个集团发生公开冲突；他随机应变，等待时机，指望通过例行的选举使国会的组成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变化。总之，肯尼迪的内政和外交路线并非始终一贯的。

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是肯尼迪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制定了克服经济危机和刺激生产增长的计划，其中包括如下措施：减少垄断组织所得税，缩短工业中主要
设备折旧期限，对大资本家实行一系列其他优惠办法。还规定适 171
当扩大国家对社会需要的拨款（向生活水平低于官方规定贫困线者以及失业者提供救济，采取缓和城市危机的措施，等等）。

总的说来肯尼迪的社会经济计划就内容而言并没有超越有限的反危机措施的范围。虽然如此，这项计划的实施仍然遭到垄断集团的坚决反对，因为它们对政府干预价格政策，限制垄断组织逃避纳税，增加失业补助金等措施表示不满。肯尼迪政府提交国会的多数法律草案或未获国会支持，或被否决，或被束之高阁。其中包括“公民权利法案”（关于美国黑人权利的法案）、向学校和经常遭受失业侵袭的地区提供援助的法案、向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法案等。国会也曾就某些社会问题通过一些决议，但为保证其实施所拨款项数量甚微。肯尼迪政府实行的社会措施只具有局部意义，并未触及美国社会制度本身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质。在这些措施当中包括关于提高最低工资及将该措施范围再扩大三百五十万人的法令；暂时延长领取失业补助金的最长期限：从二十六周延长到三十九周，以及若干其他措施。还曾试图使尖锐的黑人问题有所缓和。总统曾邀请黑人组织领导人到白宫共议美国黑人的处境，派遣政府军队前往奥克斯福德（密西西比州）制止种族主义分子的暴行，并声称将对伯明翰（亚拉巴马州）采取同样措施。然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肯尼迪的方针也不彻底，不坚决，因为他担心同南方各州有势力集团的关系搞得过于紧张。

肯尼迪政府积极干预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似乎旨在达成劳资“合作”。实际上，国家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居间调解活动带来的却是残酷的反工人政策。政府往往强迫罢工工人接受其强制性仲裁，这实际上等于在不利于工人的条件下停止罢工。例如，1962年的海员罢工，1963年的酝酿了几年的铁路员工罢工都被迫停止。塔夫特—哈特莱法（1947年）和兰德勒姆—格里芬法（1959年）仍然有效。

肯尼迪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虎头蛇尾态度以及他在工人和企业主关系紧张时期所持的反工人立场引起了许多工会日益强烈的不满。因此，工会没有进行多少重大的斗争来支持政府提交国会的法案，甚至对支援经常遭受失业侵袭的地区和增加公共工程拨

款等法案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偶然的。

同时，肯尼迪所选择的维护整个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并没有使这个阶级某些有势力的集团感到满意。肆无忌惮地追求超额利润的实力雄厚的公司对政府限制它们谋取私利的行径感到愤慨，因而反对实行这些措施。例如，肯尼迪不顾垄断组织已经宣布实行新价格的规定，下令禁止“美国钢铁公司”提高其产品价格。他公开表示，打算限制强大的石油垄断组织获取超额利润的来源，减 172
少它们原来以所谓“资源枯竭”为借口而享受的税收折扣。总统和南部资本家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是，他未经企业主的同意就提高了几类工人的最低工资。附设于商业部之下、为政府组织提供咨询的工商事务委员会是有相当势力的，它也拒绝同肯尼迪政府进行合作。大金融工业资本集团认为，肯尼迪总统执行反劳工政策不够强硬。但是，没有理由过于看重肯尼迪的反垄断主义立场。拥有百万家产的大资本家肯尼迪入主白宫是代表美国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同大垄断组织关系密切的人士占据着肯尼迪政府中的各个重要职位。肯尼迪需要并寻求垄断组织的支持，尤其是在面临总统选举的时刻。

肯尼迪的对外政策也和他的国内政策一样是前后不一贯的。他在正式讲话中一再表示赞成寻求同“共产党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同时，却迫不及待地采取加强扩充军备的方针。根据肯尼迪的提议，美国国会多次增加军事拨款。肯尼迪执政的三年中，仅在发展战略核力量方面就耗资三百亿美元。

六十年代美国继续修改其军事政治战略。这项工作在前十年即已开始进行。美国领导集团进一步认识到，在世界上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的条件下，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思想和“战争边缘”政策对美国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理论及据此而制定的外交政策是把主要希望寄托于美国可以无所顾忌地使用核武器而且它的领土不会遭到还击。在苏联研制成功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失去了单方面的优势，这是美国许多专门研究机构和官方文件所

承认的。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后又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是美国新的军事政治学说的制订者之一，他承认，“在双方都拥有相互毁灭能力的核对等条件下……‘大规模报复’战略已失去其作用”。

被称为“灵活反应战略”的一种新的军事政治战略认为，作为武装冲突形式的普遍核战争有可能被一系列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革命策源地的“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所代替。在这类战争中不能排除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新战略倡导人认为，核武器的使用将是“适量的”。泰勒将军公开声称：新战略的目的是：创造条件“使战争尽可能在远离我国海岸的地方进行”，使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不致“受到直接威胁”。

1962年1月18日，在有美国高级军政领导人出席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肯尼迪总统阐明了美国军事政策要点，概括起来是：不断增强导弹核力量；设法使任何一次政治冲突都能按美国的心愿发展，以便迫使苏联处于有可能被卷入同美国作战的境地。后一种思想是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的翻版，目的在于
173 制造对苏威胁，以便向它施加政治压力。此外，还规定要建立从事“秘密斗争和反游击斗争”的特种部队，实际上就是建立一支讨伐部队，用来对付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必须认为，这支特种部队是总防务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其重要性而言，它与我国防务中的其他两个重要因素——核武器和常规武装力量几乎可以并驾齐驱”。精锐的讨伐部队——“绿色贝雷帽”队部受到总统的特别重视，无怪乎人们称它是“肯尼迪的近卫军”。

肯尼迪政府曾经两次企图对社会主义古巴进行武装干涉。干涉计划早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就已制定；当时就在危地马拉的特种兵营里开始组建入侵部队。干涉的准备工作由中央情报局进行总的领导。肯尼迪总统在入主白宫后立即详细过问这一行动计划，并表示赞同和使之得以实施。

1961年4月，在全世界欢呼庆祝人类首次宇航成功之际，满载由古巴反革命流亡分子组成的干涉军先头部队的军舰开往自由的岛国。古巴反革命分子驾驶的美国飞机多次轰炸古巴领土。美国特种部队也已准备就绪，等待空降。

古巴人民响应革命政府的号召，奋起保卫祖国，保卫革命，歼灭了在吉隆滩登陆的匪帮。经过周密策划的入侵古巴的行动一开始就遭到彻底失败。干涉军先头部队的迅速就歼打破了中央情报局的如意算盘。

在肯尼迪召集的讨论当时局势的一次会议上，入侵行动计划直接领导人比塞尔（中央情报局）、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伯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空军参谋长怀特坚决主张美国空军立即采取行动，支援古巴反革命部队。但是，肯尼迪不敢贸然采取这一步骤。他不能不考虑到坚决维护古巴的苏联的立场。在肯尼迪、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实权人物之间第一次出现了严重分歧。

武装干涉古巴的尝试失败了，然而再次进行干涉的危险依然存在。后来的事态表明，再次干涉的准备工作正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只需寻找一个借口即可发动干涉。古巴政府采取的保卫国防的合情合理的措施——设置从苏联得到的中程导弹，被美国官方宣传机器说成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蓄意侵犯”。在加紧反古巴运动和加剧紧张局势的情况下，美国于1962年秋破坏国际法的一切准则，对古巴实行了海上封锁。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盟国的武装力量也进入战备状态。上述种种行动将世界置于爆发导弹核战争的边缘。国会、政府和军事部门中好战的反动分子的代表要求给古巴以毁灭性打击，消灭美洲大陆的这个“革命策源地”。但是，总统的亲信中不无理智的人士。在危机加剧期间，肯尼迪自己使自己处于窘境。他不仅没有制止狂热的反古巴运动，而且还用自己的言行为这个运动推波助澜。而在正式的声明 174
中，这位总统又力图表示敞开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的大门。事态

越向前发展,对于肯尼迪本人来说,这种“玩火”的冒险性就更明显。

苏联采取了保卫古巴的坚定立场,同时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冲突发展成两个大国的战争。在最后时刻,肯尼迪表现出足够的责任感和决心,没有使美国政策中的危险趋势占上风。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妥协性的和平解决古巴危机的办法,并承担今后不对古巴采取侵略行动的义务;苏联政府则同意从古巴撤出苏联导弹。

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导致国际局势日趋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肯尼迪政府在西柏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西柏林问题尖锐化是反动势力,首先是联邦德国军国主义集团的挑衅活动造成的。在国会紧急授予总统的特别权力的基础上,美国采取了动员措施。肯尼迪本人搞了一次示威性的西柏林之行。

肯尼迪任参议员时曾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使美国卷入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当时,肯尼迪在一次讲话中说,“把金钱、物力、人力耗费在毫无胜利希望的越南热带丛林里,是一件十分愚蠢而有害的事情”,因为“要战胜神出鬼没的敌人,要战胜受到人民爱戴和支持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但是,肯尼迪出任总统之后却采取了加紧从军事上干涉印支国家事务的方针。1961 年,泰勒将军、副总统约翰逊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奉总统之命访问了南越。肯尼迪总统在致南越统治者的信中表示了美国对他的支持。1962 年 2 月,美国驻南越军事司令部成立;美军部队开始直接参加对付南越爱国者的军事行动。但是,无论是美国武器还是美元都无法阻止傀儡政权的分崩离析。

肯尼迪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奉行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新殖民主义。在六十年代,美国同非洲多数年轻的民族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立了非洲—美国贸易和发展协会,作为美国资本打入这些国家经济的渠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拨款大量增加,把这种经济援助作为施加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根据肯尼迪的提议建立的“和平队”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和平队”由经过专门挑选的并受过周密训练的“志愿者”组成。他们被派到非洲、亚

洲、拉丁美洲国家，对当地居民进行思想灌输，同时执行破坏、间谍任务。

肯尼迪提出的“争取进步联盟”纲领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实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美国垄断资本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进一步强调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存在”。肯尼迪政府没有放弃对拉丁美洲国家内政的直接干涉和对反动独裁政权的支持，而是想把重点放在受它控制的不彻底的“改革”上，以便缓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在 175
古巴革命的影响下强烈要求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而“争取进步联盟”特别关心的是要削弱这种影响。然而，肯尼迪的纲领却根本行不通：拉丁美洲国家的反动集团反对这个纲领，因为他们不希望发生触动他们利益的任何变化；美国本国的有势力集团也不支持这个纲领，他们认为地主寡头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他们在拉丁美洲的最好盟友。

美苏关系在肯尼迪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由于美国按过时的“冷战”原则行事，这种关系一度相当紧张。与此同时，肯尼迪就任总统一年之后曾经承认：“我们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也非无所不知，我们不可能永远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余百分之九十四的人类，因此，每一个国际问题都由美国来解决是不可能的”。他认识到，“冷战”已成为美国经济、政治和普通美国人的沉重负担。在肯尼迪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通过和平和政治途径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思想越来越明确地反映在他的演说中。“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可能用军事行动来解决”——肯尼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肯尼迪在其 1963 年 6 月 10 日发表的演说中明确表示，为了实现同苏联关系的正常化，有必要对美国的外交方针作某些修正。他说，在现代条件下，“总体战没有任何意义”。关于苏美关系，肯尼迪强调指出：“无论美国及其盟国，还是苏联及其盟国，彼此都十分

关心公正的、真正的和平和停止军备竞赛”。美苏之间的武装冲突将给两国人民和全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这种认识最后决定了总统在六十年代初尖锐的国际危机时期的立场。1963 年签署关于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试验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是肯尼迪外交活动中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行动。

在肯尼迪总统任职的最后几个月，他同某些有势力集团的分歧更加扩大。在对他的政策表示不满的集团当中也包括实力雄厚的德士古石油垄断组织。同时，总统选举即将进行。肯尼迪获胜的把握极大。可是，1963 年 11 月 22 日，当肯尼迪周游全国进行竞选到达达拉斯市(得克萨斯州)时遭人枪击而死。

据美国报刊和许多调查证实，达拉斯悲剧不是偶然的插曲，并非如代表官方调查肯尼迪被杀案的沃伦委员会所说，是单枪匹马的刺客所为，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是力图把美国拉回到战后头几年内政外交方针上去的极右派势力广泛密谋的结果。

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纲领 约翰逊在肯尼迪被刺后入主白宫当上美国总统不是选举的结果，而是如美国人谈到类似事件时所说的那样，是“机遇”，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在 1964 年的总统选举(即肯尼迪准备参加的选举)中取胜。

这一时期国内形势的特点是右派势力活动猖獗。已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戈德华特领导的极右派的代表人物所控制的共和党的
176 选举纲领就是明显的表现。在垄断集团，尤其是南部各州垄断集团的强大靠山的支持下，戈德华特在共和党内建立了一个纪律极严的秘密集团，他依靠这个集团把自己的追随者逐步安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其中包括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职位。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戈德华特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尼克松和洛克菲勒，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戈德华特的竞选纲领清楚地暴露出将实行加强反劳工立法、停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这位共和党候选人主张继续奉行“实力政策”和“冷

战”政策。戈德华特的政治路线也得到民主党一部分反对派的支持。

在当时的形势下，约翰逊采取了笼络人心的手法。他依靠国会中的民主党多数于1964年8月(离总统选举还有几个月）通过了一项关于经济潜力的法案。这项法律将标志着“向贫困宣战”的开始。它关系到三千至四千万美国人。据官方估计，这些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为执行这项计划，国会在1964/65财政年度拨款九亿六千三百万美元（为执行约翰逊政府提出的五年社会计划总共拨款七百五十四亿美元，而实际需要为一千五百至二千亿美元)。

在选举中，约翰逊获胜，他得票四千三百一十三万张；戈德华特得票二千七百一十七万八千张。百分之三十八点七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选举结果，国会中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对民主党极为有利的局面：在众议院民主党占二百九十五席，共和党占一百四十席，在参议院民主党占六十八席，共和党占三十二席。

选举后公诸于世的新总统的计划取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名字：“伟大的社会计划”。计划宣称要解决美国的几乎所有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根据这项计划，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制度均属于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之列。大城市问题更被作为必须予以解决的重点。计划还答应要消灭贫民窟——滋生犯罪和贫困的温床，扩大住房建设，特别要为低收入居民阶层建设住房，要建立“模范城市”。

政府在实现计划的立法措施方面也是无懈可击的。根据经济潜力法，为低收入阶层青年组织了所谓“劳动队”。打算让这些青年人受一定的教育，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以便于安排他们的工作。但是，局部措施不可能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参加“劳动队”的人数毕竟是很少的。由于工会的坚决要求，加之受到日益扩大的罢工运动的威胁，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提高许多工种工人最低工资的法律。但是，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使工资的增加额迅速贬值。为执行“向贫困开战”所拨款项大部分都用于从事计划安排（如贫困

人口统计等)的行政机构的开支。

卫生保健方面的措施也收效甚微。国家负担六十五岁以上收入低的老年人的部分医疗开支。但是，得到此种救济者必须每年
177 交纳一定的医疗费，因此大部分贫困者和收入低的退休者都无法享受这种待遇。而且联邦当局拒绝为执行向最贫困居民阶层提供医疗服务的计划拨款。

承诺扩大黑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是"伟大社会纲领"的组成部分。而六十年代黑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是迫使政府在这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的原因。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曾通过一系列决议，在法律上废除了对黑人的某些歧视条款(雇佣、入学、租房方面)。但是，这些决议的实施却交由地方当局负责，联邦机构对此未建立应有的监督。

美国官方宣传机器断言，美国能够做到"既有大炮，又有黄油"。约翰逊说："虽然眼下我们还在越南打仗，但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然而，就在1966年，政府减少了对学校建设、卫生、社会保障、"向贫困开战"方面的拨款。约翰逊在任总统的最后时刻被迫承认，美国穷人的人数没有减少。

"伟大的社会"纲领归根结蒂是无能为力的。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加速了它的破产。

1964年3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约翰逊主持下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空袭的计划。计划包括有步骤地轰炸机场、桥梁、燃料库、工业枢纽等。

1964年8月初，美国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在越南沿海集结。8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明，硬说8月2日和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鱼雷艇袭击了(用麦克纳马拉的话说)停泊在北部湾越南领海以外的一艘驱逐舰和另外两艘美国军舰。根据这项声明，美国国会迫不及待地投票通过一项授权总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决议("北部湾决议")，从而批准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侵略。(1971年，在报刊披露了证实美国挑衅行径的五角大楼部分秘密文件之后，国会被迫撤销了"北部湾决议"。)

1964年8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城市就遭到美国空军的轰炸。从1965年2月初起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袭始终不断。每次空袭行动(目标选择、空袭兵力等)事先都由约翰逊亲自审批。北部湾挑衅行径逐步升级为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进南越。据美国国防部统计，美国在越南的驻军人数1964年为二万三千人，1966年为三十八万五千人，1968年为五十三万五千人。此外，参加干涉的还有美国"盟国"的军队：南朝鲜军队四万五千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总数约五万人。1964年开始轰炸老挝领土。

印度支那半岛成了美帝国主义试验新式武器、新的战争手段和方法的演习场。美国好战分子在越南使用了除原子武器以外的全部现代化武器，对和平居民广泛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化学武器；用脱叶剂对广阔的植被地带加以"改造"，使这些地带变成有毒的荒 178
漠地带，使人们普遍中毒。侵略者大肆屠杀被他们占领的居民点的居民；美军讨伐队在南越松密村所干的野蛮屠杀勾当是举世周知的。

1965年4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奉约翰逊之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领土登陆，因为那里的人民举行了反对反动军政府的起义。约翰逊在美国广播电视台发表讲话为这一干涉行径辩解时硬说，起义者胡作非为，结果使居民死伤多人。其实干涉的真正目的在于防止多米尼加共和国反动政权垮台，不让民主力量上台执政。

约翰逊政府对近东的政策旨在维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地位(首先是维护石油产地的通道)，颠覆阿拉伯国家的进步政权，削弱阿拉伯人民在维护自己切身利益斗争中的团结。约翰逊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方针，在以色列1967年6月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向它提供了广泛的经济和军事技术援助。

同时，在深深陷入越南之后，约翰逊认为，有必要避免在其他地区发生冲突，甚至有必要缓和一下同苏联的紧张关系。美国的外交方针有某些改变也和下列情况有关：当时苏联同西欧国家的关

系有所改善；这些国家的舆论支持苏联关于加强欧洲安全措施的建议。美国统治集团也不能忽视苏联同西欧国家扩大经济联系的事实。在1966年1月致国会的总统咨文中有一条，认为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减少税率限制。约翰逊政府外交政策的积极方面是签署了一些文件，如美英苏三国条约（1967年1月27日）（这项条约规定各方承担义务不把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实体射入绕地轨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7月1日）。

约翰逊政府是在其地位受到削弱的情况下投入1968年秋例行的总统选举的。主要原因是对越南的干涉。在对政府的内外政策日益不满的情况下，社会危机一触即发，国内政局不稳。作为国家首脑的约翰逊，其个人威信一落千丈。在1964年的大选中，约翰逊以压倒优势的票数战胜戈德华特，在开始其总统生涯之时，他曾作出种种许诺，大吹大擂提出过众多的施政纲领，而结束其总统任期时，却是普遍的失望。报刊指责总统有意欺骗选民，首先是在停止越南战争问题上。没有履行竞选诺言使他失去了青年和大学生的支持。原先靠拢民主党的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团体"美国人——民主行动拥护者"也反对约翰逊。这个团体在1964年大选中曾经积极支持约翰逊。

在民主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出现了许多派系，它们在党内争权夺利，竞相提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自由派提出的候选人是尤金·麦卡锡（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和罗伯特·肯尼迪（纽约州参议员，已故总统肯尼迪之弟）。中间派提出的候选人是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极右派则百般吹捧亚拉巴马州州
179 长、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乔治·沃利斯；在支持他的团体当中也有些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派别团体。

罗·肯尼迪实际上成了民主党内反对约翰逊的首领。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他，他在青年当中的声望有所提高。然而，美国劳联—产联领导反对罗·肯尼迪，原因是对他参加约翰·麦克莱伦参议院委员会（五十年代末）调查工会上层人士营私舞弊和各种违法

行为一事不能原谅。正当选举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之际，罗·肯尼迪被杀害。在当时的局面下，尤·麦卡锡的地位加强了。但他的纲领前后不一贯；他没有提出改善最贫困居民阶层状况的积极措施，没有抨击军事工业集团。休·汉弗莱成为民主党的正式候选人。他的弱点在于，作为副总统，他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负有责任，而他的纲领却同约翰逊的纲领没有重大差别。

在大选前夕，共和党的地位略占上风，因为它在竞选中成功地利用了民主党行政当局在内外政策上的重大失策。民主党内部分崩离析，与此相反，共和党的队伍却是团结一致的。理·尼克松被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

尼克松总统生涯的开始（1969—1970年）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美国第37任当选总统，是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开始领导国家的。越南战争旷日持久；近东的尖锐危机（美国对此负有大部分责任）随时都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新的战争，这要求美国进行直接干涉，以支援其盟国以色列。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声称，他的政府将力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同时致力于加强自己的“实力地位”。1969年的总统“国情”咨文说：“保障我国和平的战略将以军事实力地位为基础”。尼克松1970年2月在以“七十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平战略”为题致“国会与国民”的报告中，重申美国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的主张，进一步增强美国军事潜力的计划证实了这种主张。与此同时，报告也提出（虽然是有条件地）美国有可能接受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基础的想法，并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这项原则。

苏联奉行的、得到世界公认的始终不渝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苏联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进行的斗争，为改善苏美关系打下了基础。1969年和1970年，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初期，美国在放弃“冷战”政策方面曾经采取了一些步骤。1969年11月17日—12月22日，苏美两国代表在赫尔辛基举行谈判，讨论制止战略性军

备竞赛问题。1970年4月23日，苏联和美国向日内瓦裁军委员会提出禁止在海底设置核武器条约草案第三方案，1970年9月1日提出第四方案。

180 尼克松政府所以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目的在于为它在东南亚的政策遭到的失败作些“调整”。尽管驻南越的美军人数已超过五十万，但美国空军仍在不断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美国无法用它所需要的军事办法来解决越南问题。它不得不同意举行谈判并承认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是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尼克松在宣布向战争“越南化”政策（其目的在于把作战任务推给南越傀儡政权军队）转变之后，下令从南越第一批撤出美军二万五千人。1970年4月，美国和西贡军队入侵柬埔寨。6月，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美国被迫从柬埔寨撤军，但数百名美国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帮助朗诺政权。

同时，尼克松当局有许多严重的国内问题急待解决。改革社会救济制度，以便建立联邦的、全国统一的救济制度，本来是政府预定实施的一项重要举动。但1969年提交国会的有关法案——“帮助家庭计划”却长期搁浅。而越南战争经费却有增无已（1969年比1965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点六），这导致税额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变本加厉。

尼克松当局处境困难，因为共和党在国会不占多数。1969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比例在众议院为二百四十三：一百九十二，在参议院为五十七：四十三。

1970年11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对全体众议员、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和三十五名州长进行改选。这种选举的政治意义在于，对尼克松当局头两年的活动进行总结，对他的施政纲领执行情况作出评价。共和党和尼克松本人为了在选举过程中使国会中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作了很大努力。共和党企图利用“沉默的多数”（即美国居民中的中产阶级）害怕青年极端行动变本加厉、黑人斗争更加活跃和反战运动蓬勃发展的心理而把他们吸引

到自己方面来，但这种指望落空了。

在1970年中期选举结果中，共和党在参议院只赢得一个席位，而在众议院失去九个席位，并失去十一个州长职位。

1961—1970年的工人运动。共产党的活动 六十年代是美国社会政治危机继续深入发展的年代。相继公布的一个个政府计划许诺要建立“普遍富裕的国家”，实际上没有解决美国社会任何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一如既往，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条件仍然低于官方公布的贫困线；大量资金用于生产最新式武器，国家对社会需要的拨款越来越少。城市问题依然未能解决：住房十分缺乏，贫民窟成倍增长，犯罪和吸毒现象日益严重。据官方统计，仅从1960年至1970年期间，有记载的犯罪次数几乎增加了两倍。1960年严重犯罪案件为二百零一万四千六百起，1969年为四百九十八万九千七百起。“美国生活方式”的理想以及这种生活方式所特有的把“消费社会”当作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的观念变成了中间阶层看破红尘、不问政治的消极态度，美国青年一代精神空虚，反社会现象日益严重。

越南战争似乎把美国社会政治危机的各种表现都集中起来， 181
并加强了它们的相互联系。工人运动、黑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青年运动等各种重要形式的群众运动汇合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的反战运动。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证实说：“战争使美国人惶惶不安，破坏了对我们政府的信任，而我们的政府根本没认识到，哪些问题对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参加越南战争对解决任何一个国内问题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问题包括饥饿、贫困、对住房状况不满、教育制度中的缺点。

在这十年，尤其是后五年，美国工人运动又有新的发展。1960年发生三千三百三十三次罢工，参加人数为一百三十二万，1970年发生五千七百一十六次罢工，参加人数为三百三十万零五千。工人阶级要求国家增加对社会计划的拨款，要求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提高实际工资。六十年代几次最重大的行动是福特工厂工人于1964年举行了为期四十九天的大罢工；1967—1968年炼铜

工业工人举行了有六万人参加的罢工；1969 年美国东海岸码头工人举行的为期一百天的罢工；1969 年 底至 1970 年初通用电气公司各厂十五万工人举行的罢工；1970 年 通用汽车公司五十万工人举行的为期两个月的罢工。但是，工人阶级缺乏组织性，这对罢工有消极影响。工会的发展速度缓慢：1962 年 参加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六，1968 年 占百分之二十三。

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机会主义领导对工人运动危害很大。它奉行同企业主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合作" 的政策。以美国劳联—产联为主要代表的有组织的工会运动没有自 己 的、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影响之外的政治纲领。而美国劳联—产联中资产阶级化的上层是同资产阶级政党领导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实际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仍然坚持反共立场，支持对越南的干涉。

在美国劳联—产联第六次(1965年)、第七次(1967年)和第八次(1969年)代表大会上，该组织主席米尼及其追随者曾成功地使会议通过决议，支持政府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如果美国当局需要向社会舆论施加压力的话，它是可以依靠劳联—产联领导的。当举国上下对侵略柬埔寨义愤填膺的时候，尼克松曾求助于劳联—产联的领袖们。他对这个组织执委会成员发表讲话，并得到他们对政府在柬埔寨行动的支持。

六十年代，美国工人阶级还不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但是，正如美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所指出的那样，阶级斗争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舞台；劳动和资本的冲突越来越多地发展成为政治斗争。社会矛盾的加剧，黑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日益激进，对美国工人阶级不能不产生影响。事实证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进步力量正在逐步团结起来，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工会普通会员和劳联—产联上层之间的分歧在扩大。1968年 5 月脱离劳联的汽车和航空工业工人工会联合会(拥有近一百六十万会员） 和早在 1957 年就被劳联开除的

汽车司机和仓库工人工会(拥有二百万会员)于1969年5月召开 182
代表会议，会上宣布成立新的工会中心——工会行动联合会。会上通过了工会行动联合会纲领和章程。但是，新工会中心的活动没有得到开展。

“工会普通会员运动”是参加工会的劳动者对工会上层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自发的、分散的抗议劳联—产联领导路线的行动有时是有组织的。“工会普通会员”代表会议于1970年6月在芝加哥举行。与会者主张工会采取不受资产阶级政党影响的政治行动，主张加强维护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斗争。成立了“工会普通会员”全国协调委员会，并在各工业区成立分会。

劳联—产联领导站在支持干涉越南和美国整个反动对外政策的立场上，而许多工会组织却积极参加争取停止干涉的斗争和群众性反战运动。在主要的反战组织之一——争取奉行明智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中也出现了工会分会，这个委员会还在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和其他大城市成立了地方工会分会。1967年11月在芝加哥召开了争取和平的工会领导人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全国性组织、区域组织和地方组织的五百多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得到汽车和航空工业工人工会联合会、肉类罐头工业工会和屠宰业工人工会、缝纫工人工会联合会的支持。建立了全国常设中心。这个中心联合了全国拥护和平的基层和地方工会工作者。教师工会代表大会、西海岸码头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美国州县市机关职员工会联合会、电子和无线电工业工人工会等也都要求停止越南战争。拥有二十万人的纽约工会组织于1969年10月筹备和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战活动。1970年6月，十三个工会的领导人宣布成立争取停止越南战争全国工人委员会。

六十年代初，美国共产党和前一时期一样是在遭受警察迫害的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1961—1962年，美共被要求以“外国代理人”身分进行登记，并提交党员名单。1962年12月，华盛顿区法院以共产党拒绝登记的罪名判处罚款十二万美元。共产党的许

多领导人(亨利·温斯顿等)在那几年不经审讯就被关进监狱；四十多名党的工作人员被指控为“为某大国服务的特务”。



在纽约尤宁公园广场上举行的“五一”群众大会。
美共总书记葛斯·霍尔在发表演说。1962年

美国共产党人勇敢地顶住了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共产党得到美国其他进步力量的支持。在舆论的压力下，1964 年恢复了美共党员领取出国护照的权利；同年还取消了兰德勒姆-格里劳法关于禁止共产党员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条文。1965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承认规定共产党登记的麦卡伦法(1950年)不符合宪法要求。1967 年 12 月，以同样的理由取消了麦卡伦法禁止共产党员在军事工厂工作的条文。到六十年代末，“冷战”时期各项反共法的主要条文都已失效。共产党在对反动派的艰苦斗争中坚持
183 下来了。同时，美共继续贯彻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59年)的路线，顺利地开展了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了党的队伍。共产党在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和青年组织中的影响扩大了。党的领导人经常应学生组织、青年组织、学校和各界人士的邀请，作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报告和演讲，参加讨论会、学术会议等活动。破天荒第一次为共产党代表提供了发表电视讲话的机

会。共产党积极参加反战运动——游行、群众大会等。他们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反战运动，并在此基础上为建立所有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进行了斗争。1968年，在总统选举中，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在多数州里，他们没被列入名单。

制订新的党章，广泛讨论并通过新党纲的活动对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具有重大的意义。新党纲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分析了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论证了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所有民主力量反垄断阵线的必要性。第十八次(1966年6月)和第十九次(1969年5月)代表大会讨论了党纲草案。经修改后于1970年公布。在美共第十九次(1969年5月) 代表大会上，亨利·温斯顿再次当选为党的主席，葛斯·霍尔当选为总书记。

在加强党的思想工作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从1968年7月起开始出版党报《世界日报》；建立党校网。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吸收工人，特别是重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入党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共产党十分重视扩大自己在青年和黑人中的影响。1970年 2月，马 184
克思主义青年组织——青年工人争取解放联盟成立。这个组织的基础力量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活动的“杜波依斯俱乐部”系统。葛斯·霍尔指出，这些年美国共产党恢复了它从前失去的许多阵地，而在许多方面它的影响比过去更大。

1961—1970年的反种族压迫运动 在本卷所述时期内，美国黑人、印第安人、波多黎各人以及其他非欧洲人后裔的美国居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象过去一样，美国的黑人运动无论是组织上还是纲领上都不统一。这首先表现在社会成分的复杂性方面：参加运动的有各个阶层的人。同时，整个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教师的手中。

六十年代美国有很多黑人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黑豹”、全国洗礼教派国民大会(黑人资产阶级组织)、“黑色穆斯林”分立主义组织和一些极左派别。从1957年起就由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

导机构会议在黑人运动的发展中继续起很大作用。金迅速成为一致公认的黑人运动进步派领袖，金的活动反映了这个运动本身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为支持清洁工的罢工斗争而来到孟菲斯市(田纳西州)，受雇用的刺客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

六十年代初，黑人运动的矛头主要是指向种族隔离，其原则是采取非暴力行动(“自由进军”、“静坐罢工”等)。普遍采取的是“直接行动法”——对实行种族隔离的机关、企业、商店进行纠察和抵制。

从 1963 年起，黑人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伯明翰(亚拉巴马州)事件成了黑人开展争取自身权利的大规模进攻性斗争的直接导火线。1963 年 4—5 月，以州长乔治·沃利斯为首的亚拉巴马州种族主义当局对和平抵抗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血腥镇压。许多黑人(其中也包括儿童)遭到毒打，当局还使用了警犬和催泪弹。几千人被关进监狱。肯尼迪总统不得不警告亚拉巴马当局：要派联邦军队进驻该州维持秩序。种族主义分子的暴行引起了普遍愤慨；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抗议活动的在芝加哥有五万人，在底特律有二十五万人。8 月，六个主要的黑人组织向华盛顿进军，最后在林肯纪念碑前召开了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美国城市黑人住居区发生的武装行动是对种族压迫、无权地位和赤贫状况抗议的最有力的形式。1965—1969年，这种武装行动的浪潮席卷全国。1965年 8 月，洛杉矶瓦茨黑人居住区的起义是引爆武装行动的起爆剂。这次起义持续了整整一周；当局派了近二千名警察和一万四千名国民警卫队去镇压。

1967 年更是多事之秋。这一年爆发了一百六十四起武装行动，其中包括辛辛那提、布法罗、密尔沃基、纽约、明尼阿波利斯、亚
185 特兰大等城市，纽瓦克(新泽西州)和底特律等城的武装行动规模尤为巨大。在纽瓦克市起义遭镇压中，有二十六人死亡，一千五百

人受伤。在底特律，州长宣布了紧急状态。奉派前往镇压起义的有八千名国民警卫队和四千七百名正规军伞兵，而参加这次起义的还不到三万人。结果四十三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七千多人被捕。1967年，参加镇压黑人居住区骚动的国民警卫队和正规军士兵总数达三万二千余人。

1968 年 4 月马丁·路德·金的遇害激起了黑人骚动的爆发。1968年总共发生二百多起骚动。其中最严重的是发生在美国首都的骚动，为镇压骚动，政府投入了一万四千名士兵。派往芝加哥黑人居住区进行镇压的士兵和国民警卫队有五千人，派往巴尔的摩黑人居住区的有五千名。仅在 4 月份，就有六万名国民警卫队员和士兵参加了对起义者的镇压。在镇压过程中，有四十三人死亡，三千五百人受伤，二万七千人被捕。贫困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印第安人 1968 年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向首都进军，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进军参加者来到白宫，要求约翰逊总统听取他们代表的意见。但是，约翰逊拒绝同他们谈判，而且集会者被警察驱散。

在以后的几年，黑人骚动也未平息。据不完全统计，1969 年发生五百多起，1970年发生一百九十五起。据统计，六十年代参加武装行动的共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示威游行要求给黑人公民权的达一百多万人。

为了镇压黑人骚动，美国当局大肆动用武力。对国民警卫队 186
和某些部队进行了有关的训练，受训者达四十万人。担任镇压黑人居住区骚动任务的军队由隶属于五角大楼的特别行动司令部领导。这个司令部从联邦调查局获得关于进步组织、社会运动及其参加者等的详细情报。

六十年代黑人居住区的武装行动增加了美国黑人对本身力量的信心。同时，这种行动迫使美国统治集团采取了防止黑人问题进一步激化的某些措施：1964年通过了禁止在选民登记时以及在公共场所按种族特征实行歧视的公民权利法；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这项法律取消了对黑人选举权的种种限制，尤其是在南部各州

广泛实行的对黑人选举权的种种限制；1968年通过又一项公民权利法，这项法律禁止在出售和租赁住房方面的歧视（法律仅适用于用联邦资金建筑的住房，这只占住房总面积的很小一部分）。但是，这些法律没能解决整个黑人的问题，因为这些法律只是宣布黑人同美国其他居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其实这方面早已通过几项对宪法的特别修正案）。至于这些法律的实施则由地方当局负责，在种族主义分子占优势的地区，一般是办不到的。

黑人运动"政治化"是这个时期黑人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积极现象。黑人在工会中的活动日趋活跃，他们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反战运动。黑人参加各州立法会议的人数增加了：从 1962 年的五十二人增加到 1970 年的二百零五人。黑人被选进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人数从 1962 年的四人增加到 1970 年的十三人；1966 年美国参议院有了唯一的黑人参议员。1967 年，黑人当选为几个城市的市长。1970 年已经有四十个大城市的市长由黑人担任。

六十年代种种不成熟的而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如极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放弃积极行动和采取同当局妥协的方针）对黑人群众运动颇有影响。但是，采取恐怖手段也好，消极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在发展"黑色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长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也好，都不能实现黑人的真正利益。

政治上最成熟的黑人运动核心越来越确信，为了顺利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必须同美国的其他进步力量合作。黑人运动的分化过程影响到多数黑人组织。最大的黑人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发生了分歧。从前起过很大作用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转向极端主义立场，逐渐失去了过去在黑人青年中的影响。内部的分歧削弱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这个组织中，山头主义倾向占了上风。其目的在于发展纯黑人的企业经营，争取黑人区享有经济和政治自治权。

1966 年成立的"黑豹"组织也发生很大变化。这个组织成分复杂，除了学生以外，它还包括半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到六

十年代末，这个组织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同反 187
对美帝国主义的所有进步力量联合的必要性。1970年 9月，这个组织在费城举行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六千人。大会谴责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表示声援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黑豹”组织领导人声明，该组织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但他们对科学共产主义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

政府很注意“黑豹”组织的活动。当这个组织成为社会生活和反战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时，政府就对它进行残酷的打击。仅在1969年，该组织就有二十八名领导人被警察杀害，一百五十人被逮捕。

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 六十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蓬勃发展，后五年更具有群众性和战斗性。这个运动反映了美国青年一代对资本主义制度道德“价值”的失望，对统治集团反动的内外政策的抗议以及他们要求彻底变革的愿望。

就社会成分、纲领、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而言，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就整个运动来说，它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即它不仅维护青年和学生的特殊利益，而且为争取完成一般民主性任务而斗争，如停止美国对东南亚的干涉，为黑人争取公民权，等等。这种要求得到美国所有进步力量的支持。

杜波依斯俱乐部（亲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在提高青年工人和学生的政治觉悟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六十年代，在青年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十分活跃的同时，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新左派”运动的产生。这个运动不仅遍及美国，而且在许多其他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很普遍。这个运动思想的形成是与1962年“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代表大会通过“新左派”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即所谓“休伦港声明”有联系的。

“新左派”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大学生。他们的思想纲领是五花

八门的理论的大杂烩：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左的极端主义与改良主义，抽象人道主义与反共主义兼而有之，并存于一体。不过，这个运动有一个起积极作用的重要特点，即它的反资本主义倾向。

在较短的时间内，“新左派”经历了从自发的分散行动到认识到必须有一个符合其斗争要求和目标的组织的过程。“新左派”寻求社会对自己运动的支持也是它的一个具有肯定意义的演变。起初，他们选择最贫困的社会阶层，首先是半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作为依靠力量。“新左派”想以“到民间去”的方式建立“直接民主公社”。在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失败以后，他们又改变方针把重点放在劳动知识分子身上。认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六十年代末，“新左派”开始认识到，必须同工人阶级一道转向开展政治斗争。

188 “新左派”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能够团结分散的激进青年队伍的纲领，也缺乏其他的思想基础和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通过“新左派”的主要组织——“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这个例子，可以透彻地考察六十年代青年运动中发生的种种事态的过程。“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1962年在工业民主学生同盟的基础上成立的，在短短的期间内就发展成为拥有十万人的全国性组织。由于代表各种思潮和流派的人都可以加入“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组织既有毛派、托洛茨基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没完没了的辩论和内部斗争削弱了这个组织。但是，彻底的民主派逐渐得到加强；这个组织的一部分成员对马克思主义和同工业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越来越感兴趣。1965年举行的“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代表大会摈弃了反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与学生运动宗旨不相容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在1969年的代表大会上，毛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被开除出该组织。但在斗争战略和策略上的严重分歧并未消除。代表大会以后，“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成几派。

六十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主要采取非暴力方式（静坐罢课、和平示威等）作为对种族歧视表示抗议的手段，并在美国黑人和白人最贫困阶层中进行宣传工作。学生的行动主要出自道德动机和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等。1964 年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发动可以认为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这次行动的起因是学校当局禁止学生组织支持黑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抗议当局的活动迅即发展成为要求实行高校制度民主化，要求在大学实行言论和政治活动自由。

从六十年代中期大学生积极参加反战运动起，他们的行动便具有日益明显的群众性和战斗性。这个时期经常举行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反对美国武装干涉越南的抗议示威，在校园区不断发生学生罢课，激烈的骚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往往占领教学楼和行政楼，同警察发生冲突。在大学校园区的群众辩论会上，不仅针对侵略越南抨击了美国反动的对外政策，而且抨击了美国整个社会制度。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4—5 月）、加利福尼亚大学（1968年10—11月）和哈佛大学（1969年春）先后发生了规模最大的学生抗议越南战争的行动。1970年 5 月举行了有四百多所大专院校参加的全国性学生罢课。校园区爆发的行动遭到警察和军队的残酷镇压，不时发生名符其实的搏斗。

学生的行动得到学校教职员工的支持。这具有重要意义。

反战运动 反战运动是六十年代美国存在社会政治危机的明证，是各居民阶层对统治集团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不满的明显表现。
这个运动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群众性，它的弱点在于缺乏组织上 189
的统一，在于行动上的随和性和偶然性。反战运动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行动，内部存在许多不同思潮、组织和派别。这个运动各组成部分的活动只是在组织某一次群众运动——反战进军、抗议游行等时才进行相互协调。大学生和自由知识分子是这个运动中最为积极的部分。而整个来说，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个时期反战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停止美国对印度支

那的武装干涉。

1965年3月由密执安大学师生组织的美国对外政策问题辩论会为六十年代的反战活动打下了基础。这样的辩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扩展到全国各个学校。参加辩论会的人数往往达数千人之多。随着美国对印度支那半岛武装干涉规模的扩大，反战运动越出了学校的范围，参加反战运动的面也扩大了。反战活动的群众性日益广泛，参加示威游行、群众大会、“和平进军”等活动的人成千上万。运动逐年壮大，席卷全国。运动的参加者在高校系统后备军官军训中心和应征集合点设置纠察线，封锁为越南战争供应军备的垄断组织办事处。普遍销毁应征通知书以示抗议。1965年，联合了一百多个反战组织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委员会成立。

令人注目的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反战行动是1965年4月的“向
190 华盛顿进军”。参加者达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同年10月，美国九十多个城市发生反战行动。1965年11月，二十多万人参加了拥护和平者向华盛顿进军的行列。1966年，芝加哥、旧金山、底特律、克利夫兰、巴尔的摩等许多城市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抗议美国干涉越南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1967年春，反战运动的强大浪潮汇合成为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壮观的“向纽约进军”的洪流。1967年7—8月，反战行动采取了全国性运动的形式，即著名的“越南之夏”，参加者总人数达一百万人。同年10月，举行了全国注目的大规模的“向五角大楼进军”。当局把大批军队和警察调进首都来对付示威游行者。和平拥护者遭到警棍毒打和催泪瓦斯的伤害，成百人被逮捕。在五角大楼院外，手无寸铁的人们遭到特别残酷的毒打。

1968年4月和5月发生了一系列规模特别大的反战活动。1969年，反对干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继续加强。在4月5日和6日复活节期间，美国五十个城市举行了反战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在纽约有十多万人，在芝加哥和旧金山各有三万人。夏天，校园区一片沸腾。在享有特权的哈佛大学里，校长召唤来的警察

向学生占领的行政楼发起猛攻，并且逮捕了二百人。根据许多青年组织的提议，10月 15 日举行抗议越南战争全国日。近八十所学校的领导人、许多州长、六十四名国会议员支持这一提议。这一天，在纽约布赖恩特公园有十二万五千多人出席了群众大会。1969年10月 15 日的反战示威游行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

1969年的反战活动以大规模的“反对死亡进军”而告终。11月14—16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从阿林顿公墓开始的夜间游行，并举行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旧金山举行了群众大会。其他许多城市也进行了大规模活动。成千上万人参加了经常举行的反战性质的示威游行、群众大会和讨论会。1970年，反对美军入侵柬埔寨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4 月，二百多个城市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抗议活动。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美国人滚出柬埔寨！”政府动用了包括伞兵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军队来对付示威者。5 月，在肯特市和杰克逊市的大学校园里学生示威活动遭到开枪镇压。为了回击这种暴行，有五百多所大学和学院参加的全国大学生联合会号召学生举行大规模的送殡仪式。这一切使反战斗争更加白热化。在许多大学校园内，学生同警察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搏斗。

在华盛顿国会和白宫附近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反对越南战争群众抗议大会。美国首都活象一座兵营，调集来的军队达三万人。和平拥护者们把 5 月 31 日举行的战争阵亡者纪念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战活动：在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在迪克斯堡、布雷格堡军事基地，在波士顿地区的兵营以及在其他地方都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反战示威游行。开展了在反战请愿书上征集签名活动。在反对美国干涉柬埔寨声明上签名者当中，有国务院的二千多名工作人员。

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两院通过一项决议，规定该州公民有权拒绝参加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因而也是非法的越南战争。州当局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建议：宣布这场战争是与美国宪法相抵触的。191
与此同时该州检察官还请求最高法院批准向美国国防部长提出起

诉,追究其越权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

根据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各界人士支持)于1970年底开始了旨在缔结美越两国人民和平条约的直接谈判:全国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了河内，会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大学生和青年组织的代表。通过这次访问签订的协议文本一开头就庄严声明:“举世周知,美越两国人民不是敌人”。

美国报刊指出，在军人中，包括在印度支那的现役部队的军人中,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成立了许多反战军人组织:“反越战士兵”组织、“为战争担忧的军官运动”等。秘密出版的反战报纸在部队中流传，到七十年代末达七十多种。其中多数报纸的印数为五千至七千份,有的达到一万至一万五千份。

报纸报道了由于部队存在反战情绪而纪律松弛的现象，报道了士兵不服从指挥官命令、超假和开小差等大量事实。据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统计,在驻印度支那的军队中,擅自外出超过三十天者,1967年为四万二千余人,1968年为三万五千余人,1970年为七万余人。许多该应征入伍的美国青年宁愿迁居国外。

一批学者、法学家、实业家、宗教界人士参加了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1969年10月14日,以卡里根主教为首的一批神职人员到五角大楼院内作祈祷,并强烈谴责越南战争。军事警察逮捕了这一行动的所有参加者,其中也包括主教。1970年6月,全国科学院的三百名成员(其中包括八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呼吁尼克松总统在本年内从印度支那撤出美国军队。约翰·加尔布雷斯、亨利·摩根索、弗雷德·尼尔、詹·沃尔伯格、亨利·康马杰等著名科学家强烈抨击越南战争。代表纽约主要法律事务所的一千二百名法律工作者前往华盛顿,向国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美军立即撤出印度支那。实业界也组织了种种反战组织,如“工业管理人员反对战争”组织、“实业界人士争取越南和平”组织。1970年6月,公司经理争取和平委员会派了一百名代表前往华盛顿,建议政府采取停战措施。

反战运动对政界某些人士——国会议员、白宫显要人物、政府

成员也产生了影响。

六十年代美国和平战士是在困难条件下开展活动的。他们面对国家和国内反动派强大的精心组织起来的势力，经常不断地遭到镇压。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统计，一年中(从1969年7月至1970年7月)在示威游行中被逮捕的就有七万二千人之多。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经常监视进步组织，派人打进这些组织，进行特务、内奸活动，收买不坚定分子，从内部分化这些组织。尽管如此，在本卷所述时期内美国的反战运动在动员社会舆论反对统治集团侵略政策方面仍然起了很大作用。它加强了广大群众要求国际关系 192
正常化的愿望，对美国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

2. 加　拿　大

六十年代，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六十一(以1961年不变价格计算)，虽然生产上升时期也有明显的危机性衰退。六十年代末，加拿大的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七位(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三点二)，从全国人口数(1961年为一千八百二十万，1970年为二千一百五十万)来看，这证明它的经济发展是高水平的。石油化工、电子等新工业部门得到了发展。飞机制造业蓬勃发展。燃料，首先是天然气和石油以及非金属矿物的开采量飞速增长。六十年代末，加拿大镍、锌、银、石棉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一位，铀、钼、钛、碳酸钾产量居第二位。加拿大也是铜、铅、黄金、铁矿石、铝的最大生产国之一。

加拿大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首先是因为农业生产面向出口，因而取决于国外市场行情。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农场主的普遍破产。1961—1971年，加拿大的农场数减少了十一万四千个，即减少百分之二十四。这是因为农业人口在国家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十一点七下降到百分之六点九的缘故。佃农人数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种表现。

六十年代末，农场主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加强了。1969年夏，全国农场主联盟成立大会在萨斯卡吞市举行。这个联盟联合了加拿大七个省的农场主组织。这种联合的目的是维护农场主的利益，反对在食品工业中很有影响并力图控制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公司横行霸道。

对外贸易仍然是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出口额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十五点一(1960年)上升到百分之十九点七(1970年)。首先是大批出售小麦合同以及1965年美国加拿大汽车免税贸易协议促进了外贸发展。

六十年代，美国在加拿大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显著增长：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从百分之五十四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四点六，进口额所占比重从百分之六十七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一。而英国所占比重：出口额从百分之十五点八下降到百分之八点九，进口额从百分之十点七下降到百分之五点三。美国投资继续大量涌入加拿大。从1961年至1970年，美国投资总额从一百八十一亿美元增加到三百一十亿美元。到六十年代末，美国资本控制了加拿大百分之五十七的采矿工业和百分之四十五的加工工业。在这些部门的收入中，美国所占比重更高——分别占百分之六十一和百分之五十五。加拿大和美国经济一体化过程继续深化，而加拿大经济处于从属地位。

美国垄断组织在加拿大经济主要的和收益最多的部门中的霸道行径引起已壮大起来的加拿大资产阶级和各界广大人士日益强烈的不满。同美国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1957年6月起在加拿大执政的进步保守党从六十年代初开始
194 便由于约翰·迪芬贝克政府在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多的情况下执行外行政策而明显地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1962年6月18日举行例行议会选举。保守党人在竞选活动中主要吹嘘自己的政绩，同时指责自由党人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以莱·皮尔逊为首的自

由党人则指责保守党人实际上没有履行上届选举(1958年)前许下的主要诺言，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竞选期间正好国家外汇储备明显减少，迪芬贝克政府不得不让加拿大元贬值。反对党没有忘记利用这一点在选民面前把保守党搞臭。

1962年新民主党首次参加选举。这个党成立于1961年8月，它是为复兴平民合作社会民主联盟（这个联盟由于其领袖奉行改良政策而开始衰落）而进行斗争的产物。但是，从新党成立之日起，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全国最大的工会加拿大工人大会的领袖便夺取了它的领导权。因此，新民主党是按照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建立的。

选举结果保守党在众议院总共获得(二百六十五席中的)一百一十六席，失去了九十二席，只得到农业地区选民的支持。自由党则主要依靠城市居民的选票获得了一百席（1958年为四十九席）。新民主党在工会的支持下在众议院获得十九席（平民合作联盟有八席）。极右的社会信用党获得三十席，其中二十六席在魁北克省。这个省的地方党组织持法兰西加拿大民族主义立场。

社会信用党议会党团的支持使迪芬贝克得以执政。

1963年1月初，已退休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前总司令、美国的诺斯塔德将军访问了渥太华。他在当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加拿大明确表示承担义务接受美国核武器。这种主张显然和迪芬贝克的历次声明是矛盾的，在社会舆论和党内部分党员的压力下，他至今迟迟未就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在诺斯塔德之后，自由党领袖莱·皮尔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说，他放弃自己过去反对接受核武器的立场。在诺斯塔德发言之后，华盛顿采取了一项没有先例的步骤：1月30日，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诺斯塔德，实际上是指责加拿大政府首脑没有履行加拿大所承担的义务。

美国公开干涉加拿大内政，引起了迪芬贝克政府危机。议会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结果政府被迫辞职，并于1963年4月8日举

行特别议会选举。

在选举过程中，自由党人得到加拿大大资产阶级和美国的支持。因此，他们战胜了保守党人，在议会中获得一百二十九席（保守党获得九十五席）。

由莱斯特·皮尔逊组成的并在议会中得到新民主党议员支持的第一个自由党政府存在了两年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反美情绪日益强烈，这种情绪在美国对加拿大施加影响的传统堡垒——自由党内部也开始表现出来。

195 自由党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居民社会保障的措施。1964年12月15日，议会批准加拿大国旗，它取代了英国国旗"加拿大化"方案。尽管如此，在1965年秋举行的特别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人仍然未能获得绝对多数。他们在众议院中总共只增加了两席（从一百二十九席增加到一百三十一席），保守党人有九十七名议员。

魁北克问题是第二届皮尔逊政府碰到的主要问题。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争取在生活各个领域享有同英裔加拿大人同样的平等权利的运动日益壮大。分立主义者便加紧利用这一运动。他们在省内影响的加强威胁着国家的统一。1966年6月，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联盟在魁北克省重新执政。这个党的领袖采取了同联邦政府相对抗的方针。1967年，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失业进一步增加，引起通货膨胀，这就使局势更加恶化，加拿大联邦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也未能使这一局势缓和下来。

在准备新的议会选举的同时，加拿大两个主要政党都更换了自己的领导人。1967年9月，约翰·迪芬贝克的保守党领袖的职务由罗伯特·斯坦菲尔德接替。12月，莱·皮尔逊宣布了辞职。在1968年4月举行的自由党代表大会上，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当选为党的领袖，从而成为自由党政府首脑。他立即宣布，定于6月25日举行新的普选。

皮·特鲁多是法裔加拿大人，他首先主张加强国家的统一，坚决反对魁北克分立主义。同时，他向法裔加拿大人保证，他提出的保证法语同英语享有平等地位的措施将改善他们的处境。虽然特鲁多在他的讲话中不作具体许诺，但他的某些言论使人对发生某种变化产生了希望。在短短的时期内，他就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在青年中间。实业界人士认为皮·特鲁多在经济和金融问题上奉行保守政策立场，但因此也对其表示支持。

选举给自由党人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在众议院获得二百六十四席中的一百五十五席。1953年后，自由党第一次组成一个依靠议会中稳定多数的内阁。

皮·特鲁多在取得管理国家的大权之后，于1969年经议会批准实行关于两种正式语言法。规定法语和英语处于平等地位，在联邦内均可使用。此外，政府为了促进经济上落后地区，首先是魁北克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时，总理拒绝了魁北克提出的在社会经济方面赋予它以特权的要求。

工人运动的发展对1961—1970年期间加拿大的国内政局产生很大影响。在此期间，加拿大的职工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一，达到六百五十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参加了工会。加拿大绝大多数工会都是加拿大工人大会的成员。这些工会一般都是所谓"跨国的"美国一加拿大工会的分会，它们的总部和基本会员都在美国。美国劳联一产联对"跨国"工会的政策施加的反动影响以及"跨国"工会对加拿大工人利益的漠视，引起加拿大劳动者日益强烈的不满。他们要求在解决自己内部问题方面要有完全的自主权。

六十年代是加入纯属加拿大本国工会的国家和私人企业和机关的职员，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参加工会运动的时期。 196

劳动强度的增加和物价的不断上涨迫使工人举行罢工。1966—1969年期间，罢工运动达到特大规模。这几年，在罢工次数(1966年为六百一十七次，1969年为五百九十五次)、参加人数(1966年为四十一万一千人，1969年为三十万零七千人)和因罢工而损失的总

工时（1966年为五百一十万人日，1969年为八百万人日）方面都创造了空前的记录。

六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不同，在五十年代，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承认他们的工会和保障就业，而在六十年代首先要求的是提高工资。象过去一样，罢工斗争的中心仍然是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这里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动力。

共产党人站在加拿大劳动者争取自己切身利益，争取和平和民主斗争的前列。在本章所述时期内举行的加拿大共产党第十八次（1964年）、第十九次（1966年）和第二十次（1969年）代表大会上，深刻分析了加拿大政治局势、工人运动状况，并制定了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的具体纲领。

1965年，魁北克共产党（已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成立，这反映了加拿大共产党人为争取法裔加拿大民族自决权得到承认而进行的始终不渝的斗争。同时，共产党人谴责了削弱全国人民团结的分立主义。

加拿大共产党人一贯主张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的团结。

1961—1970年期间加拿大的对外政策首先决定于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身分以及加拿大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这在六十年代末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对外政策和国防问题上，加拿大对美国的依附达到危险程度，这在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期间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时加入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的加拿大空军在得到迪芬贝克政府同意之前就奉华盛顿之命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自由党人在1963年4月大选中获胜之后，8月就同美国签订一项关于在加拿大领土上布署美国防空导弹核弹头的协议。

加拿大在追随美国政策的同时，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甚至与美国相对立的立场。比如，它不顾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多次声明而继续保持同古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1961年5月，

肯尼迪总统访问加拿大时试图诱使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但美国的这种尝试未获结果，因为加拿大统治集团不愿意对美国强加给美洲国家组织的任何行动，其中包括对古巴的政策，同美国分担政治责任。1963年，加拿大总理皮尔逊对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关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国核力量的主张不予支持。1965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一再请求加拿大派遣军队支持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哪怕是“象征性的”也好，加拿大拒绝满足这一请求。

六十年代初，加拿大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意图，因为这会严重损害加拿大农产品，首先是粮食对英国的输出。

六十年代后五年，加拿大同法国的关系出现了麻烦。法国统 19
治集团对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运动蓬勃发展表示同情。在魁北克受到热烈欢迎的法国总统戴高乐于1967年7月以官方身分参观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时，在蒙特利尔市政府阳台上重复了地方分立主义者提出的一句口号：“自由魁北克万岁！”加拿大总理皮尔逊发表了不容许干涉加拿大内政的声明，回敬了这种做法。此后，戴高乐立即返回法国。在以后的八年中，加拿大和法国的关系一直处于低调状态。

加拿大舆论越来越坚决地主张加拿大奉行独立的外交方针。鉴于这种要求，皮·特鲁多在1968年6月大选前承诺修改加拿大对外政策，使之符合国家利益和变化了的世界局势。4月3日，皮·特鲁多宣布关于减少派驻北约驻西欧军队中的加拿大军队人数的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谈判也已开始。

约·迪芬贝克政府对苏联抱着赤裸裸的敌视态度。1963年自由党执政，加拿大的立场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66—1967年期间，双方议员和部长进行多次互访。然而，只是在皮·特鲁多政府时期才开始发展同苏联的睦邻与合作关系。1969年10月，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应加拿大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加拿大。

3. 英　国

英国的经济(1961—1970年)　六十年代，英国的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九点二(1961年)下降到百分之七点一(1970年)；同时生活费用年均增长百分之四，这在西欧大国中是最高的。

其主要原因是军事开支庞大(英国的军事开支一年达二十多亿英镑)，对垄断组织实行财政和减税免税优待办法，对民用经济部门投资不足。

从 1964 年 4 月 1 日起，国家一切军事经济和战略措施统统由国防大臣领导的国防部集中管理。所有三个军种部保留原有职能，以司一级单位并入国防部。军事工业家的利益不仅同高级军官、许多议员和部长的利益，而且同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中心领导人的利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英国广泛流传着“军事工业科学政府综合体”的说法。

金融垄断集团地位的不断加强，是六十年代英国发展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到 1970 年年底，在世界上二百家最大的公司中(美国除外)，英国就有四十六家(加上两家英国荷兰公司)，也就是说，相当于联邦德国(二十五家)和法国(二十一家)的总和。资本集中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到七十年代初，英国总共只剩下十二家商业银行，而这些银行百分之八十的存款集中在伦敦六家清算银行手中。1967年夏成立的国营英国钢铁公司生产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三点五的钢。

198 尽管经济增长普遍缓慢，但是在原子能、宇航、电子以及其他最新的工业部门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到六十年代末，英国在原子能领域居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首。

六十年代同前几个十年相比，英国的农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保障国家的食品供应。但是，仍有约百分之五十的粮食需要依靠进口。

英国比其他殖民大国更善于适应殖民体系瓦解后形成的局面。例如，法国只能同自己从前的几个殖民地保持联系，英国则不同，它使几乎所有在其原殖民帝国区域内诞生的国家都留在英联邦内，同其中许多国家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经济关系的性质，继续享有很大的特权和利益。英国依然是"没有殖民地的宗主国"，它和过去一样剥削着被纳入它的经济范围的许多已获解放的国家的财富。1960 年，英国在国外的投资达到六十五——八十亿英镑。到1969年底，英国在国外的投资仅次于美国，而超过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投资的总和。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拨款增加了，而提供援助的条件更加优惠。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巩固英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同时，英国本身又是美国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就美国投资总额而言，只有加拿大走在它的前面。

在六十年代，除了美元，英镑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货币。英国在最大的国际货币联合组织——所谓"英镑区"中居于统治地位。

总之，虽然英国经济中存在许多消极现象，但是它在经济上仍然处于比较强大的地位。

1961—1964 年保守党政府的政策。1964 年的议会选举 1963 年秋季起在英国经济中出现的繁荣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对保守党统治的不满情绪。1964 年 9 月，英国的失业人数下降到最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三十四万一千人。

在例行的议会选举前一年半，保守党政府就增加了失业补助金和寡妇养老金拨款，扩大了住房建设和消灭贫民窟计划，增加了公路建设、大学教育经费，等等。这一切又通过宣传报道大肆渲染，自然会对选民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过，保守党的另一些行为对群众的情绪同样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影响。在英国开展了反对政府外交方针的活动。从 1961 年春季起，伦敦便出现了群众性的"静坐罢工"运

动，抗议保守党奉行的核武装政策。在1962年3月24日的示威游行过程中，警察逮捕了一千一百七十二人，行动规模之大可想而知。1958—1968年期间每年都举行的市参议员进军和反战组织"争取核裁军运动"（有几十万成员）的活动成了英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109 麦克米伦政府在英国领土上为西德武装力量提供军事基地、导弹试验场、坦克部队训练营地和供应基地的决定引起国内民主舆论的强烈不满。1961年8月，联邦国防军第一支分队抵达英国。

在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令人忧虑的日子里，英国政府批准布署在英国并针对苏联的美国导弹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引起英国各阶层居民的猛烈抨击。国内对美国好战分子的行动和保守党的立场持否定态度是十分明显的，以致麦克米伦政府不敢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

就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展开的辩论对国内的政治情绪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961年初，英国多数大资本家就已得出结论：英国于1960年所建立的与"共同市场"分庭抗礼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有英国、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七个国家参加）不符合它们的意图和利益，必须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而不是共同体之外同竞争对手作斗争。

麦克米伦首相1961年8月2日在下议院讲话时也透露了他的政府在英国参加"共同市场"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政治内情。他肯定地说，西欧存在两个经济集团——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就意味着分裂，这种分裂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该放弃"岛国孤立主义"。

同时，一部分英国实业界人士反对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削弱英国在联邦国家中的地位。联邦中许多国家的政府坚决反对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意图。

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懂得，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不

仅有损国家的独立，而且会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国内已经出现的冻结工资水平和生活费用上涨的趋势可能还要加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会对就业问题和劳动人民的社会成果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令人十分担心的。

1962年，在布赖顿举行的工党代表会议上，它的领袖休·盖茨克尔批评了英国加入"一体化欧洲"的意图。他说："在欧洲合众国里，我们将不过是象得克萨斯或加利福尼亚那样的一个州而已——这意味着英国这个独立国家的末日"。但是，会议决议带有妥协性质。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给工党领导留有相机行事的余地。英国共产党针对这一点强调指出，工党上层人士只是主张讨价还价以便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获得"最佳条件"，而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决定也会给英国劳动人民及其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愿望带来沉重的打击。但是，与会议决议的炮制者——工党右翼领导人的意愿相悖，尽管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这个决议还是为实现保守党政府的意图制造了某些（尽管是暂时的）障碍。



无家可归的人在伦敦举行示威游行。1962年11月

最坚决反对保守党计划的是英国共产党。它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旨在加强对各国人民剥削的垄断组织联合组织。

200 由于英国人民普遍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使保守党政府不得不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领导机构是否接受一系列条件，再对这一问题作出最后解决。麦克米伦没有取得任何让步，又遇到法国坚决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接纳英国，遂于1963年1月中断了关于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

1963年4月举行的英国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英国统治阶级曾经准备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尝试的失败对英国帝国主义是一次空前严重的打击。然而，这却是英国人民与和平事业的胜利”。

“共同市场”问题在1964年选举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工党参加竞选时向选民保证，它不容许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保守党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引起英国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英国大资产阶级虽然十分敌视进步力量，但对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颇感兴趣。然而，英国统治集团无意利用大好机会来发展同苏联的双边关系。在经济和文化关系方面进展不大。1961年3月19日，苏英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协定在伦敦签字。同月，有六百家公司参加的英国工商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

1963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尝试失败使国内争取扩大对苏
201 贸易的运动得到加强。同时，相互竞争的各政党都在1964年的竞选运动中利用对苏关系问题，这也是显而易见的。1964年4月23日，英国和苏联签署了一项关于把1959年签订的贸易协定延长五年的备忘录。

1964年9月，签订了一项英苏贸易关系史上最大的合同：在苏联建设一座价值约三千万英镑生产特丽纶纤维的工厂。英国政府不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向苏联提供为期十五年的贷款。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在1964年的选举运动过程中，真正进行较量的是两个党——保守党和工党。它们的竞选宣言内容表明，在国内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它们很少存在分歧。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以及英国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和是否应该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问题以外，它们的纲领也几乎毫无二致。1964年9月18日，英国共产党执委会发表英国共产党竞选宣言。宣言指出，共产党的竞选纲领是反对大资本，主张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唯一能够保障和平的政策，主张广泛发展社会福利措施制度。

在1964年10月15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保守党遭到失败。同1959年的选举相比，保守党大约失去一百七十五万票。投保守党赞成票的约有一千二百万人，占选民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三（1959年为百分之四十九点四）。保守党在下议院获得三百零四席，而在上届议会中为三百六十五席。工党获得一千二百二十万票（比1959 202
年大约少一万票；同时投工党赞成票的百分比从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在议会中获三百一十七席。

工党的妥协性选举纲领（向右翼作出许多让步的结果）吸引了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但是，这种方针却使工党脱离了相当一部分工人，而工人是工党的主要社会支柱。

自由党在大选中获得三百一十万票，这一成就十分出人意外。自由党代表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主要问题上支持当时执政的工党的政策。如果英国实行比例代表制的话，那么根据选举结果，自由党在下议院获得的就不是九席，而起码是六十五——七十席。投自由党的票，这既是对保守党政策，又对工党政策表示抗议的一种特殊方式。

威尔逊政府的对内政策　选举后组成的哈·威尔逊工党政府实现了选举纲领中的部分诺言：退休金额有所提高，医疗制度有所改进，限制了房主对租户的胡作非为。同时，也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大资本的措施，其中包括向已收归国有的冶金企业的前企业主支

付赔偿费五亿八千万英镑。

在垄断集团的压力下，工党政府越来越积极地干预劳资关系问题。1964 年 12 月 16 日，政府、英国职工代表大会和企业主三方代表签署了一项“意向声明”，强使工会承担义务，消除“各种障碍以提高生产效率”并制止各种“制约行动”即非正式罢工和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其他措施。企业主也同意不任意提高价格。1965 年 9 月 17 日公布的 1966—1970 年“国家计划”，其核心是实行冻结工资的方针。

工党政府在价格和收入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目的在于恢复英国牢固的经济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却导致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

威尔逊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不仅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而且迫使它让英镑贬值。英国研究者戴维斯指出：“国家已经陷入了它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经济绝境。英镑贬值，竞选诺言未能履行，实行控制的主张威信扫地，而英国本身负债累累，挣脱无望”。工党政府未能使国家摆脱重利盘剥。而且，它不得不请求美国和国际银行再贷款三十亿英镑。

英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过程在继续发展。据《经济学家》杂志统计，1966 年，百分之七的英国纳税人拥有全部私有财产的百分之八十四。全部私有股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归英国百分之一的成年居民所有。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威尔逊内阁决定提前进行议会选举。在1966年 3 月31日举行的选举中，工党得票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九，保守党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九，自由党占百分之八点六。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进一步增加到八十四席。政府依靠在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203 中新的力量对比，加紧推行它的反工人政策。早在 1966 年 8 月就通过了价格和收入法。这项法律无视价格经常上涨的情况，规定冻结工资水平。

威尔逊政府在巩固其在议会中的地位之后，便改变了对欧洲

经济共同体问题的态度。1967 年初，威尔逊挫败了反对参加欧洲“六国集团”的内阁成员的公开抵抗。5 月，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发表声明：英国决定加入“共同市场”，同时加入欧洲煤钢联营组织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而且表示准备放弃工党领导 1962 年提出的多数条件。威尔逊警告说，不同意他所奉行的路线，尤其是在“共同市场”问题上的路线的部长们最好辞职。他这番不客气的讲话引起舆论界的强烈不满。身为英国首相，不是为了向反对党，而是向本党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人施加压力，以举行新的选举相威胁，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经过下议院三天的辩论，在保守党的支持下，政府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决定获得通过。下议院四百八十八名议员投票支持政府决定，六十二名议员反对，其中包括三十五名工党议员，他们是在不顾有可能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投反对票的。五十名工党议员在投票时弃权。

在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上开展的国内政治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任何一个工会组织能够对这场斗争袖手旁观。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工党左翼再次表现得软弱无力，他们对国家的需要毫无明确的认识，又没有同党的右翼领袖的外交方针作斗争的决心。这一切都更便于工党右翼领导施展种种手段，使党内反对派在很大程度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

1967年 12 月，法国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再次行使否决权，结束了针对英国打算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乌尔斯特事件　1968年年底，英国国内政局由于乌尔斯特（自 1921 年起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自治地区）事件而变得紧张起来。

1968 年 10 月 5 日，英国人通过电视目睹了在北爱尔兰大城市伦敦德里发生激烈冲突的场面：乌尔斯特皇家警察用橡皮棍和水龙头驱散和平示威群众。野蛮的镇压激起了北爱尔兰所有六个郡的义愤。

乌尔斯特事件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使得与世界帝国主义中心之一毗邻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反帝斗争基地。在这次冲突中，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地区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事件具有特殊意义。

由于从十六世纪起爱尔兰开始殖民地化，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大批移民在乌尔斯特定居，他们得到大片份地，成为当地地主——大地主的主要核心。这些移民是基督教徒，而当地居民却信奉天主教。这样就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方是土著居民——天主教徒，另一方是剥削者——基督教徒。第二次世界大
204 战后出现了促使矛盾深化的新因素，首先是经济方面的新因素。北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传统工业部门(造船业、纺织工业等)在战后开始衰落，新兴部门发展缓慢，因而造成失业人数增加。乌尔斯特的土著居民——处于少数的天主教徒在就业上受排挤，被解雇的往往首先是他们。天主教徒的孩子无权和基督教徒的孩子同在一个学校读书。土著的爱尔兰人居住在专为他们划定的街区——天主教徒居住区，他们的选举权受到财产上的资格的限制。在北爱尔兰议会中，天主教徒代表为数极少。

基督教的半军事半宗教式的组织系统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例如，奥伦治教团(北爱尔兰基督教徒组织，成立于1795年，根据威廉三世奥伦治亲王的名字命名。亲王是基督教徒，他于1690年战胜了英格兰国王、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的军队)通过其下属分团实际上控制了乌尔斯特生活的所有领域。教团成员反对在北爱尔兰进行任何民主改革。

六十年代后半期，乌尔斯特要求把英国其他公民享受的权利扩大到当地土著居民的呼声日益强烈。1967年，争取北爱尔兰公民权斗争协会成立。协会发表声明阐明自己的任务：明文规定乌尔斯特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个人权利，揭露各种滥用权力的现象，保证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个协会联合了几个反对党派的力量。它提出了一般性民主要求：取消宗教歧视，废除非常法。这

个协会团结了广大居民群众。

争取公民权运动是在伦敦德里开始的，因为在这里英国统治的一切弊端——歧视、失业、房荒、宗教争端等全都暴露无遗。

在伦敦德里流血事件之后，英国统治集团许下的改变乌尔斯特局面的诺言多半是一种策略上的花招。在消灭失业、根除就业和教育方面的歧视以及取消警察法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得到解决。英国政府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武力解决乌尔斯特问题。1968 年 8 月，英国军队进驻北爱尔兰。但这只能使斗争更加激化。

威尔逊政府的对外政策　工党从保守党继承的不仅是虚弱的经济和混乱的财政，而且还有遭到严重失败的对外政策。

威尔逊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于 1964 年 12 月初举行的谈判对于确定工党政府的外交方针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约翰逊表示愿意支持英国首相“加强英国在苏伊士以东地区”和非洲的地位的要求。英美两国就东南亚政策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美国继续在越南打下去；英国则在马来西亚同印度尼西亚的冲突中积极支持马来西亚。工党加强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和非洲的地位的政策，同从前保守党政府的帝国主义方针很少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政策的涵义在于，英国除了在欧洲和地中海承担军事义务以外，还应该在西南亚、印度洋、太平洋和波斯湾确保自己的军事存在。按照恢复英国在苏伊士以东地区作用的主张，英国必须加强其在 205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巴林的军事基地，并在印度洋和澳大利亚建立新的战略基地。这种主张的出发点是保障英国垄断组织在前殖民帝国中的利益，保持英国过去的那种在世界任何地区可以发号施令的世界强国地位。

但是，1967 年 4 月即作出决定：1970—1971 年期间英国驻远东武装力量将裁减大约一半，七十年代中期将全部撤出该地区。1967 年 11 月，工党政府发表声明：放弃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1971 年年底以前英国军队将撤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波斯湾的军

事基地，并将其部署于欧洲。1968年1月宣布"撤离苏伊士以东地区"，并将英国政策的重点转向西欧。

改变对"苏伊士以东地区"的政策的首要原因是，大英殖民帝国解体后，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也随之缩小，因此它要改变方针，同欧洲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就说明了这一点。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以及近东、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政策运动的高涨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1967年近东的武装冲突中，工党政府实际上是站在以色列侵略者一边的。但是，后来英国考虑到它自己在中近东的经济和军事政治利益，于是不得不采取比较现实的立场，甚至成为安理会1967年12月22日通过的决议的倡议者。这项决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工党政府支持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这引起了英国各界广大人士，包括来自工党内部的猛烈抨击。

在英国社会中，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问题上，立场最坚决、最积极的是英国共产党。它坚决主张英国奉行独立的和平政策，呼吁英国民主力量，支援英雄的越南人民。1965年在英国成立的英国争取越南和平委员会很快就发展成为有许多工会、和平人士和其他社会团体参加的群众性组织。1966年举行的英国职工大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同年举行的工党代表会议呼吁政府多方设法向美国施加压力，以便结束越南战争。在工会运动内部，对威尔逊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十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统治集团已无可能直接和公开地参加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行动。

工党政府一上台便发表一系列声明，目的在于强调英国将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新的主动态度。威尔逊首相宣称他打算同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人接触。在英苏关系方面一度出现过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领的

苏联代表团于1967年2月6—13日正式访问伦敦，这一行动本来应当起重大作用。但是，由于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工党政府对苏联采取了敌视立场。到1969年夏季，才有了转机。6月3日，英苏两国1969—1975年贸易协定签字。这项协定是无限 206
期的，因为它规定，只要一方不提前声明废除协定，便可自动延长协定期。

1961—1970年的工人运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白领工人”数量上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变化。由于非体力劳动者比重的增加，出现了工人阶级“组织化”的情况。国家职员的人数增加了。

六十年代英国就业总人数几乎没有变化：1961年为二千二百三十七万三千人，1971年为二千二百零二万七千人。但是，男工减少了八十三万七千人，而女工增加了四十九万二千人；农业和采矿业就业人员几乎减少了一半，同时，财政、科学和其他机关的职员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就组织程度而言，英国工人阶级超过许多资本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1970年，英国工会会员约占全体雇佣工人的百分之五十(美国为百分之三十，法国为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联邦德国为百分之三十点一，日本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六十年代，左翼力量的积极活动分子主要靠全国两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工会——机器制造工人和铸工工会联合会和运输与非熟练工人工会(拥有三百余万名会员)来充实。

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在战后头几年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高的，后来不断下降，到六十年代低于多数西欧国家。急剧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伤事故不断增加：英国生产部门每天发生的工伤事故不下二千起。六十年代后半期，只有同科技革命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两个部门——教育部门和科研机关的就业率有所增长。

六十年代，英国的罢工斗争有所发展。这些罢工是在十分复

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开展了广泛的运动来对付工会，其目的在于挑唆社会舆论反对工会，削弱工会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影响，把产生经济困难的责任推到工会身上。据官方统计，在保守党统治时期，罢工斗争的最高潮是1962年(罢工人数达四百四十二万一千人)和1964年(罢工人数达三百八十八万三千人，比1961年和1963年约多五——六倍)，而在工党统治时期最高潮发生在1968年(罢工人数达三百多万)和1969年(罢工人数为一百六十万零九千人)。然而，官方统计没有反映出真实情况，因为它没有包括自发性罢工，即未经工会领导同意的罢工。矿工、码头工人、机器制造工人和建筑工人的罢工占非正式罢工总数的四分之三。

在本卷所述时期内罢工斗争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劳动者打破了工党政府赖以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入政策。罢工斗争加强了工人的团结倾向，挫败了反共政策。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1968年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与非熟练工人工会决定取消已存在近二十年的禁令：共产党员不得在这个工会中担任经选举产生的职务。

207 **1970年的议会选举** 从1967年起，工党的地位日益恶化。它在地方的和议会补充选举中遭到失败。1967年4月，工党失去了从1934年起就在大伦敦地区议会中保持的领导地位。7月选举结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五十九个郡议会中，工党只在三个郡保持了自己的地位。在议员补选中，工党失去了九席中的六席，而在1968年，失去了十一席中的九席。1969年年底，在三百四十二个城市中工党只在二十六个市议会中保持了多数席位。党内出现了分歧。一批左翼人士——“新宪章运动者”提出社会主义宪章，要求实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计划，扩大经济的国家成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等。

工党领袖们忧虑地指出，群众对党的不信任日益严重。1969年当国家财经状况有所好转时，他们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指望再次获胜，继续执政五年。党的领导对1970年初生效的降低选举年

龄资格法(从二十一岁降低至十八岁)寄予很大希望。这项法律生效以后，选民中增加三百五十万青年人，工党领袖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1970年5月18日，威尔逊首相宣布，定于7月18日提前(工党政府任期还有一年)举行议会普选。

对许多人来说，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工党领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保守党获胜。工党比保守党少得一百万票(一千二百一十万票对一千三百一十万票)，也少于1964年和1966年的工党得票数(分别为一千二百二十万票和一千三百一十万票)。工党在下议院失去七十个席位。投票支持工党的只占参加者的百分之四十三(1964年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一，1966年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九)。在议会中工党得票只占百分之七，保持了十三席中的六席。同时，大批选民弃权：百分之二十八的选民(一千一百万)没有参加选举(1964年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九，1966年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不能认为，工党在1970年选举中的失败是左翼力量软弱的表现。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针对选举结果所发表的声明中强调指出，以威尔逊为首的工党右翼领导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它所奉行的政策与保守党大同小异，因而失去了广大居民的支持。

保守党在1970年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而1964年为百分之四十三点四，1966年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九，在下议院中比工党多三十个席位。

以爱·希思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受到伦敦商业区工业金融大王们的热烈欢呼：选举后的第二天，伦敦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大幅度上升。

1970年选举后组成的新内阁是大资本代表制的体现。在十八名大臣中有十二名大臣在上任前曾担任英国最大的工业公司和银行的总共四十八个董事职务。还有更多的大资本代表在下议院当上了保守党议员。一百九十名保守党议员同大企业有直接联系。

爱·希思内阁很快就表明了它的意向：加强英国对外政策的

军事方面，保持英国在国外的驻军，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积极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

208 4. 法　国

六十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　1961—1970年，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法国进行了工业结构的改造。国家对信贷和燃料资源的集中控制，为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把固定资金投入最有前途的生产部门，鼓励私人大公司活动和外国投资，降低并从1968年7月1日起完全取消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的关税壁垒，——这些措施导致了中、小企业的被淘汰和生产集中化的加强。到六十年代末，国内百分之一的企业集中了百分之六十一的流动资本。

在上述十年内，法国经济有了高速发展：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九。法国在这一方面超过了联邦德国，居西欧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象宇航工业、原子工业、无线电电子业和塑料生产这样一些工业部门都获得了蓬勃发展。法国建立了飞机和汽车制造业产品出口国的信誉，并扩大了黑色金属和化工产品的出口。但是，法国尽管增加了成品出口的比重，但是原料和半制品仍是它出口的主要项目。1960年颁布的《关于农业方针》的法令规定十年内要取消八十万个亏损农场。根据这项法令，只有那些收入稳定的农场才能获得国家信贷和税收优待，这就加速了法国农村资本主义集中化过程。到六十年代末，法国成了谷物、乳制品和葡萄酒的最大出口国。

同时，有高度生产发展水平的法国却仍然是一个外国劳动力，首先是地中海地区各国廉价劳动力的最大输入国。就利用外国移民工人的相对规模来说（约占全国自立人口的百分之七），法国居世界首位。

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　1961年1月6—8日，法国政府就"关于阿尔及利亚居民自决以及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国家政权直至

自决时为止"的问题举行全民投票，要求全民投票的参加者简单地回答"赞成"或"反对"。第五共和国的领导人打算利用大多数法国人民的肯定回答，以便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傀儡政府，使这个政府同表达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民意志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分庭抗礼。

全民投票结果，有一千五百二十万人投了赞成票，有五百万人投了反对票。

全民投票结果引起了那些仍希望法国保持对阿尔及利亚统治的"极端派"不满情绪的发作。1961年2月，法国殖民主义军阀和崩溃了的法西斯集团的代表人物在马德里组织了一个秘密恐怖中心——萨朗将军领导的秘密军队组织。这个组织得到了部分陆军上层人物、警察、反动政客和殖民主义分子的支持。4月21日夜，陆军叛乱分子在阿尔及利亚夺取了政权，并且开始以派伞兵在巴黎登陆来威胁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后来他们又成立自己的反对派政府，并宣布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成员"已被废黜"。法国共产党号召 209
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作好保卫共和国的准备，宣布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并着手建立保持警惕委员会。4月23日，戴高乐总统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宪法第十六条生效，该条文曾授予他无限权力，使他能采取形势所需的一切措施。4月24日，一千二百万法国劳动者响应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的号召，参加了反对叛乱威胁的全国罢工。全国开始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人要求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极端派"进行斗争。军队没有支持叛乱分子，叛乱分子开始惊慌起来。4月26日晨，叛乱结束。

但是，秘密军队组织并没有放弃实施自己的反动计划。这个组织秘密领导了一些反对民主组织的恐怖活动。法国共产党领导了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运动。1962年2月8日，法国劳动人民在巴黎举行了规模极大的反对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恐怖活动的游行示威。警察向游行群众开枪，有多人牺牲。为死者送葬成了法国人民反对秘密军队组织及纵容这一组织的当局的新的强大发动。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拖延阿尔及利亚战争已不可能。1962年3月18日，在疗养小镇埃维昂结束了法国代表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持续十个月之久的关于缔结和平的谈判。1962年4月8日举行的全民投票，同意了决定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埃维昂协议。参加全民投票的有一千七百五十万人赞成缔结阿尔及利亚和约，有一百八十万人投票反对。

1962—1965年的国内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高涨 1962年4月，其姓名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紧密相连的米歇尔·德勃雷政府下台。戴高乐将军委托曾长期担任洛布尔兄弟银行经理职务的乔治·蓬皮杜组织新内阁。

伴随新政府成立而来的困难，反映出第五共和国政权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增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引起危机的情况下，戴高乐将军曾是一个最受法国资产阶级各阶层满意的人物，尽管他们也批评他的政策的某些方面。随着战争的结束，当有争议的经济和对外政策问题被提到首位的时候，戴高乐的许多昨天的战友开始转为反对派。人民共和运动党只是在经过长期内部争论后才同意参加蓬皮杜政府。但在1962年5月，人民共和运动党的所有五名部长便已提出了辞职。几乎与此同时，曾对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及其领导经济的方法提出过批评的全国独立人士与农民中心宣布不再正式参加政府。“独立人士与农民”的四名代表以非党身分留在内阁任职。

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国家独立。“极端派”采取了新的恐怖活动进行报复。8月22日，一群恐怖分子在小克拉玛镇向戴高乐的汽车开枪射击。谋杀总统未遂，但这一事件却被戴高乐派利用来作为实现早就考虑好的修改宪法计划以便进一步加强总统权力的借口。由于这一计划在议会必然遭到失败，政府没有通过议会，而是委托总统把修改宪法问题提交再次
210 进行的全民投票表决。戴高乐追求权势的欲望引起国民议会大部分议员的愤怒，10月6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谴责蓬皮杜政府的

决议。戴高乐将军希望加强自己拥护者的地位，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决定重新进行选举，作为对谴责的回答。

1962年10月28日的全民投票批准了宪法改革，但投票结果表明国家元首的威望下降。与第一次（1958年）同样的全民投票相比，投赞成票的人数差不多减少了五百万。

11月18日和25日分两个阶段进行的议会选举，反映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的过程。在第一阶段选举中，执政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和法国共产党获得的选票最多，分别是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和百分之二十一点九。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第一阶段选举中共获得百分之十二点六五的选票后，由于需要在第二阶段选举中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于是在1947年分裂后首次同共产党人订立了一个选举协议。在不民主的选举法（多数代表制）影响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四十一席，社会党人获得六十五席，戴高乐的党——保卫新共和联盟获得二百二十九席。人民共和运动和“独立人士”的反对派失去了相当大一部分席位。

同1962年全民投票和议会选举有关的尖锐的国内政治斗争，影响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地位。它从原来支持戴高乐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建设性反对派”转为攻击现有制度的直接反对派。1963年6月举行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代表大会认为，“同共产党人一起在保卫民主的斗争中采取共同的防御策略”是可能的。

群众运动的高涨，对左派力量的接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旨在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来稳定财政状况的社会经济政策，遭到了坚决的反抗。1963年3月1日，因矿井亏损准备关闭而受到失业威胁的矿工首先开始了罢工斗争。随后，要求提高工资的其他矿工队伍也参加了罢工行列。支持罢工者运动的蓬勃展开，使政府未能实行强迫动员工人上班的决定。为资助罢工的参加者，全国进行了群众性捐款，许多家庭表示自愿暂时收留罢工矿工的子女。

阿尔萨斯的矿工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巴黎去，代表团的使命是向政府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矿工代表们在前往首都途中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抵达时又得到了巴黎工人和职员的支持。在巴黎马赛广场举行了声援罢工者的集会。全国都响起了“共同行动！”，“大家在一起！”和“必须团结一致！”的口号声。

211 戴高乐政权的农业政策也遭到了强烈的反抗。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改造农业，使它适合于垄断资本的需要。农民为表示对这一政策的抗议，拒绝纳税和出售农产品，并占领了一些省、市政府。

1964年5月14—17日，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动员国内左派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这两个斗争之间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并指出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及一切民主力量建立联盟的必要性。代表大会还提出，同社会党人达成协议，是党的首要任务之一。

1964年7月11日，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遭到了沉重的损失——长期领导共产党的法共主席、法国人民的忠实儿子莫里斯·多列士逝世了。法国共产党人在向多列士告别时宣誓：要为工人阶级的统一继续斗争。

劳动人民为保卫自己的权利采取的积极行动，有助于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国内最大的工会联合会之一)的左倾。1964年11月初，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改称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决议。

1965年的总统选举 1965年，戴高乐将军为期七年的总统任期已满。根据1962年的宪法改革，规定在12月举行的新选举应当使用直接普选法。

法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建议国内一切左派政党和组织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1965年6月，社会党代表大会赞同关于建立所谓“大联盟”的决议，这个大联盟应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激进派(激进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的共和党)、人民共和运动

和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一些小集团联合起来。在总统选举中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应当成为这一新的中派联盟的第一项实际措施，按照这一联盟发起人的想法，这一联盟以后可能转变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马赛市市长、社会党人加斯东·德费尔曾打算担任发起人的角色。但是，“大联盟”的主意却成了一个死胎：“社会主义”一词的本身就已使人民共和运动的代表们惊慌失措了。

在“德费尔试验”失败之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激进党接受了共和制度大会党（1964年6月在一些左派政治俱乐部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组织）关于建立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的建议。这个新的联盟于1965年9月10日建立，它是由共和制度大会党主席、一个不大的中左派政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

共产党考虑到自己的竞选纲领在必须取消个人专制政权的问题上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纲领是一致的，所以决定支持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的领袖作为总统选举中的候选人。

执政党阵营提出戴高乐将军为候选人。一共提出了六名总统



里昂劳动人民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美军撤出越南并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1966年10月

候选人。

在12月5日的初选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票。戴高乐将军和密特朗都进入了12月19日进行的第二轮选举。戴高乐以百分之五十四点四九的选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212 选举结果表明在克服左派力量的分裂方面有了好转，由于法国共产党在组织和团结各左派力量方面的积极活动，这种好转才成为可能。

各左派政党的接近，以及它们在总统选举中提出共同候选人，都在客观上有助于工会统一阵线的形成。1966年1月10日，国内两个最大的工会中心——劳工总联合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缔结了一个为保卫劳动者生活水平和加强工会权利而统一行动的协议。5月17日，根据这两个工会中心的倡议组织了全国"要求日"。在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1967年全国斗争日的规模更加广泛。

个人专制政权的反对派进一步壮大 1965年总统选举后，为了建立一个广泛的能把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各种资产阶级力量团结起来的中派政党，仍在继续寻找办法。1966年初，宣布成立了一个名为民主中心的政党，这个政党是拒绝加入联合政府的人民共和运动和部分"独立人士"在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的。1967年9月，战后法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人民共和运动宣布自行解散。

民主中心反对保卫新共和联盟—劳工民主联盟（这是1962年保卫新共和联盟同"左派戴高乐分子"合并后使用的名称）这个执政党的专制政权及其领导方法，并宣布拥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的政治联合组织。

213 1966年夏，又出现了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独立共和派全国联合会，这个政党是在加入联合政府的"独立人士"的基础上建立的。该党领袖瓦莱里·古斯卡尔·德斯坦总的来说支持政府政策，只批评政策的某些方面，坚持在对外政策方面执行更加"欧洲式的"路线，在经济管理方面放宽政策。

法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是戴高乐政权的左派反对党。为巩固和扩大各左派力量在总统选举中取得的成果，法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66 年 12 月 20 日，法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签订了一项关于在当前国民议会选举中联合行动的协议。这个文件反映了法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在和平共处、裁军和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已相当接近。双方确定了自己今后在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和发展经济方面的基本工作方针。协议还规定双方在议会选举中要协调行动。在初选中每党可以有自己的竞选纲领和候选人。但是，在第二轮选举中，两党应当遵循“共和纪律”，即支持在同议会多数派斗争中有更大可能获胜的候选人。

1967 年 1 月 4 — 8 日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分析了议会选举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代表大会决议强调指出，国家正面临着新的社会搏斗，而搏斗的结局则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

1967 年 3 月 5 日和 12 日进行的两轮议会选举，反映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左倒的变化。在初选中，共产党比上届议会选举中多获得一百多万张选票。左派政党共获得选票百分之四十三，而在 1965 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各左派政党共获得选票百分之三十二。第二轮选举结果巩固了各左派力量的地位。共产党获得五百多万张选票（1962 年为四百万张），获得七十三个议席（1962 年为四十一席），社会民主左翼联盟获得一百一十六个议席（上届为九十一席）。中右反对派在竞选中惨遭失败。民主中心在议会中共获得二十七席。执政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劳工民主联盟及其同盟者共获得二百四十四席（1962 年为二百八十四席）。选举结果证明各左派政党的威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68 年的五月—六月事件 1968 年法国经受了一次严重的社会震荡。国内一场深刻的阶级冲突早就逐渐酝酿成熟。法国为使经济更快地适应科技革命和在“共同市场”条件下竞争的需要，

摧毁了传统的部门结构，加快了生产集中化的速度，但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强度提高，工资的增长受到抑制，中、小企业破产和为数众多的农场倒闭。劳动人民的购买力低于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每周工作达四十八小时，这是西欧最多的工作周时之一。

政府不断剥夺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劳动成果。1967年夏，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从劳动人民工资中扣除的金额增大，从而引起国内普遍的不满。

戴高乐国家本身政治上层建筑的特点、专制体制的加强和对
214 反对派合法形式的限制，所有这些为社会爆炸提供了前提。在第四共和国年代，对社会冲突起缓冲作用的议会和资产阶级政党这些缓冲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已受到削弱，法国社会广大阶层从“直接行动”中找到了表现不满的方法。大学生中发生了严重的骚乱。第一次爆炸发生在农泰尔文学院（巴黎郊区），该院的大学生被剥夺了参加决定学院事务和组织自己生活的权利。1968年3月22日，此地因有支援越南委员会的积极分子被逮捕而出了名，其中也有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被捕者的同学们举行了抗议集会。但是，一些极左分子夺取了那天发生的“三·二二”运动的领导权。

在那个年代，“左倾”是青年思想危机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是他们在丧失理想的“消费社会”中感到自己被抛弃后的一种反作用。工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分裂，妨碍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的传播，妨碍了吸收他们参加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萨特和卡缪赋予特独形式的那种存在主义哲学，对法国大学生思想有着极大影响。这两位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承认目前存在的现实是荒谬的，无意义的，与人为敌的，并否认权威的本身。这些观点使青年对“工业化社会”的道德价值形成了一种否定的态度。反抗和自发行动被认为是解放的主要途径。

学生运动是早就不可避免的社会爆炸的导火线。同劳动知识分子（法国社会中这一阶层的比重不断增大）一样，大学生们抗议陈腐的教育制度和给他们中大多数人所安排的“雇佣奴隶”的命

运。这是大资本剥削的牺牲者——劳动人民普遍不满的表现。大学生们最初的行动，成了点燃国内多年堆积起来的干柴的星星之火，其斗争的性质，就已不仅是为了改革大学教育制度，而且是为了改变国内现有制度。

5月2日，农泰尔文学院被封。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左派学生组织同亲法西斯的青年组织“西方”发生冲突。现在，索邦——位于巴黎拉丁区的法国最古老的一所大学——成了学潮的中心。连续几天，首都大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同警方发生冲突。5月10日夜，警察包围了拉丁区的学生游行队伍。大学生们针锋相对地开始修筑街垒。夜里二点多钟，警察开始对该区进行“扫荡”，他们使用了警棍和催泪弹，数百名学生受伤。

对大学生的残酷镇压引起了普遍的愤怒。根据劳工总联合会的倡议并在其他工会组织的支持下，决定在5月13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表示抗议。共产党和民主左翼联盟号召一切民主力量支持罢工，并在全国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13日，首都六十万劳动人民走上街头。游行者手举透明的标语牌，上面写着要求戴高乐辞职的标语：“十年够了！”

5月13日的游行开辟了运动的新阶段，成了广大劳动群众积极行动的开端。继南特附近的“南方航空公司”之后，“雷诺”汽车公司各厂接着罢工。其他企业的职工纷纷以“雷诺”为榜样。与人民阵线年代一样，罢工者占领企业的做法得到了普遍应用。罢工运动波及法国生活的各个领域——工业、运输业、邮电业、广播电视部门和国家机关。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戴高乐5月24日发 215
表电视演说，总统在演说中宣布自己打算引导国家走“第三条道路”，以避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条“绝路”，但这次演说也没有使局势平息下来。劳动人民充满决心力求取得比戴高乐将军作出的某些让步和含糊不清的许诺更大的胜利。在5月20日以后的几天中，罢工人数已经达到一千万，法国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白热化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工会、企业主和政府的代表于5月25日在格勒内尔街的社会部开始进行谈判。5月27日，拟定了协议的基本原则，协议规定把有保障的最低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其他工资平均普遍提高百分之十，取消劳动报酬中的地区差别，提高各种优抚金额，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逐步把每周工作时数减少到四十小时，改进职业教育体制，扩大工会在企业中的权利。但格勒内尔协议并没有使罢工者平息下去。劳动人民仍继续进行斗争。但事态表明，法国工人阶级和左派力量的分裂还没有完全消除。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的领袖们背着共产党人进行了关于组织以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过渡性政府的谈判。民主中心的领袖们支持了成立这种政府的想法。

尽管“左倾”分子散播“政权出现空白”的论点，并说什么这种空白甚至可以不用去占领，而只要“选拔”人才去补上就行，但统治阶级并不打算放下武器。执政集团制定了用武力恢复“秩序”的计划。5月29日，戴高乐访问了驻联邦德国法军司令马絮将军。法军一些坦克兵团被调到巴黎附近。5月30日，戴高乐在广播电视中发表声明，打算在总统任期届满前仍留任总统职务。同时，他还宣布提前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戴高乐估计到，对可能爆发的国内战争的恐惧和民主中心领袖们的反共思想将起到应有的作用，并帮助执政的多数派巩固地位。1968年6月23—30日举行的议会选举结果，戴高乐的党（从6月4日起称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在国民议会中首次获得绝大多数。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和同它结盟的独立共和派全国联合会共获得三百五十八席。相反，各左派政党的选票减少了。共产党人获得三十四席，社会民主左翼联盟获得五十七席。这次选举的结局是由下列因素预先决定了的：反共分子5月间暗中联合起来使劳动人民统一阵线遭到了打击，以及极左分子的挑衅行动使法国一般居民陷入恐惧和惊慌的状态。

1968年7月12日，组成了以莫里斯·古弗德·缪尔维尔为

首的新政府。

法国1968年的五月—六月事件，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欧和美洲许多国家的一系列群众运动中声势最大的一次反专制的行动。法国社会在这两个月内经受了战后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一危机充分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深度和力量。这场规模空前的罢工运动不是反对某个资本家集团，而是反对整个国家专制统治制度。1968年事件粉碎了个人专政制度巩固性的神话。法国人民的广大阶层开始认识到深入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统治阶级内部也动摇了对戴高乐的信任。垄断资产阶级坚持采用更为灵活的政治领导方法，想用这种方法去防止1968年“大恐怖”重演的可能性。 216

法国共产党中央十二月(1968年)全会对五月—六月事件的教训进行了深入分析。共产党指出，各左派力量没有共同制定一项明确的纲领，是它们在危机时期活动中的主要缺点。全会所通过的“争取进步的民主制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法国”的宣言，成为确定党在新阶段团结各左派力量活动中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宣言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国共产党人为民主而斗争的观点，把这场斗争看作是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以社会主义为结束的不断创造的过程。党指出，如不提出国家政权问题，夺取“工厂领导权”和“大学领导权”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党人宣布，要为民主而斗争，而不要个人专政制度，这是国内各种反专制力量的主要任务。

在1968年五月—六月事件的压力下，政府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给了高等学校某些自主权，还对扩大工会在企业中的权利的协议从法律上作了规定。但这并没有消灭引起1968年爆炸的深刻根源。

可怕的1968年对戴高乐无疑产生了影响，他感到总统的个人专政同法国大多数人民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政府决定于1968年4月27日就改革国家行政区划和改革参议院问题举行全民投票。打算成立同现有省份平行的二十二个区，这些区的领导人应

当不仅由选举产生，而且还由政府直接任命。改革结果，参议院将由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变为社会形式的协商机构，该机构由政府、企业主、工会联合会和各区派代表组成。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破坏合法反对派作为基地的传统地方自治机关和参议院的影响，以及用各个阶级和居民集团"参加"新机构工作的方法扩大戴高乐派的社会基础，从而削弱各左派政党的影响。改革方案受到各左派政党的批评，这些政党指出，成立区的自治机构和过分扩大政府任命的区行政长官的权利具有反民主性质。独立共和派全国联合会的领袖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也反对这个方案。全民投票结果，有百分之五十三点一七的参加者对进行改革的建议投了反对票。4 月 27 日夜，戴高乐宣布辞职。

戴高乐总统期间法国的对外政策　戴高乐于 1958 年上台执政，是他的外交思想的胜利。按照这一思想，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坚决主张法国应起大国作用，是保卫法国利益的最好手段。五十年代末形成的环境，促进了法国外交航舵的转向。当时欧洲和世界形势同战后初期的形势有显著不同。战后初期，一些西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美国。法国垄断组织需要有一条在同外国垄断组织竞争中能保护自己利益的外交路线。根据戴高乐将军的想法，"法国在国际上的威严"也能巩固它的内政状况。

1958 年 9 月，戴高乐将军向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发出一份秘密备忘录，建议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成立法、英、美三国同
217 盟，负责解决一切同使用核武器有关的问题。两国领导人对建议作了模棱两可的答复，这使戴高乐相信必须采取更大胆的步骤来巩固国家的独立。1959 年 3 月，法国政府撤回了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指挥的法国地中海舰队，1963 年 4 月，又撤回自己的大西洋分舰队。在那几年，戴高乐便已对美国准备武装干涉越南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谴责。1961 年夏，他以法国不成功的经验为例，警告美国总统肯尼迪："……您越是起劲地在那里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就越是以民族独立捍卫者的姿态出现……我向您

预言，无论您付出多大的损失和代价，您仍然将一步一步地陷入无底的军事和政治泥坑。”

戴高乐主要指望同联邦德国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目的是保证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领袖地位。1958 年 8 月和 9 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进行了互访。1963 年 1 月 22 日在巴黎签订的法国—联邦德国合作条约，肯定了建立“巴黎—波恩轴心”的方针。条约规定两国领导人就国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定期进行磋商，以及扩大两国的军事合作。

法国在接受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立场。戴高乐在指出大不列颠同它过去殖民地的密切经济联系时强调说，英国的贸易和外汇政策越来越不符合欧洲大陆的利益，所以，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就等于是对“共同市场”的破坏。但是，巴黎对接受大不列颠加入“共同市场”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动摇法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害怕美国在共同体中增强自己的影响。1963 年 1 月，戴高乐坚决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

法国以西方“防御”中美国的核保障不足为理由建立起自己的核力量，同时也以此来显示自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盟国中的独立地位。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继续进行和这一战争受到世界舆论谴责的情况下，戴高乐将军认为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对法国执行外交路线是有利的。所以，法国政府在解决柏林问题的谈判中采取否定的立场，并批评美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软弱”。

从 1963 年年中起，“巴黎—波恩轴心”进入了深刻的危机时期。西德联邦议院单方面在法国和西德合作条约的序言中添入忠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自己外交政策传统方针的论点。法国和联邦德国在对待 1962 年 12 月美英提出的建立“多边核力量”计划方面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法国严厉谴责了这个计划，认为这是破坏法国核政策独立性的一种手段；联邦德国则相反，对“多边核

力量"思想表示完全支持，因为这为自己研制核武器开了绿灯。

从 1963 年末起，法国的外交方针决定转向支持国际缓和。法国在同联邦德国及美英关系中的失败，迫使它必须谋求新的对外政策的方法。法国领导人也不能不考虑到法国由于拒绝加入关于在三国领域内禁止试验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而陷入国际孤立的境
218 地。戴高乐政权国内反对派的增多，也迫使他提出一项能补偿对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不满的外交纲要。

法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采取了现实的立场。法国强烈反对在越南发动战争的政策，谴责美国破坏了 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1966 年 9 月 1 日，戴高乐将军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发表演说时，号召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并就这个问题召开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会议。

法国政府谴责以色列 1967 年 6 月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并禁止向侵略者提供法国武器，在侵略停止后，又要求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并表示承认所有近东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法国政府还谴责外国对塞浦路斯内部事务的干涉和企图把它拉入北大西洋联盟。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夏尔·戴高乐

法国继续奉行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强政治方针独立自主的路线。法国政府在1966年 3 月9—10日送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十四个参加国代表的备忘录中强调指出，自己忠于北大西洋联盟，但同时又指出，在情况变化了的条件下，联盟的军事组织已无力量。同时，法国政府宣布决定：驻联邦德国的法国军队不再受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的控制，并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合参谋部召回自己的代表。还提出修改同美国签订的关于法国境内美国驻军、装备和基地的地位的协议问题。1966年3月29日，法国外交部进一步明确了上述措施的期限。1967年4月1日，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谋部设在法国领土上的协议宣告失效。

法国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的转变，对苏法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64年法苏两国签订了一项长期贸易协定，1965年两国又签订了在和平利用原子能和运用彩色电视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于1965年4月25—30日的访问法国，对在政治领域内活跃苏法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戴高乐将军于1966年6月20日—7月1日对苏联的正式访问，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法国总统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伏尔加格勒、新西伯利亚。会谈结果，签订了苏法宣言，双方在宣言中强调了自己对缓和和削弱东西方之间紧张局势的愿望。苏法之间的贸易、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都得到了顺利的 219
发展。

法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1967年9月6—12日戴高乐正式访问了波兰。在这次访问中确认了他在1959年所作的关于法国信守奥得河—尼斯河分界线是不可动摇的这一原则的声明。1968年5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访问了罗马尼亚。此外，法国还同一些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外长级互访。

法国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这些关系的发展表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的合作，有利于推动和平事业和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1969年的总统选举。蓬皮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在1969年6月新的总统选举的前夕，法国共产党人号召各左派力量提出统一候选人。但是，法国社会党拒绝了这一建议，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加斯东·德费尔。法国共产党决定提出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老战士雅克·杜克洛为总统候选人。统一社会党提出

了米歇尔·罗卡尔。执政阵营联合在候选人乔治·蓬皮杜的周围。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成了一些小的中派集团的候选人。

在1969年6月2日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各政党的得票如下：蓬皮杜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九五，波埃为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二，杜克洛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二，德费尔为百分之五点零七，罗卡尔为百分之三点六六。第二轮选举结果，乔治·蓬皮杜以获得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八的选票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蓬皮杜在"保持继承性和对话"的口号下就任总统职务，这一口号意味着忠于戴高乐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考虑到1968年的教训而准备扩大政权基础并赋予它以更大的灵活性。委托国民议会议长、执政的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成员雅克·沙邦—戴尔马组织新内阁。在选举中支持蓬皮杜为候选人的部分民主中心的代表获得了几个部长的职务，这就引起了民主中心的分裂。

法郎贬值百分之十二点五是新政府的第一项重大财政措施。物价上涨使法郎贬值，结果把劳动人民在1968年夏争取到的提高工资一笔勾销。国内的社会局势重新动荡起来。劳动人民要求严格遵守工会在企业中的权利的法令，减少每周工作时数，提高工资，降低消费品价格。

在这种情势下，沙邦—戴尔马为革新戴高乐主义的社会口号，于1969年9月16日在国民议会发表了所谓"新社会"的施政纲领，许诺改善国内政治生活并在法国确立"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将不再有导致激烈阶级冲突的基础。为了迎合社会的蛊惑宣传，"新社会"纲领同时还提出一些十分具体的任务：实现工业现代化，提高法国垄断组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独立性。

自蓬皮杜担任总统职务后，法国的外交缓和了同美国和西方各盟国的关系，但是在法国新政府内加强了自己地位的"大西洋分
220 子"——亲美派并未能使法国在国际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放弃根本路线。法国继续奉行旨在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互利关系的方针。1970年10月6—13日，蓬皮杜正式访问苏联。在访问期间

签订的苏法文件——协定书和宣言——中规定，在出现威胁和平的情况下，双方有义务进行磋商，同时，大力促进两国之间贸易和文化关系的发展。

法国政府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近东冲突，继续寻求自己同阿拉伯一些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改善同这些国家关系的途径。法国没有改变对美国侵略越南所持的否定态度。

1970 年 11 月 9 日，在法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法国的国际政治中曾经起了显著作用的政治活动家戴高乐将军逝世。

六十年代末法国共产党争取左派力量统一的斗争 在随着1968年社会爆炸而发生左派力量分裂的形势下，法国共产党人继续为统一而斗争。五月—六月事件暴露了左派缺少一条共同的明确的路线，这就使幕后的反共阴谋活动有空可钻。

社会民主左翼联盟未能经受住 1968 年的考验。这一联盟在提前进行的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后，同年秋季就土崩瓦解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很快就宣布自行解散，并宣布将在联合其他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和集团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政党。但是，社会党人的领袖们不得不承认，没有共产党人的支持，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有希望取得胜利的现有政权反对派。1969年5 月 4 日在阿尔福维尔举行的社会党成立大会，通过了一项以左翼联盟为目标和坚决谴责任何中派联合的决议。党不再使用旧的名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始称社会党。

尽管困难重重，暂时退却，但左派力量的联合仍不断取得进展。1970 年 2 月 4 — 8 日举行的法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动员一切主张统一的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代表大会对1968年12 月所通过的宣言的论点作了具体说明，并有所发展。党强调指出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两个斗争之间有着深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党再次宣布，要达到所提出的目的，只有建立巩固的左翼联盟，而且工人阶级应在这一联盟中起先锋作用。代表大会对罗歇·加罗迪用修正主义思想解释科技革命后果、以所谓“新的历史

性联盟”来同工人阶级相对抗和鼓吹放弃科学理论等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有理论根据的批评。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把加罗迪清除出法共中央政治局。加罗迪在走上派别斗争的道路后，很快就被开除出党。

1970年12月，公布了法国共产党同社会党谈判的“初步结果”，证明两党在国内、国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取得观点一致方面有了重大进展。这个文件强调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联合人民的大多数才能实现。在对外政策方面，两党都强调自己信守三项不可分割的原则——国家独立、国际合作、和平共处。尽管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共同市场”的态度以及某些其他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但两党谈判的结果总的说来是积极的，并为制定左派力量联合执政纲领开辟了前景。

221 ## 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 六十年代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第二位，占西欧的第一位。1961年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为百分之九点九，至1970年，达到百分之十二点五。

1961—1970年，西德经济在发展中经历了许多周期，其中包括1963年的衰退和1966—1967年的危机，但至六十年代末，西德的经济重新进入高涨阶段。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作最有成效的是生产各种设备的部门，以及化学、石油加工、机器制造、汽车制造、林业技术和电子等工业部门。十年内，经常发生因物价上涨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官方公布的生活指数六十年代初约增长百分之二，1969年增加到百分之二点六，1970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实际工资的提高勉强跟上物价的上涨。

联邦德国参加“共同市场”，总的说来起了加速其经济发展的作用。生产和资本集中化过程的发展速度比以前更快了。至1970年，十八家最大的股份公司集中了西德全部股本的三分之一。这

时，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生产资料掌握在百分之一点七的自立人口手里。国内三家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共同地或分别地占有了许多康采恩。开始积极筹建跨国垄断组织。农业也出现集中化，伴随而来的是农村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大规模破产。

西德的资本扩张加强了，1970 年联邦德国私人资本的国外投资为二百一十多亿马克。同时，外国资本也渗入西德的经济。1970 年末，在联邦德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为二百一十六亿马克，其中美国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国家垄断的经济调节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1967 年颁布的稳定经济法规定，用调节基本建设投资和在政府、企业、工会等组织之间协调经济政策的方法来扩大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六十年代初，几乎百分之七十二铝的生产、百分之五十二点九铁矿开采量和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小轿车的生产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还起着私营工业最大债权人的作用。

国内社会政治生活 联邦德国六十年代的特点是垄断资产阶级与极大多数居民之间的矛盾加深。这个时期，罢工运动的规模较小，只具有中等规模，这是因为经济状况多少有所改善，以及企业主尽量避免同工会发生大规模冲突。为使厂方接受自己的要求，工会往往只要以罢工进行威胁就够了。但是，这不排除工人和企业主之间也曾发生过相当大的冲突。

1962 年 5 月，萨尔矿工举行了大罢工，1963 年初，卡塞尔的汉舍尔工厂也举行了罢工。1963 年 4 月末在巴登—符腾堡有十四万五金工人开始罢工；5 月罢工总人数超过了四十万人。企业主以扩大同盟歇业来对抗。只是在全国的五金工人举行了声援罢
工工人的警告性罢工后，企业主才停止同盟歇业，提高了五金工人 222
的工资。

“阶级和平”神话在联邦德国的破产，使西德资产阶级对阿登纳的政策感到绝望。再加上对外政策的失败，导致阿登纳于 1963

年秋辞职，联邦总理职务由路德维希·艾哈德接任。他同阿登纳一样，也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袖之一。经济衰退，而后又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是艾哈德政府在1966年10月垮台的主要原因。

六十年代末，罢工斗争加强了。1969年9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五金工人大罢工。1970年举行了五百多次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七十多万。

六十年代下半期，青年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青年工人、劳动知识分子、大学生和中学高年级学生为扩大国内民主权利和自由、为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实际参加作出重要决定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学生们在青年工人的支持下，主张对教育制度进行民主改革。

反对西德进行核武装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运动具有很大的规模。1967—1969年是青年运动发展中的高峰，这个时期，青年在大规模游行示威中不断对统治集团和反动报刊煽起的反共运动进行谴责。青年运动成了联邦德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统治阶级企图用局部措施来消除国内的社会矛盾。六十年代初，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四十六点四小时减少到四十四小时，并实行因工人的紧张劳动(因"热忱工作")等而发给奖金的制度。所有这些让步并不是企业主给工人的恩赐，而是在工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

政府企图把自己打扮成仿佛是努力公正地考虑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超阶级的"全民力量的代表。在阿登纳和艾哈德担任总理期间，通常国家对劳资之间相互关系的干预，总是尽量削弱工会的影响，尤其是在确定工资率方面。

还在1960年秋阿登纳担任总理期间政府就提交联邦议院的"特别法"草案，是几乎整整上述十年内联邦德国国内政策的主要问题。围绕批准这个法案问题而进行的斗争，持续了八年之

久。

"特别法"是一部综合性法令。这部法令如通过，将使统治集团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停止基本法的生效，而把全部权利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在国内实行独裁制度。法案规定，一旦宣布"紧急状态"，就取消国内一切权利和自由，还规定警察有逮捕、不经审判而监禁和侦讯联邦德国任何公民的权利。在一整套拟定的措施中还包括一些法案，这些法案规定在一旦宣布"紧急状态"时便实施一系列旨在把经济和社会生活纳入战争轨道的决定。

"特别法"引起工人阶级和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强烈抗
议。处在地下的德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通过新法令的斗 223
争。"特别法"问题是1963年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强反对政府的危险性法案的斗争及动员广大舆论界采取共同行动的决议。

联邦德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首先是五金工会和化工工会）是反对"特别法"运动的主力。德国工会联合会第六次（1962年）大会和第七次（1966年）大会坚决批驳了"特别法"。1965年夏，"特别法"草案提交联邦议院表决，但是，因社会民主党团投反对票，法案因未获得必需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而未被批准。在这以后，政府宣布，有一些法案并不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批准，并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通过了部分法案。

这时，仍以工会为群众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其领导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该党积极为自己参加政府铺平道路，党的领导人准备为此而对右派势力作很大让步。在1966年夏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该党领导层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实际上同意了联邦议院还没有批准的"特别法"的那一部分条款。但是，反对这项法案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停止。1966年10月末，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了以"民主制在危急中"为口号的大会，这次大会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和一些工会组织的，而且得到共产党的积极支

持。大会代表一致拒绝了政府的计划。

艾哈德的内阁垮台后，又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组成了“大联合”政府。联邦总理职务由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库尔特·基辛格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新政府继续推行“特别法”路线。在联邦议院讨论这些法案的决定性日子里(1968年5月)，国内许多工业中心举行了政治罢工，表示抗议。但是，尽管进步舆论积极反对，1968年5月30日联邦议院还是以多数票批准了“特别法”。

强迫接受反动法令之日，正是西德新纳粹势力明显活跃之时。还在1964年11月，一些不大的半法西斯组织的成员联合组成了国家民主党。这个新政党的领导人求助于部分西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同他们的先哲——纳粹分子一样，竭力利用各阶层居民对现状的不满；出于蛊惑的目的，他们也对垄断组织提出批评。在国家民主党的纲领性文件和领导人的发言中，逐渐地把关于修改战后欧洲边界线的复仇主义要求提到首位。

新纳粹分子的口号对部分居民产生一定的影响。1966—1968年选举结果，国家民主党在联邦德国七个州的地方自治代表会中获得了代表席位。取得这个胜利的原因首先在于，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状况急剧恶化。此外，据国家民主党人自己承认，该党没有感到宣传工具的不足；该党得到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复仇主义分子和成千上万的前纳粹分子的积极支持。

在1969年9月的竞选运动期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家民主党这时拚命地想使自己的代表进入联邦议院。

224 1966—1969年，在社会民主党人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一起加入联合政府期间，议院中的正式反对派只剩下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高级职员和某些其他居民利益的一个不大的自由民主党党团。1968年以前，这个党是由保守派的领袖们领导的。1968年1月，以瓦尔特·谢尔为首的竭力接近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取得了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但是，在1969年选举以前，联邦议院有代表席位的唯一反对派政党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当时真正的民主反对派是一些并非根据某种协议联合起来的民主组织——左派工会、进步青年和妇女组织；共产党人、德国和平联盟、受纳粹迫害者协会和其他一些进步组织给予这些“议会外的反对派”以最积极的支持。议会外的反对派为保卫劳动人民的民主成果、反对纳粹主义复活进行了斗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积极改变六十年代末国内的思想政治风气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民主舆论强烈要求共产党合法化，是上述活动的结果之一，并且首先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和奋不顾身地进行活动的结果之一。

1968年9月，成立了筹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联邦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把这个政党称为德国共产党）。10月，举行了新政党的代表会议，1969年4月12—13日在埃森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批准了党章、党的纲领性声明和行动纲领，该党在其成立的头几个月共有二万二千名党员。在纲领性声明中阐明了国家和社会民主革新的主要任务。大会主张发扬国内民主，反对新纳粹主义，废除“特别法”，劳动人民参加生产管理，民主制定为大多数居民谋利益的经济计划，还主张把主要工业部门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大会宣称，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派的团结和行动一致，是达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手段。

行动纲领包括：争取和平，争取裁军和欧洲安全，争取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61—1966年的对外政策　六十年代，在阿登纳和艾哈德担任总理期间，所谓“大西洋主义”一如既往仍然是联邦德国对外政策方针的基础，这种大西洋主义具体表现在西欧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的体系中，首先是表现在北大西洋联盟中。

六十年代初，联邦德国的外交地位得到了巩固。这时西德在工业生产水平方面已超过了自己的西欧伙伴。从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时候起(1955年)，它便成为一支相当大的军事力量，联邦国防军成了西欧陆军的主力。西德的统治集团继续酝酿消灭屹立在德国土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西柏林仍然是制造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之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的挑衅性政策，引起中欧的可怕危机。在民主德国采取加强自己边界的合理措施后(1961年8月)，美英又向西柏林增派驻军。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吓不倒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225 所采取的强硬而坚定的立场，帮助消除了因西柏林而造成的危险局势。美国由于考虑到当时世界力量的对比，不打算为达到西德对外政策的扩张目的而开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部机器，当这一点变得相当明显时，西德的统治集团感到非常失望。况且，在加勒比海地区局势危险地尖锐化之后(1962年秋)，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行政当局愿意在同苏联关系正常化方面采取某些步骤。

西德的领导人开始寻求自己政策的其他“支撑点”。从阿登纳最后两年的执政中可以觉察到，西德同美国的关系有些冷淡，联邦德国转而接近法国。这一方针具体表现在1963年1月22日在巴黎签订了爱丽舍条约。按波恩的意图，条约不仅应当有助于加强西德的地位，而且要阻止法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任何协议。但这些指望落空了。两个伙伴之间很快便发生了严重摩擦。

联邦德国同英国的关系中也有一定的困难。阿登纳政府一方面支持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请求，同时又赞成发展共同体的政治一体化，而这一点却是伦敦当时所坚决反对的。

因此，西德政府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遭到严重的失败，而且与盟国的关系也遭到一系列的挫折。1963年8月在莫斯科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西德统治集团加强苏美对抗的指

望落空了。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了危机，这就是1963年末阿登纳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总理艾哈德执行了一条同华盛顿无条件合作的路线。这个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世界的实际状况。美国深深地陷入没有前途的越南战争之中，它的一些西欧盟国害怕美国继续侵略会引起严重的国际冲突，而它们由于对美国承担的义务也将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被卷入这场冲突之中。某些西欧国家首先是法国表示希望调整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戴高乐总统1966年夏访问莫斯科，并同苏联签署了苏法宣言。

指望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核武器，这是联邦德国对外政策中占统治地位的“大西洋主义”的动因之一。阿登纳曾经要求，以后的艾哈德更加露骨地要求让联邦国防军参加使用核武器，但是，西德统治集团的企图未能得逞，这一企图遭到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舆论以及联邦德国本国进步力量的坚决反对。就是西德的盟国（包括美国）也不急于让西德的将军们去接近“核按钮”。

1966年春法国退出北大西洋联盟的军事组织，以及戴高乐在莫斯科的谈判结果，反映了欧洲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客观变化。但艾哈德政府继续无视国际生活现实。西德领导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一切建议。尽管欧洲和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德的统治集团仍然指望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国际问题。

“大联合”政府的“东方政策” 基辛格和勃兰特政府的外交方 226
针，是“大西洋团结精神”及同美国结成紧密联盟的传统路线的继续。基辛格内阁中以国防部长格哈德·施罗德为首的强大的“大西洋”派，经常敦促政府进一步加强同美国的联系，处理好同华盛顿特别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西德政府坚决反对哪怕稍许减少一点在欧洲的美军人数。政府中以财政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为首的另一派，要求略为改变一下西德“西方政策”中的调子，强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的团结。根据这一派的意见，

明确的倾向巴黎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能使波恩处于有利的地位，因而也就能更成功地在华盛顿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最后两派的目标一致起来了，因为这两派都想提高西德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作用。

担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职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的路线，同基督教民主党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路线有所不同。勃兰特1967年6月7日在联邦议院说，他要把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提到对外政策中的首位，而把同处在西德和苏联之间的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实现正常化摆在第二位。他保证说，孤立民主德国不是西德领导人的目的。勃兰特指望，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将使联邦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某些“机动的自由”。但是总的说来，基辛格和勃兰特政府“东方政策”的特点是，力图实现华盛顿策划的借助“搭桥”政策“软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实际上，这条路线已具体表现在同个别一些东欧国家的勾搭中，表现在企图利用这些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困难，使它们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使“搭桥”困难的是阿登纳老政策中的那些基本原则：不承认民主德国、“哈尔斯坦主义”①、联邦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非分要求，都仍然有效，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同以往一样仍被冻结。这一切都证明，西德统治集团没有放弃自己的主要目标——并吞民主德国和改划中欧的边界线。这个时期只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不实行“哈尔斯坦主义”，尽管这两个国家承认了民主德国，西德仍然同这两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分别于1967年1月和1968年1月）。

1966年开始的苏联和联邦德国关于不使用武力协议的谈判，

---

① 1955年联邦德国根据外交部国务秘书哈尔斯坦的建议制定的一项对外政策。内容是西德政府代表整个德国，不承认民主德国，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译者

于1968年8月被西德单方面中断。

在"大联合"政府执政期间，联邦德国继续力求用原子武器装备联邦国防军。西德政府用捏造的所谓"目前苏联还没有放弃要求干涉西德"的借口，拒绝参加1968年由苏、美、英和其他一些国家签订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69年5月，西德政府炮制了三个所谓"原则性声明"。声明说，第三国对民主德国的承认重新被看作是对联邦德国的一种不友好的举动。基辛格总理在向联邦议院的六月报告中重弹了唯有西德"有权"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老调。

承认民主德国问题成了"大联合"政府执政年代激烈论战的对象。除了一些还在六十年代初就主张和民主德国对话的政治活动 227
家、学者和政论家外，现在又有许多议会外的反对派代表(主要是青年组织和工会的代表）参加了为承认民主德国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线的建议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广泛的支持。1966年12月末，德波文化和经济交流协会要求西德政府承认奥得河—尼斯河分界线，并为对波兰人民共和国实行新的建设性政策奠定基础。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相当一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立场上联合起来了。1967年11月末，巴登—符腾堡州的"青年民主党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在决议中提出要求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奥得河—尼斯河分界线。1951年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反对承认奥



联邦德国社会进步人士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而组织的"列宁和工会运动问题"科学理论会议主席团。纽伦堡，1970年

得河—尼斯河分界线的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八十，而在1967年末的民意测验中就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作了否定的回答，而赞成承认那条分界线的有半数。舆论的压力如此强大，以致外交部长勃兰特认为必须在纽伦堡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正式声明承认奥得河—尼斯河分界线。

在1966年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要求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实业界人士也对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967年2月成立了西德和苏联商品交流贸易协会的一些纺织企业主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主动。这个协会起了1967年8—9月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时装展览会西德馆的组织者的作用。

六十年代末，在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中，联邦德国从第五位升到第一位。但是，苏联在西德的贸易额中的比重仍然不大，勉强超过百分之一。

联邦德国议会外的民主反对派，首先是共产党人和主张和平的组织，其中有德国和平联盟和受纳粹迫害者协会等组织，对在国内造成新的政治气氛作出了很大贡献，这种气氛对中央政权的外交方针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要和平、不要核装备和搞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等口号下一年一度进行的复活节行军在国内非常流行，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种行军。

共产党人走在为和平、为欧洲大陆的安全和合作、为奉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而斗争的前列。德国共产党在自己印发的机关报
228 和传单上号召实行真正新的东方政策。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国内各个工业中心就西德对外政策中的一些迫切问题组织了会议、论坛和讨论会。

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首先是"青年社会党人"组织的成员，分别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1967年12月在美因茨和1968年5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也要求外交方针民主化，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这样的观点和情绪，逐渐成为联邦德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因

素，对越来越广泛的居民阶层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国际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现实，首先是苏联经济和军事技术实力的增强，是产生上述现象的基础。

在“大联合”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联合政府的参加者之间在“东方政策”上的分歧加深了。基辛格总理和勃兰特副总理对苏联政府1969年9月12日的照会（建议就不使用武力的协议问题恢复谈判）作出不同的评价。总理对此所表现出来的是波恩上层的那种传统作风，他声称，莫斯科好象在要求西德政府投降，而勃兰特强调了苏联照会的实事求是和建设性精神。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1969年秋的选举运动期间。基辛格在选举运动中表示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承认民主德国。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则声称有必要承认奥得河—尼斯河分界线，虽则这种承认是带有附加条件的，即这条分界线的最后命运将由和约决定。社会民主党人还表示准备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民主德国）签订关于不使用武力的条约。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原则上同意西德参加核武器不扩散条约。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仅不掩盖自己同基督教民主党的同僚们的分歧，而且还强调了这些分歧。他们竭力在选民面前把自己同基辛格、施罗德和施特劳斯区别开来，并表明自己是国际政策新趋势的代表者。社会民主党人对待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已破坏了“冷战”时代的传统方针，博得相当一部分选民的好感，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69年9月28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

向新的“东方政策”的过渡　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同“自由民主党人”联合组成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担任政府联邦总理职务，自由民主党领袖瓦尔特·谢尔获得外交部长职务。

在联邦德国领导人更迭之际，经济因素迫使联邦德国必须对“东方政策”进行重大修改。六十年代末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外汇危机，提高了联邦德国实业界人士对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兴趣。他们要求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项比过去更多地考虑到西欧外贸利益的经济政策。

联邦德国同苏联经济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是两国缺乏条约基础：原来的贸易协定已于 1968 年 12 月 31 日期满失效，但是新的协定还没有签订，而且没有就这一问题作出进行谈判的任何决定。在这个领域，也象在政治领域一样，联邦德国落后于它的
229 资本主义伙伴——法国、意大利、芬兰和一些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已同苏联在达成经济关系的原则性协议的基础上顺利地发展了经济和科技联系，并同苏联外贸机构签订了一些规模庞大的合同。这种情况使西德相当大的一部分垄断组织急不可待了。

主张采取新外交方针的一派的积极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不愿离开阿登纳时代就已臭名昭著的“冷战”道路的右派的压力。由于进步力量斗争的结果，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心理气氛，这种气氛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政府加快了把所宣布的“东方政策”中的转折予以正式肯定的过程。

1969 年 11 月 15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外交部递交了本国政府的照会，照会中表示愿意立即开始进行关于相互不使用武力的谈判。

1969 年 11 月 28 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订是勃兰特—谢尔政府迈出的重要一步。联邦德国参加这项条约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尽管签署这个文件时还有附加条件（要求作出补充保证，使条约对联邦德国为和平目的发展核工业不会造成障碍等）。实际上，新政府强调的是联邦议院于 1958 年 3 月 25 日所作的关于用“最现代化”武器装备联邦国防军的危险决定。条约的签订，是对联邦德国本国和国外在关于用核武器装备西德军队问题上的斗争所作的总结。

勃兰特于 1970 年 1 月在联邦议院作《关于国家状况》的报告时确认，不使用武力是他的政策的核心。他说，这应当成为“改善同所有东欧国家关系的基础”。同月，联邦总理办公厅国务秘书埃贡·巴尔抵达莫斯科，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不使用武力的协议问题进行了谈判。不久，联邦德国政府同波兰人民共和国也开始进行了同一问题的谈判。

两个德国并存二十年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国政府首脑维利·斯多夫和维利·勃兰特于 1970 年 3 月(在埃尔富德市）和 5 月(在卡塞尔市）的最初两次会晤，是这一转折时期的令人瞩目的事件。维利·勃兰特于 1970 年 5 月 11—14 日在萨尔布吕肯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宣称，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

与此同时，勃兰特在自己所有讲话中都强调指出，联邦德国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密切联系是国家对外政策中最根本的东西，
西德政府准备对该联盟作出“相当大的财政贡献”，要求“加强欧洲 230
一体化，并使它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包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取得政治合作方面的进步”。此外，联邦德国新政府在活动初期仍继续反对其他国家承认民主德国。

尽管如此，联邦德国“东方政策”中的转折仍然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一转折是由国际生活中的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正如勃兰特所说的，联邦德国“曾被迫”做了它所做的事。根据原来在欧洲“排斥社会主义”的路线，认为有可能“依靠实力”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的种种指望显然是不现实的了。1968 年 8 月，使捷克斯洛伐克离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尝试的破产证明，在施罗德和美国总统约翰逊方案中的“搭桥”是一项没有前途的工程作业。联邦德国的新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在由联邦德国国防部起草并于 1970 年发表的《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安全和联邦国防军的状况的白皮书》中指出：“企图离间华约条约各国之间的关系将是愚蠢的和危险的”。

有人期望德国土地上所出现的工农国家将是一个软弱的和不巩固的国家，可是这一期望也落空了。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民主德国在六十年代末进入了世界前十个工业国的行列。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实力，保障了民主德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世界舞台上孤立民主德国的企图遭到了失败：至1970年8月，民主德国同二十七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几十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目标明确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争取欧洲大陆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不倦地进行斗争。

然而，虽然具备了使联邦德国（一个在二十年来一贯执行反苏和复仇主义路线的国家）的政策实现重大转折的一切客观条件，但对这个国家的新领导人首先是联邦总理勃兰特来说，仍然需要有政治上的现实精神、个人勇气和逆西德统治集团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潮流而动的能力。西德居民思想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1970年7月进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在十八岁以上的成年居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二赞成“同苏联彻底和解”。被调查的每一百人中只有五人认为改善两国关系是不适宜的；有百分之三的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表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参加民意测验的十八岁至三十岁这一个年龄组中有百分之九十八赞成“和解”。在另一次民意测验中，有五分之四的人表示了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

1970年8月12日同苏联签订的条约　1970年8月12日，西德方面的勃兰特、谢尔和苏联方面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莫斯科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条约。

条约的序言和第一条强调了双方对增进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发展相互合作，包括科技和文化联系的愿望。

条约规定双方都承担“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这实际上意味着联邦德国放弃“实力”政策，即压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承认欧洲现有国境线的不可侵犯性，是条约中极其重要的原 231
则之一。在条约的第三条中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致认为，只有在谁都不侵犯现有国境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保持欧洲和平。

两国承担无条件地保持欧洲所有国家在现有国境内的领土完整的义务；

两国宣称，无论对谁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将来也不提出这样的要求；

两国认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国境线，其中包括波兰民主共和国的西部国境线，即奥得河—尼斯河分界线以及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国境线，均以在本条约签署之日这些国境线的走向为准，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侵犯的。”

这样，关于“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谈判结果所签订的条约，就超越了这一问题的范围。条约的各项条款触及到欧洲政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相互关系是对欧洲和平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莫斯科谈判过程中通过的另一份文件《关于双方意图的协议书》中也有具体反映。联邦德国政府在这份文件中声明自己准备同民主德国政府缔结一项各国之间通常采用的有约束力的条约，并打算在完全平等、不歧视、尊重两国在本国境内自己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事务的独立自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同民主德国的关系。

《关于双方意图的协议书》中包括了一项重要的条款，这项条款证明联邦德国政府放弃了“独自代表全体德国人”的要求。这份文件的第二款指出，联邦德国政府的出发点是，“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在国外代表另一国或以另一国的名义活动……”。文件还

宣布联邦德国打算调整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

苏联和联邦德国两国政府主张召开加强欧洲安全和发展合作的全欧会议，并宣布将为筹备和顺利召开这次会议竭尽全力。

苏联和联邦德国签订的条约，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对增进欧洲和全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贡献。随着这个条约的签订，苏联和联邦德国的相互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条约为两国在国际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仇视和对抗转向发展互利关系和合作提供了条件。从而对造成中欧新的思想政治风气、信任气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70 年 8 月 12 日签订的条约，消除了原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1949 年以后联邦德国政策的复仇主义要求和民族主义野心，而对由于战后和平解决的结果以及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而出现的欧洲现实状况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符合欧洲人民的真正利益，因为它减少了欧洲武装冲突的危险性。

同苏联签订的条约是联邦德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广泛的协定。条约为联邦德国同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也为联邦德国同其他社会主
232 义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1970 年 8 月 12 日签订的条约，说明联邦德国已改变了妄想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和孤立民主德国的战后“东方政策”。

1970 年 12 月 7 日，在华沙签订了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条约。这项条约确认两国边界其中包括 1945 年 8 月 2 日波茨坦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奥得河—尼斯河分界线的不可侵犯性。两国宣称，彼此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将来也不会提出这种要求。联邦德国和波兰所签订的条约，也象莫斯科条约一样，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并表示了双方对发展全面合作的愿望。

6. 意 大 利

从"经济奇迹"到新危机的出现 六十年代，意大利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共同经济发展过程中去。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使意大利的经济同该集团西欧成员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七十年代初，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与意大利的贸易占意大利进口额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占出口额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六（1961 年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九点四和百分之三十一点二）。

意大利资本的积极输出，尤其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本输出，是标志着六十年代意大利经济发展的新因素。意大利垄断组织参加国际卡特尔的规模扩大了。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瑞士和英国）继续加紧渗入到意大利经济，特别是渗入到石油化工业和电子工业这样一些部门。出现了意大利的一些最大的公司同国外一些大垄断企业进行合并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意大利同别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促使意大利国内工业的发展加快了速度；另一方面，也导致本国国民经济更加受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尤其是"共同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

意大利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异常迅猛，一方面向深度发展，即使生产达到高度的技术装备程度；另一方面向广度发展，即普及到南方的一些落后地区。在国内南方地区，由于国家干预经济，出现了一些集约化的投资基地。在塔兰托、那不勒斯和巴里兴建起一大批大型工业综合体。但南方和北方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消除，相反，由于北方工业综合体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使差距更加拉大了。在北方，资本集中化过程发展得特别迅速。1966 年成立的蒙特爱迪生金融工业公司，其周转额在 1971 年就在化学工业方面有影响的世界垄断组织中上升到第四位。在橡胶产品生产中居统治地位的皮雷利公司是国际性的康采恩，在十二个国家里都拥有自

己的企业。菲亚特汽车公司这个垄断组织，在1970年就成了世界生产汽车的最大联合公司之一。

实力雄厚的国家-垄断联合组织在意大利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工业复兴公司、国营液体燃料公司、加工工业集资与筹款公司。1962—1965年由于电力工业国有化而建立了大型国营综合体——国营动力工业联合公司，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233 但“经济奇迹”(1959—1961年）为期不长。以后几年在意大利的经济发展中发生了突变。1960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五点二的最高水平，但在1962年末就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的初步征兆，1964年的生产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点三。1964—1965年的经济衰退涉及到一系列主要工业部门：汽车工业、纺织工业、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部门。生产设备开工不足，引起大量裁员和减少工作周时，许多企业甚至临时关闭。在克服经济衰退以后，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仍然比较低，而至1969年末，意大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波及到一切经济部门的更加严重的危机时期。

国家对国内经济生活的干预(工业中的国营成分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基础)，使危机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缓和。所以，尽管六十年代的危机很深，但从绝对数字来说，还没有使国家经济倒退得象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那样。六十年代使意大利震荡不安的危机开始具有独特的结构。这些危机的特点是，不仅表现为生产下降，同时还表现为各种比例失调的突然加剧和整个经济机制的紊乱。生产下降带来国民收入的减少和基本建设投资的紧缩，以及通货膨胀的上升。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失调也加剧了。一些农业部门在“共同市场”条件下处于长期萧条的状况。播种面积和农场数量减少了。同五十年代相比，失业现象虽有减少(当时失业人数为二百万)，但仍然是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六十年代末，意大利共有一百万失业者。

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 国家经济的加速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以及“共同市场”的影响，使居民的区域分布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居民继续不断从农村转入城市，从南方的农业区转至北方的工业区。1959—1969年期间，有一百六十万劳动者离开了意大利南方。

农村的社会结构受到特别深的破坏，这同垄断组织扩张过程中的农业改造有关，也同农业机械化和采用现代组织劳动方法有关。在1961—1971年期间，农业工人人数减少了九十万(即差不多减少一半)，而农民人数减少了一百一十万。

农村外流人口迁居郊区和市郊，加入产业工人和服务性行业工作者的队伍。他们也补充了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和失业者大军。在经济衰退和失业者增加时期（特别在1964—1966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未就业或被解雇了的“南方人”重返家园，或者移居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除了有传统习惯的大量移民外(主要从南方)，北方工业中心的熟练劳动力也开始加紧输出。这同存在着一支经常性的失业大军有关，同时，还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建立，使意大利工人能在“共同市场”的其他国家比在意大利更为有利的条件下找到工作。1961—1969年期间，意大利向国外移民二百五十万人，其中有七十七万人永远离开了祖国。

从农村“外流”，造成南方整个整个地区的荒芜。然而，意大利农民仍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居民阶层。这些农民很大一部分仍是对分制佃农，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受封建残余加重盘剥的租约所 234
束缚。

城市继续高速发展。国内十三个最大的中心城市及其郊区集中了几乎两千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在意大利南方也出现了一些大的工业中心。

城市居民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产业工人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核心。这个时期产业工人人数平均稳定在大约四百三十万。

建筑、运输、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人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中占有越来越显著的地位。至 1971 年，这些部门的工人人数达到四百万(在十年内增加了五十万)。

职员、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工业、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中的中、小企业主所占的比重大，仍然是意大利城市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职员人数大大增加了(增加九十万人)，1971年为三百一十万人。而且，相当大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和职员在劳动条件方面越来越接近工人阶级，同时，还效法他们的经济组织形式(工会)和斗争方法(罢工)。

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决定了普通教育的迅速发展，1969 年，在自立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到五十五万四千(1961 年为三十四万八千)，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人数增加到一百万。由于各种学校大量招收职员子女和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使学生的社会成分发生了质的变化。

“中左”议会联盟的形成 在上一个十年内就形成的所谓“中派”执政联盟越来越陷入同国内政治力量实际对比的矛盾之中。加入这一联盟的除天主教民主党外，还有两个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和共和党的代表，以及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整个战后时期每次新的选举都证明，国内除天主教民主党外，还存在两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政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民主运动的扩大，共产党人影响的增长，以及工会采取统一行动的趋势，还有天主教群众组织中左派的活跃——所有这些变化，向天主教民主党提出了扩大执政力量的群众基础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民主党的领袖们提出了建立一个社会党也能参加的中左联盟的思想。这是企图保证新的联盟能获得跟社会党人走的那部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支持。同时，按照中左联盟倡议者的看法，新的社会政治手法必然会使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孤立，并削弱他们在国内的影响。

经过这样一番解释，于是中左方针得到在那不勒斯召开的天

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1962 年 1 月）大多数代表（百分之九十）的赞同。

中左政治方针的思想得到意大利社会党领导层的响应。社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也支持这一思想。相反，自由党人和一些极右政党则展开了反对天主教民主党这一新方针的斗争。

共产党人对中左方针持反对立场。共产党认为，为了真正向左转，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开展争取深入进行社会改革的群众斗争。

1962 年 2 月 21 日成立的阿·范范尼的政府，被认为是意大 235
利历史上第一个中左政府。这个政府由天主教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在政府内没有社会党人的代表，但他们在议会内给政府以间接支持，从而由天主教民主党的反对派到同天主教民主党结盟迈出了第一步。

范范尼政府于 1962 年实行的最重要措施是，通过关于进行赎买使电力企业国有化的法令，关于提高优抚赡养金最低限额的法令，以及关于提高某些工种劳动者工资的法令。与此同时，在右派势力的压力下，范范尼内阁还在 1962 年 12 月就已放弃通过他所承诺的关于废除田租对分制的法令和实行区自治的法令。范范尼政府未能实现自己的纲领，结果引起 1963 年 1 月的政府危机。

1963 年 4 月 28 日的议会选举表明，左派力量的地位在加强。意大利共产党获得七百八十万张选票（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比 1958 年多一百一十万张选票。相反，执政联盟各党派的地位削弱了。天主教民主党差不多失去了一百万选民，在上届选举中它获得百分之四十二点四的选票，而这次获得的选票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三。

意大利社会党的影响有所削弱（1958 年它获得百分之十四点二的选票，而这次只获得百分之十三点八的选票），这同样是群众对社会党人所支持的政府工作表示失望的结果。尽管如此，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十五次代表大会（1963 年 10 月）仍然决定，社会党

人将参加“中左”政府。在党的左翼的压力下，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是以执政联盟承担废除田租对分制、实行区自治和实施“民主规划”的义务为前提的。所谓“民主规划”，即国家在民主监督下对经济进行计划调节。

“中左”政府 1963年12月，天主教民主党中最有远见的代表者之一，政治书记阿尔多·莫罗组成了中左内阁。除天主教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外，社会党人（彼·南尼和理·隆巴尔迪）也首次加入了他的内阁。但莫罗内阁碰到了因开始出现的经济危机所引起的困难。天主教民主党的右派要求冻结工资，以此使劳动人民负起危机的重担。这一建议引起左派的强烈抗议。1964年6月底，莫罗政府倒台。

新的中左内阁是在更温和的纲领的基础上经过极大努力才得以组成的。1964年7月22日莫罗第二次成立的中左政府，几乎完全放弃进行所承诺的改革。这届政府企图以限制劳动人民可能为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的所谓“收入政策”来消除经济危机现象。但工会的对抗粉碎了政府的这种企图。

因共和国元首安·塞尼身患重病，总统选举提前到1964年12月举行，这次选举使国内重新出现原已蕴藏的政治紧张局势。天主教民主党在尖锐的和旷日持久的竞选斗争中未能获得必要数量的选票，不得不放弃提出自己的正式候选人。12月28日，第二十一轮投票选举的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朱·萨拉盖特当选为总统。各左派政党其中包括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的支持，保证了他在选举中的胜利。选出同天主教宗教界无关的“世俗”总统，标志着天主教民主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严重失败。

在莫罗的第二届政府执政期间，围绕经济规划问题展开了尖
236 锐的斗争。垄断集团主张通过一项为大资本利益服务的多年的全国“发展计划”，并从国家预算中为这项计划拨款。工人阶级反对这项计划，提出了制定一个崭新的民主的经济计划的要求，目的是限制垄断组织的权利。共产党人和民主工会组织要求国家的“发

展计划"应规定通过保障就业，减少工作日、提高工资、实行社会保障累进制等途径来增加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应得份额的比重。他们坚持在规划的同时要实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农业改革、税收改革和信贷改革）。还强调必须吸收议会、地方政权机关和工会参加制定国家计划，以及监督计划的实施。

1965年1月意大利政府通过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按编制者的姓名，这项规划称为"皮耶拉蒂尼"计划）考虑了工会的某些要求：规定更快地发展南方的经济，更加紧增加住房建筑，与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成正比例地增加工资。但总的说来，计划远不符合工人阶级对规划所提的要求，从而遭到共产党人、左翼社会党人和工会的严厉批评。

1966年爆发了持续月余的新的政府危机。4月24日莫罗第三次组成政府（1966—1968年）。南尼仍为本届政府的副总理。社会党人在政治危机和第三届中左政府期间已提不出任何有独创精神的建设性规划。

1968年5月19—20日举行了例行的议会选举。共产党人在这次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获得八百五十多万张选票（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九），比上届选举多八十多万张选票，并在众议院中获得一百七十七席（1963年为一百六十六席）。天主教民主党的地位从形式上看略有增强，获得一千二百四十万张选票（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一），比上届选举多百分之零点八。但天主教民主党仍然没有在众议院中获得绝大多数席位：1963年该党在六百三十席中获得二百六十席，在1968年的选举中获得二百六十六席。同时，在该党的议会党团内左翼的地位增强了。

1966年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的统一社会党的惨重失败是选举的重要结果之一。该党在本届选举中共获得四百五十万张选票（占百分之十四点五），同上届选举中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共获得的选票比较，失去了一百六十万选民（即失去百分之五点四的选票）。

1968年的议会选举引起中左联盟的严重危机。乔·莱昂纳指定一些天主教民主党人组成了新内阁。由于参加中左联盟的政党之间及各党内部长期争论的结果，"中左"联盟才于1968年12月重新恢复。新的"中左"内阁由天主教民主党书记马·鲁莫尔领导。但政府的地位很不巩固，仅维持了半年左右就让位于由天主教民主党人组成的"清一色"内阁。但是，在天主教民主党队伍中左派的地位加强了，他们要求政府实行建设性的改革政策。在1969年6月底至7月初举行的天主教民主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代表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天主教徒劳动群众的不满情绪，他们表示不同意保守的多数派的路线。统一社会党内部就"中左"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辩论，于1969年7月以该党的分裂而告终。

237 **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建立新的民主多数派的方针** 在为深入进行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而争取团结劳动者的一切政治力量和建立新的民主多数派的斗争中，意大利共产党是最坚定不移的战士。意大利共产党在制定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战略时，经常强调民主斗争的现状同社会主义的前景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情况下召开了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62年12月)。党的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意大利"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早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民主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之间建立紧密的有机联系"仍然是党的"中心问题"。代表大会非常注意进一步制定"结构改革"战略，即对意大利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进行民主改革的战略。

代表大会号召团结天主教徒中一切进步力量，为争取社会的民主革新而斗争。在这一总的战略中还制定了党对中左派的策略路线。代表大会尖锐地批评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多数派在对天主教民主党的关系上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方针。代表大会指出，应当利用新的形势去建立一切民主力量的广泛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有工人阶级各个政党和天主教左翼参加的议会中的民主多数派。共产党认为，真正向左转的条件不是上层的谈判，而是扩大反对垄断组织的群众斗争和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一致。

陶里亚蒂再次主持了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领导机构。陶里亚蒂在其一生的最后这几年，集中精力进一步研究在国内建立广泛的人民联盟问题，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同天主教徒劳动群众的接近应当成为这一联盟的基础。他指出，宗教世界观不应当成为天主教徒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障碍。陶里亚蒂号召利用一切条件去保证所有进步力量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相互了解和接近，这一号召推动了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进一步开展对话。

1964 年 8 月 21 日，陶里亚蒂逝世，这是意大利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重大损失。在罗马向陶里亚蒂的告别，成了工人阶级、国内一切进步力量和全体人民的一次大规模显示团结的行动。参加追悼大会的有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其中也有苏共代表。

196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意共中央全会选出了路易吉·隆哥为党的总书记。全会宣布，党将沿着“陶里亚蒂同志指出的”道路前进。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66年1月)，肯定了在陶里亚蒂领导下奉行的党的政治路线。代表大会同意隆哥的总结报告，指出由于中左联盟放弃民主改革纲领的结果而使“中左”政策“退化”。代表大会在建议开始实行民主的经济规划时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一面提出这一口号，一面还要为争取国家的发展而奋斗，使这种发展能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代表大会指示党为深入进行国家改革而组织斗争，大会还特别注意了区的自治问题。隆哥在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工人阶级联盟的战略时说，共产党人要向天主教徒劳动者建议不仅就最低纲领达成协议，而且还要进行更广泛的甚至涉及社会主义前景的对话。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69 年 2 月)肯定地指出， 238

旨在孤立共产党人的“中左”政策已彻底破产，出现了“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权体制危机”。隆哥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危险的反动阴谋和专制趋势，这就要求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力量保持警惕，准备共同给予回击。隆哥在肯定了要建立一个民主力量的新联盟以代替“中左”联盟的方针后强调指出，“没有已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没有全国民主力量的压力，经过选举产生的大会的活动就必然会退化到议会主义和改良主义”。

意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再次选举了路易吉·隆哥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代表大会谴责了意共党内出现的“宣言派”极左集团的意识形态和实际活动，这个极左集团企图“论证”群众运动对党实行自治的观点。由于“宣言派”集团的领导人继续进行派别活动，意共中央全会于同年11月作出决定将他们开除出党。

劳动人民为改变国家的社会政策，为实现民主进步而斗争

“中左”联盟执政时期，劳动人民的经济斗争达到极其紧张的程度。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中起着先锋作用，它要求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对国民收入重新进行更合理的分配。

在这场经济会战中国内三个工会中心的统一行动大大加强了。其中居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意大利总工会。在六十年代，意大利总工会约有三百万会员。按人数和影响来说，天主教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占第二位，约有二百万会员(1970年)。第三个工会中心主要是亲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意大利劳工联盟，约有五十万会员(1970年)。意大利劳工联盟在六十年代也开始参加了阶级斗争。

各个工会行动的一致，保证了罢工斗争的极大威力和成效。还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奇迹”年代，罢工运动便进入了高涨时期。1962年是这个时期的顶点，当时参加罢工斗争的有六百五十万工人。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罢工斗争特别尖锐。在九个月内共

有一百二十万五金工人参加罢工。有六百万人参加了声援五金工人的总罢工。

罢工斗争的规模和各工会行动的一致，对改善国家集体合同的条件起了促进作用。工人的工资得到大幅度的提高。1960年，工资名义上增加了百分之六点六，1962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1963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但是，应当考虑到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每年增加百分之八。结果，意大利1963年的实际平均工资还大大低于“共同市场”的其他国家。

1962年，终于使禁止解雇孕妇法令得到通过。

在1964—1965年由于经济困难而出现的短暂的经济衰退之后，工人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1968—1969年，工人运动的高涨正好又碰上国内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六十年代末，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罢工总人数中意大利要占百分之八十。五金工人再次站在罢工斗争的前列。1968年，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
的工人和职员三次举行罢工。1969年末，五金工人开展了一个为 239
期三个月的新的斗争运动，在此期间每周罢工十二小时。他们达到了大幅度地提高工资，逐步实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和承认工会有监督劳动条件的权利的目的。

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也跟着汽车制造业职工和五金工人参加了罢工运动。南方的罢工尤为激烈，遭到了血腥镇压。1969年4月在巴蒂帕利亚市（西西里）警察开枪射击“圣卢恰”烟厂工人的游行队伍。约有二百人受伤，两人死亡。劳动人民对此采取



被警察的警戒线包围的茵诺森蒂机器制造厂的罢工工人。1965年5月

了全国抗议行动，提出了解除警察局武装的斗争口号。这一口号不仅得到了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所有三个工会中心、意大利社会党某些人士以及天主教民主党的四十三名议员的支持。

1969年废除了把南方一贯低于北方的工资水平固定下来的所谓工资地区等级表，是南方劳动人民取得的重大成果。

1969年9月，罢工运动达到了最高峰。"炎热的秋季"是在工人同企业主的顽强斗争中度过的，斗争结果签订了一项适用于五百万人的新的集体合同。合同规定：提高工资，每周工作时数从四十四小时减少到四十小时，以及完全恢复工会在企业中的权利。

在经济会战过程中，积累了三个工会中心统一行动的丰富实践经验，加强了劳动人民对组织上实现统一的向往。1968—1969年在企业中出现的工人阶级新的单一组织——车间代表和工厂委员会，是在组织上实现统一的一个重要步骤。车间代表由全体工人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不管这些代表属于哪个工会。他们后来被看作是组成未来单一工会的基层组织成员。工厂委员会得到企业主的承认，把它看作是有权代表工人签订集体合同的唯一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的建立，成了各工会组织上统一的新的推动力。

1969年6月召开的意大利总工会第七次大会，坚决要求把三个工会联合会联合起来。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在同年各自召开的大会上也都讨论了统一问题。1970年，三个联合会的总理事会举行了会议，会上通过了共同负责实现工会统一的决定。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中阐明了未来的统一工会组织的原则：它的阶级性、独立自主性、建立基层组织的民主原则和基
240 层组织的统一机构。但是，在天主教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导层中反共倾向仍未消除，因而妨碍了三个联合会的联合。

人民群众争取对国家进行深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造的斗争，是这十年阶级搏斗的核心。共产党提出的结构改革的口号得

到了千百万普通人的支持。为改进国家的保健、社会保险、国民教育、住宅建设等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把工人、职员、农民、青年学生、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妇女、领养老金者这样一些最广泛的人民阶层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对改革的各项要求越来越成为三个工会中心行动的具体口号。

在国内对分制佃农占优势的中部地区农村展开了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由于在五十年代的土地法令中对分制佃农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再次要求把他们所承租的土地交给他们所有。1962年范范尼政府提出的所谓对分制的法案不符合农民的利益，这个法案受到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的尖锐批评。1963年对分制佃农举行了全国性罢工，参加这一罢工的有一百五十万人。三个工会中心领导了这次罢工，但是未能达到废除对分制的目的。1964年通过的一项把对分制佃农收获粮食的分配比重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八（原来是百分之五十三）的法令是农民斗争所取得的最大成果。

为了改变国家在诸如社会保险、医疗服务和住宅建设等这样
一些极其重要领域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针而进行的声势浩大的罢
工，揭开了意大利阶级斗争史上新的一页。劳动人民争取优抚赡
养的改革运动也具有广泛的规模。1968年11月15日，有一千二 241
百万人参加全国罢工，支持要求修改现行的优抚金法。1969年2月5日，有一千八百万人在争取公正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口号下参加了总罢工。此外，在1969年“炎热的秋季”最紧张激烈期间还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参加这次总罢工的人数创意大利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达两千万人。那天，几乎意大利的全体劳动者都参加了罢工，要求实行民主的住宅政策。

强大的人民运动在六十年代末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成果。根据1969年的法令，各种优抚金增加百分之十，尤为重要的是，“浮动的等级表”的原则也适用于各种优抚金，即优抚金随物价的上涨而自动提高。

1969年12月，议会根据共产党议员和社会党议员的提案通过了关于劳动者权利的条例，条例恢复了工会在企业中的权利，包括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

1968年2月，关于成立区政委员会（在政治、社会经济和行政立法方面享有广泛权利的地方管理机构）法令的通过，是民主力量的巨大胜利。宪法规定了这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但为了使国家基本法的相应条款得到实现，却斗争了二十年。1970年6月7—8日举行的区政委员会选举的结果，显示了左派力量其中包括共产党人（获得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九的选票）的巨大胜利。在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翁布里亚组成了左派的区政委员会。国内出现了拥有八百万人口的"红色地带"，那里区的管理权掌握在左派——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左派天主教民主党人手里。

六十年代，工人阶级在共同的民主斗争中的同盟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以新的方式提了出来。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众在民主力量的共同阵线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展开的阶级搏斗的影响下，大学生政治化的过程加快了。青年大学生社会积极性的提高，还由于他们社会成分的变化，即他们中间小资产阶级、职员、知识分子和部分工农出身的比重扩大所决定的。对这些年青人来说，接受大学教育势必碰到物质方面的极大困难，他们往往没有可能结束学业。与此同时，教育制度本身越来越同大学生的利益和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发生矛盾。所以，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已成为意大利六十年代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

1963年春季，意大利全国大学生代表就几个主要大学生组织之间的统一行动问题达成了协议。于是全国首次掀起了大学生以"占领"大学形式表现的罢课学潮。在许多情况下，大学生得到了教师和全校人员的支持。1964年6月通过了全国争取大学民主化斗争日。这一天全国各大学师生都罢教罢课。他们向教育部长递交了要求高等学校管理民主化的请愿书。要求在大学成立有学生参加的委员会，成了这次学生运动的特有口号。

1965年议会开始讨论政府的大学改革法案。但是，这个法案没有考虑到大学生对大学机构民主化的要求，因而引起激烈的反对，并遭到了议会的否决。青年学生也反对这个法案。1966年秋 242
（在10月和以后的12月），大学生又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罢课。在许多城市内，大学宿舍和教室几天之内就被青年学生所占领。

1968年春，学生运动再次大规模展开，引起了意大利全国的注意。这次学运持续了三个多月，约有五十万男女学生参加。青年学生重新占领教室达几个星期之久，并击退法西斯喽啰们的袭击。米兰一所天主教大学的学生们举行了五天的绝食罢课。帕尔马的男女学生占领大学二十四天，迫使当局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有权建立学生管理大学的最高机构——全体大会，学生组织有自治权，该组织的刊物有出版权。一些城市派出警察来对付大学生。当警察不顾罢课者的抵抗而占领了几幢教学大楼以后，进步的教师就发表了致莫罗总理的公开信，要求警察撤离大学区。

从六十年代中期起，青年运动开始越出了大学生特殊要求的范围，越来越具有政治倾向性。1965年5月，罗马大学生成了青年争取越南和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发起人。

大学生积极反对新法西斯组织"全国行动大学阵线"活动中的恐怖手段。1966年4月，罗马大学展开的反对新法西斯分子的斗争特别激烈，这场斗争甚至成了议会辩论的对象。罗马大学的学生在民主舆论的广泛支持下迫使亲法西斯的校长提出了辞职。

学生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极左集团的影响。当六十年代中期学生开始和工人建立联系时，极左集团企图把这种主动性作为证实自己关于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个理论的根据。但这种野心已被事态进程的本身所粉碎。工人把巩固同大学生联盟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共产党人为使学生运动摆脱左倾理论的影响而进行了斗争。共产党考虑到学生运动客观上的反资本主义倾向性，力求把这一运动同一般民主运动联系起来，提出的"工人和大学生共同斗争！"的口号，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因而六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不仅具有激进的民主性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

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 克服工人运动中加强了的右的改良主义倾向，成为六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自从意大利社会党的左翼退出该党以后（1964年1月），南尼所领导的右派就得以在党的第三十六次代表大会上（1965年11月）作出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合并的决定。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66年1月）赞成加快合并的过程，为此而专门成立的两党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未来党统一后的原则、政治行动和组织的宣言。被社会党人看作是“统一宪章”的这个文件宣布，行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发展群众斗争，而是通过参加政府的途径“从内部对国家进行改造”。宣言中还有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共产党人划清界线的论点；只有在反对右派势力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防御斗争中才可以同共产党人采取暂时
243 的共同行动。宣言还写道，社会党人承认“由于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而按照公约对防御的解释所承担的义务”。

1966年10月，在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分别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和通过了统一宪章。里尔·隆巴尔迪和费·杉蒂在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这个文件，并反对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他们不同意宪章中那些关于承认北大西洋公约、同共产党人划清界线和实行使工会分裂的方针的条款。但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投票赞成通过宪章。同月，举行了统一社会党的成立大会。南尼担任该党主席。共产党对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作了否定的评价，因为这种合并是建立在右倾改良主义和反共的立场上的。

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政治力量重新进行如此重大改组的时期，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该党于1964年1月在罗马建立，由退出

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社会党人所组成。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赞成在争取民主斗争中实行不以资产阶级为转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并宣布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该党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目的是揭露那种仿佛社会党人参加了“中左”政府就会出现“阶级调和”的幻想。同时，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方面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党过低估计了反垄断斗争的意义，而提出直接选择社会主义的战略。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思想纲领中的这些因素削弱了它影响意大利广大劳动人民阶层的能力，缩小了党参加竞选的基础。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在成立后共有十八万党员。在1968年的议会选举中党获得大约百分之四点五选民的支持。

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同共产党一起反对“中左”政府政策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反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赞成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该党对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总的来说向左转这一过程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相反，社会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的做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是不成功的。在1968年10月举行的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同天主教民主党人的政治联盟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南尼关于支持“中左”联盟的决议以通过决议所必需的相对多数票（百分之三十四）勉强通过。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统一社会党决定仍采用意大利社会党的传统名称。南尼再次当选为该党主席。在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十一月全会（1968年）通过的决议中，该党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赞成恢复同天主教民主党的联盟，以及主张“在防御和地理限制的前提下”保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意大利社会党新的右倾路线在党内引起极大的不满。党的左翼代表认为，为深入进行社会改革和改变政府的外交方针而斗争是必要的，并提出恢复同共产党人的合作问题。在1969年7月4日的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全会上，大部分与会者拒绝支持右派领导的立场，并要求在国内和国外政策的问题上修改党的路线。右派

集团（一百二十一名中央委员中有三十六人）遭到失败后便离开全会，于第二日宣布成立新的政党——统一社会党。但是这一行动没有得到社会党人的广泛支持，跟分裂主义者走的只是党内少数人（约占党员的六分之一）。

244 这样，社会党人（意大利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人（统一社会党）重新成为政治舞台上两支独立的力量。统一社会党继承了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妥协和反共立场。至于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已形成克服“中左”观念并建立“新的联盟”包括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趋势。党的新书记弗朗切斯科·马蒂诺是这一趋势的代表者。南尼辞职，他对意大利社会党的方针已不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六十年代下半期，在部分意大利工人阶级中，主要是在青年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得到了传播。一些客观原因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基础。各种社会矛盾的大大激化和社会党人在“中左”框框内改良主义政策的破产，是产生极左思潮的原因。因此，青年产生了革命急躁情绪，渴望把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游击武装斗争形式应用于本国。毛主义的宣传对左倾情绪的传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极左”分子反对任何合法斗争方式，只指望发展武装斗争，举行起义。反共反苏，是极左分子思想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特点，但是除了这些共同的特点外，各左倾集团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始终是一盘散沙。

六十年代末，在意大利北方“极左”分子开始建立秘密的武装集团（“红色旅”、“爱国行动队”等），这些集团主要由青年中的阶级蜕化分子所组成，该集团的性质和组成使法西斯奸细容易混入其中。

共产党坚决谴责了极左分子的思想和实践。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对劳动者阶层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同工人运动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一样，反左斗争促使劳动群众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

新法西斯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战略” 六十年代下半期，意大

利的新法西斯分子开始猖狂活动，他们是一股敌视工人阶级同时又反对天主教民主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第三势力”。1965年6月召开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恢复行会性质的法西斯国家的方针。过去曾任墨索里尼政府部长的乔治·阿尔米兰特是这个时期新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之一。他在战争年代曾同占领意大利的希特勒分子合作过。阿尔米兰特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1970年)发言时号召扩大法西斯活动，继续“冷战”，并建立“反共统一阵线”。他提出了一个要使意大利社会运动党成为执政党的任务。

六十年代末，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共有二十万党员。在1963年4月和1968年5月的两次议会选举中，新法西斯分子分别获得一百六十万和一百四十万张选票(占百分之五点一和百分之四点四)。1970年的市政选举和区的选举表明，新法西斯分子的选民比1968年增多了，达到百分之五点三。在南方的一些落后地区，新法西斯分子获得的支持者人数最多。

六十年代末，新法西斯分子在为扩大选民而斗争的同时，加强了恐怖活动。在左派组织办公处、民主报刊编辑部、司法机关大厦、学校和铁路制造炸弹爆炸事件。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口头上竭力否认这些行为，千方百计掩盖自己同恐怖集团的联系，为此而使 245
用了使右派恐怖分子“渗透”到极左组织的独特策略。结果，新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常被社会舆论认为是极左分子干的勾当。

1969年秋季，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达到高峰时，新法西斯分子的行动也开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1969年12月12日发生了两起最大的挑衅事件：那天，在罗马和米兰人数最多的地方同时发生炸弹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些暴行的肇事者都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新法西斯分子因不受制裁而继续实行其“制造紧张局势战略”。1970年期间，他们进行了一千余次的挑衅活动，其中有五十四起炸弹爆炸的恐怖事件和三十二起纵火案。新法西斯的企图是

在国内造成恐怖和不信任气氛，引起居民对一个有能力建立"秩序"和防止现有制度受到"左的威胁"的"强大政权"的怀念。新法西斯分子继续制定国家政变计划。1970年在"黑公爵"瓦·博尔盖塞领导下炮制了一个当前计划。这位古老氏族的后裔还在五十年代就同新法西斯党联系在一起，有一个时期甚至担任了该党的名誉主席。1968年末，他退出了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建立了"全国阵线"这个武装组织。博尔盖塞依靠这个匪帮中的喽啰们同军队中的某些高级将领拉上关系，于1970年12月制定了代号为"南极洲"的武装夺取政权计划，但博尔盖塞在最后时刻，感觉到行动面临失败便取消了这次行动而逃至国外。

政治形势的恶化要求民主力量经常保持警惕，积极行动起来挫败反动派的计划。为此，共产党不断发出号召。1969年冬季，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反法西斯政党及工会举行了一系列罢工和群众集会，要求制止新法西斯分子的活动。民主力量的团结，消除了反动集团在国内制造内战的气氛。

六十年代意大利的外交方针和左派为争取对外政策的转变而进行的斗争 六十年代初，忠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核心。随着中左联盟在意大利取得政权，开始明确规定国家在北大西洋联盟范围内所承担的义务是"有限的"和"防御性的"。

意大利共产党赞成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奉行的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政策，并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行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62年)强调指出，为制止战争而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急的日子里，意大利共产党坚决支持古巴。这一立场表达了意大利劳动群众的思想，他们以声势浩大的、支援自由岛国的罢工和集会，来回答美国对古巴的威胁。在意大利的许多大城市，不顾当局的禁令而举行了示威游行。明确表态的国内社会舆论迫使政府正式表示赞成通过联合国来和平解决古巴问题。

意大利共产党在1966年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要求“中左”政府宣布意大利拒绝参加使用原子装备和防止西德染指核武器。意大利共产党谴责以色列1967年6月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它还反对利用撒丁岛上的外国基地去帮助侵略者。

在意大利，保卫越南运动的规模浩大。1965年春季，全国举
行了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群众示威游行及和平行军。参加的有共
产党人、社会党人、左派天主教徒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年底，意大 246
利劳动人民募集了援助越南基金共一亿四千余万里拉，并用这笔
款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医院购买了设备。

1967年11月，根据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达尼洛·多尔奇所领导的委员会的倡议，在意大利举行了有好几千人参加的“争取越南和平与自由的行军”。两支行军队伍——一支从米兰出发，另一支从那不勒斯出发——长途跋涉至罗马。途经全国的多日游行以在首都举行群众集会而宣告结束，会上通过了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决定，信中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越南的‘肮脏战争’，撤走自己的军队，并给苦难深重但却是英雄的越南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声援越南人民的运动，影响了意大利政府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中左内阁一方面仍然向华盛顿表示对美国越南政策的“理解”，但同时又极力避开这场“肮脏战争”。1965年意大利政府宣布，越南不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的行动范围，所以意大利在这个地区不承担任何义务。

1968年，外交部长范范尼在议会上演说时表示，同意通过谈判途径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但是拒绝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意大利政府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罗马会见时，范范尼也表示了同一立场。

五十年代末意大利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出现的积极变化，
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尤其是意苏经济关系有了顺利的发展。 247
1961年2月签订了意大利和苏联1961年贸易额协议书，同年7

月又签订了1962—1965年贸易额协定，协定规定相互贸易额要比1958—1961年增加百分之八十。1967年意大利和苏联两国政府就经济和科技合作问题达成的协定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参加下，在苏联陶里亚蒂城开始建设伏尔加汽车制造厂。1961年8月2—5日，意大利总理范范尼和外交部长塞尼应苏联政府邀请抵达莫斯科进行访问。1966年4月，葛罗米柯访问了意大利。这是继1922年格·瓦·契切林前往参加热那亚会议之后由苏联外交部长率领前往意大利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团。在1967年1月苏意最高级谈判过程中，双方主张支持召开讨论欧洲安全和合作问题的全欧会议，并表示同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第六章

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 248

六十年代是北欧各国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与五十年代相比这些国家的工业增长已大大加快，并且超过了西欧的平均指标。加工工业是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其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六十年代结束时，北欧各国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种重要工农业产品方面，在捕鱼和海洋运输方面都位居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

上述国家在前十年中发展经济的共同趋势，在六十年代仍然没有变化——主要是发展加工工业的出口部门，首先是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以及劳务领域。瑞典、挪威和丹麦的农业和捕鱼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70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到九，芬兰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冰岛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

生产的积聚过程、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过程以及两者的国际化过程加快了。瑞典在这方面发展最快。1970年全国大约四分之三的工业产品、投资和出口额都集中在两百个最大的企业。六十年代生产积聚最常见的方式是合并（全部或部分的合并，即在同一部门中大公司被最大的公司所吞并）及在生产和销售领域签订合作协定。某些同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财团，实力进一步增强。

北欧各国国营企业的规模同以前一样比不上英、法、意等西欧国家。以瑞典为例，国营企业的产品在工业品总产量中仅占百分之五到六。但是，由于实行高额税收，实际上归政府占有和分配的国民产品的比重在北欧属于资本主义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1970年税收和企业的优抚基金提成两项合计，占瑞典国民生产总

值的百分之四十六，占挪威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四，丹麦的百分之四十一，芬兰和冰岛的约百分之三十。六十年代，学习“共同市场”国家经验而实行的间接营业税和附加价值所得税比直接税的增长还快。

日益增长的军费和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范围不断扩大的研究工作所需经费，都从这些巨额税收资金中开支。给私人企业的财政援助也来自这批资金。社会救济所需费用基本上也靠这些资金来满足。

249 北欧各国的社会救济制度比较发达，但这抹杀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这些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工人仍然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但是，工人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人数居第二位的（尽管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集团是职员——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职员队伍的增长速度还在加快。例如，瑞典加工业的工人数量十年内几乎没有增加，矿业和运输业工人人数还有所减少，而同一时期科技专家的人数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总的说来，靠工资生活的人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递增，而自谋营生的小企业主，特别是从事农、林、渔业的小企业主的人数却是递减。

甚至在冰岛这样的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中，渔民、农场主及其工人在自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960至1970年间也从百分之二十三下降到百分之十七。丹麦从事农业和渔业的就业人员在自立人口中所占比例十年间也从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九。国家和市政机关，保健和国民教育部门以及科研机关和社会救济部门的就业人员人数和比重上升，这是六十年代的显著特点。十年间，上述各国这部分劳动者的人数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瑞典的增长率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居民民族成分的单一性已成为过去。在土著居民大批移居国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人涌入这些国家。这方面最突出的又是北欧最发达和最大的国家——瑞典。六十年代末，瑞典八百

万居民中，有六十万人是外籍出身，他们中有四十万人，即占人口中的百分之五还没有取得瑞典国籍。移民工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一般都从事低报酬劳动。他们组成了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社会"底层"。大部分妇女劳动者和青年也属于低工资劳动者。

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苏联奉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积极政策，民族解放斗争不断高涨，西欧在经济上发生分裂，在上述种种因素影响下，国际政治也变成了北欧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目标。在本章所述的十年期间，一多半时间是在反对核武器和核武器试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反对加入"共同市场"，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度过的，在这些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是青年学生。六十年代后五年他们受"新左派"左翼激进团体的领导，而这些"新左派"本身是存在着种种矛盾和模糊认识的。

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中，基本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除荷兰外，大体与过去基本相同。在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社会民主党继续保持着势力最强的党的地位，它们在选举中获得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选票。在冰岛，保守的独立党在国会中起着主导作用，也占有相对的多数。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国内政策宣传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体现，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范例。实际上北欧依然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的一种类型，其特点是：国家主要依靠私人财政资金对国民经济实行间接的调节；基本上依靠国家，同时也由私人企业主提供经费建立发达的社 251
会救济制度；政府在代表居民各社会集团的最有势力的全国性组织参与下作出重大的经济决定；通过企业主和工会中央组织之间的全国性协商定期协调劳资关系，首先是调节各类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增长速度。北欧型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丝毫没有帮助这一地区摆脱通常的阶级斗争。六十年代末期，北欧各国和整个西方世

界一样再次出现了阶级冲突的激化。

六十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群众反对本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德军国主义复活的运动十分活跃。丹麦和挪威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也加入了这一运动。但是，这些党同工人运动和工会的联系是很薄弱的；他们想领导左翼反对派却力不从心。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地位开始有所加强。

六十年代，除芬兰外北欧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加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政党却加强了团结，因此得以先后上台执政（1965年在挪威，1968年在丹麦）。本章所述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得到加强，如挪威和瑞典的中央党（过去的农民党），丹麦的激进左翼党（激进的自由党）。而大资产阶级、高级官员和地主的传声筒——保守党的地位，除丹麦以外，均遭到削弱。

北欧各国对外政策的总方向和主要内容没有发生变化：瑞典“不结盟”；丹麦和挪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军事机构，但声明，和平时期不得在其领土驻扎外国军队。冰岛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但不派本国军队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允许该组织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芬兰不仅不参加军事集团，而且根据1948年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苏联保持友好合作的密切关系。

所有北欧国家都拒绝获得和部署（瑞典还拒绝生产）核武器并在相应的国际协定上签了字。但是，除冰岛和芬兰以外，所有北欧国家都在充实自己的军事潜力：丹麦和挪威（范围较小的还有冰岛）扩建了本国的永久性军事设施，以适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务和需要。

北欧国家继续相当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并力图在联合国内采取统一立场。同往常一样，他们的代表多半是同西方大国唱同一个调子，但是，与裁军，特别是与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有关的问题是例外。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地位日渐削弱，由于北欧各国国内民主运动的冲击，六十年代末，瑞典（态度最为坚决）、挪威、丹麦和冰岛第一次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北欧各国，首先是芬兰，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积极地支持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实行全欧和平合作的主张。六十年代期间，北欧各国同苏联的商品交换显著增长，并且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文化交往，社会团体之间的接触均有扩大。苏联政府领导人首次对瑞典、挪威和丹麦作了正式访问。

六十年代初期是北欧国家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961 年芬兰作为联系成员国参加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70 年冰岛也参加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工业品相互贸易中关税的取消 251
刺激了北欧内部的贸易流转额。到六十年代末期，北欧各国相互的进出口贸易在各该国对外商品交换中已占居主导地位。只有瑞典和冰岛例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瑞典的进口额中占第一位，而在冰岛出口额中美国居于领先地位。

上述国家集团在协商组织——北欧理事会范围内的合作关系日益巩固。1962 年北欧理事会五个成员国签署赫尔辛基协定也是这一关系加强的表现。这项协定是“参加国愿意在法律、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以及在交通问题方面进一步保持并发展各国之间合作关系”的内容广泛的声明。协定签字国保证力求使北欧各国家公民在权利方面享有最大限度的平等，尽力使各国民法和刑法相互接近。各方同意对国际组织中讨论的问题尽可能地相互进行磋商，并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等问题上协调各方的行动。由此可见，六十年代北欧各国即已形成一种独特的合作关系。在保持完全不同的外交方针的情况下，这个合作关系在全面而现实的一体化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1. 瑞　　典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交替时期，瑞典的经济进入了战后

年代的最高涨时期。按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百分之五，工业生产增加率为百分之八，劳动生产率增长为百分之四。出口额的增长幅度也相当可观，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点五。1966 年至 1967 年间，由于瑞典主要出口货物在世界市场的价格下降，经济形势出现明显的恶化。以后又出现复苏，六十年代是在经济高涨形势下结束的。

由于经济发展顺利，瑞典的国内局势比北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稳定。塔格·埃兰德在打破了总理任期的纪录（从 1946 年任首相至 1969 年）以后把领导政府和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权力移交给了年仅四十二岁的原教育部长帕尔梅·乌罗夫。在 1960 和 1964 年的国会选举中，执政党因缺少百分之几的选票，未能取得绝对多数。在与资产阶级反对派意见发生分歧时，共产党的代表证书保证了社会民主党内阁的必要多数。共产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64 年 1 月）以后对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纲领，保证工人和职员的就业，实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将大的保险康采恩收归国有，同物价和房租的上涨作斗争，并由政府进行监督。在 1964 年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八票，比原来的五票增加了三票。


斯德哥尔摩各界人士举行争取和平和民主的示威游行。标语牌上写着："美国从越南滚出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滚出斯堪的纳维亚！" 1969 年 5 月

在整个六十年代，瑞典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同西欧各国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工业部门平均每小时劳动报酬几乎增长了一倍。劳动者取得了许多新的重大社会成果。从 1963 年起，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由企业主按服务年限发给。医疗津贴三分之二

由企业主和国家支付，只有三分之一是由劳动者缴付的保险金中支付。

但是，瑞典这个“全面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组成 252
部分。它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同样深刻的矛盾，它又是一个小国，经济带有极为明显的出口色彩。因此，它直接和间接地受着国际经济行情的支配。消费品价格上涨（十年内上涨近百分之四十），沉重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负担（占个人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高额的房租，不断增长的劳动强度和六十年代末期变得特别严重的失业威胁，所有这一切为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这一尖锐的阶级斗争并未因实行重大的社会优惠办法而有所缓和。劳资关系依然由战前的，甚至是本世纪初的法律和协议予以规定。企业主可以随意地雇用和解雇工人或职员；在集体条约有效期内罢工遭到禁止并会受到法庭的惩处。

1969年末爆发了未经工会领导允许的“野蛮”罢工的新浪潮，这次罢工浪潮一直持续到后两年。最先爆发的大冲突是哥德堡码头工人的罢工，特别是1969年末至1970年初冬季国营铁矿公司所属企业在瑞典极圈地区内工作的五千名矿工为期两个月的罢工。这些罢工开始是自发性的，随着罢工的进展不仅提出了纯经济性要求，而且还提出了政治性要求，归结起来要求改变那些使企业主在生产中享有无上权力而限制工人罢工权利的清规戒律。

极圈地带罢工者的胜利引起了全瑞典的注意。这一胜利表明了进行阶级发动的巨大可能性，对工会领导集团和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声援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运动强有力地推动了激进思想的成长以及后来群众性民主运动的发展。瑞典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支持越南人民的团体。1966年春这些团体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支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联合会”。参加这些团体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尽管这些团体在思想上是五花八门，但它们的活动对全国社会舆论并且间接地对瑞典执政党和政府产生了十分积

极的影响。

在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和青年日益激进的情况下，执政党虽在选举中连续两次遭到失败，但却再次地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和生命力。1907年以后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于1967年首次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措施。1968年议会选举前夕才最后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积极的经济政策纲领"规定，国家要比迄今为止更积极地参与解决工人的劳动就业和再训练，以及预防失业和救济失业者，并加强瑞典经济发展中的计划性原则。党和工会的领导人甚至慷慨激昂地尖锐批评那些不打招呼就关闭自己企业的公司。由此可见，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企图采取同资产阶级的党划清界线的做法，对国内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作出响应。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瑞典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放弃其同大资本的合作。

各资产阶级党为参加1968年的议会选举暂时停止了相互的攻击。它们异口同声地呼吁选民把政权交给反对派，对瑞典的"社会主义化过程"规定出一个极限。

在1968年的选举中，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获得了过半数选民的选票。恢复了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只有一个最左倾的党——中央党的地位有所加强。1968年9月的选举是瑞典按照旧的选举制度进行的最后一次选举。1969年获得最后通过并于1970年生效的选举制度改革规定，改两院制为一院制，由三百五十名代表组成，议会代表由年满十九岁的全体公民投票选出，任期为三年。选举采取直接投票和严格地按比例选举制。在一个区至少得到百分之十二的选票或在全国得到百分之四的选票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议会和市政选举同时进行。

六十年代瑞典的外交仍然十分积极。瑞典代表对核裁军问题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恩顿(1962年前任瑞典外交部长)关于建立"无核大国俱乐部"的计划实质上是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前奏。但与此同时，瑞典在继续加强其常规军备，其军费开支按人均

计算在世界上占居首位。由于存在着非生产性的军费开支，加之瑞典领导人不愿意无条件地彻底放弃核武器计划，因此常常招致国内进步人士的批评。这些人士还严厉抨击政府在大公司和右翼政党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那种力图使瑞典和"共同市场"保持联系的倾向。

瑞典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越来越尖锐地谴责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为。瑞典当局为那些不愿参加"肮脏战争"的美国军人提供避难所。斯德哥尔摩成了爱好和平力量就越南问题举行国际会议的场所。当时任瑞典内阁成员的帕尔梅在1968年2月声援越南人民的示威集会发表演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从这以后美国定期召回其驻斯德哥尔摩大使，以表示华盛顿对瑞典政府的不满。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瑞典于1969年率先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瑞典政府给非洲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提供支援，同时力图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对这些运动，以及对年轻的独立国家施加影响。瑞典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六十年代末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援助款额达五亿克朗，换句话说，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三。

六十年代瑞典同经互会国家经济交往发展顺利。1970年经互会成员国在瑞典对外贸易额中所占比重超过了拉丁美洲国家所占份额（经互会国家在瑞典进口额中占百分之四点七，拉美国家占四点三）。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交往的扩大，反映了瑞典同这些国 254
家关系的全面改善。从1964年起，定期举行高级领导人的会晤已成惯例。1967年苏瑞两国签署了领事协定，此后双方分别在哥德堡和列宁格勒开设领事馆。瑞典政府积极支持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的全欧会议。两国政府在越来越广泛的问题上观点吻合。1970年夏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莫斯科会谈成功便是这一反映。谈判结果，瑞苏两国签订了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强调愿尽一切力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扩大互助合作。

2. 挪　威

六十年代挪威的工业发展速度相当高。以1959年为一百，1970年采矿工业增长指数为二百三十一，加工工业为一百七十九，电力生产为一百八十四。挪威商船队居世界第四位，1959至1970年期间总重吨位由一千万吨几乎增加到两千万吨。仅有三百八十万人(1970年)的一个国家，其经济所表现的出口特点是非常明显的。1970年，商品和劳务出口占挪威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八(丹麦为百分之三十四，瑞典和芬兰仅百分之二十八)。挪威工业的主要出口部门仍然是电炉冶金业，电化学部门，木材加工和鱼罐头工业。

在本章所述时期内，挪威经济发展较北欧其他国家更为平衡和稳定。挪威同样存在着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赤字和外债问题，但比较不那么尖锐。不过，挪威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又
255 超过北欧其他国家，外国资本在挪威占据的阵地相对说来比在瑞典和丹麦更强大。据1970年统计，外国资本在挪威经济中所占比重估计为百分之二十五。外国投资集中在工业出口部门。

以Э·基哈德森为首的挪威工党政府在进入六十年代时，掌握着议会中压倒多数的席位，这是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从未作到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也只是偶尔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挪威执政党队伍内部的反对派势力日益增强。这首先表现在对外政策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有“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以及以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周刊《方针报》为核心的一个团体。反对派提出的主要要求是，挪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单方面实行裁军。1961年春，《方针报》的活跃分子被挪威工党开除出党，不久，他们另建社会主义人民党，这个党实际上就是左翼社会党。

在1961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两个席位，而挪威工党失去了四个席位，因而也失去了议会中压倒多数的地位。挪威工党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各占七十四个席位。为了继续执政并对

付来自左翼的批评，社会民主党人允诺“继续进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运动”，扩大国营成分和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性原则。1962年工会和企业主组织达成协议，实行工龄补助救济金，这项补助金三分之二由企业主支付。

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续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对挪威工人党的分裂感到鼓舞，对挪威工党扩大经济中国营成分的做法极为不满，正伺机推翻政府。1963年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当时国营“金斯贝”矿（斯匹次卑尔根岛）发生事故，二十一人死亡，事故原因调查表明，矿井安全设备十分糟糕。

在议会定期选举前夕，基哈德森内阁加紧采取了一系列受人欢迎的措施。基本上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国家用于社会救济的支出在1961年至1965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从1965年起对工人和职员实行工资照付的月休假制。

尽管如此，在1965年的选举中，资产阶级政党依旧获得了微弱多数。组成了以中央党首领农艺师佩尔·博顿为首的保守党、自由党、中央党（原农民党）和基督教人民党四党联合政府。

资产阶级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历届前任政府的方针。从1967年起实行新的统一的社会救济制度。这项制度的主要新东西是把工会救济金制度扩大到全体公民。1970年起，还给每个不满十六岁的儿童发放补助金。

然而，垄断集团对政府的压力日增，它们的喉舌就是保守党的代表。于是，使企业主感到满意的税收方案通过了，制订对企业管理实行民主改革计划的工作也停顿下来了。与此同时，联合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共同市场”态度问题上的分歧也日趋尖锐。1969年的议会选举表明，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保守党和自由党地位削弱，而挪威工党的地位有所加强，社会主义人民党则丢掉了自己的席位。

这十年是挪威人民群众，首先是青年群众在关心国家对外政策、国防和整个国际关系中重大问题方面的积极性不断高涨的十 256

年。各种各样反对原子武器、反对挪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策划中的与"共同市场"实行一体化，以及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组织和运动相继出现。

挪威在外交上依然保持着亲美的"大西洋"方针。它在国内广建机场、码头、仓库、交通道路和通讯设备，以适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需要。然而，挪威历届内阁都确认实行不设基地和不部署核武器的政策。在苏联边境附近继续保持低水平的军事力量，也不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演习。挪威工党对挪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也持否定态度。

挪威社会舆论对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作出了十分强烈的反映，甚至连政府成员，虽持谨慎态度，但也批评了美国的行为。1965 年末挪威成立了声援越南人民委员会，参 加委员会的有社会主义人民党和挪威共产党，以及挪威工党青年组织的代表。举行反美示威已成为常见现象。1967年秋，挪威外交部长、保守党人吕恩在联大会议上呼吁美国不带先决条件地停止轰炸越南，作为走向和平谈判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挪威同苏联的关系有了改善，它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合作也有所扩大。

3. 丹　麦

丹麦由农业工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大约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优先发展的是生产效率高的工业部门：电子工业、造船业、柴油机制造业、冷冻设备和自动翻砂设备制造业、浓缩食品和药剂生产。丹麦的工业产品原先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国内需要，如今在国际市场上已成为颇具竞争能力的产品，某几种产品甚至处于垄断地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六十年代前五年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瑞典。总的说来，在这十年间丹麦的工业生产翻了一番，而工业品的出口增加了两倍。

丹麦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早建立农工综合体，也就是

说更早组织高度集约化农业和为农业服务或为农产品加工的工业和贸易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丹麦是世界猪肉、黄油和干酪三大出口国之一。六十年代，丹麦农业生产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农产品加工、运输和销售均有改善，农业机械、肥料和饲料生产均有提高。

与此同时，丹麦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行情的波动越来越敏感。这个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虽然对丹麦工业结构现代化的过程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方针，但仍无法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66年起每年的消费价格水平增加百分之六到七。

丹麦国内政治局势不如瑞典稳定。

经过1960年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建立了由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分子(激进自由党)组成的政府。原外交部长、财经问题专家茵斯·奥斯·克拉格任政府首脑。不久他又担任了丹麦社会民主党 257
主席。在上述十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克拉格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他所领导的内阁奉行右翼改良主义路线。

1966年的议会选举显示了强烈的向左转的倾向。执政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丢掉了七个席位。社会主义人民党人获得了二十个席位。丹麦议会第一次出现了工人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多数派，这是选举产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失去了若干议席。社会主义人民党不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政府，但答应在议会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



丹麦和平拥护者的队伍开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弗伦斯堡市会同西德禁止原子武器的队伍一起举行联合群众大会。

1963年4月

资产阶级宣传机构喋喋不休地宣传丹麦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向左转的倾向，说它受“赤色”社会主义人民党人的控制。而实际上所谓“工人多数派”时代的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却使劳动者大失所望。它仿效“共同市场”各国的做法，在商品生产和销售各环节上征收新的间接税，从而损害了低工资收入的劳动阶层的利益。政府的政策对解决国家复杂的商业支付问题毫无促进。1967 年 11 月英镑贬值之后，丹麦克朗也随之贬值，这就要求采取种种措施以制止即将出现的物价上涨。措施之一就是要取消预定实行的工资的“物价补贴”。但是，政府关于冻结物价补贴的立法草案却被资产阶级反对派和脱离社会主义人民党的左翼所否决。克拉格当即决定于 1968 年 1 月进行新的选举。

在这次选举中“工人多数派”政党失去了十六个席位。议会中的多数又转到了资产阶级政党一边。这一次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和激进党人之间达成了协议，组成了包括所有主要资产阶级党派代表在丹麦历史上第一次的联合政府。激进党领袖、包恩斯戈尔律师担任政府首脑。

新政府大力缩减财政支出。但是，对外贸易收支中的赤字仍不断上升，以致 1970 年的外汇储备低于 1964 至 1967 年时期。由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工会，已不象过去那样同情或迎合政府愿望了。丹麦的罢工斗争本来就比瑞典频繁，更不用说比挪威了。六十年代末期，丹麦的罢工斗争更有所发展，1968 至1970 年期间每年参加罢工的人数已不再是 1962—1967 年的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而是三万到五万人。1967 至 1968 年期间，“野蛮的”罢工之外，还爆发了大学生要求改革大学管理和教学的罢课活动。

六十年代末期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高涨，是先进的丹麦舆论界积极参加反对核武器和核试验（六十年代前五年），以及反对美国侵略印度支那（六十年代后五年）的群众运动促成的结果。多年来，反对丹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重新武装西德和同西德

进行军事合作，特别是反对西德联邦军在丹麦建立仓库和派兵驻扎的运动从未间断。哥本哈根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青年奋起反对1967年春在希腊进行的反动谈判，声势十分浩大。

1960—1961年间，国际紧张局势加剧，这为丹麦统治集团将其武装力量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实行一体化提供了方便。1961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了一个包括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其毗连地区在内的联合司令部（“波罗的海司令部”）。

“波罗的海司令部”的建立在参加政府的另一个党——激进党内部引起了尖锐的分歧，这个党过去就曾投票反对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5年，克拉格政府曾表示，丹麦可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但条件是有权退出这个组织，只要提前一年通知即可。

1969年丹麦国会以压倒多数票批准丹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丹麦派代表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种新的机构，如原子防御委员会。与此同时，在整个六十年代期间丹麦曾多次申明，恪守不在其国土设置基地的政策。

北欧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过程也影响到丹麦，在发展对苏关系和支持召开全欧安全和合作会议的主张方面，丹麦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中所有其他小国更为积极。六十年代末，丹麦和苏联经济贸易交往增多。1969至1970年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1970—1975年的长期贸易协议，1970—1972年文化和科学技术纲要等等）。

4. 冰　岛

冰岛是高度发达的、面向国外市场的单一渔业国。六十年代冰岛经济发展极不稳定。1962至1966年期间出现过繁荣景象，但伴随而来的是冰岛出现了北欧最严重的通货膨胀。1967至196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低于1966年。1966至1968年对外贸易额的出口总值下降百分之四十二。衰退带来的后果是，冰岛克朗两次贬值：1967年贬值百分之二十五，1968年贬值百分之三十五。

六十年代冰岛曾为克服工业发展中的单一性作过努力。它依靠外国的巨额投资，加紧开发水利资源，1967年着手建设铝厂——这个岛国建立重工业的开端。

在本章所述时期内，冰岛是由保守党人（独立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冰岛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先后领导政府的都是保守党领袖——先是O·托尔斯，1963年起是B·本内迪克森。历届联合政府都想通过进口自由化（特别是从1963年起），缩减对农场主的补贴及获取新的外国贷款等办法振兴经济。他们千方百计地冻结工资的增长，冰岛工会（共产党人—冰岛统一社会党人在其领导机构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对此作出的回答是举行罢工。和五十年代一样，六十年代冰岛的罢工水平大大超过北欧其他国家。
259 1961年曾爆发过自195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一万二千名来自工业部门和码头的工人，以及建筑工人（约为整个冰岛工人的三分之一）。罢工得到其他国家工会的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1962年也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如拖网渔船渔民长达一百三十天的罢工，1963年12月又爆发了冰岛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持续十一天的总罢工，全国三分之二的工人卷入了这次罢工，最后取得了部分胜利。新的一次总罢工是在1968年春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时期爆发的，参加者几达二万五千人。

1968年11月，有冰岛统一社会党和左翼社会党参加的选举集团人民联盟改组为人民联盟党——左翼社会主义派。此后（同年12月）冰岛统一社会党宣布停止活动。

六十年代劳动人民日益高涨的经济斗争是和对外政策问题方面连续不断的社会运动，如争取维护十二海里捕鱼区，撤出冰岛的外国（美国）军队，冰岛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同“共同市场”签订协议和保卫越南等运动结合在一起的。

1961年冰岛同英国在捕鱼区宽度问题上的冲突暂时得到调解。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压力下，两国签订了妥协性协定：英国实际上承认了冰岛规定的十二海里捕鱼区，



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反对在冰岛上修筑外国军事基地的示威游行。1967 年 6 月

而冰岛允许英国人三年内可在沿海地区六海里外捕鱼。但是，外国海洋捕鱼量日增，而冰岛捕捞船队捕鱼量日减。因此，到六十年代末期国家捕鱼区的范围问题再次提到了日程上来。1969 年冰 260
岛国会批准一项立法草案，根据该草案规定，冰岛大陆架从冰岛海岸延伸至水域深度能允许利用其自然资源的距离为止。

1962 年 4 月宣布了在雷克雅未克以北的华尔湾修筑美国潜艇基地的计划。尽管在冰岛开展了激烈的抗议运动，但美国仍于 1964 年开始在海湾为美国舰队修建码头式加油基地并于 1969 年投入使用。

冰岛政府支持在欧洲实现全欧完全合作的主张。和过去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在冰岛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比在瑞典、挪威和丹麦更为明显。

5. 芬　兰

1961 至 1970 年芬兰的经济状况整个来说是比较好的。在这

个时期，芬兰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总的速度方面(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五)，还是在工业的增长速度方面(每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七)都超过了西欧的许多国家。这些成就的获得在很多方面得益于芬兰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稳定的经济贸易合
161 作。起重要作用的另一情况是，在本章所述时期内世界市场一直保持着对木质纸张产品的高需求量，芬兰靠出口这种产品获得的外汇收入不断增加，因而有可能拨出款项来扩大和更新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设备。

与此同时，六十年代芬兰经济受世界经济形势的牵制相当严重。所产商品和劳务平均每年都有四分之一在国外，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因此，芬兰未能避开在六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的那场经济动荡的影响。1966年芬兰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到百分之五点二，1967年更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三。这几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额也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五。

上述情况产生的后果是失业人数增加，生活费用上涨，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恶化。1968年1月芬兰失业人数近十二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的百分之四。物价，特别是必需品的价格，十年间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二。1969年芬兰马克的实际价值仅为其1959年价值的百分之六十一。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十年里从一亿三千三百万增加到十三亿八千五百万芬兰马克，而且其中主要是对西方国家中的贸易赤字。芬兰的外债仅1965年至1970年期间就增加了一倍，从两万四千四百八十亿增加到五万七千七百四十亿芬兰马克。

在人口结构中，雇佣劳动者的比重上升。1960—1970年期间就业总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二，而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总人数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六。工人阶级在社会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客观上为工人政党——芬兰共产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扩大社会基础提供了方便。

在本章所述时期内，芬兰国内形势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966年以前为一段，1966年以后为一段。

1966年前，执政的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府。联合政府的基础是农民联盟（1965年起改称中央党）和代表大资本利益的民族联合党。代表工人运动的有三个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小农社会民主联盟（这个联盟是在五十年代末从芬兰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

工人和小农社会民主联盟没有发表自己完整的思想纲领，也没有放弃芬兰社会民主党1952年的“原则性纲领”（这个纲领很多方面类似1951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宣言）。芬兰社会民主党在这个纲领里，以及其他的文件中阐述了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全部基本思想：如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局部的改革而不经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进化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政府似乎具有超阶级的性质；否认劳动者必须采用革命暴力和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建立社会主义等等。然而社会民主联盟在内政方面却同温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拒绝同极右的民族联合党合作。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拒绝了芬兰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的激烈反共路线。他们主张加强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社会民主联盟得到了芬兰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的支持，还得到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为分裂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而于1960年建立的芬兰工会联合会没有获得劳动者的广泛支持，这个组织建立一年后仅发展会员约六万名。在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发生分裂时成立的各独立工会（它们既不愿留在芬兰工会中央联 262
合会里，也不愿加入芬兰工会联合会）拥有约十万人。

分裂后，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仍是最大的工会中心：1961年有会员二十七万人。

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全国工会运动的统一，主张各工人政党之间进行合作以维护劳动者利益。1961至1963年间，芬兰共产党不止一次地向社会民主党人呼吁实行合作，恢复工会的统一，但是没有得到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响应。

社会民主运动组织上发生分裂的后果是，芬兰社会民主党在1962年议会选举中所获得选票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仅得选票的百分之十九点五。芬兰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企图同极右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这对该党在这次选举中遭到失败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一点特别表现在1962年的总统选举中。

在与工会运动的关系方面，右翼领袖也把党引进了死胡同。在1963年芬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右翼领导人遭到失败。温和派领袖拉·帕西奥取代瓦·唐纳成为党的主席。帕西奥声称芬兰社会民主党将实行新的政治方针，把方向盘“向左转两度”。

芬兰社会民主党新领导在工会运动实行联合的问题上采取了富有建设性的立场。而促使它去寻求妥善解决工人运动问题途径的重要因素是，它希望再次成为执政党，而没有工人运动的支持，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企业主们对芬兰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反共即兴表演表示赞赏，但并不把这个联合会放在眼里。企业主中央联合会宁愿同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它代表大部分参加工会的工人）进行谈判，以签订集体合同一揽子协议。

1966年，根据芬兰社会民主党的倡议，芬兰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成员瓦·勒斯基宁和芬兰共产党主席阿·萨里宁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就更新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领导问题达成了协议。在同年召开的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协议得到实现。社会民主党人被选为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主席，芬兰共产党的一名党员被选为第二主席。共产党还在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及其专职工作人员机构里获得了新的位置。但是，最重要的领导位置均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由十九人组成，其中七名共产党人，七名社会民主党人，五名为工人和小农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百八十四名代表中约有五十名代表支持工人和小农社会民主联盟。在上述力量对比条件下，社会民主党

人不可能独自操纵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

1967年，芬兰社会民主党和芬兰共产党的代表共同制定了在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工会运动联合的建议。在1969年召开的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非常代表大会恢复了工会的统一。芬兰工会联合会和独立工会加入了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在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新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里：社会民主党占十二席，共产党占八席，社会民主联盟占二席。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会中央机构重新起名为芬兰工会中央组织。这个组织联合了约五十万劳动者。

1966年3月的议会选举使国内政治力量的格局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在这次选举中，三个工人政党——芬兰共产党（它以芬兰
人民民主联盟成员的身分参加选举，而且是该联盟的核心力量）、
社会民主党及工人和小农社会民主联盟在国内历史上第一次获得
多数席位（在二百个席位中获得一百零三个席位），而资产阶级政
党的席位大为减少。芬兰社会民主党领袖拉·帕西奥在选举中获
票最多，遂于1966年5月组成由芬兰社会民主党、芬兰人民民主 263
联盟、工人和小农社会民主联盟及中央党代表参加的政府。这样
一来，曾在1948年同苏联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三大党”
政府里共过事的所有政治力量都有代表参加这个在议会里占有一
百五十三个席位的新内阁。

芬兰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参加政府不甚热情，但也未表现出过分的不安，因为1966年时国家经济处于危机的边缘，企业主们认为取得政治上的稳定才能摆脱这场危机。

帕西奥政府执政一年多一点时间，就碰到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的问题。1967年10月国家银行宣布芬兰马克大幅度法定贬值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五。于是，靠牺牲领取工资和其他规定收入者利益以保障经营出口的垄断组织利益的谈论又起。1968年通过了税收改革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免去了私营公司的多项税款。

1968年3月这个联合政府由毛诺·科伊维斯托领导。不久

签订了芬兰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收入政策的一揽子协议：工会放弃集体合同中的所谓“指数附加条款”。该条款规定工资自动上升以补偿物价上涨和生活费用随之出现的上升。为了替代上述规定，从1969年起对各类雇佣劳动人员的工资实行幅度很小的定额提高制度，而工会则保证，如果劳动生产的增长不能补偿工资的提高额，工会将不要求提高工资。政府则保证根据该协议对价格、支付和工资实行监督。这一监督职能由政府下设的专门机构执行，工会和企业主均派代表参加该机构。

这个协定被称为一揽子协定，是因为除了其他种种措施以外，它还规定国家对农产品价格实行补贴，并制定所谓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计划，即政府答应在国会中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造的清单。

同帕西奥政府和科伊维斯托政府的经济政策一样，关于收入政策的第一批协议也是对企业主极为有利的。1966—1970年间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远远超过雇佣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增长。这个差距在1968至1969年间最为突出，当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约百分之六，而实际工资增长仅百分之二。

协议束缚了工会在开展罢工斗争方面的行动。1967年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为三十二万个工作日，而1968年为二十八万个工作日，1969年减少到十六万一千个工作日，1970年只损失十四万八千个工作日。

不过，帕西奥和科伊维斯托政府的活动也有有利于劳动者的一面。工业中的国营成分扩大了，用于住房建设的拨款有所增加，社会救济制度也有所改善。

六十年代末，芬兰共产党内部在对参加政府作何评价，对社会民主党采取何种态度以及在党的战略策略方面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出现了思想政治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有使党在组织上发生分裂的危险。1970年2月召开的芬兰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通过集体努力使党的队伍得到了统一，并通过决定，要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芬共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

1970年3月的议会选举表明，左派力量和中央党联合政府的活动使选民大为失望。所有执政党都失去了自己一部分选民的选票，其中失票最多的是中央党和芬兰人民民主联盟。资产阶级政 264
党重获议会中的多数。但是，联合政府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71年3月。共产党人把左派力量和中央党的合作看作是以保卫劳动者利益为己任的政府的最为适当的政治基础，因而再次参加了1970年7月15日组成的内阁(由阿提·卡尔亚莱宁领导)。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芬兰人民党和自由人民党也被邀参加内阁。

六十年代芬兰内政方面的情况是，社会政治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并带有向左转的倾向，而在对外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以对苏友好、信任和合作政策为基础的外交方针。

在本章所述六十年代的初期，芬兰内部政治斗争的激化和右派势力的活跃，是与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同时发生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这种紧张局势刺激起来的。西方大国在中欧制造的危险局势也使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局势恶化。

从对外政策的观点来看，1962年的总统选举意义十分重大。选举前夕，右派势力再次试图改变国家的外交方针。他们企图阻止1956年取代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担任总统的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连任总统职务。但是，1962年2月15日吉科宁再次当选为芬兰共和国总统。这次总统选举以及同年3月举行的国会选举的结果，显示了芬兰人民最广大阶层的坚强信念，他们决心今后也将坚持实行芬兰所选择对苏友好和睦邻合作的方针。1963年芬兰社会民主党更新了领导机构，大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社会民主党开始正式支持“巴锡基维—吉科宁的外交方针”。芬兰共产党在1966至1971年间参加了政府，这对于加强一贯主张和苏联友好的左派势力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有着特别的意义。

1967年4月中央党、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芬兰人民

民主联盟向吉科宁提出请求，希望他同意作为下届总统的候选人，他们还组成了广泛的选举联盟来支持他作为候选人。这令人信服地证明，同苏联友好合作的方针深得芬兰人民的支持。这个行动在内政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工人党和中央党达成协议提出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这在芬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民族联合党为首的右派势力这次又企图将他们的代表推上国家总统的宝座，可是依然一无所获。1968年 2 月 15 日吉科宁再度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在第一轮选举中即获得三百票中的二百零一票。

六十年代是芬兰同苏联睦邻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年代。1970年 7 月苏芬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延期，是这一进程的顶峰。苏芬关系政治基础的巩固，为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芬之间贸易额(这种贸易从 1951 年开始便以五年为期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方式实施)大幅度增长。第一个五年贸易协定期间，苏芬之间的贸易额约为十亿卢布，到第四个五年(1966—1970 年)贸易协定期结束时，贸易额激增至二十四亿卢布。

265 合作兴建大型工业设施、水电和其他工程，这种新的合作形式使苏芬经济关系更加丰富多采。1968 年 8 月，塞马运河在苏联境内的河段经改造后交付使用，这段运河使芬兰东部的湖泊地带与芬兰湾相连接，是根据 1962 年 9 月签署的条约由苏联租给芬兰，为期五十年。

苏芬关系的加强及“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在国内基础的扩大，使整个芬兰的对外政策明显地活跃起来，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后五年，同时也使芬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有所提高。正是在这个时期吉科宁总统提出了著名的论点：芬兰在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采取积极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芬兰不是中立的：它一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巩固欧洲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巩固北欧安全的问题，在芬兰的国际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63 年 5 月，吉科宁提出了宣布北

欧为无核区的建议。1965年2月24日，芬兰总统在莫斯科发表演说，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内的多边核力量的计划，1965年11月吉科宁建议采取旨在巩固北极圈地区——芬兰、挪威和苏联边境地区和平的措施，以保障芬兰挪威边界的安全。

芬兰国内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66年提出的关于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全欧会议的建议看作是完全符合欧洲各国人民利益的切实可行的建设性主张。1969年5月，芬兰政府向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发出备忘录，建议在赫尔辛基召开全欧会议。1970年11月芬兰又提出新的倡议，建议在其首都举行有关国家会议就全欧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协商（协商会议两年后即在此召开）。

芬兰在联合国为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它是第一批签署和批准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订于1968年）的国家之一。

芬兰的经济在很多方面依赖于世界市场，因此它不可能脱离在西欧日益兴起的一体化过程。1961年芬兰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1969年又参加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芬兰对建立北欧国家排他性的经济贸易联合体——北欧经济联盟的计划持否定立场。它认为这个计划是企图把所有北欧国家圈进"共同市场"。1970年4月，吉科宁总统宣布，参加这样的联合体是与芬兰的对外政策不相容的。

266

第七章

西欧、中欧、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

六十年代，西欧、中欧、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特征，只是在规模上相应地小一些，科技革命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发展过程，对它们彼此之间的以及与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国家之间的所有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生产和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过程非常迅速，尽管速度不尽相同。这些国家的科技革命也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科技革命导致生产关系领域内再次出现最激烈的冲突。阶级斗争愈加激烈，并具有政治性质。反战运动广泛展开。

这一时期上述诸国的对外政策有明显差异。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葡萄牙、希腊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由于他们隶属于这个侵略集团，又高度依赖美国的垄断组织，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对外方针。但是，总的国际局势的积极变化对这些国家中的某些政府的政策还是产生了影响：六十年代中期，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开始同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

两面性是西班牙对外政策的特点。它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但这一时期签订的一系列军事协定（关于基地和援助问题）把西班牙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与古巴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经济关系。爱尔兰的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矛盾的特点。与前一时期一样，爱尔兰在六十年代持中立和不参加军事集团的立场，但是同时，它的政府差不多直到六十年代末还未同社会主义

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其他关系。

奥地利和瑞士的外交路线，总的来说，是由它们的一贯中立地位所确定的。但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统治集团的别有用心和外部施加于它们的压力，因此它们在很多场合采取了与这个路线相抵触的行动。

1．比　利　时

1961—1970年比利时国民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八（前十年为百分之三点六）。基本建设投资和出口以超前速度增长。化学、冶金、机器制造部门高度紧张地进行新的工业建 267
设。同时，在诸如采煤、纺织工业、玻璃板制造业、有色金属业等传统部门实际上出现了停滞现象，或者说，甚至出现了水平下降的情况。加速结构改革的国家垄断法主要对比利时大垄断组织，特别是对外国垄断组织有利。外国垄断组织在化学工业控制了百分之五十多的生产设备，在石油加工业控制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在电子工业控制了百分之百。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国资本。

比利时是在继续进行“大罢工”（1960年12月20日开始）的情况下进入六十年代的。有一百多万劳动者参加了这次大罢工。罢工的目的是反对加·艾斯根斯政府的“统一法”（“济贫法”）。这个法令的实质在于通过提高直接税、尤其是提高间接税，以及削减用于社会需要的拨款的途径，把由一些工业部门危机形势造成的主要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罢工是由广大工人群众发起的，没有得到工会领导的同意，但是在罢工大规模开展起来以后，比利时总工会的领袖们害怕失去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不得不予以支持。罢工具有百屈不挠、毫不妥协的性质，而且罢工工人纠察队非常活跃，有力量不让工贼和当局代表进入企业。罢工以抗议“济贫法”也即以经济罢工为开端，迅速发展成反对垄断组织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专横行为的罢工。政治口号与经济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如要求政府辞职、解散国会和提前选举。罢工历时三十四天，于1961

年 1 月 27 日才结束。罢工表明：天主教社会党和自由党（1961 年起改称自由进步党）的联盟再也不能执政了。政府不得不同意提前进行议会选举。1961 年 5 月由天主教社会党和比利时社会党组成的新内阁（勒费弗尔—斯巴克），继续奉行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在新的议会中拥有多数的天主教社会党和比利时社会党联盟通过了四项法案以限制劳动人民的权利和经过多年斗争才获得的工会自由（包括罢工权利）。

1962 年进行了税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统一某些种类的捐税和提高直接税的作用。以前，比利时的直接税在征税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西欧其他国家要低，现在规定了接近“共同市场”国家现有实际情况的制度。统一捐税实际上是提高捐税：在 1962 年至1966 年这段时期，捐税平均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大部分捐税依然落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身上。

勒费弗尔—斯巴克政府的政策使天主教社会党和比利时社会党在1965 年 5 月 23日 举行的国会例行选举中遭到惨败。但是比利时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不愿正视这一情况，不顾普通党员的意见（在 1965 年 7 月召开的比利时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上，三分之一的代表投票反对党派代表参加政府）再次同天主教党人合作。皮·阿麦尔主持了由天主教社会党和比利时社会党代表于1965年 7 月29日组成的新的联合政府。天主教社会党在1961 年的选举中曾获得二百多万张选票，而在 1965 年的选举中只获得一百八十万张选票；比利时社会党在 1965 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不到一百五十万
268 张，而在上届选举中则是一百九十万张。总之，两个执政党失去了将近一百万选民，其中很大一部分投了自由进步党的票。

经济衰退和随之产生的失业人数增多导致 1966 年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林堡省矿工为反对政府企图以无赢利为借口关闭某些煤矿而举行的罢工得到全国广泛的响应。1 月 31 日警察企图用武力驱散兹瓦特贝格矿工居住区的示威游行队伍，打死工人两名，打伤几十人。政府调动了军队镇压矿工。罢工和支持矿工罢

工的示威游行浪潮在全国汹涌澎湃。林堡省工人终于迫使政府作出了让步。

兹瓦特贝格流血事件以后，社会党人声明退出政府。1966 年 2 月 11 日阿麦尔内阁辞职。

1966年 3 月 19 日天主教社会党和自由进步党代表组成政府，保·范登·博埃南任政府首脑。在垄断大资本的压力下政府继续采取将重负完全卸到劳动人民肩上的措施。1967 年 3 月，通过国会实行了几项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削减给人民教育、保健、社会保障等事业的拨款，提高原有的并规定新的直接税和间接税。

煤炭工业、纺织工业、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业、公用服务事业继续大量解雇工人。解雇首先触及瓦隆老工业区。六十年代末，全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的数量约达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生活费用增加，所有食品、工业品、公用事业的价格上涨，运输费和各种税捐都提高了。

1968 年 2 月 7 日博埃南内阁辞职。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尤其在瓦隆）的尖锐化是产生政府危机的主要原因。国会和省议会的选举决定提前进行。

1968 年 3 月 31 日进行了选举。天主教社会党损失最大，它总共只获得三十七万张选票。它所失去的选票都改投弗兰芒人民联盟和讲法语居民的民主阵线（即瓦隆统一党）的候选人了。直到 1968 年 6 月 17 日加·艾斯根斯才组织了由天主教社会党和比利时社会党代表组成的政府。比利时战后历史上为时最长的（一百三十二天）政府危机得以结束。但是，艾斯根斯内阁的纲领并没有规定任何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和其他问题的根本措施。然而，比利时的经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1961—1970 年，民族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性质的问题。民族问题的尖锐化首先与瓦隆的经济衰退有关（在那里集中有比利时传统的工业部门，而这些部门已经进入停滞、衰落时期），也与弗

兰德伦采用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加速工业化有关。过去，讲法语的瓦隆人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二十世纪初在弗兰德伦就出现了强大的民族运动，运动参加者要求承认弗兰芒语为第二国语，要求为发展弗兰芒文化提供相
269 同的条件。1929年为弗兰德伦和瓦隆分别设立了单独的行政机构，为布鲁塞尔规定了专门的制度，弗兰芒语被承认为第二国语。基建投资分配不均是1961—1970年争执的起因。基建投资的大部分都集中到弗兰德伦，因此弗兰德伦经济发展比瓦隆快了一倍。

弗兰芒民族主义的加强引起瓦隆族部分居民相应的反应。1960—1961年总罢工以后，由瓦隆左翼社会党人发起，并在共产党人积极参加的情况下组织了瓦隆人民运动。这个运动立即把广大劳动人民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1962年10月比利时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国家联邦制的法案，并提出，这是解决民族矛盾的唯一办法。但是政府仅仅提请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语言界线"的法案，即根据某个地区是弗兰芒人还是瓦隆人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原则来划定使用语言界线。1966年5月民族问题重又尖锐起来。国内最老的鲁文大学弗兰芒语系的学生要求大学只用弗兰芒语上课。1967年鲁文大学的学生又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抗议把用法语上课的一些系进行扩大的计划，并要求把这些系迁移到瓦隆去。在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马林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为了驱散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出动了大量警察。

民族与语言问题引起各政党之间和各政党内部的严重分歧。天主教社会党分裂成两派——瓦隆派和弗兰芒派，而自由进步党中，起先分出了瓦隆自由派集团，尔后又分出布鲁塞尔联盟，稍后成立了激进党。

1970年底艾斯根斯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宪法改革。经过修订的宪法承认国内存在三个文化共同体(法语、弗兰芒语、德语)和四个语言区(使用法语、弗兰芒语、德语以及使用两种语言的布鲁塞尔区)。修改过的宪法草案还规定：为弗兰德伦省、瓦隆省(包括居

民讲德语的县)和布鲁塞尔省建立三个区域性的政权机构，它们在经济、社会问题方面应获得广泛的权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任何区域性机构。

在本书所述时期，国内还开展了尖锐的社会斗争。1961年12月底，为纪念总罢工一周年，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举行了集会、示威游行和组织了短时间的发动。比利时工人阶级对当局迫害总罢工组织者的企图进行了反击。奥伦和克拉别克市的冶金工人，以及特姆斯赫造船厂弗兰芒族工人的罢工(1962年)都持续了很长时间。1964年石油加工、煤气企业和安特卫普港发电厂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赫斯塔尔市平诺克-帕克斯厂的工人作出了勇敢的榜样(1967年)。他们在一百一十四天中没有离开工厂区，以抗议工厂的关闭。他们终于迫使企业主作出让步，使企业重新开工。1967年根特市"阿尔贝德"厂工人持续了十二个星期的罢工以胜利而告终。同年，阿塞克公司的工厂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动。1968年12月，有将近一万的大学生罢课四十八小时，他们要求高等学校民主化，保障大学毕业生的工作。

弗兰德伦信天主教的工人参加阶级斗争是比利时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新情况。1961—1970年罢工运动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并且更有成果。二十四小时总罢工得到推广，它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工 270
业部门。未纳入正式统计的短时间罢工(即每日几小时)越来越多，罢工者开始更经常地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在阶级搏斗过程中，各工会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已经出现，最初是在总工会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的各部门联合会之间，随后是在各工会中心之间。工会最主要的要求是：加强对投资及其分配的监督，反对资本外"流"，要求税捐政策和价格政策民主化，禁止在劳动者的就业和转业没有预先作好保证的情况下关闭矿场和工业企业。1966年林堡罢工以后，在采煤工业中工会实现了上述最后一项要求。

考虑到有些地区的情况特殊以及对经济不景气的地区给予有效的帮助，总工会于1965年通过的新纲领特别强调必须把全国经



布鲁塞尔总罢工参加者示威游行，抗议
劳动人民经济状况的恶化。1966 年

济计划改为非集中化。比利时总工会要求加强对物价的管制，实行民主的税制改革，腾出资金以便对保健事业进行改革，保证男女同工同酬，改善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瓦隆人民运动为实现联邦制而斗争，总工会拥护这一联邦制的各项原则。

比利时共产党认为总工会的纲领是一个能够把与采用民主方式摆脱危机而斗争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的行动纲领。1965 年 10 月 23—24 日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赞同始终一贯地促使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政策，赞同以全民投票的方法民主解决民族问
271 题，反对把国家的对外政策服从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国主义集团的需要。1966 年 12 月 10 — 11 日举行的比利时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要求美国停止对越南的侵略，赞成为组织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召开会议，赞成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别国领土上撤走军队，赞成削减武装力量，赞成比利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会要求停止解雇工人和职员，在冶金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给工人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

六十年代比利时亲美的“大西洋”方针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布鲁塞尔成为国际垄断组织总部、美国垄断组织欧洲分支机构和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聚集的中心。比利时由于对“大西洋团结”的忠诚而获得了某种“行动自由”的权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掩蔽下采取了一些帝国主义行径：早在1960年就开始武装干涉刚果共和国，在葡萄牙对安哥拉、莫桑比克（比利时的企业主在那儿有不少财政利益）进行的殖民战争中帮助葡萄牙。

比利时政府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纲领大大增加了军费拨款。1962年7月比利时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原子武器和所谓“共同防御”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协议规定把核秘密情报以及一定的军事设备和装具交给比利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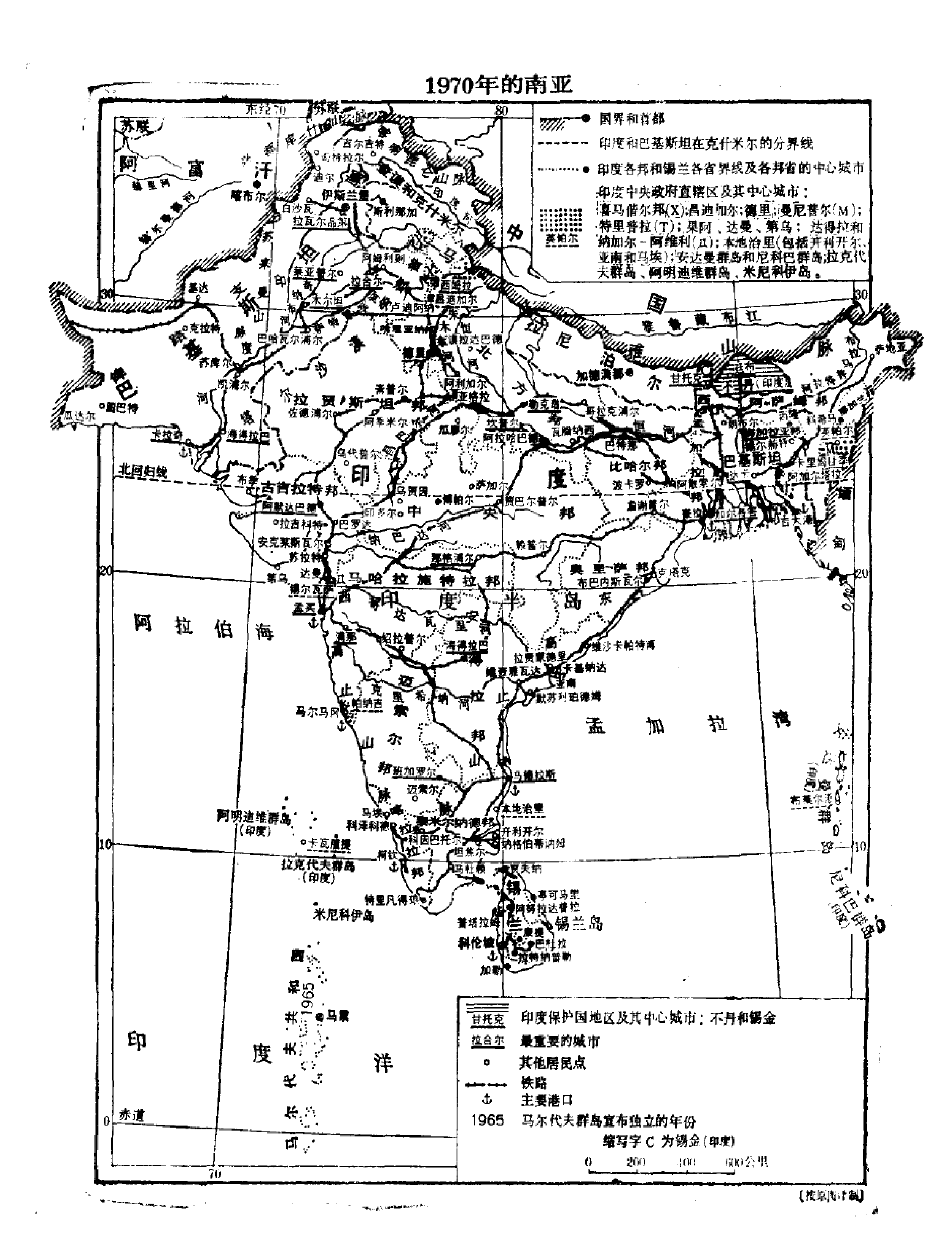
“欧洲主义”在比利时的对外政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对比利时来说，它不仅意味着经济一体化，而且意味着加强比荷卢联盟国家的军事政治联盟。

六十年代，比利时的垄断组织企图恢复其在刚果的阵地，但是没有成功。曾在基桑加尼（现扎伊尔）参加过反政府叛乱的比利时雇佣兵于1966年7月被撵出刚果。从1967年1月1日起刚果政 272
府撤销了比利时的“加丹加矿业总公司”，并成立了本国的“刚果矿业总公司”来取代前者。

政府反动的对外方针引起比利时社会广大阶层的不满。有些国务活动家（阿麦尔、斯巴克）以前是“冷战”的狂热拥护者，现在拥护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号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话。在巴黎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十二月（1966年）会议上，比利时提出改组集团的建议，目的是通过同华沙条约国对话的途径使“实现缓和、巩固和平”成为该集团的主要宗旨。

至六十年代中期，比利时的对外政策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合作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1964年成立了苏比“斯卡尔迪亚—伏尔加”公司，其宗旨是在比荷卢联盟国家出售和修理苏联汽车。以后又成立了食品和工业品贸易合营公司，1967年又有了苏比“石脑油”公司，该公司将苏联的石油和石油产品进口到比利时，然后向国内外出售。1970年底在莫斯科签

1970年的南亚



【按原图绘制】

订了比苏通商条约，还成立了一些新的苏比合营公司。

2. 荷　兰

273

六十年代荷兰经济发生了重大的结构变化。新兴部门发展的速度很快，产品基本上都投放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在生产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化学和食品设备方面实行专业化的机器制造业蓬勃发展，化学、石油加工部门、黑色冶金（主要是轧材）工业处于迅速高涨时期。有几年，化学工业生产的增长额达百分之十八，石油加工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按荷兰人口平均计算，化学工业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垄断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最快，同时，其他一些部门的生产出现停滞甚至有某种下降的现象。从 1962 年起采煤量开始下降：仅 1968 年至 1970 年采煤量就从六百七十万吨减少到四百三十万吨。但总的来说，经济上的繁荣景象是这十年的特征。1958—1969 年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七点六，出口额为百分之十强。这一时期荷兰国民总产值从九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二百八十二亿美元。

工业的重新调整是通过扩大国家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途径实现的。国家垄断调节的方法被扩大应用于制订预算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年度计划，应用于实现区域性发展纲要以及城市化和生态方面的规划。国家积极参与开发五十年代末在格罗宁根省发现的储藏量极为丰富（居世界第四位）的天然气。对这一产地的加速开采不仅大大提高了天然气的作用，而且改组了整个经济。从 1963 年至 1971 年天然气开采量几乎增加了四十九倍，达四百八十三亿立方米。至六十年代末，天然气在工业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五。按人口平均计算，荷兰的天然气消费量居第一位。

为使新兴工业部门顺利发展，荷兰经济需要投资，所以从1967年起，在创办新企业的条件下国家拨给外国公司的津贴占外国投资额的百分之三十五。由于实行鼓励外国投资政策，因而至六十

年代末期，在荷兰开办的外国企业已约有一千家。美国资本占主要地位。至1968年，仅美国在荷兰的直接投资就有十一亿美元。五百家美国大公司中有一百多家在荷兰设有分公司，有六家美国大银行的分行在荷兰国内营业。石油加工业、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子工业、精密机械和精密光学仪器制造业是美国资本的主要投资范围。至1969年，美国石油垄断组织控制了百分之五十的荷兰石油加工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投资迅速增长，十年内增长了六点五倍。

同时，荷兰本身也在积极地把本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张并不断扩大其范围，从那里急剧增加原料、特别是石油的进口。荷兰本国石油开采量只能满足经济需要的百分之五（1960年的开采量为一百九十万吨，1969年略微超过二百万吨）。

西欧一体化推动了荷兰的生产、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六十年代初，工业方面合并数量最多的是金属加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业。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商业银行合并成“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274 银行”。1964年，由于合并的结果，成立了“荷兰银行”。国内所有私人银行资产的四分之三属于这些新成立的银行。1967年开始了新的资本集中浪潮。这一年开设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荷兰银行实行合并。“菲利浦电器公司”和“尤尼莱弗油脂公司”把自己的国外分行增加到数百个之多，并把大部分资本转移到美国和西欧国家。康采恩“维罗尔麦”把荷兰的四分之三造船业集中在自己手中。1969年由于阿克尤和克佐两个垄断组织合并的结果成立了阿克佐纤维公司，它在生产化学纤维的公司中很快就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同时，一体化的后果是中、小企业主纷纷破产：一年就有三千多个企业倒闭，以至失业人数增多。1967年失业者达荷兰创纪录数字——十万人。

在农业方面，荷兰政府实行了农产品国际自由市场的方针，从而使小农户大量破产，在农业中形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虽然这十年期间这个部门的就业人数减少了，但总产值提高了。按

许多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畜牧业产量来说，荷兰居第一位。在使用无机肥料方面居世界第二位。除畜产品外，荷兰还一年四季出口蔬菜、果品和花卉。在出口农产品方面荷兰居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位。

国内市场的局限性使荷兰的经济依附于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十年期间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在出口产品中，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产品几乎占一半，食品的比重将近四分之一。

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其他国家相比荷兰较少地依赖西欧大陆市场。美国和英国仍旧是荷兰的贸易大伙伴。荷兰增加了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进口和从近东国家的石油进口。六十年代期间，荷兰在比荷卢联盟和“共同市场”内的地位大大地巩固了。荷兰盾成为西欧最稳定的货币之一。

六十年代，荷兰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职员加在一起仍然占自立人口的多数。同时，农业和捕鱼业的就业比重从百分之十一下降到百分之六点五。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大大增加。1970 年服务业占有经济收入的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1960 年为百分之四十）。

荷兰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是在大垄断组织的操纵下和有利于他们的情况下进行的。劳动人民则承受了由这些变化的不良后果带来的全部重担。荷兰商品的高度竞争能力和生产费用的降低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和冻结工资的途径达到的。十年内国内生活费用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六十年代荷兰劳动人民的斗争与前十年的阶级发动相比，其特点是规模大，涉及问题多。在罢工运动高潮时期，政府通过社会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按平均分配原则组成，工会、企业主、政府的代表各为十五人）直接参加调解工会与企业主之间的冲突。荷兰是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对劳动人民的工资和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采取国家垄断调节方法的国家，目的是保证荷兰商品在国外市场上有最大的竞争能力。

275 联合内阁的经常更迭表明，荷兰国内政治生活在这十年内很不稳定。从1958年起，由四个右翼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由天主教人民党的代表扬·爱德华·德奎伊主持政府。一些大企业主联合组成的自由民主人民党(自由党)、反革命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的代表也加入了内阁。天主教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联盟是联合政府的基础。1963 年春 荷兰议会的例行选举没有给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带来重大的变化。天主教党人、自由党人、反革命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的代表又参加了右翼政党新的联合内阁。维·马里能(天主教人民党)主持政府，他宣布了“使经济发展”达到“最大速度”的方针。

由于天主教党人与自由党人意见分歧，马里能政府于 1965 年 2 月辞职。4 月，约·卡尔斯(天主教人民党)组成新政府，在新政府中劳动党(社会党人)的代表取代了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的位置。卡尔斯内阁执政总共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1966年10月在国会对预算草案投票表决时，他没有获得多数。

1966 年和 1967 年荷兰议会两院先后进行了选举。21 至 23 岁的青年第一次参加选举。天主教党人和自由党人失去部分原有的选民。共产党人以及和平社会党的代表巩固了自己在二院的阵地。从大学生和青年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新政党“民主党—66”获得了七个席位，这是不容怀疑的成就。1967 年 4 月 5 日，天主教党人佩特鲁斯·德容组成了以四个政党(天主教党人、自由党人、反革命党、基督教历史同盟)为基础的教权主义—自由主义政府。

1969 年议会选举结果是四个右翼政党传统的联盟取得政权。仍由德容主持内阁。

教权主义—自由主义联盟的对内政策是以“收入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图借助这一政策来消除社会矛盾。政府使工资的增长直接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间接取决于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涨。但是，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政府未能够制止引起通货膨胀的物价上涨和生活费用提高。

1962 年德奎伊政府强迫工会接受关于暂时冻结工资的协定，

阿姆斯特丹的冶金业以罢工来回击。其他城市的冶金工厂工人支持罢工，从而迫使企业主将工资提高百分之十。

荷兰劳动人民的经济斗争与争取修改“大西洋”对外政策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961 — 1963 年全国各地举行了反军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要求限制荷兰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削减军事开支(1961 年的军事开支将近二十亿荷兰盾)。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撤除在苏斯特堡市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军基地。

荷兰共产党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1963 年荷兰共产党提出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统一行动的口号。但是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劳动党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一切倡议。

工会运动仍然是分裂的，主要的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领导不止一次地反对宣布罢工。人数最多(按 1970 年统计)的荷兰工会联合会追随社会党人，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荷兰天主教工会联合会和荷兰基督教工会全国联合会积极推行“劳资合作”政策。

在工业和出口的高速发展下社会冲突的不断增多是马里能政 276
府执政时期社会冲突的特点。就劳动生产率而言，这几年荷兰居西欧的前列，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超过美国。同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只有意大利工人的工资低于荷兰。所以，在罢工斗争中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提到首位。1964 年因罢工而损失的人日达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二个，超过 1962 年水平的三倍以上。

1965 年由于失业人数增多(青年人的失业现象尤为严重)局势更加紧张了。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生和青年为保障就业、争取和平和缓和紧张局势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发动。

1966 年夏、秋两季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工人与警察发生了大冲突。为了驱散罢工者的示威游行队伍，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弹和火器。结果有六十多人受伤。乌德勒支、赞丹、阿纳姆以及其他城市举行了声援阿姆斯特丹工人的罢工。

六十年代中期，劳动人民进行战斗性和群众性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人们称之为“工资爆炸”的没有先例的现象。三年期间(1964—1966年)企业主被迫将工资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二。但是，后来德容内阁开始推行用冻结工资的手段来调整物价和收入的政策，以致社会冲突又激烈起来。1969年秋，许多省举行了抗议生活费用上涨、失业现象加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政府为“恢复秩序”以实行“紧急状态法”相威胁。

1969年春，限制工会权利的法案被提交议会审议。工会坚决反对这一法案。统一阵线成立了，国内所有的工会组织都参加了这一阵线。由于协调行动的结果，12月15日举行了全国范围的一小时抗议性罢工。

1970年荷兰处于经济上升时期：采掘工业产量的增长率达百分之二十七，石油加工业为百分之三十。政府以工资水平“过高”为借口，把冻结工资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全国各地，罢工浪涛滚滚，9月份更是波澜壮阔，罢工者在十五万人以上。世界最大港口之一——鹿特丹的码头工人声援其他城市的罢工声势最为浩大。结果，经社会经济委员会的调解罢工者的部分要求得到满足。

六十年代荷兰的对外政策是在各种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倾向的影响下形成的。“大西洋主义”拥护者与进步力量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进步力量注意到，在欧洲发生了有利于缓和、和平和互利合作的良好变化。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荷兰还从来不具有这样的迫切性，从来没有成为如此激烈辩论和争吵的对象，各个阶层的荷兰人都拥护修改国家的片面的对外方针。不少省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与联邦德国签订关于在荷兰领土上建立西德军事供应基地的协定。劳动党内的“新左派”集团要求荷兰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军队撤出越南。

共产党人、左翼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和民主社会团体代表采
277 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解决西伊里安问题的行动。1962年政府

不得不签订关于把荷兰非法占有的西伊里安交给印度尼西亚的协定。但是，荷兰依然保留着在苏里南和部分安的列斯群岛的殖民地。

1966 年以外交部长约·伦斯为首的反动势力努力使政府同意了把从法国撤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中欧司令部设置在本国。

荷兰社会团体积极反对议会关于赞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决定。1967 年，二院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促使美国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1968 年阿姆斯特丹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军备竞赛，示威游行的参加者还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同年，荷兰签订了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1970 年 12 月，德容表示赞同召开全欧安全与合作问题会议的想法。

荷兰人反军国主义的行动和欧洲紧张局势的不断缓和对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有利的影响。苏荷关系得到巩固，两国互派代表团，经济关系日益发展。

六十年代下半期，"大西洋主义"和军备竞赛的拥护者开始放弃自己的阵地，不过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这一点一如既往仍然是荷兰政府对外方针政策的准则。

3. 卢 森 堡

六十年代卢森堡的经济发展首先是由它参加西欧资本主义一体化所确定的。国家对外经济联系扩大，出口部门垄断程度提高。冶金工业更加集中，由于世界钢铁市场的需求而更加专业化了。国家对世界行情和国际钢铁托拉斯的依赖程度也同时增加了。

集中在国家西南部的黑色金属冶炼业仍然是经济的基础，至六十年代末，这个地区的黑色金属冶炼业生产的工业产品将近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卢森堡在钢铁生产方面稳居第八、第九位，在钢铁冶炼方面按人口平均计算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位。

国家的工业发展受到双重依赖性的制约，一方面依赖矿石和焦炭的进口，另一方面依赖钢铁产品的销售(这类产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供出口)。由于 1961—1963 年世界钢铁市场情况恶化，定货总额骤然减少，导致卢森堡的工业产值下降，经营兴趣低落。1962 年铁矿石开采量减少百分之十四，纺织工业、木材加工业、化学工业部门缩减生产。所有七家冶金工厂全都开工不足。产生危机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用石油和天然气来代替煤，以及进口比本国价廉质优的外国铁矿石而造成经济结构的改组。

从 1967 年起至六十年代末，在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百分之四点六的情况下，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总的来说，1961
278 至 1970 年卢森堡的国民总产值几乎增长了一倍，达九亿美元；钢的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从十二点四吨增加到十六吨。从六十年代下半期起美国和西德的投资流入卢森堡的数额增多了。美国资本在化学工业占主要地位，西德垄断组织在电力工业居优势。国内原已有三十二家外国工业企业，1965 年又增加了两家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大型化学工厂。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比利时、联邦德国和荷兰是卢森堡的主要贸易伙伴。

西欧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发展使卢森堡金融活动迅速活跃和扩大起来，尤其是从六十年代下半期起最为突出。十年内国内银行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外国订货总额和对外经济联系基本上变成了控制卢森堡总的经济发展的调节器。这是一体化的最主要的不良后果。世界钢铁市场的价格下跌和需求减少会立即造成卢森堡工业生产的衰退。

六十年代，卢森堡三十四万人口的社会成分有了某些变化。就业者在农村中所占比重减少到百分之十一，同时非生产领域的就业者人数大大增加。从 1965 年起，将近一半的国家投资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

从六十年代初起，基督教社会人民党继续在卢森堡的国内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1963年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进行了市

议会选举。这是卢森堡人一种独特的"情绪晴雨计"。选举结果表明：参加皮·维尔纳联合政府的民主党的威信下降了。从1964年7月起由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和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组成政府。

兵役问题成为六十年代中期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以卢森堡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反对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军备竞赛。1966年，他们不仅要求缩短兵役期限，而且要求取消普通义务兵役制。"大西洋主义"拥护者却以"忠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借口，主张保留义务兵役制。1967年6月22日，众议院通过一项法令，从本年7月1日起取消义务兵役制，改由志愿兵组成军队。这是卢森堡爱好和平力量的巨大胜利。

1968年议会通过了"稳定计划"。计划规定：从1970年10月起（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国家一样）开征新的间接营业税，减少和重新分配国家贷款。实行物价管制和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使卢森堡经济适应西欧一体化的各项条件。在讨论计划时，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和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意见分歧，结果这两党组成的联合内阁于1968年10月30日辞职。同时，教权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右翼首领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民族运动"。他们猛烈攻击卢森堡共产党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期间支持苏联的立场。在这种形势下市议会进行了部分选举，国会也提前于1968年选举。这两个选举的结果出乎社会党人和教权主义者的意料。他们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在某些大城市失去了主要阵地。1970年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一小撮右翼首领被开除出党。共产党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各市的阵地和在市议会中获得了若干新的 279
席位，而且增加了国会代表名额。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和民主党的代表重新组成联合内阁。

1970年3月在大钢铁中心和国内第二大城市厄什举行了公共委员会选举。这次选举给卢森堡共产党带来了新的胜利：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九的选票拥护卢共代表。由共产党人担任市长领导

了这个委员会。

六十年代卢森堡保持了被认为是西欧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这十年期间，直接税和间接税增加了，食品价格、医疗品和公用事业费提高了。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国民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金融业和工业巨头的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卢森堡没有发生过罢工，但是，劳动人民赞成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和增加工资，赞成增加优抚金，扩大民主权利和自由，反对提高物价和增加捐税的垄断政策。由于采取联合行动，卢森堡人民增加了优抚金，改善了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由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某些社团中所做的努力，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力扩大了。1965 年卢森堡自由工会联合会(参加世界工联)和卢森堡工会联合会(参加国际自由工联)合并成卢森堡工人工会联合会，其成员共计一万九千五百人左右(主要是冶金工人和矿工)，在克服工会运动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卢森堡共产党在六十年代为改善外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提高他们的工资进行了积极的、始终不渝的斗争。外国工人被利用来担任没有什么技术的工作，主要是在建筑业，有些年，他们的数量超过这个部门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六十年代初，卢森堡的对外政策还在沿“冷战”的轨道进行。这与居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社会人民党的对外纲领直接有关。然而在六十年代上半期，国家的对外方针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从“大西洋主义”转变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实行全欧合作，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受欧洲总的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这些趋势也是由于必须更广泛地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来解决小国经济问题而造成的。1963 年卢森堡驻苏大使签订了关于禁止在三个领域试验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随后几年劳动人民的反战行动对卢森堡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影响。1965年 5 月，社会民主人士和青年举行了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66 年进行了反战性质的强有力的发动。迫于这些行动，

卢森堡政府拒绝在本国领土上驻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部队最高司令部、中欧司令部和北大西洋公约的一些军事院校（由于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组织，上述组织不得不改变驻地）。1968 年卢森堡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卢森堡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发展。还在 1966 年 1 月，卢森堡大公和苏联通过了把双方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的决定。1966 年卢森堡同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政府达成了同样的协议。1969 年卢森堡外交大臣在访问苏联期间签订了苏卢文化合作协定。

4. 爱尔兰 280

六十年代，爱尔兰共和国由替天行道士兵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执政。1966 年以前由肖恩·勒马斯主持政府，以后是约翰·林奇。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执政党和政府更加重视经济问题，并不惜任何代价力图保证经济高涨。替天行道士兵党放弃了还在五十年代就拟定的建立独立自主的爱尔兰经济的方针便是为之而付出的代价。爱尔兰领导人声明打算同英国一道争取加入“共同市场”，力图使本国经济在国外市场有竞争能力。实际上，这意味着从传统的保护关税政策转变为同外国帝国主义垄断组织进行无限制的接触。

爱尔兰政府通过了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纲要（1958—1963年和1964—1970年）。这两个纲要规定：减少向国外移民，增加农业产量（第一个纲要所强调的）和工业产量（第二个纲要所强调的），通过建立新的工业生产单位的途径来消灭失业现象。这两个纲要反映出了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新思潮：发展工农业出口部门，吸引欧洲和美国资本，逐步放弃保护关税制度。

在执行第一、第二个纲要的过程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民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加快了一倍，与

前十年的百分之一点九相比，六十年代末为百分之四点一。同时工业发展得特别快，工业产值平均增长额将近百分之六点一。

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使爱尔兰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爱尔兰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六十年代，工业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百分之三十一增长到百分之三十七。然而，农业比重却从百分之二十六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一。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在自立人口的结构方面。十年内从事农业的人数从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减少到百分之二十六，而从事工业的人数从百分之二十四增长到百分之三十。爱尔兰的经济工业化还反映在出口总额中工业产品的比重增加了。在出口总值方面，1970 年工业品输出第一次超过农产品输出。

在这十年内，爱尔兰建成了五百七十个新的工业企业，建立了成千上万个生产单位。这使失业现象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减少。向国外的移民在几十年里第一次大大减少：1966—1971 年，平均每年每一千个居民中只有三点七人移居国外，开始低于年自然增长率。这使本国居民人数在一百多年来得到空前未有的增长。

但是资产阶级报刊为之欢欣鼓舞的爱尔兰的“经济奇迹”有其不利的一面。首先这与国内积极引进外国资本有关，外国资本在爱尔兰经济中获得越来越稳固的阵地。爱尔兰为外国企业主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源源不断的后备廉价劳动力，以及共和国依然享有的帝国特惠（虽然爱尔兰已退出英联邦），这一切都有助于在短期内建立了大量的外国公司，其中不仅有英国的，而且有美国、西德、荷兰、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公司。这些公司从爱尔兰的经济假繁荣中
281 获得主要利益。1961—1970 年期间，设在爱尔兰国内的外国企业有四百家，资本总额为一亿二千二百万英镑，占这些年里爱尔兰建立的所有工业设施的百分之七十和投资的四分之三。爱尔兰的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受到外国的控制。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在采掘业喧宾夺主（在铅锌矿产地以及爱尔兰大陆架地区的天然气和石油产地被发现以后，采掘业得到了发展）。英国资本在轮胎工业居

首位。电子工业、汽车制造业、化学工业也都受到外国存户的控制。

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促使爱尔兰在经济上更依赖美国和西德的垄断组织。虽然在爱尔兰创建的企业中英国所占比重为百分之四十四，依然居第一位，但至六十年代末，在投资总额方面美国已经超过了英国（英国为百分之二十九，美国为百分之三十四）。同时，爱尔兰依然同过去一样牢牢地依附于英国市场：1970 年爱尔兰对联合王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六，进口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不仅如此，放弃经济领域的孤立主义还意味着实行进一步接近英国和使爱尔兰在经济上成为英国附庸国的方针。1965 年与英国签订的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规定：十年期间，完全取消不列颠对爱尔兰的工业出口的一切限制。在协定生效的头五年期间，爱尔兰从英国的进口额从一亿八千八百万英镑增加到三亿三千六百万英镑。在同英国的贸易中爱尔兰的国际收支赤字从二千五百万英镑增加到七千二百万英镑。至 1970 年，爱尔兰与“共同市场”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但是它的对外贸易一如既往依然入超。

替天行道士兵党政策中的一些新的趋势首先影响到政府对当代爱尔兰最尖锐的一个政治问题——国家分裂问题的态度。1921 年爱尔兰分裂以后，在同英国的相互关系上要求民族统一是替天行道士兵党的根本立场。爱尔兰加强同英国的经济联系，力图跟随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就意味着放弃统一国家的斗争，也即放弃了替天行道士兵党意识形态上的一项基本方针。

都柏林政府于 1963 年制定了新的方针。实用主义者肖恩·勒马斯认为，采取与北爱尔兰进行合作的现实态度，要比实行那种在“无法确定的未来”统一国家的政策为好。

从成立两个各自独立的政府以来，1965 年爱尔兰共和国总理肖恩·勒马斯和北爱尔兰行政首脑特·奥尼尔第一次进行了互访。约翰·林奇继承了这一政策。

上述会晤意味着实际上承认北爱尔兰政府，会晤结果是采取

了一些搞好两个爱尔兰之间经济合作的措施。1968年事件使这一合作暂时中止。

替天行道士兵党政府对于在北爱尔兰乌尔斯特区发生的剧烈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持的立场不是始终如一的，一方面它不得不考虑到国内开展的支持北爱尔兰战士争取民权的运动，另一方面又不想恶化同英国的关系。形形色色的社会各界代表——共和国各种团体、工党党员、全国民权联盟、大学生联合会及许多其他团体，抗议警察镇压1968年10月5日在伦敦德里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他们要求林奇政府采取坚决行动，即公开表示抗议并向联合国呼吁。

1969年8月英国军队开进北爱尔兰以后，爱尔兰共和国捍卫乌尔斯特战士争取民权的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在都柏
282 林的英国大使馆前经常举行人数众多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这些行动往往以同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结束，要求发给武器来援助北爱尔兰战士的活动也从未停止过。爱尔兰进步社会团体主张英国军队撤出北爱尔兰领土，解散讨伐队(即所谓"B"特种警察部队)，举行全爱尔兰选举。还组织了为帮助乌尔斯特受难居民的捐款活动。

爱尔兰共产党人十分积极地参加了争取乌尔斯特民主化的运动。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支持北爱尔兰的争取民权斗争联合会(运动的核心组织)。北爱尔兰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职工大会贝尔法斯特委员会领导成员贝蒂·辛克勒成为该联合会的最初几任主席之一；1969年4月女共产党员埃德温娜·斯图尔特被选进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

都柏林政府不得不正式对乌尔斯特事件作出反应。1969年8月共和国外交部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审议北爱尔兰问题，以及把联合国军队开进自治省。在爱尔兰共和国领土的边境地带设立了许多野战医院和难民营。但是林奇政府没有坚决对抗英国对北爱尔兰的政策。爱尔兰总理宣布了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方针。这一政策在执政党内引起了严重分歧。1970年5月，一些主张对乌尔

斯特事件采取比较坚决行动的内阁成员辞职。林奇花了很大力量才得以维持其在党内的控制。

北爱尔兰危机的发展引起了爱尔兰共和军的积极活动，结果于 1969 年底导致共和国运动分裂成“正统”派和“临时”派两个组织。从新芬党内(该党是拥护共和政体者的政治组织)分离出来的所谓“正统”派提出了在爱尔兰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任务。“正统”派及其共和军主张积极采用政治斗争的方法，主张实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刻的民主改革，主张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和反对爱尔兰参加“共同市场”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新芬党的所谓“临时”派仍然持民族主义的宗派立场。“临时”派和“临时”派的共和军坚持用武力统一国家的方针，忽视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要求。

六十年代末，劳动人民更加强了为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而进行的斗争。1967 年爆发了一场反映农村对替天行道士兵党政策不满的“农场主战争”。为了抗议农产品的价格低和反对外国人收买国内土地，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封锁了道路，在农业部大楼前举行示威游行。

爱尔兰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大大加强了。1966 年共和国职工大会约有一百个组织，会员有三十六万人，与 1960 年相比，职工大会会员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十一。在爱尔兰职工大会的领导下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罢工。1965 年运输业的罢工和印刷工人的罢工(在十周内没有出报纸)以及 1968 年有五万人参加的修理工人罢工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几次罢工。

与此同时，爱尔兰职工大会和爱尔兰工党右翼领导人的影响以及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和宗教与宗派主义观点的存在，都对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不良的作用。1967 年底爱尔兰工党发表了 283
修改党纲的声明。党纲中加进了一些新的章节，把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目的。但是爱尔兰工党党员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它实际上与“混和经济”体制的改良主义概

念相差无几。在这同时，党的队伍中左倾情绪逐渐增强。党的一些代表人物开始积极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的强横霸道，主张建立左派力量的统一阵线。

1962年爱尔兰工人党(共产党人的政党)党纲《独立的爱尔兰》被通过。这是爱尔兰劳动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纲科学地分析了爱尔兰的现状，用阶级观点评价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还对工党进行了批判。爱尔兰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宣布了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社会主义爱尔兰的方针，规定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拥护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赞成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关系，反对加入“共同市场”。

1970年3月，爱尔兰共和国共产党与北爱尔兰共产党的合并和重新建立统一的爱尔兰共产党是爱尔兰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开端。在联合宣言中爱尔兰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为在国内实行民主改革和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民族自由发展而斗争的纲领。

六十年代爱尔兰对外政策的特点是它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展开活动。虽然共和国在联合国不能一贯坚持独立的立场，但是它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赞成限制核试验和核裁军，赞成给殖民地人民以独立。爱尔兰人参加了联合国军队，于1964年在塞浦路斯作战，1965年则是联合国在印巴边境上的观察员。

在几乎整个六十年代内，爱尔兰没有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在六十年代末在这方面才出现了积极的变化。1968年7月，爱尔兰外交部长弗·埃肯访问莫斯科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在访问期间双方为签订苏爱贸易协定采取了步骤，制定了进出口货物清单。1970年4月爱尔兰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这些事实证明，爱尔兰统治集团开始重新审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

5. 奥 地 利

1961—1966 年奥地利的经济同欧洲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处于从 1953—1954 年便已开始的高涨阶段。这一时期增加了投资，提高了产量，扩大了商品流转额。1966 年工业产量指数为一百五十一(以 1958 年为一百)。1961—1966 年期间国民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不变价格)。

受科技革命的影响，社会生产结构不断完善。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与加工、化学工业 精密机器制造业、电子工业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矛盾在经济高涨的情况下也加剧了。所谓的“缓慢的通货膨胀”仍在继续。在六十年代初通货膨胀每年达到百分之三至五。1962 年，投资多年来第一次减少了百 284
分之二。物价上涨也是通货膨胀的结果。

1967—1968 年上半年，奥地利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济情况普遍出现恶化。1967 年，经济总投资与前十年的水平相比减少了百分之十一，而工业产量指数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一百五十一)，也就是说工业产量没有出现增长。这些危机现象导致预算赤字增大(与 1966 年相比，1967 年预算赤字增加四十一亿先令，1968 年增加将近五十亿先令)和主要食品价格上涨(1966—1969 年上涨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六)。从 1966 年到 1969 年奥地利欠外国的债款增加了二倍(从四十四亿先令增加到一百四十三亿先令)。

在经济困难持续一段时期以后，从 1968 年下半年起经济重新复苏，并一直保持到六十年代结束。1969 年国际收支第一次(1964 年之后)出现顺差，共计约二十六亿先令。但是经济衰退的后果还继续影响着国家总的形势。预算赤字依然存在。对外贸易仍然入超。西德马克增值(1969 年 10 月 27 日)对奥地利贸易尤其不利。这一措施意味着西德商品在国外的涨价，这给奥地利带来不良后

果，因为奥地利进口的货物将近百分之四十是来自联邦德国的。政府依靠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来寻求摆脱经济困难的出路。物价上涨的同时捐税增加了，并且对于工人和职员（所谓"非自立"纳税人）来说捐税累进额增大了，而对于企业主（"自立"纳税人）来说，却仍然同原来一样，或甚至减少了。

然而，六十年代奥地利经济情况周期性的恶化和某些工业部门的危机现象，并不象有些西欧国家那样严重，也没有带来那么明显的社会后果。失业现象总的来说减少了，虽然下降的速度缓慢：1961年失业人数共计为六万三千五百人，1966年为六万一千四百人，1970年为五万八千四百人。因此奥地利的工人运动不象其他西欧国家那么活跃。只是在六十年代初通货膨胀现象加剧才使罢工运动略有增多。1962年有二十万七千四百名工人和职员参加罢工运动。就罢工人数而言，1965年居第二位。这一年有十四万六千人参加了罢工，奥地利工人进行斗争主要是为增加工资。

政治冲突更加激烈。1965年1月的反法西斯主义示威游行——反对维也纳高等学校的一名教授借电视台发表纳粹种族主义的演说——是奥地利工人最大的一次群众性政治行动。1965年3月被新纳粹分子杀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基赫弗格尔的出殡变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六十年代中期，反对新纳粹组织在国内活动的运动广泛展开。为反对把新维也纳的"拉克斯"金属加工厂出售给外国康采恩的计划而进行的持续几个月（1965年底至1966年初）的斗争也是工人运动的一个主要方向。

六十年代上半期，奥地利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合作原则的基础上的。从1945年底起所谓的"大联合"是两党合作的政治体现。多年以来社会党的代表一直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等职。社会党人是奥地
285 利战后所有年代的历届总统。不仅政府、而且国家机关、行政机构和一些社会机构的组成都与议会选举结果成正比。随着两党合作的加强，奥地利人民党的领导越来越明确地使奥地利社会党领导

人懂得"大联合"绝不意味着那种双方应当相互让步的政治妥协。奥地利资产阶级力图使联合适合自己的需要。随着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进一步巩固，人民党越来越明显地向右偏离，同时它更进一步地向大企业和金融家的政党蜕变。

奥地利人民党的这个演变过程是在没有内部摩擦和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1961年4月联邦总理尤利乌斯·拉布屈服于右派分子的压力，宣布辞职，由阿尔方斯·戈尔巴赫接替。新的政府马上开始推行较右的路线，1964年4月约瑟夫·克劳斯就任联邦总理标志着人民党右派集团的彻底胜利。右派分子主持党和政府以后，采取了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的方针。右派对奥地利社会党的进攻表现在他们不断引起政府周期性的危机上。如1963年夏，关于"哈布斯博格案件"的分歧引起了"大联合"的危机。经过长时期斗争以后，社会党人获得了胜利。议会（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拒绝授予君主王朝后裔奥·哈布斯博格奥地利国籍的决议，虽然奥地利人民党拼命地反对这项决议，也未成功。这类危



在反对哈布斯博格进入奥地利的集会期间聚集在维也纳议会大厦前的"奥地利自由青年"组织成员。1963年6月

机经常发生，结果，由于1965年9月在讨论下一年度预算时意见分歧，10月23日，经奥地利人民党领导人提议，政府宣布辞职。

286 在人民党内右翼势力增长的情况下，奥地利社会党内要求实行更独立自主政策的趋势加强了，这表现在反对参加“共同市场”和反对非国有化计划上。虽然如此，但是，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仍然对在“大联合”范围内与奥地利人民党结成社会伙伴的这一政策及其实际做法信守不渝，他们并不断绝与人民党的政治联盟关系，而打算保持“大联合”并争取在其内部的最高权力。

社会党右翼领袖忠于“大联合”，这就确定了社会党在竞选斗争中的策略方针。一方面，受党内情绪影响，奥地利社会党越来越积极地主张保持中立政策，反对加入“共同市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这种因素增大了；另一方面，社会党的选举纲领并不是除奥地利人民党的选举纲领外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可作的唯一选择。

1966年举行了议会选举。百分之四十八点三五的选民投票赞成奥地利人民党，百分之四十二点五六的选民投票赞成奥地利社会党。奥地利人民党在国民议会相应地获得八十五个席位(1962年为八十一席)，奥地利社会党获得七十四个席位(1962年为七十六席)。

共产党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只在一个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共产党号召自己的拥护者在其他选区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候选人。共产党在自己的选区内获得一万八千六百三十八张选票，因而
287 无权获得议会席位(获得基本席位的法定票数为二万七千八百张)。

奥地利人民党的领袖利用在议会所获得的优势向奥地利社会党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联合条件。奥地利社会党考虑到党内情绪，不得不拒绝这些条件。在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实行政治联合的二十年以后，开始建立了人民党的资产阶级一党政府。

社会党的失败意味着奥地利社会党右翼领导人的改良主义政策的失败。这种改良主义政策的基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

为奥地利社会民主派右翼领袖与垄断资本实行阶级合作的“样板”的社会伙伴体制。

约·克劳斯领导的人民党执政四年(1966年4月—1970年4月)。这一时期国内政治生活出现大幅度右倾。奥地利人民党提出了要求:不为国有企业提供任何特权,也不采取对国有企业实行宪法保护的措施。1969年10月,这项要求在法律上作了明文规定,当时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成立集资入股的“国有化工业管理公司”以及该公司有权将任何国有化企业的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卖给任何人的法令。相当大一部分国有化企业,主要是原先德国的资产,直接还给了西德康采恩。

对广播电视局实行的改革促使国内政治生活更向右转。奥地利人民党利用这一改革取得了对社会舆论的垄断地位。国内反动分子日益猖獗。这从拥护君主制组织的复活以及大日耳曼主义思想和观点的传播上表现了出来。

奥地利人民党在1966年选举中的胜利及其一党政府的建立使奥地利社会党领导集团在社会党处于新的政治形势下制订反对党纲领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奥地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布鲁诺·克赖斯基当选为党的主席,取代了布鲁诺·皮特曼。

党的新领导推行所谓“温和反对派”的政策,他们竭力表现出自己对社会伙伴关系这一主张的拥护,并证明自己对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忠诚。新的领导同意奥地利人民党在其统治时期通过的几乎所有反社会利益的法令。奥地利共产党人有充分理由称奥地利社会党的这种“反对派立场”为“静悄悄的联合”。同时,奥地利社会党考虑到下届议会选举的临近并力图恢复其执政党的地位,于是对劳动人民许下了种种诺言。

在1970年3月1日的议会选举中奥地利社会党获八十一席,奥地利人民党获七十八席。在奥地利的历史上第一次组成了社会党的一党政府。布·克赖斯基任联邦总理。

1961—1970年奥地利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奥地利共产党积极参加了要求增加工资、修订工资税率和反对奥·哈布斯博格返回奥地利的群众运动，并为此而努力争取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信奉基督教的工人和职员统一行动。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党内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恩·菲舍尔、弗·马雷克等人）。右倾修正主义分子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期间特别活跃。右派分子的反苏活动日益频繁。奥地利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69年1月)回击了修正主义分子。1969年10月右派首领被开除出奥地利共产党。

288 奥地利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党内辩论和1970年5月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声明，党找到了克服危机的自身力量。先进工人重新增强了对党的信任。

国家的国际法律地位——给奥地利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永久中立"——仍然是决定1961—1970年奥地利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苏联坚决要求恪守由苏联倡议而筹备和缔结的1955年国家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另一方面是，奥地利进步社会团体渴望切实遵守条约和关于永久中立的议会法令，这两个因素对巩固作为永久中立国的奥地利的国际威信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奥地利同苏联的关系改善了。这特别表现在1960年12月缔结的协定期满后，1965年7月14日又缔结了关于1966—1970年相互供货协定。

以右翼领导集团为首的奥地利人民党1966年在奥地利上台执政并未使奥苏关系受到不利影响，而且奥地利的新领导人考虑到奥地利人民对和平和对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向往，不得不在紧张局势已开始缓和的情况下赞成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合作。

六十年代末，奥地利与苏联缔结了科学文化合作协定和经济科技合作协定。1968年苏奥经济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的成立使双方的贸易联系扩大了。

1969年奥地利支持就安全与合作问题召开全欧会议的思想。奥地利的国土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会晤的场合。1969年12月公布的关于1970年4月在维也纳恢复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决定，得到奥地利的欣然同意。

六十年代奥地利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内容单一的政策。它承担奉行永久中立政策的义务，但经常遭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反抗，这就给奥地利政府的对外方针打上了一定的烙印。

6. 瑞　士

五十年代末瑞士的经济形势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可能称之为“繁荣时期”。但是，“经济温度过高”的征兆在1963年就已在生产和金融的假繁荣中初露端倪。1963年12月联邦议会（政府）承认国内已形成“令人担忧的经济形势，而其前景更是令人担忧”。1964年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特别法令，这是瑞士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以立法形式干预私人的经营活动。外国资本的引进人为地缩小了，企业主获得银行贷款的条件、建设新工程首先是生产性工程和扩大已有工程项目的面积等权利都受到了限制。垄断集团赞同联邦议会这些符合他们利益的措施。所以，与大资本关系密切的瑞士激进民主党和天主教-基督教社会保守党拥护政府的政策。为此他们号召工人和职员“为了共同的利益”不要去争取提高工资和缩 289
短工作周（在资本主义欧洲，瑞士是工作周时最长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周为四十八至五十小时）。中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中产阶级党与独立人士联盟则反对这些法令，因为中、小企业主与大企业主不同，他们没有方法逃避“降温措施”对他们利益的直接打击。但是这些政党没有提出可供选择的整顿经济纲领。

1968年初，政府开始逐渐放松“降温措施”，到1969年，几乎完全取消了这些措施。官方解释这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不过，对联邦政府政策持反对立场的强大力量在这件事上也起了一定的

作用。至于政府所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则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根本原因（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而只不过是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一次有限的尝试而已，这次尝试只产生了部分的和暂时的效果。1969—1970年通货膨胀趋势已经恢复就是证据。

六十年代，瑞士是四党联合执政。它们是激进民主党，天主教保守党，农民、手工业者和中产阶级党以及与这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瑞士社会民主党。1963年和1967年的议会选举只是给这四党之间的议席分配（这些党在联邦议会里各拥有相当数量的席位）带来无足轻重的变化。

这十年内，资产阶级主要政党的政纲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至于社会民主党，它的领袖则仍然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并且利用其在瑞士工会联合会（国内最大的工会中心）领导集团中的代表来推行改良主义。同五十年代一样，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实行反共路线，拒绝与共产党人共同行动。但是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不仅普通党员，而且一些党组织（在法语州和意大利语州）都纷纷参加由共产党人组织的政治示威游行、集会、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以及参加反对生活费用高涨，要求缩短工作周等运动。

瑞士劳动党（共产党人的政党）站在坚定地、始终不渝地捍卫劳动人民利益和瑞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共产党人遵照1959年瑞士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在六十年代提出了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的目的是：捍卫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反对提高房租；要求增加优抚金和补助金数额；根本完善瑞士的社会救济制度。（普遍认为，瑞士在这方面所做的远不如西欧邻国）。在对1964年的法令上，瑞士劳动党是唯一的明确持反对立场的党。它反对这些法令所规定的内容，如：缩减或"冻结"住房、学校、医院、道路的建设，反对劳动人民为了托拉斯和康采恩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所造成的"经济温度过高"而付出代价。共产党人为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扩大了在群众中的

影响。在1965年的日内瓦州的地方选举中瑞士劳动党获得百分之三十三的选票，1966年在该州获得百分之二十三点六的选票。如果注意到瑞士劳动党长期遭到诽谤性的攻击，那么这是有重大意义的胜利。1966年，瑞士劳动党有两名候选人被选入苏黎世市政府，在这个城市里，由于右翼政党的反共运动，党的工作条件特 290
别复杂。1967年的选举结果，有五名共产党代表被选为议员，结果瑞士劳动党多年来第一次有权在联邦议会里成立共产党小组。

在左派民主力量于六十年代取得胜利的同时，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极右集团，如瑞士法语区的“警惕者”和德语州的“反对外国人横行霸道运动”也十分活跃。这些集团的特点是：肆无忌惮地进行社会蛊惑宣传和鼓吹沙文主义，一些中等阶层以及相当一部分工人和职员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

外国工人问题成为瑞士国内政治生活的尖锐问题。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由于生产迅速扩大和为外国旅游者服务行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输入量特别大。例如，1964年在这个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共和国有将近八十万外国工人，主要是意大利人。他们的处境比当地工人要坏得多。如果外国工人对劳动和生活条件表示不满，他们就会被当局用行政手段驱逐出境。外国工人不享有与瑞士人同样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权利。他们住在狭小的木房或者没有起码设备的破旧房子里。瑞士资产阶级在外国工人周围造成一种人为的隔离环境，从而阻止他们与瑞士无产阶级共同行动。而且右翼集团还煽动居民中某些阶层（主要在德语州）的沙文主义情绪，激起他们对“外来人”的反感。施瓦岑巴赫议员和他的同伙提出“保护瑞士人不遭外国人的吞食”的蛊惑性口号，要求 291
三十万外国工人在1968年离开瑞士。在这场闹哄哄的活动中，“施瓦岑巴赫分子”企图把外国工人说成是国内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祸首。

社会各界人士及时地识破了得到“反对外国人横行霸道运动”和“警惕者”支持的施瓦岑巴赫倡议的极端反动性。国内民主力

量，首先是瑞士劳动党揭露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开展的反对外国劳动者运动的目的，他们坚决保护外国工人不受任意施加的种种迫害。官方人士以及大资本的代表人物也不同意施瓦岑巴赫的举动，因为三十万工人离开瑞士会严重地影响瑞士经济的发展。

妇女的政治平等是六十年代进行斗争的另一个问题。这些年瑞士仍然是欧洲唯一的（如果不算列支敦士登这个小公国的话）不给妇女享有基本政治权利（全国议会以及地方管理机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妇女也没有参加州的和全国的全民投票的权利，而提交全民投票表决的问题中就包括了那些涉及女工或有孩子的妇女利益的经济、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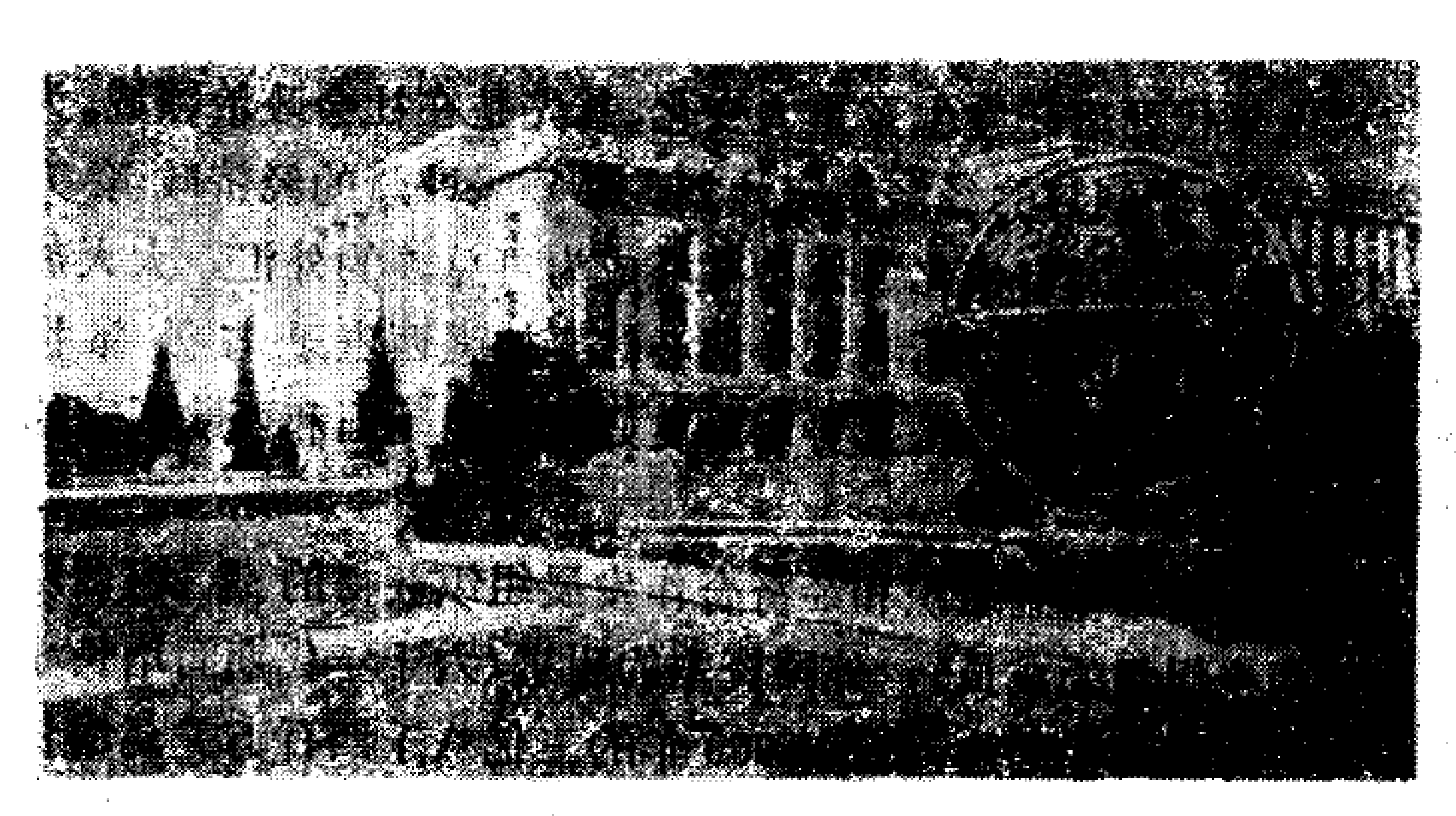
日内瓦州、沃州和纳沙泰尔州还在1959年就让妇女享有了选举权，很快巴塞尔州、提契诺州和瓦里州也这样做了。但是反对妇女平等的人仍然持顽固的态度，例如，在提契诺州，反对者只是在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四次全民投票以后才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六十年代末已有不少州准许妇女参加全民投票，但不准她们参加州的选举。报刊上、政党中、各社会团体的会议上都对妇女平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69年3月1日三千名妇女——全国各州的妇女代表举行了“向伯尔尼的进军”。她们要求立即在政治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消除在劳动报酬上的差异（差额平均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但在很多情况下，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以及在公营和私营部门担任任何职务的机会方面和在享受高等专业教育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状态。

进步力量在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尽管不大，但毕竟证明了，社会舆论明显地向有利于先进思想的方向变化，新的思想侵入了瑞士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在国内政治生活的其他一系列事实中也得到了证实。

六十年代全世界开展的缓和紧张局势的运动对瑞士也起了良好的影响。国家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扩大和巩固，用以提高阿尔卑

斯山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机会增多了，永久中立政策为瑞士提供了这种机会。

由于中立，由于不参加军事政治集团，在这个时期，瑞士作为联合国组织两个活动中心之一（还有一个是纽约），作为举行政治、经济和学术性质的大型国际会议的场所，它的作用更大了。联合国欧洲分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国际劳工组织总部、国际电信联盟总部、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国际红十字总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还有约二十个其他较小的国际组织都设在日内瓦。这里还设有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领导机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领导机构。在日内瓦进行过裁军谈判，关于停止在地面、空中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谈判，以及老挝问题的谈判，等等。在瑞士的另一个城市
洛桑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办公大楼，而在首都伯尔尼驻有万 292
国邮政联盟总部。



日内瓦的民族宫。联合国欧洲分部所在地

作为永久中立国的瑞士人是联合国派往世界各地的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尽管瑞士本身不是联合国成员。

在本章所述时期，瑞士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1967年运输邮电部部长鲁道夫·格内希访问了苏联，这是瑞士政府官员第一次到苏联正式访问。苏瑞贸易额增大，两国之间建立

了科技联系（苏联与大化学公司“盖吉”、瑞士钟表工业联营等签订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协定）。1967年开辟了苏黎世——莫斯科直达航线。两国之间体育运动和旅游的接触日益频繁。瑞士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也增多了。但是瑞士执政集团仍与过去一样拒绝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常的政治关系。在对这些国家的关系上，伯尔尼是以美、英的立场为指南的。

同时，在这一时期，瑞士执政集团不仅对加强同美国的关系，而且对加强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表现出比过去更大的兴趣。阿尔卑斯山共和国与欧洲的另外两个中立国——奥地利和瑞典也明显地接近起来。

7. 西 班 牙

六十年代西班牙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为了实现1959年制订的经济稳定计划，必须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方
293 针：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使比塞塔成为可兑换的外汇，大大放松对外国资本的限制。所有这一切必然要加强西班牙与外部世界，首先是与正处于经济形势相对良好时期的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联系。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获得的贷款（西班牙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外国资本的引进（六十年代期间增长了九倍），对外旅游业的收入（从1960年的三亿八千四百万美元增长到1970年的十七亿美元，占全世界旅游业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以及大批劳动力移居西欧（十年内给西班牙带来将近三十亿美元），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创造了条件。国内保持有廉价的劳动力、很高的资本积累率，以及固定生产基金不断扩大，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61—1970年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额为百分之七点六。钢的产量从1960年的二百二十万吨增加到1970年的七百四十万吨。

西班牙的造船业至七十年代初已进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五位。汽车制造业为第八位。新兴工业部门不断涌现，新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方法更快地得到了采用，基础结构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修复和铺设了将近五千公里的汽车路。

六十年代，西班牙作为工业农业国的地位已完全固定下来。经济结构的改组使社会上主要阶级和阶层的比重发生了变化。十年内，农业就业人数从百分之四十一点七五减少到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同时工业就业人数从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增长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服务行业从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增长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五。1970 年，国内有百分之三十六点五的居民住在拥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同时，区域性的比例失调依然存在：在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上集中了百分之五十七的国民产值；而在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上总共才拥有国民产值的百分之十五。国家的工业发展没有消除已存在的尖锐矛盾，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

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监督有所放松。但是，经济调节机制仍然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国家垄断资本的阵地。1964—1967 年和 1968—1971 年两个“发展计划”的实现消除了经济自给自足的重要因素。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在有利于大私有者，首先是垄断资本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政府通过“直辖”工会（工团）实行制止工资增长的政策，西班牙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同过去一样仍然是西欧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材料，六十年代该国的工资名义上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六点一。但是，不止一次的通货膨胀浪潮使这十年的物价上涨了一倍多。而政府则更经常地采取冻结工资作为通货紧缩的手段。

虽然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国内仍经常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只是由于大批人移居西欧（二百五十万人以上），六十年代的失业者才没有超过就业人数的百分之二。

罢工运动的高涨是从五十年代下半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六

十年代。1962年春，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举行了大罢工。他们的英勇斗争在全国其他地区得到了响应。至5月中旬，罢工席卷了西班牙五十个省中的二十四个省。虽然当局把三万多警察调到罢工地区，但是罢工者坚持了将近两个月，他们的经济要求部分地得到
294 满足。罢工运动主要是在工会反对派的秘密机关——罢工时期工人自己初次选出的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除了工人委员会以外，一个被称为"天主教工人兄弟会"的天主教工会在领导1962年的罢工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除官方"直辖的"工团以外，"天主教工人兄弟会"是劳动人民在有限范围内可以公开活动的唯一组织。

1962年的罢工浪潮标志着工人运动已开始发展成国内政治生活的经常性因素：1965年记录在案的罢工有二百三十六起，1970年为八百一十七起。1970年罢工运动几乎席卷了全国所有的大工业中心。

在罢工过程中，除经济要求外，工人们提出了旨在使国内一切生活民主化的要求。1970年政治性罢工在罢工总数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同时，在象西班牙这样的国家，虽然参加罢工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还并不是说就有了罢工的权利。因此任何罢工都是重要的政治因素。六十年代期间，"工团主义劳工行动"之类由天主教徒及其他人领导的一些地下工会积极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至六十年代末，1939年被禁止的总工会的地下工会小组在阿斯图里亚斯和巴斯克地区重新拥有很大的影响。

在罢工运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工人委员会成为工会反对派的常设机构，工人委员会在组织建设中把按部门（如企业的地方组织、城市的部门协调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和跨部门原则结合起来。1965年，由冶金、建筑、化学、电子技术等工业代表组成的第一批跨部门委员会在马德里成立。从1967年起开始秘密召开工人委员会的全国大会。

工人委员会不分政治信仰广泛吸收劳动人民参加。共产党人、

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和无党派人士都参加了工人委员会。共产党人在许多工人委员会中担任领导，其中有公认的工会反对派领袖马塞利诺·卡马乔。

六十年代下半期，类似的委员会在农业工人中开始成立。1969年在农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农民和农业工人在赫雷斯举行了佛朗哥政权存在的整个时期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参加者有一万一千人。

六十年代对国内整个政治生活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规模工人运动对民主舆论的形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引起广大阶层的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的文化工作者的同情和支持。支持工人阶级斗争的运动使反佛朗哥的各种反对派小组和团体更加接近起来。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互相支援极其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学生运动在经历了捍卫与学校生活直接有关的权利，首先是捍卫成立学生组织的权利的行动阶段之后，至六十年代中期，成了为整个政治生活民主化而斗争的重要因素。1965 年 2 月 20 日在马德里大学自然科学系召开的自由学生大会的纲领证明，学生运动在进步，它已成为反对佛朗哥一派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会参加者除要求成立自治的学生民主联盟和对学生进行大赦外，还 295
声明支持所有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劳动人民。1967 年 2 月 27 日马德里的大学生积极响应工人委员会的号召，参加了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六十年代下半期，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一直得到民主学生的积极支持。1968 年 9 月巴伦西亚高校大会的参加者还建议“与工人委员会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但是 1966—1970 年政府采取镇压手段破坏了国内一些重点大学的运动。

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和加利西亚民族运动的各种流派也都具有日益接近的倾向。这个运动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政党开展起来的，而是在笼罩全国的民主主义普遍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群众性运动。加泰罗尼亚省形成了最广泛的联盟。在那里共

产党人、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共同行动。工人委员会以及一度颇有影响的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盟残留下来的一些团体代表了工人的工会组织。巴斯克争取国家自由战士联合会是这一时期在巴斯克出现的组织中最积极的一个。尽管该组织中主张武装斗争(这里也包括个人进行恐怖活动)的一派与信奉非暴力行动的一派存在重大分歧，但是巴斯克争取国家自由战士联合会在这一时期避免了分裂，有时还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既有民族要求，又要实现反佛朗哥斗争的总任务，这两者的结合是六十年代国内所有民族运动的特点。

反佛朗哥民主运动的高涨不仅使已有的反对派政党得到巩固和壮大，而且还使一些新的秘密组织和团体不断涌现。以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民社会党这样的组织，以及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左派地方主义者、共和政体拥护者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都在养精蓄锐。西班牙共产党在实行还在 1956 年就制定的"民族和睦政策"的过程中，提出了在六十年代末成立"体力工作者与脑力工作者联盟"的任务，把这个联盟作为对佛朗哥专制政权进行斗争的主要突击力量。这时期，西班牙共产党已拥有数十种秘密报纸和杂志，它的中央机关刊物《工人世界》的发行量有时达五万份。同时，采取社会主义方针的政党和团体，首先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一些组织的积极性提高了。

一些基督教民主主义组织，首先是有进步倾向的团体的影响范围显著扩大。六十年代末，华·鲁伊斯·希门尼斯成为这些组织公认的领袖。1967 年鲁伊斯·希门尼斯及其拥护者制定了一个改革的纲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要求，即实现运输、矿场国有化，进行农业改革和税捐改革，赋予政治自由和工会自由，宣布大赦。

在一些反对党的中派和右翼集团中，奥·玛·伊尔·罗夫莱斯领导的右翼"天主教社会民主党"是最有势力的集团之一。自由主义的保皇派组成了几个集团，他们的影响也扩大了。

反对派实现联合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力图制定出一个关于斗争

和未来社会经济改革的共同纲领上。但是，大部分反政府派的领袖顽固地拒绝与西班牙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虽然在他们的许多文件中有些条款与西班牙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吻合的。

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没有被邀请参加反对派领袖于1962年 296
6月5—6日在慕尼黑召开的秘密会议，但西共仍然拥护这次会议制定的纲领的主要内容：实行大赦，恢复民主自由，包括工会自由。对于反对派共同制订的其他一系列文件，西班牙共产党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例如对递交政府要求建立民主自由的"137人文件"(按签署文件的人数命名)，就是如此。至六十年代末，西班牙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被其他党派疏远的障碍。1969年底反对派领袖和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其中有不少共产党人)在塞尔维亚召开的会议便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前还是佛朗哥政权牢固支柱的一些组织和团体加快了与政府划清界限的过程，这是反佛朗哥运动日益高涨的另一结果。首先这表现在教会的立场上。在1962年春的罢工斗争时期，西班牙教会的正式机关刊物《教会》虽然小心谨慎地，但公开主张捍卫工人的罢工权利。至六十年代末，一贯支持佛朗哥政权一切行动的右翼教徒处境愈加孤立。多次谴责佛朗哥政权的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卡西安·胡斯特这些年在信奉天主教的宗教界人士和非宗教界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68年曾是马德里大主教的恩里克·塔朗康积极支持争取和平、言论自由、成立工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权利的运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这与教会根据1962年至1965年进行的第二届普世基督教会(梵蒂冈)会议的决定而改变社会政策有关。

反对派的反佛朗哥运动的发展和那些曾是佛朗哥政权支柱的各组织之间开始发生的分歧削弱了佛朗哥政权机构的力量。与此同时，独裁政权拥护者之间在关于采取何种途径和方法使政权得以稳定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一些主张持"强硬"方针的人，即所谓的"死硬派"，以佛朗哥手下的老将军、官僚主义机构和土地寡

头政治的上层人物为靠山，坚决维护强硬的镇压制度。西班牙的社会舆论认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胡·格里莫因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活动而于1963年被判处死刑是“死硬派”施加压力所造成的。主张所谓“放宽”的一派并不完全拒绝镇压方针，但是认为这个方针应与佛朗哥主义某些政治制度实行有节制的现代化结合起来。他们的理由是，为了使西班牙进入资本主义西方的军事和经济集团体系，首先是进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共同市场”，必须清除形式上的障碍。

受这些集团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一些“放宽”制度的措施。例如，1963年，在处决胡·格里莫后不久，由于几乎席卷全世界的抗议运动的结果，撤销了特别法庭。1965年，议会赞同政府关于废除因经济罢工而判刑的决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工人阶级有罢工的权利。1966年取消了因在国内战争时期参加行动而负的政治责任，1969年又取消了因在国内战争时期参加行动而负的刑事责任。六十年代内，六次宣布赦免部分政治犯。1966年3月通过的出版物法取消了书刊付印前的检查，代替检查的是采取其他保护性措施，不准公开批判体制的各项基本原则。

1966年11月通过了新的组织法，目的是造成“放宽”制度的表面现象。这项法令设内阁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规定五百六十四名议员中有一百零八名可由选举产生，各户家长和已出嫁的妇
297 女都可以参加这一选举。其余的议员仍同以前一样，或者由“直辖”工会、市政机关、大学等有关团体选拔，或者由国家元首委任。法令规定了国家元首逝世后任命国王或摄政王的原则：凡三十岁以上忠于“民族运动”原则的西班牙人和天主教徒可以被任命为国王。1967年1月这项法令经过全民投票开始生效。1969年7月23日根据新的组织法，佛朗哥指定波旁王朝的西班牙最后一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1902—1931年)的孙子胡安·卡洛斯王子为西班牙未来的国王。

有人企图把反对派运动纳入对政权没有危险的轨道和按照政

府的"放宽"方针所规定的框框来限制佛朗哥制度的改革，这在六十年代末已表现出是不可能办到的了。因此，用佛朗哥政权的传统镇压方法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冲突的倾向往往比随机应变的策略占有明显的优势。佛朗哥的专政依然是反民主的强权制度。1968年8月恢复了《关于土匪行为和恐怖活动法》。根据这项法令，反对任何政权机构和官员的行为均被认为是军事叛乱。1969年10月进行了政府例行改组。这次改组巩固了与大企业和天主教的非宗教组织"上帝事工派"有联系的专家治国论者——部长们的阵地。这些专家治国论者主张在最大限度地保持私人企业经营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主张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密切关系，但是，他们同时又是保持西班牙强权制度的拥护者。新政府的许多部长倾向于必须实行强硬的镇压方针。内阁副主席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是这个方针的热心拥护者。他是对圣塞瓦斯蒂安市的十六名巴斯克人——巴斯克争取国家自由战士联合会成员——进行审讯的发起人之一。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抗议，将原判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同美国的关系在西班牙国际关系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1963年9月26日，西美两国把1953年签订的"防御"协定期限延长了五年。1970年8月在华盛顿签定了新的协定，根据协定，西班牙获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连同贷款共达四亿美元。托雷洪和萨拉戈萨的美国空军基地和罗塔的美国海军基地再继续保留五年。协定还规定设立由西、美两国代表组成的防御问题专门委员会。

与此同时，西班牙与拉丁美洲和近东国家的传统联系在六十年代更加频繁起来，并且西班牙对这些地区的外交方针具有灵活性和独立自主性。西班牙政府所作出的一些决定往往引起华盛顿以及西欧各国首都的不满。例如，西班牙拒绝参加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并于1963年与古巴建立了经济关系。1967年6月西班牙发表声明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马德里确定这样的外交方针，其立足点既是预计西班牙能在欧洲与拉丁美洲、远东之间起到桥梁

作用，也是力图为扩张本国资本获得有利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促使西班牙在寻找国外市场时去“开发”东欧。六十年代下半期，它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贸易关系。同一时期，西班牙与苏联也进行了头几次的贸易接触。

298

8. 葡 萄 牙

1958年总统选举后葡萄牙形成的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到六十年代初仍然存在。镇压并没有摧毁反对派。1961年1月，以反对派著名活动家恩·加尔万为首的反法西斯小组夺取远航班轮“圣玛丽亚”的事件，使全世界都注视着葡萄牙民主力量进行的斗争。

成为葡萄牙殖民帝国崩溃序幕的一些事件对葡萄牙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1年2月安哥拉人民奋起为摆脱殖民压迫而开展武装斗争。葡萄牙殖民军队却没有作好军事行动的准备。在葡萄牙的将领中也有主张对安哥拉问题进行政治解决的一派。领导这个集团的是在军官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共和国前总统（1951—1958年）克拉维罗·洛佩斯元帅，以及国防部长博特里尤·莫尼斯将军。4月，他们试图进行政变，但被镇压下去。

1961年12月，在果阿、达曼、第乌的葡萄牙军队投降。葡萄牙不得不将这些领土归还给印度。葡萄牙帝国主义失去了其重要领地。

1962年1月，一群军人和文职人员企图夺取葡萄牙南方贝雅市兵营未遂。在审讯时，一个起义参加者声明：葡萄牙军队不想为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流血牺牲。

1963年葡属几内亚、1964年莫桑比克先后开始进行民族解放武装斗争。葡萄牙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战争具有越来越持久的性质。有反法西斯情绪的青年学生加入军队，他们的观点对军官们起了很大的影响。

武装部队中日益增多的哗变反映了葡萄牙广大阶层人民对政

权的不满。1961 年 11 月国民大会选举期间举行了政治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次游行。1962 年 3 月发生了萨拉查政权整个历史时期内具有重大意义的学生运动。葡萄牙劳动人民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来庆祝五一节。仅里斯本一地就有十万多人参加。全国同时举行了罢工。五一节的行动是在“打倒萨拉查!”和“安哥拉要和平!”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些日子里，南方的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要求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后，罢工获得了彻底胜利。1963 年 5 月 1 日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虽然参加人数比 1962 年少一些。

从 1926 年起处于地下状态的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了国内民主力量的斗争。六十年代初，葡共的活动明显增多。1960 年 1 月，葡萄牙共产党著名活动家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还有九名被囚禁的共产党人从“皮尼希”城堡的监狱中越狱成功，这对葡萄牙共产党的活动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1961 年 12 月又有八名共产党人从卡夏斯堡垒逃了出来。

在葡共中央三月(1961 年)全会上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葡共中央在六十年代制订的文件中指示党准备在有很大一部分武装力量参加或中立的情况下发动大规模的“全国起义”。共产党认为建立“广泛的反垄断、反帝阵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思想在 1962 年 12 月 9—21 日召开葡萄牙反对派第一次会议时
开始得到贯彻。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左派天主教徒，甚至 299
自由主义的君主主义者都参加了会议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民族解放爱国阵线的决定。1964 年 1 月，民族解放爱国阵线第二次会议选出中央爱国联合小组，住地设在阿尔及尔。1958 年选举时反法西斯力量的候选人翁贝尔托·德尔加多将军担任了这个小组的主席。1964 年底，爱国阵线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拒绝参加殖民战争而侨居国外的一群军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民族解放爱国阵线提出了“领导人民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任务。

同以往一样，萨拉查政府对六十年代上半期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是采取了恐怖活动和蛊惑人心的两手。萨拉查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捣毁社会团体，其中包括作家协会，另一方面他企图把自己的非洲政策冒充为“全民族的事业”，并利用相当多一部分葡萄牙人所固有的殖民偏见。右翼反对派的一些老顽固组织了支持当局政策的行动。官方的宣传竭力使人相信：葡萄牙士兵在非洲作战不是为了某种政治制度，而是为了“祖国”。萨拉查硬说，他之所以继续执政只是由于非洲战争的缘故。

法西斯口号在国内没有取得成效，但是殖民主义理论却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总的来说，这些年葡萄牙资产阶级从开发“海外领土”中获得巨额利润。离开殖民地的这种思想在葡萄牙自由主义者中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只有葡萄牙共产党一贯反对殖民主义。右翼反对派各集团(其中也有参加民族解放爱国阵线的组织)的领袖一方面谴责法西斯主义的死硬政策和最原始的凶恶的开发形式(强制劳动)，一方面又主张逐步使殖民地享有在“葡萄牙联邦”范围内的自决权。这种主张帝国实行联邦制的思想在萨拉查的阵营中也有其拥护者。

政府满足了自由主义者的某些要求。政府略微扩大了“海外省”立法会议的权限。废除了对“国民身分”的限制，即非洲土著在法律上不享有全部权利的特殊规定被取消了，所有帝国居民都具有了葡萄牙国籍。对国民教育也开始重视起来，因为殖民主义者力图尽快地造就出他们能够依靠的非洲资产阶级阶层。战时状态的某种稳定——这首先是由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分裂造成的——使葡萄牙资产阶级中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削弱了。葡萄牙自由主义反对派组织“社会民主行动”于1965年提出的“殖民地有权独立”的口号引起内部严重的意见分歧，以至大大破坏了自己的影响。

翁·德尔加多将军于1964年底脱离民族解放爱国阵线的行动对民族运动的低落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十年代葡萄牙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二，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二。国家经济结构迅速变化。农业部门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减少到1970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一。同时，工业比重从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增长到百分之四十九点八。出现了石油化学、铸钢、电机、无线电器材、自动装配等工业部门。葡萄牙自1960年参加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后，从国际分工中得到了一定 300
的好处。由于在安哥拉进行殖民战争而造成的国内资本严重不足，1965年又给予外国资本以很大的优惠，外国资本便成了葡萄牙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战时景气对某些工业部门曾起了刺激作用。六十年代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对葡萄牙的收支差额也十分有利。与此同时，主要由安哥拉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工业中的比例失调依然存在。六十年代建成的现代化工厂在为数众多的工艺陈旧的小企业中显得是寥若晨星。

1968年在萨拉查生病期间(后于1970年逝世)，以往曾多次担任部长职务的法学教授马尔塞洛·凯塔诺匆忙宣誓出任总理。他过去是墨索里尼的崇拜者，法西斯组织"葡萄牙青年"创始人之一，在五十年代，与自由主义人士的关系相当密切。凯塔诺曾经一面让自己干一些同政府捣乱的活动，一方面又要求政府维护民权。1962年他甚至辞去里斯本大学校长的职位以示抗议警察对学生的镇压。凯塔诺被公认为是殖民地问题的大专家，因为他在1945—1947年曾任殖民地部长。

凯塔诺于1968年上台后提出了"继承和发展"的纲领。他指望，在不损害"新国家"的实质的情况下，他能使葡萄牙的政治制度稍许现代化一些，从而更容易为外部世界所接受。

在1969年的议会选举中执政党候选人获得将近百分之八十八的选票，照例获得国民大会的全部一百三十个席位。除了执政党惯用的偷梁换柱和恐吓选民的手段以外，对当局"放宽"政策的期望以及反对派力量的分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总理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术语的改变。法西斯政党“国民联盟”改名为“全国人民行动”，秘密的“国际卫国警察局”改为安全总局。按其实质来说，凯塔诺政权与萨拉查的独裁只是“作风”不同罢了。新总理比较和蔼可亲，喜欢到处游览。凯塔诺子孙满堂的照片（萨拉查则是个固执的单身汉），他的与电视观众亲切的“家庭谈话”仅仅是以仁慈温和的薄纱来掩盖政权反动实质的一种手段。同时，对书刊的检查有所放松。反对派进行活动的条件也略有改善。

葡萄牙经济发展的前景主要取决于欧洲一体化，而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葡萄牙垄断组织不得不非常重视葡萄牙经济改革问题和葡萄牙商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能力。1965年法令颁布后，迅速增长的外国投资基本上集中在本土，而不是在殖民地。1969年外国资本对葡萄牙本土的投资为五亿八千万埃斯库多，对殖民地的投资为十一亿二千八百万埃斯库多，可是，1970年对本土的投资已达十七亿七千一百万埃斯库多，而对殖民地只有二亿零八百万埃斯库多。

凯塔诺委以国家经济领导重任的“欧洲问题专家”——一群专家治国论者认为，只要使垄断组织的经营管理彻底实行现代化，葡
301 萄牙就能够在西欧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们的规划包括这样一些要求，诸如废除为没有生存能力的工业部门提供温室环境的保护关税制度，抛弃代价太大的、官僚主义的阶级合作主义，加强同西班牙的区域工作，等等。但是这个规划中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是不公开的一点，却是对非洲问题进行政治解决，使葡萄牙经济走上和平轨道。“欧洲问题专家”期望找到一个政治方式，即既能结束战争，同时又能使葡萄牙保持殖民地。一些热中于向非殖民地市场出口的葡萄牙垄断组织与“欧洲问题专家”建立了密切联系。

在里斯本的政治舞台上，与“欧洲问题专家”对抗的是“非洲问题专家”。以葡萄牙非洲殖民帝国市场为经营对象的垄断组织则支持这个集团。一部分最反动的将领、工业家由于他们的利益将会

因废除保护关税制度而受损失，也赞同这一集团。“非洲问题专家”担心“放宽”政策和放弃非洲领地将会产生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的结果，他们甚至提出警告，反对同佛朗哥西班牙进行接触。“要非洲，不要欧洲”——这就是这个集团的口号。因此，里斯本的分歧也扩大到对外政策方面。

殖民战争是影响六十年代葡萄牙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安哥拉战争开始以后，葡萄牙陷入外交上几乎完全孤立的状态。以前曾与里斯本保持外交关系的大部分亚、非国家断绝了同它的外交关系。在联合国、在安全理事会上西欧国家以及美国往往不得不投票赞成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决议。

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继续对葡萄牙提供武器，公然维护里斯本，但是他们不打算，也不愿直接参加它的殖民主义冒险行为。萨拉查因此而非常忿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这位独裁者甚至以退出北大西洋集团相威胁，他拒绝缔结关于亚速群岛美国基地的新协定。葡萄牙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特别是西班牙的关系有了较良好的发展。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萨拉查也没有得到对他的殖民政策的完全支持。在巴西有进步思想的夸得罗斯和古拉特两位总统执政时期(1961—1964年)，作为萨拉查外交极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葡巴关系也曾经十分紧张。

然而，里斯本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外国资本投资条件的放宽在年迈的独裁者离职以后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凯塔诺统治的头几年，外国资本对葡萄牙经济的投资大概比在萨拉查统治几十年内的投资总额还要多。这种情况以及葡萄牙政权对外形象的改变有助于葡萄牙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密切起来。

9. 希　腊

希腊是在国内矛盾加剧的条件下进入六十年代的。矛盾的一方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力量进行合作的地方金融寡头政治，另一方是一些主要社会阶级和集团——工人阶级、农民、城市中等阶层、

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主反对派队伍中的不团结使北大西洋公
302 约组织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希腊寡头政治得以阻止希腊实行民主改革。

1961年10月，希腊统治集团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利用外国秘密情报部门的帮助，成功地伪造了议会选举结果。因此，国民激进联盟获得百分之五十点八的选票和议会三百个席位中的一百七十六席，再次组成以康·卡拉曼利斯为首的政府。

选举后，政府加强对民主人士的恐怖手段，进一步强化了警察机构，通过了一系列反民主的法令。例如，1962年通过《关于解决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法令。这个法令赋予政府以自行酌定暂时停止宪法生效和宣布戒严的权力。

在对外政策方面政府致力于使希腊进一步参加“冷战”。正是在这一时期，希腊政府拒绝接受苏联和巴尔干半岛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使巴尔干和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和平区的建议，它还同意在希腊建立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导弹基地。

尽管反动势力全线进攻，但是希腊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从1962年中期起仍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为自身权利和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具有了更好的组织性：1962年罢工人数为四十五万，而1963年已达到七十五万。劳动农民的斗争也增强了，青年纷纷要求解决他们的迫切问题，中等阶层也参加了斗争。1961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联盟——以乔治·帕潘德里欧为首的中间派联盟加强了反政府的立场。

在希腊共产党和统一民主左翼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为争取释放政治犯和进行政治大赦而积极展开斗争。和平运动开展起来。要求希腊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意见也越来越坚决。

政府企图阻止日益壮大的民主运动，便采取了恐怖政策。全国缓和国家紧张局势和争取和平斗争委员会副主席、统一民主左翼党议员格里戈里斯·兰布拉基斯成了政府的牺牲品。兰布拉基斯的被杀害（1963年5月22日）使全体希腊人民奋起反对国内外反

动势力。兰布拉基斯的出殡成了五十万人民群众对政府行动表示仇恨和愤怒的战斗的示威游行。

在这个群众运动的打击下，国民激进联盟的政府宣告垮台。在1963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国民激进联盟获得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第一次遭到失败。中间派联盟获得微弱的多数（百分之四十二），还有百分之十四的选票拥护统一民主左翼党。

中间派联盟的领袖乔·帕潘德里欧组成了新政府。他力图巩固自己在议会的地位，又不想依靠统一民主左翼党的选票，于是决定在1964年2月16日重新进行选举。由于许诺实行民主改革和修改对外政策，中间派联盟在选举中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占百分之五十三，帕潘德里欧组成了政府。但是，中间派联盟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并非易事。这个党乃是在左翼与右翼之间持中间立场的几乎所有组织的联盟。一伙代表部分希腊金融寡头政治以及外国垄断组织利益的人在中间派联盟的领导中占有优势。同时该联盟还不得不注意到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得不考虑到自己传统的民主主义拥护者的利益以及他们的反君主政体的情绪。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帕潘德里欧政府在1964—1965年开始实行某些使 303
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措施：释放大部分政治犯，取消集中营，限制警察局和宪兵队的权力，放松国家对工会的监督，等等。

但是，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就连中间派联盟政府这些小得可怜的改革都认为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在美国和王室的压力下政府变卦了。中间派联盟自己内部右翼与左翼之间矛盾的加剧对此也起了很大作用。帕潘德里欧力图以调和折衷办法来消除矛盾，但是他更多的是站在右翼的立场上。结果，在国家机关、安全部门、特别是在军队中，法西斯分子和保皇派仍然身居要职。根据君主主义者的要求，王室的走卒彼得罗斯·加鲁法利亚斯被任命为国防大臣。

这样，乔·帕潘德里欧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使右翼在1963—

1964 年选举失败后有了积蓄力量和转入反攻的时间。

1964 年选举以后，由于共产党人和统一民主左翼党人努力工作，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仍继续发展。多次举行了有数十万工人和职员参加的罢工。一百一十五个工会组织为建立统一阵线开展了活动。劳动人民和以“兰布拉基斯民主青年”(左翼青年组织)为首的青年大学生进行的斗争成了国家生活中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寡头政治和王室的最反动势力一方面对民主运动的高涨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对右翼让步和妥协政策的鼓舞，他们依靠五角大楼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帕潘德里欧为了使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能有所控制，于 1965 年 7 月决定免去加鲁法利亚斯的国防大臣职务，由自己来兼任。但是康斯坦丁国王拒绝了乔·帕潘德里欧的这一决定，并于1965年7月15日免去了乔·帕潘德里欧的职务。实际上这是一次国家政变。政变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

希腊民主力量广泛开展了抗议运动。全国各地数十万人民、所有反对垄断组织的阶级和阶层代表纷纷要求恢复宪法程序和民主自由。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走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仅从 1965 年 7 月 16 日至 8 月 29 日就举行了约四百次大规模的人民示威活动。1965 年夏季的“七十天”运动成为民主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一次认真较量。

但是，由于民主阵营的不团结，“七十天”运动已注定最终必遭失败。国内政治生活依然不稳定。从 1965 年 7 月到 1966 年底更换了三个内阁。由于中间派联盟与统一民主左翼党协商的结果，组成了以希腊银行经理帕拉斯基沃普洛斯为首的过渡政府。反动势力加紧策划政变，以便建立独裁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1966 年初，统一民主左翼党提出五项关于“所有政党坚决谴责和反击建立独裁政权的威胁”的建议。但是，只有共产党赞同这一建议。

至 1966 年底，已看得出反动势力在其政策中规定了两个方

针；或是依靠假选举，使1965年的七月政变合法化，或是建立公开的法西斯军事专政。委托由统一民主左翼党领袖帕·卡尼洛普洛 301
斯于1967年4月组成的政府在1967年5月28日进行选举。但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对这届政府的行为并不感到满意。他们为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而深感不安。1966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和职员人数达一百六十万，而1967年头几个月就超过了七十万。同时还有数十万农民参加了运动。希腊寡头政治和美帝国主义很清楚：如果民主力量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就再也不能“制止”这些运动了。于是，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希腊应付战争或革命而制订的“普洛米修士”秘密计划，于1967年4月21日进行了法西斯军事政变，结果建立了“黑色上校”专政，乔·帕帕多普洛斯以后成为“黑色上校”的领导人。

法西斯军事专政在希腊的建立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制定的近东和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帝国主义计划直接有关，也与以色列准备对阿拉伯各国进步政权进行侵略和密谋反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有密切关系。同以前一样，希腊被指定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反对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法西斯军事专政必然会保证希腊寡头政治和外国垄断组织在希腊获得迫切需要的“政治稳定性”。

国内民主运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成千上万的民主主义者，首先是共产党员和统一民主左翼党员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在希腊仅存的最后一点民主自由被消灭了。

专政为外国资本的深入希腊敞开了大门，给外国资本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有利条件。至1972年，外国对希腊经济的投资比1963年增加了十倍，共计十二亿八千五百万美元。

在“黑色上校”委员会统治期间，劳动人民在全国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1968—1970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而在这之前的三年(1965—1967年)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在这六年内(1965—1970年)资本家的利润高达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

十八点五。

希腊工人的工资本来就低，再加上对工人的剥削加剧，而工人却不能维护他们的重要权利和切身利益，以致每年都有数万名工人迁居国外寻找较好的生活条件。例如，1968—1970年就有二十五万以上的人离开希腊到国外去。

法西斯军人委员会的对外政策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军政界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军人委员会不仅支持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龌龊战争”，而且答应向越南派出希腊远征军。军人委员会还向美国额外提供了设在希腊本土上的军事基地；克里特岛上的所谓训练中心变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大的导弹基地。希腊的港口则成为美国第六舰队的基地。1970年底，在渥太华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武器小组会议上，希腊军人委员会代表第一个表示赞同以核武器装备各成员国并建议在希腊北部边境设立核地雷区。

军人委员会打破了军备竞赛的记录。例如，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资料，1969年，希腊的军备开支比1965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

意识到公开的法西斯军事专政不受欢迎，这个政权的领袖和思想家们从军人委员会上台执政的最初日子起就企图使希腊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们将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民主”。1968年9月，关于是否采用新宪法的“全民投票”在残酷镇压和大肆逮捕的情况下举行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选民抵制了这次全民投票。
305 根据“全民投票”的结果，如同1952年宪法规定的那样，希腊被宣布为君主立宪国家。然而，国王的权力被黜降到只是形式上承认他为国家元首的地步。全部政权掌握在军人委员会的手中。首相和内阁大臣的任命、法律的批准、议会的召集和解散都属军人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之内。议会的职能及议员的人数被严格限制。政治权利也被严重削弱。

但是，军人委员会没有相当牢固的社会政治基础，它甚至连这

个内容被删除殆尽的宪法都害怕实行。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如关于议会选举、地方自治选举、政党、民事法庭、出版自由等都被“暂时”中止生效。并且在专制政权建立以前和以后通过的几十条与这个宪法相悖的法令和规定依然有效。

独裁者乔·帕帕多普洛斯一再强调：在不具备“适当的条件”之前，即人民不再采取“不能容许的暴力原则”和恢复“和解”、“博爱”、“统一”、“合作”之前，也就是说人民停止抵抗和完全服从专制政权之前，决不恢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希腊人民和民主运动突然面临法西斯军事政变，以致措手不及，受到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很快就振作起来，希腊共产党政治局还在政变之日，即 1967 年 4 月 21 日，就发表告人民书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反抗专制政权。5 月初，由希腊共产党和统一民主左翼党的积极分子发起并按照共产党的方针，成立了反独裁爱国阵线，各种政治派别代表都参加了这一阵线。

希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1967 年 6 月)是反抗专制政权的重要组织阶段。会议决议强调：祖国正经历巨大的考验，对这一情况，所有政党、政治领导人、政治活动家、一切民主力量的最高民族职责是在共同纲领(为推翻专制政权，恢复宪法自由和民主自由、恢复各个政党和组织的行动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由各个政党代表组成的联盟政府进行选举而斗争)的基础上把政治分歧放在一旁而团结起来。全会着重指出“人民和国内所有反独裁力量的统一行动将决定这一斗争的结局”。全会还指出，国际舆论动员起来，国外希腊人也展开斗争，这对援助希腊的反独裁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人民对军人委员会的反抗组织得越来越好。1967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出租汽车司机、《卫城报》的印刷工人、“提尔米斯”企业的工人等进行的罢工是群众最初几次出色的行动。由于这些行动的结果劳动人民的工资有所增加。农民也表现出他们对独裁政权的反对立场。他们开始进行斗争是由于政府为了垄断组织的利益

将耕地收归国有，于是农民通过决议表示抗议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知识分子代表和城市中等阶级也参加了各种反对军人委员会的行动。1968年爆发了具有明显政治性质的反法西斯军事专制的行动。反对举行“全民投票”的九月大搏斗就是第一次这种性质的行动。随后是10月初在安葬前任首相乔·帕潘德里欧时，人民群众在“我们要自由”、“打倒暴政”等口号下进行的示威游行。约有三十万人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对专制政权的反抗更加猛烈了。

第八章

太平洋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 306

六十年代，日本、澳大利亚联邦和新西兰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结果都各不相同。日本的工业潜力增长迅速。到六十年代末，日本的国民产值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占第二位。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经济正处于危机之中，其国民总产值的水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由第五位降为第七位。新西兰的农业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工业部门发展迅速。但无论是日本还是新西兰都出现过周期性的经济衰退。

整个这一地区的特点是罢工运动和反战运动高涨。

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外交方针是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紧密结合的，其表现是，它们都参与了美国统治印度支那半岛的图谋。日本虽未出兵越南，但承担了美国用以保持南朝鲜“稳定”的部分开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直接参与了美国对越南的干涉。

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开始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一直未放弃“冷战”立场。

1. 日　本

1961—1970 年的经济发展　在这十年内，日本在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平均百分之十一)上一直走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就国民总产值而言1968年已经超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方面日本也逐渐领先。在 1960 至 1970 年期间，日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九点五，在同一时期美国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点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增长百分之七十三点六。在这十年内，日本的生铁年产量从一千一百九十万吨增长到六千八百万吨，钢的年产量从二千二百一十万吨增长到九千三百三十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的年产量从八万台增长到二十五万六千六百台。

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某些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塑料和合成材料生产等等发展得特别快。而采矿工业、棉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某些工业部门却反而处于下降和停滞状态。如：采煤量由1960年的五千二百六十万吨减少到1970年的三千八百三十万吨，正开采的矿井数从六百二十二个减少到七十四个，固定采矿工人数从二十四万三千四百人减少到五万二千四百人。

307 在劳动生产率（高额资本积累率的基础）的增长方面，日本超过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963—1970年，日本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美国为百分之一点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百分之五点五）。日本整个工业产量增长额的约百分之八十五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

在这十年内，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百分之四点四提高到百分之九。

这一时期，对工业大量投资（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是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度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在最新科技成就基础上提高物质生产的效率，是资本积累的最重要来源，而资本积累又为建立加速发展主导工业部门所必需的基金提供了可能。

然而到六十年代中期，全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和矛盾，在冶金工业、机床制造业、电机制造业等工业部门出现了“过剩”的生产设备。1965年发生的严重的衰退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这一年加工工业的生产增长速度与前一年相比从百分之十五点八降到百分之三点八。投资大大缩减，而滞销商品量则大大增加。破产数量激增，而且这一过程还波及到某些大公司。

政府认为克服衰退的唯一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垄断调节，如扩大战略生产部门，增加对垄断组织的财政补贴，发行国家公债，以及加强发展中的工业部门的企业和缩减不适应市场要求的传统部门的生产。对克服衰退起了重要作用的是越南战争升级所导致的对美国的军事供应。

六十年代初，统治集团宣称要“调整”经济结构，其目的首先是为能成功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进行竞争而创造条件。这种调整具体地说就是进一步提高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比重，提高投资的总效益和质量，通过合并企业以及组织关键工业部门的协作和协调其活动的途径来扩大生产规模。

日本垄断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既能使它们保持经济高速度增 308
长，又不致引起劳动力问题严重激化的措施。其主要措施是加强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在尽量少增雇工人的情况下扩大生产。日本垄断组织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还企图将劳动密集的生产转移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主要是南朝鲜、台湾和香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价格比日本低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

农业生产落后是加速发展造成的比例失调现象之一。为了刺激农业生产，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结果，大米的收购价比世界市场价格水平高一倍。

政府宣布实行一项新的农业政策，它反映在1961年6月通过的农业基本法中。该法令规定了一系列措施，其实质是取消无赢利的小农户，代之以机械化的大型农场，并使之成为农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这样就能保证更充分地利用农业的劳动潜力来加速工业的发展。

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在继续进行，其主要途径是合并某些公司和一些公司吞并另一些公司。1970年出现的康采恩“新日本制铁公司”就是由两个最大的冶金公司合并而成，这个康采恩成了仅次于美国钢铁公司的世界第二大冶金垄断组织。在汽车工业中，

由于一系列合并和吞并的结果，半数以上的轿车生产集中在两家公司手中。

随着生产积聚和资本集中程度的提高，日本已达到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从而导致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科技革命使社会分工、社会的阶级结构，而最终使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在这十年期间，资产阶级人数增加了，它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二点七增长到百分之三点八，增加的主要是职员。工人阶级的人数从二千二百二十万增加到三千一百七十万，即从自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点一，而中等阶层所占比重则从百分之四十五点七降到百分之三十四点八，首先是因为小农户的数量减少了。

工人阶级成了社会上人数最多最活跃的阶级，其普通教育水平和职业技术水平都有了提高。在1970年开始参加工作的青年中，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比重与1960年相比从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增长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重从百分之九点三增长到百分之二十点三。

工人阶级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又使工人运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首先是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作人员（企业的检查管理人员、办公室和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等）的人数和比重不断增加。这一类工作人员的比重从百分之四十三点五增长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九，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比重却从百分之五十六点五降到百分之五十点六，而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比重从百分之四十一点五降到百分之三十七。这些变化与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与监督劳动力系统的发展有关，也与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部门优先发展有关，因为这些部门的特点
309 是高度熟练工人的比重大。

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达到高水平。农业中还保

留有落后的小商品生产，而农业工人的人数到1971年也没有突破二十五万。在1971年尚存的五百二十万农户中仅有百分之十五点二的农户完全从事农业生产，其余百分之八十四点八的农户还兼营非农业性行业，而且在百分之五十五的农户的家庭收支计划中附带收入仍是收入的主要部分。

争夺销售市场和投资领域的日本帝国主义 在经济恢复时期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日本政府推行了强硬的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即实行外汇管制、拦阻关税以及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政策，目的是取得高额积累和国际收支顺差。日本的保护关税政策起初并未遭到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反对。但到五十年代末，美国在国内遇到了货币财政困难，在国外则遇到了日本竞争的严重威胁，于是开始对日本施加巨大压力，企图迫使日本放弃多方面的保护关税制度和实行"贸易自由化"，即取消以规定进口限额及与其有关的货币兑换限制的形式从数量上对外贸进行管制。代表帝国主义大国利益的国际经济组织也对日本施加了压力。

日本统治集团开始明白，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作出一定的让步就不能指望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扩大和巩固自己的阵地。同时，日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更新了固定资本，并提高了自己的许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因而，它已能够实行"自由化"而不使自己受损。1964年2月，日本接受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一条的条件，1964年4月，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的条件。同年日本参加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承担了取消和放宽对外国资本输入限制的义务。日本政府走上"自由化"道路后，为了不使本国垄断组织的利益在实行自由化过程中遭受损失采取了各种措施。

六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主要是靠扩大国内市场。但是，到六十年代中期国内市场已无力吸收日益增多的产品，这也决定了日本要加强对外经济扩张。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出口的增长速度比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一倍。自1961年至1970年，日

本出口总额从四十二亿美元增加到一百九十三亿美元，而进口总额则从五十八亿美元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亿美元。这一时期日本出口额之所以能增长，是因为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所下降，这与越南战争所引起的美元危机和通货膨胀有关。自1965年起，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开始超过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接连几年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有了顺差。那几年对美出口额的增长与军事生产大有关系。

日本外汇储备状况大大改善就是出口增长的结果。自1966年到1971年1月，日本的黄金外汇储备从二十一亿美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二亿美元。

310 为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占领新阵地，日本垄断组织加紧资本输出。1970年初，日本在九十六个国家都有私人投资，其总数为二十六亿八千二百万美元。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起，美国直接地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加强对日本的压力，要求日本不仅贸易"自由化"，而且外国资本输入也"自由化"，并要求日本实行"开放经济"，即赋予外国公司在日本自由成立新公司、购买现有公司的股票、提供借款等权利。

按对等原则建立合营企业，被当作外国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原则。这使日本公司有可能利用与外资进行实业合作而造成的优越性，如：运用新技术和新工艺、追加拨款、共同销售、依靠日本工人工资较低和外国技术效率高的条件获得超额利润。同时合营公司能使日本垄断组织保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

采取"自由化"措施的结果，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加强了对日本的渗透，渗透的形式是购买股票，成立子公司和合营公司，以及实行联合，如美国的洛克菲勒、摩根、杜邦、梅隆等公司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通商等公司的联合。美国资本特别加强了在日本的石油加工业、石油化工业和电机工业部门中的阵地。

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原料和燃料的消费量也不断增加。政府和垄断组织为保障从"原产地"进口原料和

燃料作了很大努力。为此日本资本涌向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和某些非洲国家的铁矿开采企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铜矿开采企业；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采煤企业；波斯湾国家和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开采企业。

自由民主党政府的对内政策 岸信介内阁于1960年7月辞职之后，由池田勇人继任首相。考虑到国内出现紧张的政治局势以及反对党拒绝承认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并决心为废除该条约继续开展群众运动等情况，政府宣布实行"温和调子"政策，其基本原则是通过与反对党谈判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政府作出的允诺如下：今后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同时又不采取通货膨胀的做法，保证充分就业，把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国家的水平，消灭城乡收入的差别，换言之，为建设"共同幸福的国家"创造一切条件。

池田声称，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将和"自由世界"国家携手并进，力求做到日美关系稳定，以此证明他将执行同前自民党内阁首相岸信介一样的亲美外交方针。

池田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现在1960年12月通过的所谓"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计划"（十年内）之中。计划的许多条款正如其名
称一样，是为了在群众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就 312
意味着劳动人民的个人收入也能相应地增加一倍。但早在1961年上半年食品价格、火车票价、中学学费就开始上涨了。居民高收入与低收入间的差距扩大了。

军国主义倾向的加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向右转现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强经济阵地的必然结果。1964年11月接替池田内阁的佐藤政府大大加快了增强军事力量的速度。到1967年"自卫队"人数已达二十四万七千人。各兵种部队的军官全部补齐，这样就使日本在必要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将武装力量人数增加三至四倍。

1966年11月，政府通过了第三个加强"自卫队"五年计划

（1967—1971 年），计划规定继续增加军事拨款，从前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万一千亿日元增加到二万一千亿日元。计划还规定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的任务，即生产自己的战斗机、火箭、导弹，以及至今仍大部购自美国的各种电子设备。新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用最新的国产武器装备“自卫队”。

有些政治活动家试图提出日本装备原子武器的可能性问题。1968 年 2 月，农林相仓石忠雄公开主张修改宪法，建立一支完全合乎要求的军队，以及“为保障后代安全”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出自一位政府官员的这一声明在国内激起了愤慨。在农林相提出辞职之前，在野党代表拒绝参加国会会议以示抗议。佐藤首相被迫表示不同意仓石忠雄的讲话并再次确认政府在核政策方面的三项基本原则——不输入、不贮存、不生产核武器。

1965 年，民主力量揭露了由防卫厅内部制订的、代号为“三箭战役”的秘密计划，该计划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正在加强。计划规定，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日本军队就占领南朝鲜，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在日本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以镇压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

为了在国内燃起沙文主义情绪和恢复对天皇的崇拜，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于 1966 年 6 月通过了关于恢复“帝国奠基日”——2 月 11 日为国家节日的法令。

对外政策 长期保持日美“安全条约”的方针以及依靠美国的核武库、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盟的方针是六十年代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对美国而言，日本仍是反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柱。而对日本而言，保留美国的“核保护伞”则于己有利，因为它可以减少军费开支并把腾出的资金用作日本垄断组织进行经济扩张的拨款，以及用于支持亚洲的保守政权。

313 1961 年 6 月，日本首相池田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会谈时美国坚决要求日本积极参与实行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政策，以及“拯救美元”的措施。这些要求并未遭到池田的特别反

对，因为他的着眼点是日本将有可能以经济“援助”、“合作”等等为幌子渗入到亚洲各国的经济中去。



日本科学家抗议美国核潜艇进入日本港口的游行示威。东京。1961年

为了具体执行1960年的“安全条约”，双方达成了关于建立三个日美协商委员会的协议，即：经济贸易问题协商委员会、科学合作协商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协商委员会。经济贸易协商委员会的活动实际上超出了纯经济合作的范围。在其会议上，双方会谈的内容竟是一些国际问题，如：越南战争、两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朝鲜的态度，以及其他一些政治问题。

日本和南朝鲜关系正常化是日本外交活动的重要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早在李承晚执政时就已开始，但是东京和汉城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存在的深刻分歧使谈判受阻，未获成果。主要分歧是日本因在统治该国时期(1910—1945年)使朝鲜受到损失而应付赔款的数额问题。自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和池田政府上台以来，日韩谈判开始有了新的动向。由于南朝鲜具有“反共斗争前线”的作用而产生的政治上的考虑被提到了首要地位。在肯尼迪和池田于1961年6月会晤时，美国总统以日本的经济实力已大大增长为理由，要求日本与南朝鲜迅速签订条约，并与汉城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合作。

同时，东京和汉城统治集团的谈判遭到日本民主力量的坚决反对。1961—1962年期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群众集会、游行和罢工，反对日本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与南朝鲜军事独裁政权的勾结预谋。

自1964年起，美国实质上已停止对日本的军事援助。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日本不仅必须增加自己的军事拨款，而且还应为“保卫自由世界”作出贡献。例如，他们认为，日本和南朝鲜建立了联盟，他们就可以将援助汉城傀儡政权的部分负担推给日本。

314 日本垄断资本对参加“援助”亚洲亲美傀儡政权的建议基本上是赞同的。日本垄断组织指望利用南朝鲜经济陷于崩溃的机会深深地打入其经济之中。朴正熙军事独裁政权为此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气候，保证了存款的安全。国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日本劳动群众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不断扩大都促使日本企业家去利用亚洲国家（包括南朝鲜）的廉价劳动力来达到提高自己商品竞争能力的目的。

1965年6月，在东京签订了日韩基本关系条约，条约包括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条款。同时签订了日本南朝鲜渔业协定、文化合作协定，以及关于居住在日本的南朝鲜公民（约六十万人）的法律地位的协定。还签定了关于解决财产和其他要求及经济合作的协定。按此协定，日本应在十年内向南朝鲜提供三亿美元的“无偿贷款”。此外，日本还应按优惠条件给南朝鲜开立三亿美元的商业信用。

这种解决办法是日本在外交政策方面所走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其目的是保证日本资本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扩张。日本垄断组织与美国密切合作广泛地渗入了南朝鲜经济。

日韩条约的签订引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广大舆论界的强烈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指出，这一条约的用心是阻碍朝鲜依靠自己力量实现和平统一，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再次渗入南朝鲜奠定基础。

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日本的亚洲政策中占有特殊地位。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关系的问题引起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关注。日本的民主人士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而垄断集团，特别是所谓“大阪集团”则别有所图地去争

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拥有丰富的原料和人力资源的中国首先是作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领域吸引着他们。日本统治集团还打算今后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起连接环节和中间人的作用。

然而，日本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长期来一直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政府表示愿意批准日本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组织进行私人交易，但不是在政治和外交上承认中国。这一方针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既想从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中得利，但又不愿使自己与美国和台湾政权的紧密的同盟关系遭受损失。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中国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代表团经过谈判于1962年11月9日签订的“关于发展日中私人贸易”备忘录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规定了为期五年的日中易货贸易的条件，并确定每年的贸易额为一亿美元。1964年8月，在东京开设了中国商务代办处，而1965年1月在北京开设了执行协议联络办事处。

除按备忘录规定的条件进行贸易外，通过所谓“友好公司”的 315
渠道进行的交易有了广泛发展。这种“友好公司”是由日中贸易发展组织、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协会及日本的其他社会组织推荐的。1966年，按备忘录进行的日中贸易额为二亿美元，而通过“友好公司”进行的贸易额为三亿美元。

1965年的经济衰退和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尖锐化促使日本扩大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1964年1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日本首相互致信函，表达了双方发展睦邻关系和经济、贸易、文化合作的愿望。1965年3月，日本成立了一个由一百七十五名议员组成的日苏友好议员团。1965年夏，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副总裁植村甲午郎为首的一大批日本企业家访问苏联，说明日本实业界人士渴望扩大与苏联的经济联系。

1965年7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设立苏日和日苏实业合作

委员会的协议书。这些委员会在莫斯科和东京轮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扩大互利的经济联系的具体措施。1966年1月，首次签订了关于商品流转和支付的长期协定（1966—1970年），以及关于自1967年4月起按共同经营新航线的条件开辟莫斯科和东京之间直达航线的协定。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966年7月对日本的访问是日苏睦邻关系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虽然日本和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在互利、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各方面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双方都认为必须签订两国间的和约，并明确表示各自对促成裁军、防止核扩散的意愿。

两国签订了领事公约。根据公约苏联在札幌设总领事馆，而日本在纳霍德卡设总领事馆。

这些接触证明日苏关系正在顺利发展，但是日本统治集团某些领导人的不现实态度，以及美国侵越战争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都妨碍了取得更大的进展。日本实际上是越南战争美方的参与者。它向驻日美军提供各种服务，供给军用物资。日本垄断组织每年对美国的军火供应几乎达十亿美元。

六十年代末，美国因对越南的武装干涉失败以及随之出现了美国货币财政制度的尖锐危机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亚洲政策。这一转变在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的所谓“关岛主义”中有所表达。关岛主义表明美帝国主义想把为美国利益而采取军事行动的全副重担推给其亚洲盟国。

1969年11月公布了日本首相佐藤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
316 顿举行会谈结果的联合公报。会谈中双方详细研究了因1960年“安全条约”有效期满而采取对策的问题。公布的文件不仅批准了条约自动延长，并且还扩大了条约的范围。现在，“安全条约”已包括整个远东和东南亚地区，它增加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义务，其中包括“保卫”南朝鲜和台湾的义务。条约还宣称日美要对亚洲和远

东的命运共同负责。在华盛顿会晤时，美国表示准备于1972年将琉球群岛（冲绳岛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和大东群岛的行政权移交给日本，条件是在那里要保留"为保障两国相互安全"所必要的美国军事设施和基地。

双方商定，在实现将这些岛屿的行政权移交给日本时，必须做到不使这项移交"有害于美国有效地履行其所承担的保卫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各国的国际义务"。

华盛顿会谈公报的内容引起了日本和世界民主舆论的公正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抗议这种勾结，认为这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

采取"安全条约"自动延长做法的佐藤政府想方设法避免就此问题与国内民主力量发生直接冲突。佐藤从美国一回来就解散了下议院，这样，反对党就无法在议会辩论过程中揭露自民党人的阴谋并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与之相对抗。

工人运动 在这十年内，日本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发生了一定变化。据官方资料，在有三十名以上工人的企业里，劳动生产率增长了一点八倍，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提高零点八倍。达到这种增长水平的主要是大企业，因为那里的工人组织程度比中、小企业要高得多。虽然一小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由于日用消费品涨价，公用事业收费提高以及税收增加，经过顽强斗争才得到的工资提高并没有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多大改善。

在劳动报酬和雇佣方式随着工人年龄、性别、工龄以及企业规模等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别的情况下，大企业的固定工人可以得到稳定的、比较高的工资；而在半数以上是雇佣劳动者的中、小企业里，工人得到的是不稳定的（取决于经济行情）低工资。

实行传送带流水作业和生产自动化使劳动过程失去了吸引力，变得单调无味。工人们不满意自己的劳动内容已成为日本的

严重社会问题之一。

到六十年代末，经济高速度增长带来的阻碍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尖锐矛盾暴露出来了：工业设备和人口集中在太平洋沿岸狭窄地带历史形成的中心城市，住房出现危机，用于社会需要的拨款受到限制，环境受到污染以及燃料能源出现危机。作为社会主要
317 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与其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显得特别突出。其结果是，工人对自身的现状日益不满。工会运动规模的扩大和罢工斗争的不断增长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工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所谓工会的“春季”和“秋季”攻势，分别选定在4月（日本财政年度开始）重新签订集体合同之前和12月支付奖金之前举行。这种活动自1955年开始以后就成了传统性活动。

工会在商定统一行动的基础上于每年春天和秋天举行群众性活动，为提高工资和劳动者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在二至三个月的时间内按统一计划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游行、集会。由左派工会联合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和独立工会联络委员会建立的工会春季斗争联合委员会对活动进行总的领导。

春季攻势参加者的人数逐年增加：1960年为四百万人，占工会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八；1970年增加到八百万人，占工会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所提要求的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工会越来越多地提出关于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制订计划、保障劳动者民主权利、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等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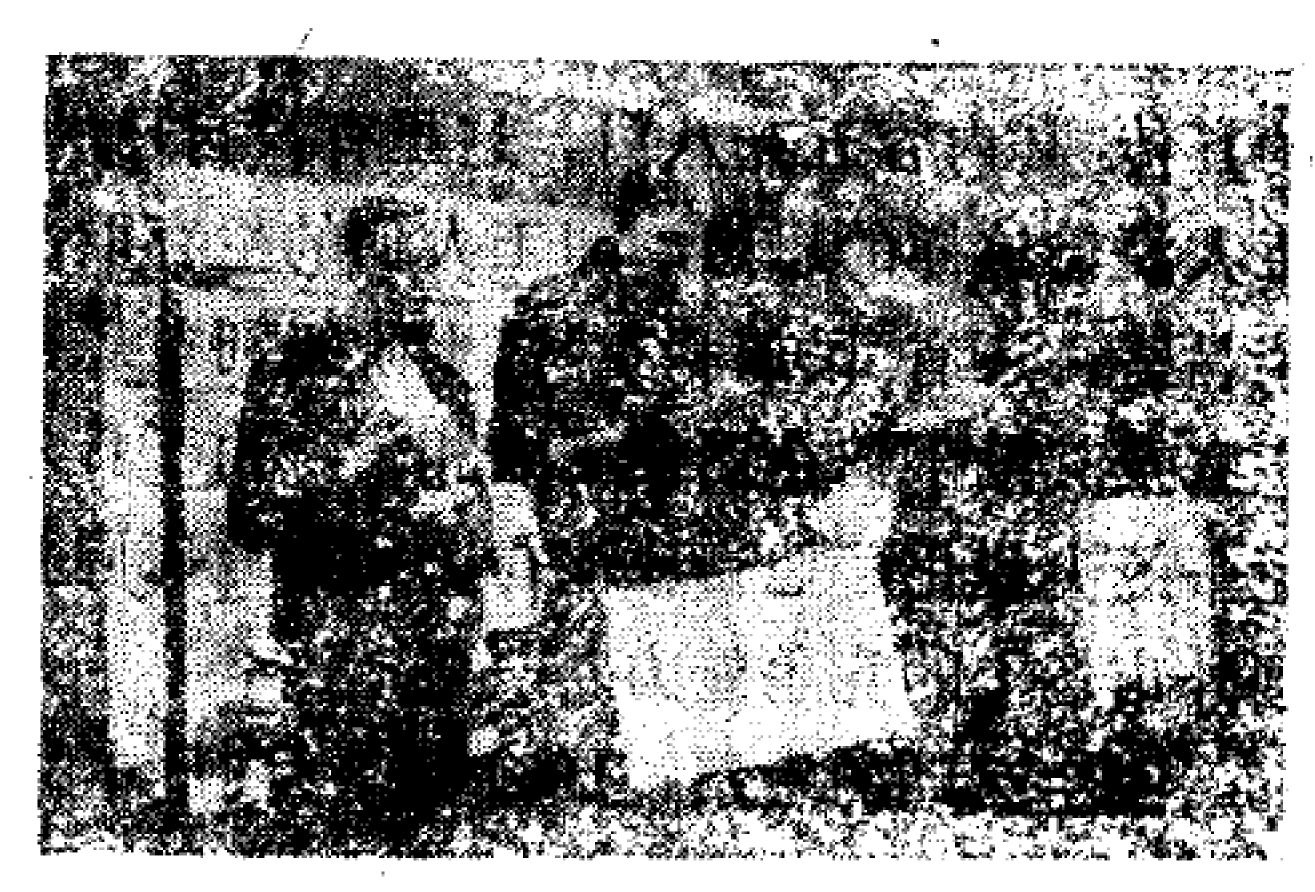
日本工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冒险和日本的参与，主张取消日美“安全条约”。它们为了向越南捐送药品、医疗设备、衣物等等还组织了几次募捐运动。这些运动得到劳动人民的广泛支持，也使工会有可能对正在战斗的越南人民给予巨大的物质支援。

1965年，鉴于美国的侵略蔓延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声明，如果美国人轰炸河内和海防，它就将发动政治总罢工，并号召一切国际工人组织仿效它的做法。日本工会履行了自

己的诺言。日本工人阶级于1966年10月21日在全国发动了声援越南人民的群众集会、游行和罢工，作为对美国飞机野蛮轰炸河内的答复。于是，10月21日就成了日本工会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声援战斗中的越南的统一行动日。一年之后的这一天东京铁路员工阻止运送供美国喷气式飞机使用的燃料，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送给美军的军用物资。

1968年，在对战斗中越南的声援日那一天，工会秋季攻势达到了最高潮，日本的六百个城市都进行了短时间的罢工、集会和游行，以抗议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抗议日本统治集团帮助侵略者。

与此同时出现了使工会罢工斗争复杂化的某些新因素。工人阶级队伍中补充了一些其他社会阶层出身的人，他们带有不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和错误认识，这就对提高阶级意识、加强无产阶级的统一和团结制造了一系列困难。新的工人阶层尚未经历过阶级斗争的考验，很难服从组织，而且比较相信资产阶级的宣传。同时，随着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组织性和积极性的提高，政府和垄断组织对自己的"工人政策"也作了某些修正，更多地注重了适应于社会的权术。早在1963年末，以前劳动大臣石田博英为首的一批自民党人就曾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保守派工人"阶层——工人运动右翼流派的基础——并与这一阶层建立更密切的合作。



318

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从越南战场来到横须贺港口的美国水兵和士兵中散发反战传单。

东京，1964年

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方面的变动，新的劳动报酬和雇佣制度的实行——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主要是在工业关键部门的大型私人企业内，建立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据官方资料，自1959年到1971年，在企业监督和管理系统基层环节工作的高薪工人的人数，从一百万人增至三百二十万人，即由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四增加到百分之十点二。这一工人阶层是工会运动右翼流派的社会支柱，六十年代，这一流派主要在大型企业内得到了加强。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为代表的工会左翼比重下降表明了这一过程。1962年，有组织的工人为百分之四十五点九，1971年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而以全日本劳动总同盟为代表的右翼的比重却有所增长，从百分之十三点四增长到百分之十八点四。未加入任何全国性工会中心的独立工会的人数也有所增长，从百分之三十一增长到百分之三十四点九。

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使日本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这就为通过工人阶级中享有特权的上层分子对工人队伍传播资产阶级影响——形形色色的妥协主义理论，劳资合作思想创造了前提。在工人中间进行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宣传，其内容五花八门。这里有："自己的公司"思想，目的是向工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工人们的生存取决于他们所在公司的繁荣昌盛；还有"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思想等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及其助手们企图使工人相信，由于日本向"开放经济"过渡和竞争的尖锐化，他们应该与公司和政府同样关心日本垄断组织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民主运动的发展 1961年7月，日本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新纲领。新纲领指出，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事实上已沦为美帝国主义半占领的附庸国"。共产党根据这一判断对现有政权的性质作了如下评价："现在，日本基本上是受美帝国主义和处于受命于美帝的盟友地位的日本垄断资
319 本的操纵"。日本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项任务：建立民

族民主统一阵线，并以该阵线为基础成立能够建设一个“和平、中立、独立、民主的日本”的国民政府。

日本社会党是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它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国会中反对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主要反对党之一。日本社会党积极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主张撤除日本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等等。但是，日本社会党的阶级成分不纯，派别活动严重，这就使该党的战斗力大大下降。

民主社会党是在1960年1月由一批右翼社会党人退出日本社会党后建成的。民主社会党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作为自己纲领的模式，它维护的是“非无产阶级化”和将社会各阶层都变为“中产阶级”的理论。民主社会党的政策充满了反共色彩。

民主社会党的群众支柱是全日本劳动总同盟，这是退出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某些工会于1964年成立的一个右翼工会联合组织。1964年，日本公明党宣告成立，它是群众性佛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政治机构。公明党的领导鼓吹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理论，诱使群众离开反对现存制度的积极斗争。同时公明党在一系列现实问题上又持有进步的观点，与其他反对党共同主张建立持久和平、维护现行宪法和削减“自卫队”，主张美国军队分批撤离日本，等等。但在另一些场合，它又常常和自由民主党联合起来。

在短时期内公明党就获得了可观数量的拥护者。1965年该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一下子就获得了五百万张选票，自己的二十名候选人均当选进入参议院。在1967年众议院选举时，公明党提出的二十五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新政党的出现对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极重要的影响。公明党把过去支持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的一部分选民拉拢了过来。此外，新政党的行动纲领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到反对派力量有可能成立广泛的统一阵线。

日本卷入华盛顿冒险政策的危险性、国内民族主义和军国主

义势力的加强，促使民主力量为改变政府的政策，为废除日美“安全条约”，为使日本成为中立的不结盟国家而积极斗争。争取加强进步力量在地方自治机构内的阵地的运动成了这场斗争的重要场
320 所。在这方面取得的第一次巨大胜利是，1966 年共产党 和社会党领导的进步力量统一阵线的代表蜷川寅 次郎当选为京 都县知事。1967 年 4 月在东京地方议会选举中，进步力量统一阵线 的候选人美浓部亮吉教授战胜了自民党和民社党的共同候选人以及公明党在这次选举中提出的候选人。这样，民主力量的代表自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首都的市长。

至六十年代末，全国十六个县均成立了进步力量统一阵线的组织，这就保证了民主候选人在象大阪、川崎、立川、镰仓、横滨、埼玉等城市选举市长时以及冲绳等县选举知事时能够取得胜利。由进步力量统一阵线候选人领导的城市、乡镇政府的数量达到二百个，其人口在三千万人以上，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 1968 至 1970 年期间，日本的学潮汹涌激烈，其原因是学费不断提高，大学校方和当局企图加强对学生社会生活的监督，首先是对大学自治的监督。学潮席卷六十七所以上的大学，其中包括东京大学。随学生骚动而发生的是构筑街垒、与警察进行流血搏斗，以及学生本身敌对派别之间进行搏斗，结果是许多人牺牲，大批学生被捕。

大学生组织在自己的声明和决议中表示反对政府和学校当局的教育政策，反对军事训练，主张学生有权参加管理学校，主张取消政府对大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限制，取消因参加罢课和游行而遭到的歧视。他们反对教育服从垄断资本的利益，反对为美国军事当局进行研究工作，主张废除日美“安全条约”。

东京大学的学生斗争特别激烈，这完全出乎当局的意料之外，因为东京大学自建立以来一直是政府官僚 干部的 主要培养场所。政府调动了八千五百人的特种警察部队使用催泪弹镇压学生。学生则用燃烧瓶、石块等进行了三天的抵抗，阻止警察的攻击。

佐藤政府于1969年8月通过国会实行学校管理暂行措施法，限制了学校的自治权，并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的监督。但是学生没有向政府妥协。1970年共发生了一百七十六起波及全国六十二所大学的学生运动。

鉴于日美“安全条约”有效期将于1970年6月截止，日本民主力量从1966年起就着手筹划废除这一条约的群众运动。

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实质上是为了解决日本的前途问题：日本究竟是沿着加强与美国军事同盟和对外扩张的道路走下去，还是让民主力量得以使日本在和平、中立和进步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同时，这一斗争乃是国际反帝运动的重要环节，它与争取和平，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争取琉球群岛归还日本等斗争汇合了起来。据1969年《朝日新闻》报对社会舆论调查的资料，百分之七十的被调查者表示反对“安全条约”，然而在1960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1968年2月，美国当局慑于日本民主舆论的压力，制定了以 321
前一直是由其任命的琉球群岛行政长官的选举原则。1968年末，举行了琉球群岛行政长官、冲绳县立法会议和那霸市政会议的选举。冲绳岛的选举是在当地居民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进行的。

左派力量的统一行动保证了自己的候选人当选为琉球群岛的行政长官。1969年3月7日，琉球群岛立法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将整个群岛归还日本，取消美国当局使用日本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的权利。

争取收回琉球群岛的运动和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汇合了起来。

1969年，受日本共产党影响的归还冲绳岛中央执行委员会、靠拢日本社会党的归还冲绳岛民族运动联络委员会和在冲绳岛开展活动的与祖国恢复统一运动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在此协议基础上第一次组织起了冲绳岛和日本本土一切民主力量统一行动的广

泛运动。根据这些组织的倡议，4月28日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那霸和其他一些城市举行了群众集会和游行，其口号是立即将冲绳岛归还日本和废除“安全条约”。1969年6月，庞大的、拥有五万五千人的冲绳岛军事基地工作人员联合会宣布罢工。罢工使该岛所有军事基地瘫痪达四十八小时之久，结果遭到了美国军事警察和海军陆战队的镇压。

1969年10月14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安全条约”自动延期和佐藤首相去华盛顿的决定，这一决定又一次激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浪潮。10月21日，即对战斗中的越南声援日这一天，根据工会总评议会、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和其他组织的倡议，通过了取消佐藤华盛顿之行、废除“安全条约”、解散国会、停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的斗争总纲领。全国十多个县举行了联合大会和游行。

许多部门工会举行了短期罢工，为美军进行运输的所有铁路也都参加了罢工。1969年11月13日，日本本土工会和冲绳岛工会举行了一连串的联合罢工，反对佐藤的华盛顿之行，要求归还冲绳岛、废除“安全条约”。参加罢工的有八十多个部门的工会联合会。在这一天冲绳岛举行了该岛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

1969年12月27日进行的日本国会众议院（下议院）选举是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与反对党力量之间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

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许下了这样一些诺言：建立“光明的、健康的”社会，稳定物价，使农业和中、小企业现代化，改造城市，发展地方自治，降低赋税，等等。

见风使舵和慷慨允诺的策略使自由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它得到了众议院四百八十六个席位中的三百个席位（众议院解散前为二百七十二个席位）。

日本共产党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它提出的竞选纲领是建立和平中立的日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安全条约”，在国内实行

降低昂贵的生活物价的政策，保护宪法，等等。共产党在众议院获得了十四个席位，比议会解散前它所拥有的席位多二倍。投票选 322
举日本共产党候选人的选民数从二百二十万增加到三百三十万，即从参加投票的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八增加到百分之七。

走"中间道路"的公明党也获得了很大胜利。它在众议院内的席位从二十五个增加到四十七个。公明党在选举中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得到了拥有七百多万户教徒的佛教教派"创价学会"的支持。

日本社会党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只得到九十张当选证书，而在议会解散前它拥有一百三十四张。日本社会党的失败与选举前不久所揭露出的一起重大的金融舞弊案件有关。据报刊报道，与此案件有牵连的除自由民主党的某些头头外还有个别社会党人。日本社会党在选举期间与某些托派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的联系也对该党的地位起了不良影响。

京都县知事的选举也是在自由民主党和反对党力量的激烈斗争中于 1970 年 4 月进行的。在这次选举中政府建立了有自由民主党、公明党和民社党三方参加的右派联盟，目的是推翻以蜷川寅次郎为首的京都民主市政当局。共产党和社会党依靠进步力量的支持使右派联盟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这次胜利再一次显示了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所领导的进步力量统一阵线的力量。

虽然日本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组织程度以及它们的战斗积极性都在不断提高，而且其战斗积极性在 1970 年春季进攻时达到了最高潮，但是它们仍未能建立起统一阵线和对斗争的统一领导。其原因之一是，两个主要反对党——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之间缺乏密切合作。同时，有一些部门工会的代表只承认经济斗争，拒绝参加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

2. 澳大利亚联邦

在六十年代的澳大利亚经济中，农业作为出口产品的主要提

供者仍旧起着主导作用。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加工工业发展迅速。化学工业和石油加工部门得到了发展，电力生产不断增长。工业商品在全国出口额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

虽然出现了生产积聚的过程，但依然存在大量的小企业。由于加强了机械化，农业中的就业率不断下降。同时在服务行业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就使得城市人口继续增长。

移民对于保证澳大利亚的劳动力仍和以往一样起着巨大作用。在挑选移民时偏重于选择高度熟练的工人。在十年内，全国人口仅靠移民这一项就增加了近一百万人（截至 1971 年 6 月全国人口总数为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八千人）。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势不稳，这一时期对澳大利亚经济来说并非特别有利。到六十年代末，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澳大利亚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五位下降到第七位。赋税增加，物价上涨，生活费用不断提高。在战后时期澳大利亚第一次出现了大量失业现象。失业人数在六万三千到十三万之间上下波动。

323 自六十年代初起，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外国资本对澳大利亚的兴趣提高了，其表现是外国投资，特别是美国投资大量增加，投资去向首先是化学工业、石油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和汽车制造业。英国资本在澳大利亚的采矿工业、农业、军火生产和金融业中仍占优势。但依靠国家支持的澳大利亚资本在国内经济中仍居主导地位。

六十年代，英国终于丧失了自己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自 1960/61 年度至 1970/71 年度澳大利亚对英国的出口额从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减至百分之十一点三，而英国商品的进口额则从百分之三十一点三减至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出口额则从百分之七点五增至百分之十一点九，从美国的进口额从百分之二十增至百分之二十五。澳大利亚与日本的联系扩大了。澳日贸易明显增长：出口额从百分之十六点七增至百分之二十七点二，进口额从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十三点八。

1965年，澳大利亚与苏联签订了贸易最惠国待遇协定。

在工人运动中居主导地位的是全国最大的政党——澳大利亚工党。大部分工人加入了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其人数达一百六十万人。1966年8月，成立了澳大利亚自由职业职工联合会理事会，会员为二十五万人。

1963年，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实行三十五小时工作周、保证就业、建立太平洋无核区以及扩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物价上涨超过了工资的增长，因此，在六十年代初就出现了罢工运动的高潮。罢工的次数逐年增长。1961年发生了八百一十五次罢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为三十余万人；而1970年记录在案的罢工次数已达到二千七百三十八次，参加人数为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人。失去的劳动日数分别为六十万零六千个劳动日和二百九十万个劳动日。

1961年11月，芒特-艾萨(昆士兰州)铜矿工人罢工。1964年，那里再次爆发罢工。运输业职工也不止一次地举行罢工。如，铁路员工于1962、1963、1964、1965和1966年都举行过罢工，而1969年还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罢工。码头工人于1963年和1965年组织过全国性罢工，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67年7月，参加机器制造工人和冶金工人罢工的有二十五万人。

自由党乡村党联盟政府企图以镇压来摧毁工人运动。1961年，为了镇压铜矿罢工，政府宣布紧急状态。1965年10月，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用以对付最有战斗力的工会之一——码头工人联合会。1969年5月，国家仲裁法院判决维多利亚州电车工人工会因参加罢工罚款八千美元。在该工会拒绝支付罚款后，其领导人之一便遭逮捕。工人们对此的回答是发动了六十万人的罢工，以表示对整个仲裁法制度的抗议。

1970年8月，由于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有可能使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的1970/71年度新预算，全国举行了有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参加的抗议罢工。

劳动人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由于工党分子继续拒绝和共产党人共同行动而仍然处于困难境地。工党因受到本党右翼的压
324 力，实际上于六十年代初已在支持执政的自由党乡村党联盟。但是在工党运动中也还存在现实主义的倾向。1965 年 8 月，澳大利亚工党代表会议就曾被迫从党的纲领中取消“白种人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口号。

六十年代初，工党处境困难，因更换党的领导而展开的党内斗争削弱了党的队伍。澳大利亚工党新领袖亚瑟·科尔韦尔同意与右翼工党分子和解。

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也经受着严重的困难。1963 年，澳大利亚共产党不得不对自己队伍内已形成的毛派集团开展斗争。六十年代中期，更换了党的领导。1967 年举行的澳大利亚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废除了“澳大利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在 1969 年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特殊的立场并拒绝在会议的总结文件上签字。1970 年 3 月，澳大利亚共产党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纲领——《澳大利亚共产党的目标、方法和组织》。新纲领把澳共背离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做法肯定了下来。一部分共产党人反对澳共新领导的路线并决定退出该党。1971 年 12 月，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创立了澳大利亚社会党。

六十年代初，澳大利亚出现了经济衰退，从而导致了大量失业(1961 年末为十二万人)和工业萧条。罗伯特·孟席斯政府一方面采取刺激生产的措施，另一方面不得不降低某些赋税和增加国家拨款。结果工业开始有所复苏，但是仍不稳定。军事开支的增加也对国家经济起了不良影响。

1963 年，对外经济形势有了少许好转。孟席斯政府利用这一时机，决定在有利的形势下提前进行国会选举。

选举结果，自由党和乡村党在众议院中得到绝大多数席位(获得一百二十四张当选证书中的七十二张)，在参议院中也得到多数

席位(获得六十个席位中的三十一个席位)。右翼民主工党在选举中失利,它甚至在自己的基地维多利亚州也遭到失败。

自由党乡村党联盟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就采取了使国家军国主义化的方针。1964年11月,孟席斯政府提出增加军事开支百分之五十,适龄公民普遍进行登记,扩充并重新装备陆、海、空三军。工党反对派反对在和平时期增加武装力量,但它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

自1962年起,澳大利亚事实上已参与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它派出自己的"军事顾问"去帮助已腐败透顶的西贡政权。1964年6月,孟席斯和美国总统约翰逊会谈时终于作出了澳大利亚参加这场战争的决定。1965年4月,孟席斯宣布政府已决定派遣一个一千五百人的正规营到越南。6月,澳大利亚人开始参加反对南越爱国主义者的军事行动。

自由党乡村党联盟政府的冒险政策激起了劳动群众的强烈抗议。国内反战运动不断高涨。成立了争取越南和平的协调委员会。1965年7月,工党提出要求将澳大利亚军队从越南召回。8月,堪培拉举行了反战示威游行。各工会和大学都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参加"肮脏的战争"。

政府不顾全国广大社会进步舆论的抗议,越来越深地陷在越南的冒险行动之中。1966年1月,孟席斯辞职,由哈罗德·霍尔 325
特继任。新政府继续奉行原来的政治方针。1966年3月,新政府决定派遣新兵到越南,虽然按当时的法令只允许派志愿兵出国。澳大利亚部队在越南的人数已达四千五百人。

越南战争成了1966年众议院选举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工党许下诺言说,一旦自己上台执政一定将部队从越南撤回。工会再次提出反对战争。这时自由党和乡村党便用"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来恫吓居民。天主教会也反对工党。在反共反工党宣传猖獗一时的形势下,右派极端分子于6月22日在悉尼组织了一次对工党领袖科尔韦尔的暗杀活动,使他受了重伤。

为了鼓动盟友的战斗精神，美国总统约翰逊于 1966 年 10 月访问澳大利亚。他的访问是为了提高政府在选举前的威信，以及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参加越南战争。

澳大利亚劳动人民却以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来迎接美国总统。在堪培拉，示威者组织纠察线，包围了用铁丝网和加强的警察部队保卫的约翰逊住地。

但是，执政党在选举中又一次获胜，而且两党联盟在众议院一百二十四个席位中所占席位数还增加到了八十二个。工党得到了四十一个席位。与此同时，在选举运动过程中，自由党乡村党联盟也出现了某些危机征兆。一部分自由党人反对参加越南战争并组织了“自由派改革小组”。

326 就在这期间，霍尔特政府却把澳大利亚驻越部队人数增至八千人。“霍巴特号”导弹驱逐舰也被派往越南。但是战况对侵略者并不有利，澳大利亚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这就使这场战争在澳大利亚人民群众中更加不得人心。1967 年 11 月，在部分参议员的选举中，执政联盟失去了两个席位。

自 1968 年 1 月起，约翰·戈顿开始担任政府首脑(哈罗德·霍尔特于 1967 年 12 月 17 日在潜水捕猎时溺死)。戈顿打算继续奉行自己前任的政治路线。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政策终将破产之势到 1968 年就已十分清楚。这时，在越南的澳大利亚军队已有三百人死亡，一千三百人受伤。自由党和乡村党在 1969 年议会选举的竞选纲领中主张在国家经济中不加限制地发展私人积极性和自由竞争；主张与新西兰进一步密切合作，积极参加澳新美安全条约集团和东南亚条约组织集团；主张争取在国外利用澳大利亚军队的机会；主张进行坚决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于 1969 年 7 月前改组为澳大利亚党的“自由派改革小组”继续要求从越南撤出澳大利亚军队。

工党分子主张加强整个地区的防务，并在马来西亚保留澳大利亚军队。他们许下的诺言是，如果工党大选获胜他们将继续忠

于澳大利亚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原有的结盟关系，而且不在国外利用澳大利亚的武装力量。工党分子还建议将全国的银行和最大的垄断组织收归国有，并再次提起"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主义化"。

民主工党同以往一样以反共的面貌出现。它要求以核武器装备澳大利亚，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保留美国在澳大利亚国土上的军事基地。

1969年10月选举结果，自由党和乡村党在众议院仅得到六十六个席位，工党得到五十九个席位。执政党联盟内部的矛盾由于失去大量选票而加深。1970年5月，自由党人在南澳大利亚州遭到失败，而同年11月在参议院选举中又遭失败。

六十年代澳大利亚外交方针的特点是忠实地追随美国的政策。澳大利亚的国土被美国用来设置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自1961年起这里就驻有美国U-2式间谍飞机。1962年5月，美国开始在澳大利亚建设新的军事项目。澳美军事合作无论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和澳新美安全条约集团范围内，还是在双边基础上都得到了发展。澳大利亚代表与美国就进一步统一装备问题进行了会谈，签署了一系列关于共同的军事纲领和购买武器的协议。1970年5月，澳大利亚赞同美国入侵柬埔寨。澳英关系始终相当牢固。1966年8月，开始兴建澳英联合海军基地。10月，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军队共同进行演习。

澳大利亚政府不止一次地反对英国削减在亚洲的驻军。同时，作为太平洋区域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之一的澳大利亚打算在英国撤离东南亚时占据其地位。在东南亚条约的范围内，澳大利亚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驻有军队，并向这些国家提供武器。1962年4月，澳大利亚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函中声明，它保留用核武器装备自己武装力量的权利。

澳日关系在六十年代发展迅速。自1963年起，日本成了澳大 327
利亚的羊毛、糖、煤和铜的主要买主。经济联系的扩大促进了两国

政治上的接近。1966年，有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以及南朝鲜、西贡和台湾政权参加的亚洲和太平洋理事会宣告成立，这就是这一道路上的重要标志。1967年6月在堪培拉，日本和澳大利亚武装力量代表战后首次就相互提供武器和武器标准化问题举行了会谈。

3. 新 西 兰

六十年代，新西兰竭力减轻本国经济对世界市场行情的依赖程度，因为它是国内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工业的发展受到重视。加工工业产值十年内提高了一倍。冶金、机器制造和化工部门发展迅速。自从在新西兰发现了油气田，石油加工工业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1967年，成立了国家石油开发公司。

但是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工业仍旧是新西兰经济的基础。在本卷所述时期内，新西兰的黄油输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占第一位，羊毛输出占第二位，干酪和肉类占第三位。1969/70年度，畜产品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二。人工播种牧场占全部可耕地的近百分之九十。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集中在大、中型农场。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提高；农场的拖拉机数量十年内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六十年代初，新西兰经济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国家对外贸易的逆差和国际收支中的赤字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由基恩·霍利约克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甚至被迫对入境移民加以限制。

新西兰对于英国打算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甚感不安，因为那样就会断绝新西兰商品进入英国市场的渠道，于是，新西兰开始寻求其他贸易伙伴。1961年5月，霍利约克总理就签订贸易协定一事开始与美国会谈。为了扩大国家的经济联系，成立了贸易委员会。新西兰与日本签订了贸易协定，并降低了日本商品的关税。1963年8月，与苏联签订了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协定。所有这些措施都促使新西兰的经济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现某些复

苏。由于羊毛和黄油世界价格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局面大有好转。

新西兰未能经受住1967年前因羊毛价格再次下跌而造成的困难，再次出现贸易逆差。1968年，全国失业人数达六千九百人（1963年为八百人）。政府不得不再次限制移民，减少进口，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借外债。刚刚发行的国家新货币单位——新西兰元（代替镑）不得不贬值百分之十九。到196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1969至1970年的干旱又使农业遭到极大损失，于是，自1970年年中起再次出现危机：通货膨胀加剧、物价猛涨。1970 328
年11月，政府设立了某些新税，并冻结了消费品价格。

新西兰和英国关系的削弱在六十年代已成为不可逆转和日渐加快的过程。新西兰对英国的出口额从1961年的百分之五十一下降到1970年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九，而从英国的进口额则从百分之四十四点七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可是同一时期内，新西兰对外贸易中的美国份额却有所增长：出口额从百分之十四点五增长到百分之十五点五，进口额从百分之九点四增长到百分之十三。日本在新西兰出口中的份额从百分之五点三增长到百分之九点八，在进口中的份额从百分之二点九增长到百分之八点三。十年内与苏联的贸易额增长了一倍。

在新西兰的对外贸易中，澳大利亚占有重要地位。自1961年到1970年，向该国的出口额从百分之三点八增长到百分之八点一，进口额从百分之十六点三增长到百分之二十点九。

新西兰农产品的主要买主是日本、美国和英国。1970年，百分之七十的出口羊肉是运往日本的。美国购买了新西兰肉类出口总额的一半，而百分之二十的出口羊毛则运往英国。

在整个这十年期间，在新西兰执政的是国民党。1961年，在国会的八十个席位中，该党占有四十六席。霍利约克政府不顾国内严重的经济状况，不断增加军费开支，从1961年到1970年军费开支增长一倍半，而对发展工业的拨款只增加一倍。

自六十年代初起，由沃尔特·纳什领导的工党，其内部的保守

倾向大大加强。1962年6月通过了新党纲，其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词句已完全消失。在1963年11月的国会大选中，工党仅得到八十个席位中的三十五席。但这次失败未能促使工党改变自己的路线。1964年5月，工党拒不接受新西兰劳联提出的在党纲中恢复早在1955年就取消的关于国有化条款的要求。党内各派系斗争的尖锐化导致其领导班子的更换；1965年12月，诺曼·柯克成了工党的新领袖。在1966年的大选中，工党再次失败。

1967年的经济衰退给国民党制造了不少严重问题，但由于六十年代末对外贸易出现了短暂的好转局面，使国民党得以在1969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与此同时，选举结果也证明了国民党的地位正在削弱。

国内工人运动日益壮大。新西兰劳联在1961年本联盟的代表会议上提出，反对政府打算取消必须具备工会会员资格的做法。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新西兰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但是仲裁法院在1962年7月通过了一项把工资只提高百分之二点五的决议。

1961年发生了七十一次罢工，共有一万六千六百名工人参加罢工，而1962年则发生了九十六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四万人。1962年8月，码头工人举行罢工。1962年12月和1964年6月，铁路员工举行全国性罢工。1967年的经济衰退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国内失业现象不断增多。1966年，登记在案的失业人数为五百人，而1967年失业人数约为四千人。1968年5月，仲裁法院再次拒绝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但后来在罢工运动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让步，同意增加工资百分之五。

1962年，为了加强国民党的影响，政府通过国会批准了农业工人法。该法令规定给予这一类劳动者以有保证的最低工资，并禁止使用不足十五岁的童工。

329 六十年代初，新西兰共产党内部的情况颇为复杂。党的领导不承认1954年通过的“新西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在工人运

动中开始推行左倾的、亲毛主义的政策。反对这一方针的共产党人退出了新西兰共产党，并于 1966 年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成立了新西兰社会主义统一党。1970 年召开的新西兰社会主义统一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在新西兰实现社会主义”的党纲。

在这十年期间，毛利族居民在政治上的组织程度有了提高。1962 年，诞生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毛利族组织——新西兰部族代表理事会。“拉塔那宗教独立运动”这一宗教组织也逐渐转向与工党取得直接联系。毛利人作为工党代表被选入国会。

移居新西兰各城市的毛利人大大增加，十年内毛利族市民几乎增加一倍。至 1970 年，毛利人总数达二十二万人。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毛利人是雇佣工人和职员，大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在加工工业部门就业，其他人在建筑业、运输业、农业、服务行业工作。对毛利人的歧视表面上已经消除，但是他们的工资仍低于白种新西兰人的工资。

执政的国民党主张在东南亚推行积极的政策，其理由是为了新西兰的“特殊利益”。1962 年 9 月，霍利约克政府与南越傀儡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新西兰越来越支持美国的政策，最终成了美国侵略越南的帮凶。1965 年 5 月，新西兰政府决定向南越派遣军队。1965 年 7 月，新西兰部队开始参加战斗行动。

新西兰的进步力量坚决反对霍利约克的反民族政策。许多城市举行反战示威游行。但是，政府继续向越南派遣新的部队。新西兰军队的人数不断增加，军费开支不断增长。

为了达到使新西兰更广泛地参加越南战争的目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于 1966 年 10 月访问新西兰。在他到达之日，新西兰劳动人民举行了反战示威游行。工党也反对出兵越南，但却同意向西贡政权提供其他军事援助。新西兰劳联的立场则比较坚定，它要求完全停止参加“肮脏战争”。

在 1966 年的大选中，越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国民党为其武装干涉越南进行辩解的理由是，必须履行对美国的盟友义

务和"保护"弱小民族免受"共产主义"威胁。选举获胜后，霍利约克政府继续奉行自己的对越方针。但是，军事上的失利，以及经济方面的困难迫使新西兰从 1970 年 8 月起逐步撤回自己的军队。

新西兰之所以要在太平洋地区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实际上是想从依赖英国转为依赖美国。由于参加侵略性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集团，新西兰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新西兰除了在越南和美国"合作"之外，还将自己的领土提供给美国供其建设"欧米伽"军事基地之用。

但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美国盟友的作用并未能加强新西兰的地位。1962 年，长期处于新西兰管辖下的西萨摩亚群岛争得了独立。1965 年，霍利约克政府被迫允许库克群
330 岛实行内部自治。

六十年代，新西兰和日本的关系发展迅速。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也得到了工党的支持。1970 年 6 月，工党领袖诺曼·柯克提出了建立一个有新西兰、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参加的军事集团的想法。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外交合作的特点是两国领导人接触频繁。1969 年，两国签订了双边防务协定。